

# 大和尚鉴真

舒展 可一

人称“淮左名都”的扬州城，在它的西北郊蜀冈中峰，有座著名的寺院——大明寺。大明寺内，端坐着一位楠木雕塑的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和尚。他看上去神情自若安详，更显得博学而高深，他两腿跏趺而坐，双手承结心印式，目虽失明，却能传情；正对东方，与邻邦日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内的同样一座彩色乾漆夹紵的和尚塑像东西辉映。他象一颗明珠，在中日两国人民深厚友谊的长河中，传送着情意，闪烁着光芒，为中日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就是人们常挂洁齿的，六次东渡日本传授佛法的唐朝高僧鉴真大师。

鉴真和尚（688—763年）俗姓淳于。唐中宗（李显）嗣圣五年，即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年）诞生在广陵（今扬州）江阳县。他的父亲曾向当时扬州大云寺（现大明寺）的智满祥师学过祥门，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鉴真从小就受着浓厚的佛教信仰的影响和熏陶。当他十四岁时（长安元年，701年）跟随父亲到大云寺巡礼，看见佛像便萌发出一种欲出家的念头。向父亲提出这个请求后，他父亲虽感到很吃惊，但很快允许了。当时，大云寺智满祥师也表示同意收鉴真为门徒。于是，鉴真就留在大云寺做沙弥。

705年，道岸律师为十八岁的鉴真授“菩萨戒”。这位青年和尚所表现出的第一个特点是好学不倦的精神。他如饥似渴地钻研佛教经典，已感到在扬州听讲不能够满足他的求知欲了。于是，他二

十岁时便跟随道岸去东都洛阳。次年（208年）在长安实际寺另一高僧荆州南泉寺的弘景禅师为他授足戒。来到长安后，继续深造。

当时长安、洛阳两京寺院林立，高僧云集。鉴真和尚在两京滞留时期，曾历访丛林，潜心钻研经典。先从济融律师习《南山律钞》（即律宗，又名“南山宗”的创始人道宣所弘扬的《四分律行事钞》）、《业疏》（授戒法的解释）、《轻重仪》（修行的规矩仪式）又随长安祥定寺义威律师所讲法砺律师的《四分律疏》从西明寺远智律师听讲《律疏》一遍，在洛阳又再听授记寺金修律师、慧策律师各讲《律疏》一遍，然后又在长安听观音寺大亮律师再讲“砺疏”（即法砺《四分律》）五遍。他们都是负有盛名的高僧。鉴真和尚在这些名师的讲授指点下，旁参经籍，潜心研究。

鉴真和尚还在艺术和医学方面下过一番功夫。

东、西两京有许多庄严华丽的名刹大寺，充满了各种风格的建筑造型、雕塑和绘画的杰作，这对于正当年富力强，感受力又极灵敏的僧人鉴真，无疑是汲取不尽的学习机会。就如他受具足戒的所在地实际寺，寺内的净土院，就是长安著名的胜景。另一座经塔小雁塔，当时正由鉴真的授戒师道岸律师监造，恰巧得以在营造过程中进行观察和学习，并取得了从设计、施工到装饰等各方面的实际知识，对他以后主持营建工作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长安时，他又留心与医药之学有关的知识。本来，佛教所传来的印度学术“五明学”中一明是“医方明”，即研究医理、方剂、药物之学。鉴真和尚的故乡扬州，那时也是医药之学较发达的城市。原来就对他熟谙医药是个天然的良好环境，加之长安更是名医群集的城市，为他研究医学创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

唐代长安又是外国僧俗聚集的城市，鉴真和尚在长安游学期

间，直接或间接地接触到许多外国僧侣，对他们那种为了佛教事业不辞艰辛、万里跋涉的献身精神自然深感敬佩，以致影响到他以后度生死于外，一心甘愿远涉重洋，赴日传法。

当鉴真和尚由长安回到扬州时，已是一个精通律学，兼具各方面知识的饱学高僧了。

鉴真学成以后，毫不留恋两京的繁华，仍返回扬州。那年是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年）他二十七岁主持广陵大明寺结会从事弘法传道的活动。除了讲经说法宣传教义之外还授戒传律。在扬州从事授戒度人和兴建佛寺等活动，当时的详细情况，据《东征传》中记载：“教授戒律，江淮之间，独为化主；于是六建佛事，济化群生，其事繁多。”可见，鉴真和尚又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宗教事业家。他一面授戒讲道，一面大力筹款，规划并亲自主持营建了八十多处寺院僧舍，指导塑造、绘制了大量的佛像和壁画；创设了救济贫病的悲田院和供养三宝的敬田院；还抄写了一万一千多卷经典，并又监制施送僧众的彩、帛、袈裟三千余领，供送五台山僧（缝衲袈裟一千领，布袈裟二千领，共三千余领）。至于他所主持的道场法事，则更难以数计。

他回扬州后，不仅做了很多工作，而且还培养了超群拔萃的扬州崇福寺僧祥彦、润州天响寺僧道全、西京安国寺僧璿光等三十五人，翘楚各方，弘法于世，引导感化民生，在当时的佛教徒中，实在是很少见。鉴真在当时的僧俗中享有很崇高的声誉，除精通佛经外，在建筑、雕塑、医药等方面，造诣也是很深的。

在当时，宗教徒之间最重宗派师承，宗派是由于对修行宗旨的不同。唐代的律宗三派，虽互为门户，但终以道宣弘扬的《四分律》为教义。鉴真和尚出家的授戒（具足戒）师道岸，当时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授戒师，曾经宫廷供养，多次主持皇家的法事，担任过许多东西两京及天下名山大寺的方丈。道岸于开元五年

(717年)圆寂后，他的弟子杭州义威律师继他为全国宗奉的授戒师。义威之后，鉴真和尚就成为全国众望所归的授戒宗主。他博才多学，佛教功底深厚，为人宽厚仁慈，又在发展佛教事业和社会救济方面颇有成就。因此，他从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四十六岁起，就是名满天下的律师权威，成为佛教界领袖群伦的人物了。他前后宣讲大律和疏义四十遍，宣讲《律抄》七十遍，宣讲《轻重仪》和《羯磨疏》各十遍。多年来，登坛授戒，度人四万余。他的优秀弟子如西京安国寺璿光、扬州兴云寺惠琮、江州大林寺志恩、苏州开元寺辩秀、天台国清寺法云等三十五人，都是各地著名僧寺的律师，在佛教界享有极大的声誉。鉴真和尚是名符其实的桃李满天下的律宗高僧。

那时，唐朝正处在全盛时期，又逢历代皇帝信宠佛道，加之唐朝又是全世界物质文化交流中心。因此，全国以及世界各地前来扬州向他顶礼问道的僧侣和信徒长年络绎不绝。据佛教史籍记载：“唐朝诸人，胡国、昆仑、新罗等人，皆以鉴真为授戒和上”。可见鉴真在国内外的声望。这与扬州是当时国际贸易的重要商埠是分不开的。

中日两国早在东汉以来，一直有着密切的往来，通过朝鲜作为桥梁，进行着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但这种交流规模还是很有限的。公元645年，日本实现大化革新，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一大飞跃。中日文化交流不仅更加频繁，而且规模壮大，更带有计划性，使中国文化的输入产生前所未有的作用。日本天皇曾十三次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政治、经济、建筑、音乐、佛学等。尤其是佛教，自六世纪通过中国、朝鲜传入日本后，中国几乎成为日本佛教的渊源。在日本，佛教信仰已相当流行，统治者为了政治上的需要，也日益重视佛教，加以扶植，以减缓异常尖锐的阶级矛盾。圣武天皇天平五年

并)四月,兴福寺僧荣睿和大安寺僧普照,衔着入唐邀聘高僧到日本担任传戒师,建立授戒制度的使命,随同日本所派第九次遣唐使多治比广成等一行出发,渡海往中国。

荣睿、普照由南路航行,首抵达苏州,后到达洛阳。此时玄宗正在洛阳,便在洛阳接见使节。荣睿与普照两僧被安排在游艺场的大福先寺(大福先寺原系武则天的母亲的宅邸)。他们到寺后不久,就奉朝廷敕令,跟从定宾律师受具足戒。定宾当时在律学上负有盛名。荣睿和普照来中国的目的,既是研习律学,又要物色律学高僧赴日。所以跟定宾律师从学,自然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但聘请一位有威望的律师赴日,却并非易事。经过多方努力,才先请到一位既习祥法,又明律学,兼善天台宗的道濬律师,于开元二十四年(天平八年,736年)随同副使中臣名代乘使船回国。第九次遣唐使船回国途中,三首脱险回国,一首途中遇难,无一生还。

此后,荣睿和普照再次由洛阳到长安,分别在崇福寺、大安寺攻习律部,并继续物色高僧赴日传戒。不久,他们便得知当代律学权威鉴真和尚在扬州大明寺讲授律学,门下人才济济。扬州又正是出海城市,如能往扬州启请鉴真和尚亲赴日本,或推荐几位精通律学,有传戒经验的律师赴日传法,便可说是不虚此行了。

他们兴致勃勃地奔往扬州,但对请求鉴真和尚赴日的事,却毫无把握。鉴真是位名震全国、海外有声望的大和尚,未必肯轻易远渡重洋。但如能真蒙他应允,那真是日本佛教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事。

一到扬州,他们立即到大明寺谒见鉴真和尚。鉴真和尚那时已五十五岁。他学识之渊博,教学之认真,以及为人之恳切真挚,都使荣睿和普照一见为之倾倒。他们恭敬地顶礼膜拜,启请道:“我国

在海之中，不知距此几千万里，虽有法而无传法人。譬犹终夜有求于幽室，非烛何见乎？愿师能辍此方之利乐，为海东之导师。”并向鉴真和尚详细叙述日本佛教界的情况，说明亟需讲习律学，建立完善的受戒制度，恳请大和尚东渡日本传戒。他们真诚恳切的态度，使鉴真和尚深受感动。

鉴真和尚对他们说：“以前听说陈代南岳慧思禅师寂没后，托生日本为王子，兴隆佛法，普渡众生。又听说日本长屋王子崇敬佛法，曾送袈裟千乘，施送此土众僧。袈裟上绣有四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了，共结来缘。’可见日本确是兴隆佛法的有缘之国。”说毕，他环顾在场的僧侣，询问谁愿意应聘，前往日本弘扬佛法。

当时是一片鸦雀无声，无人对答。僵持了半晌，在旁的徒弟祥彦才代表大家答道：“日本路途遥远，中间又隔浩渺沧海，惊涛骇浪，百无一至，旅途中生死难卜。大千世界，人身最可贵，降生中土，尤为难得。而且我等修行功德尚不完备，造诣不深……，所以大众都默然不答。”

鉴真和尚见无人应命，便慨然答道：“为这样的传法大事，何能顾惜身命！佛祖为了普度众生，尚且不惜身命，何况我等。‘你们如不去，我即去耳！’”

祥彦立即道：“大和尚如去，我也跟着去！”所有众僧都是对鉴真和尚一向爱慕备至的，他们既不愿离开他，更为他的献身精神所感召，都纷纷表示，愿意跟随大和尚前去。同行者共有道兴、道航、神顶、崇忍、如海、澄观、思托等二十一人，自愿随同前往日本，当场在佛前约议定当。荣睿、普照感动万分，欣喜万里来华，十年逗留，终获实现夙愿。

决心已定，鉴真和尚就率领众僧开始做远航的准备。广陵郡司仓参军事李凑，受李林宗的嘱托，为荣睿等修造大船，筹办粮

食给养。由于大批僧众未取得政府的出国许可，他们便假称是循海道到天台山国清寺去供养僧众。自天宝元年（742年冬至二年（743年）春，准备工作在既济寺、开元寺和大明寺等地已大致就绪。不料被学行平劣，似不宜去日本传法的如海等人卑鄙地告发衙门，诬称他们“造船入海，与海贼连”，要求火速拿办。荣睿等人于四月中被捕，到八月才被释放。第一次东渡计划未曾出海就夭折了。但是，荣睿一出狱，便再度拜见鉴真和尚，倾吐他的心愿，并征求鉴真和尚的意见，希望他能再次领导他的众弟子东渡。鉴真佩服荣睿，普照这种坚定的意志，安慰他们说：“用不到发誓，只要有这个愿望，总有达到目的的一天。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用一切办法来完成它。”

同年十二月，经鉴真和尚出资，与荣睿等设法，以八十贯钱买下岭南道来访处置使刘巨鳞所属的军舟一艘，雇好了十八名水手，置备了干粮、药物、经典、佛像、法器、艺术品等，同行的除了鉴真和尚外，还有祥彦、道兴、德清、思托、荣睿、普照等僧众十七人，连用玉作人、画师、塑像刻碑等各业医人，一行共八十五人。携青钱十千贯，正炉钱十千贯和紫边钱五千贯，驾着军船，从扬州出发，启航第二次东渡。不幸在他们的船行驶到长江口浏河附近，当时名浪沟浦（明州），遭到恶风巨浪的袭击，船被击破，只得上岸先住下，等修好船再出航。

第二次东渡的失败，并没有使鉴真和尚气馁。一个月之后，他们修好船，移船在大屿山，等到了好风，才开始启程，进行第三次东渡。可是，船刚出港又遇上了东北逆风，把船飘来荡去，无法操纵。经过多次努力，好不容易才靠近岸边，却又触了礁，船被击得粉碎。人船被搁浅在荒岩上。水米俱尽，饥渴三日，十分困苦，幸好风定以后，被渔夫发现，送水米接济。又过了五天，才有巡海官员来问明情况，报请余姚郡太守，把他们安置在鄞县（今

蕲县)阿育王寺。事至如此,东渡遂又以失败告终。

在阿育王寺时,附近的寺院听说鉴真和尚来此地,都纷纷前来恳请他去宣讲律学,设坛授戒。鉴真和尚先赴越州龙兴寺,随后依次应邀到杭州、宣州讲律授戒。其时,越州的僧侣得悉鉴真和尚是应聘去日本,便向越州官府要求挽留他,并认为他的赴日,纯属日本僧荣睿的主诱,只要处置了荣睿、普照,自然可以打消鉴真和尚的赴日之行。于是越州山阴县尉逮捕了荣睿他们。后来才因病请假释,报称亡故免于刑。

荣睿、普照两僧为日本的佛教事业,邀请鉴真东渡,历尽艰苦,矢志不拔,置生死于度外的精神深深地打动着鉴真和尚的心,于是他派遣大弟子法进,带了两个管事,携带“轻货”,前往长乐郡(福州)买船,同时来办粮食品,准备再度启航。就在他们取道南下福州的途中,发生意外。

自鉴真和尚天宝二年(743年)冬离开扬州后,扬州诸寺院的僧侣对失去他而不胜惋惜。他们极其关怀他的安危。他的弟子灵祐悉他准备从福州出海,就会同扬州各大寺院三纲(即上座、寺主、维那。是三个主持佛寺的僧职)商议:“我师大和尚发愿去日,登山涉海,数年辛苦,未能到达;沧溟万里,死生莫测,今后也前程难定,我们应告官将他拦阻。”于是,他们联合申告州县,寻迹到黄岩赴永嘉途中的祥林寺,截住鉴真一行,辗转护送回扬州,加紧守护。一连四次的失败,仍未有动摇鉴真和尚东渡的丝毫决心。

唐天宝七年(748年)春,荣睿、普照由同安郡(舒州)至扬州崇福寺,又和鉴真和尚相会,擘划制造船只,备办粮食香药百物,一如天宝二年所备,作第五次的东渡行海准备工作。至六月,准备告竣,同行的僧侣有祥彦、神仓、思托、光演、顿悟、道祖、如高、德清、日悟、荣睿、普照等道俗一十四人,连同水手等共



三十五人，于六月二十七日从崇福寺出发，在扬州新河上船启航。他们沿运河南下，很快就到了浙江越州的三塔山，在那里等风出海。真是不幸得很，当他们一进入东海，就又遇到了东北风，把他们吹向西南。十几天的海上漂泊，众僧以生米充饥，舟中淡水用尽，米粒咀嚼后既吞咽不下，又吐不出。海中咸水不但苦涩，而且还令人腹胀。有时得雨天，才得以接少量淡水取饮，可谓艰苦备尝。可后来他们并未到达日本，却漂流到了海南岛南端的延德郡（振州）。

延德郡别驾冯崇债得悉鉴真和尚到来，立即派兵四百人出至州城迎候，安置他们在州内大云寺。在这期间，鉴真和尚主持、修缮了大云寺的佛殿。住了一年，冯崇债亲自率领甲兵八百，护送鉴真一行直至万安州。

此后，鉴真和尚一路造佛殿、登坛授戒、宣讲律学。在从始安郡乘船循桂江东行，经苍梧郡到达高要郡（端州）龙兴寺时，因长期辛苦跋涉，染上重病的荣誉，奄然圆寂。鉴真和尚对这位多年来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的异国僧侣的圆寂，深感哀恸。至吉州（江西卢陵）时，他的大弟子祥彦病死舟中，使他又遭到一个很大的打击。祥彦一贯追随他，支持他的东渡。祥彦的逝世，无疑使鉴真和尚失去了一个重要的臂力。

天宝九年（750年），普照辞别鉴真和尚，自去余姚（浙江）郡阿育王寺。临行前依依不舍。鉴真和尚握住普照的手悲泣地说：“为传戒律，发愿过海，遂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于是分手，感念无喻！”

几年来，屡遭摧挫，饱经艰难的鉴真和尚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健康受到很大的影响，不幸在他六十三岁时，因南方长期感受暑热而患了目疾，经过一胡人治疗无效，反而双目失明，这对于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鉴真和尚一路经浔阳郡（江州），登庐山，再乘船由长江东下至丹阳郡（润州）的江宁县，遍历金陵著名丛林，在栖霞寺住了三日，过江回扬州。第六次东渡，就是由扬州出发，兜了一个大圈子，重又回到了扬州。

天宝十二载（753年），日本第十次遣唐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古麻吕、吉备真备等一行，来到扬州参见鉴真和尚。他们因得悉鉴真和尚五次渡海（的故事），愿向日本国传教的故事，便奏请玄宗准许前往。但玄宗又同时派了两名道士一齐赴日，而日本国天皇不崇信道教，遣唐使不便携带道士回国，只得奏请僧道一律不带。大使等表示，如鉴真自愿前往，则乘便船赴日之事，使团可以协助。鉴真和尚当即许诺。

可是扬州的僧俗都不肯放鉴真和尚赴日，对龙兴寺防卫甚严，难以成行。其时有方从东阳郡（婺州）来的仁幹禅师，知道鉴真和尚赴日的决心难移，愿意给予协助，便密具船舫，在江边相待。十月二十九日夜黑后，鉴真由徒弟护送，乘人不备，密出龙兴寺，至江头登舟。但是，还是有沙弥二十四人，赶至船上悲泣相送。他们说：“大和尚今赴日本，今生不再能有缘拜见，请求预结来生之缘。”鉴真和尚在行将别离祖国之时，也不胜依依。当场为这二十四人摩顶授戒。随即连夜启碇，前往苏州附近的黄浦，搭乘遣唐使团回国的大船。这最后一次同行的僧人，有扬州白塔寺僧法进、台州开元寺僧思托、泉州超功寺僧昙静、扬州兴云寺僧又静等十四人。其中思托在前五次东渡中，是每次随行，一直跟随在鉴真和尚的左右，艰苦与共，未尝携贰。第一次跟随鉴真和尚出发时，他才二十岁，到达日本已经三十二岁了。同行的还有藤州通善寺尼智首等三人，扬州居士潘仙童等三人，以及胡国人安姚宝、昆仑国人军法力、誉波国人善听等，总计二十四人。随带《大方广佛华严经》等各种佛经、论、疏等共八十四部，共三

百余卷。王羲之、献之父子真迹行书及其他名家法书数十帖。此外，还有大批佛像、绣轴、舍利、金塔模型及其他法器等等。

这次随行人员没有第二次、第五次那样多，所带物品也没有上次充分。他们一行从苏州黄泗浦出发，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于天平宝胜五年（753年）十二月二十日抵达日本九州南部的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今鹿儿岛），结束了十一年的艰苦行程。后来，日本人民在此地立有“鉴真大和尚上陆纪念碑”以资纪念。鉴真大和尚到日本时，已是六十六岁高龄的失明老人了。

鉴真和尚将中国古老的文化、先进的技术和人才来到日本，受到日本政府和人民热烈的欢迎。

天平宝胜六年（754年）二月初一，鉴真等人在普照的陪伴下抵难波。难波佛教界，有中国僧人崇道等接待。又进入河内国（大阪府），受到当时日本统治阶级大纳言正二位藤原仲麻吕代表日本政府的欢迎。此外来欢迎拜谒的，还有日本高僧如志忠、灵福、贤璟、晓责等。在到达奈良（当时日本的首都）时，天皇政府已派安宿王作为天皇的代表，用敕使名义在首都的正门罗城门外迎候。在安宿王的导引下，鉴真一行进入了东大寺；在那里，又有天皇朝廷的公卿武士和僧人等出迎，场面非常盛大。

在鉴真初到日本的第一月里，每天来拜谒的人络绎不绝。天皇朝廷的显赫人物，皇族中的权贵，也都一一前来礼拜。日本天皇朝廷还对鉴真以次诸僧一一赠授名号，赐物慰问。他们对于鉴真一行僧人的尊崇是十分隆重的，是前所没曾有过的最为优厚的待遇。

不久，在东大寺的卢舍那大佛前建立起戒坛，由鉴真和尚登坛主持。先是当时已是太上皇的圣武天皇授菩萨戒，接着皇太后和皇子也依次登坛受戒，又为沙弥澄修等四百三十余人授戒，最后为内道场兴行僧神荣等五十五人重授大小乘戒。后来，又在东

大寺修建了唐祥院为训继和教育僧侣的寺院。次年（ 年）被天皇任命为律师。天平宝字元年（757年）又授予鉴真“大和上”（梵文在西域语中的讹译，是指修道高深的师僧）称号，并下旨继续建筑建初律寺。两年后落成，由淳仁天皇颁赐敕额“唐招提寺”，同时宣旨，凡出家人必须先至唐招提寺研习律学，然后可选自己的宗派。此后，鉴真和尚聚集四方学徒，讲律授戒，颇极一时之盛。

年近古稀之年到达日本的鉴真，终日因忙于开坛授戒，营建唐招提寺，佛事冗杂，严重地影响着他的身体健康。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七年（763年），唐代宗广德元年五月初六，这位为传播佛法和中日文化交流而奋斗不息的高僧，因衰老而以七十六岁的高龄寂化于日本。临终前，他嘱咐弟子们，期望他们在一个较长的时间中，继续修缮唐招提寺。他还念念不忘于戒律的传播和四方前来学习的僧侣们的生活，曾对思托说：“我若终，己愿坐死，汝可为我在戒坛院别立影堂，旧住房与僧住。”这种念兹在兹于弘法而丝毫没有考虑到个人得失的精神，为他的弟子们所继承。他死后，思托等跟他一样艰苦奋斗，使律宗在日本佛教中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宗派，与三论、成实、法相、华严、俱舍并称南都六宗。

在鉴真和尚一行到达日本以前，长达五六百年的时间中，已经有大量的中国文化通过两国使节和人民的往来，移植到了日本，对日本的政治、经济、生产技术、文学艺术乃至社会风习诸方面，都产生了深广的影响。而鉴真和尚的东渡，为日本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他不仅对日本佛教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在建筑、雕刻、文学、医学方面的建树及其影响也是极为显著的。日本的书法一直流传发扬至今，与鉴真和尚赴日时带去的一些中国著名书家墨迹有很大关系。中国的文化影响着日本文化至今的发展，而鉴真和尚却又是中日文化血缘缔结纽带的不朽人物，永

远值得中日人民的怀念。尤其是日本人民对鉴真和尚的感情迄今依然，他们极其崇敬这位为缔结中日文化血缘关系而渡海献身异国的大师。

1963年，鉴真圆寂一千二百年，中日两国佛教界和文化界同时广泛、隆重的举行纪念活动，并互派代表参加。中国佛教界又在端州(今广东肇庆)，为因中日友谊奔走而客死他乡的日本僧人荣睿示寂的地方立碑石致敬。

1980年，鉴真像回国探亲，在扬州和北京都受到中国人民和佛教徒的瞻礼，更加增强了中日两国佛教界和人民的友好关系。

# 圆瑛法师传

舒 华

圆瑛法师生于1878年，是福建古田县端上村人，俗姓吴，父元云公，母阙氏，名亨春，五房昆仲，只此一嗣。小时能过目成诵，聪颖过人。17岁时，觉得人生如梦，便想舍俗出家，由于叔父极力阻拦，没能如愿。18岁时一场大病，更加坚定了他出家的决心。病愈后，出家于福州鼓山涌泉寺，礼莆田县梅峰寺增西和尚为师，法名弘悟，字圆瑛，号韬光。自号一吼主人、三求堂主人、灵源行者、离垢子。19岁时依鼓山涌泉寺妙莲和尚受具足戒。

圆瑛受戒之后，就在鼓山安居，随妙莲老和尚学习律仪。半年后，又到大雪峰寺，从达本老和尚为师。在寺里修习苦行，曾任饭头、菜头之职，共达半年，劳动精勤，深受大众称赞。21岁时发心参访诸方名刹。先在常州天宁寺向冶开考和尚学习禅定5年，后又在宁波天童寺从寄禅老和尚习禅6年，后又历参通谿、谿闲、祖印、慧明、道阶诸尊宿。最令人惊奇的，是圆瑛才听经数日，座主法师就让他复讲，圆瑛从容演说，辩才无碍、令大众十分惊异。此后，或研教观，或究向上，圆瑛悉心学习，终致宗说兼通。圆瑛得法于宁波七塔寺慈远，亲承法印，传临济正宗四十世。又传福州大雪峰寺达本心灯，为曹洞正宗第四十六世。此后，朝礼五台山，九华山、普陀山等名山胜迹，得到很多感应。虽然饱历风尘，然而即事会心，得大成就。一日，圆瑛在天宁寺

带病参禅，定境现前、身心廓然，流露出这样的偈语：“狂心歇处幻身融，内外根尘色即空，洞彻灵明无罣碍，千差万别一时通。”从此对于许多经论一向所未能明了的，无不了知。但圆瑛仍不以此而自满，26岁时，又到宁波天童寺跟禅宗尊宿寄禅习禅，一心参究，大有省发。28岁那年冬天，在禅七之中，定境复现，更胜于前，顿时身心俱空，湛寂圆明，又说偈曰：“山穷水尽转身来，迫得金刚正眼开，始悉到家无一事，涅槃生死绝安排。”此后日益增进。圆瑛禅净双修40余载，曾经著述净土法门各种经论，并在1935年秋在上海创办圆明讲堂，以此为讲经弘化净土道场，组织圆明莲池念佛会，高扬净宗宝炬。信受奉行着。难以数计。明哲法师就是其中之一。

明哲10岁那年，跟随爷爷去普济寺参加法会，得到圆瑛所著《金刚般若经讲义》、《阿弥陀经讲义》和《劝修念佛法门》。书中有圆瑛法师威严而又慈爱可亲的德相，令明哲肃然起敬。他不断学习圆瑛法师的佛学著述，萌生了追求佛法的极大兴趣。当时，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下，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明哲为了生活当过学徒工，学过医生，也学过司机，几乎将青春热力消磨净尽，在恶劣的社会环境逼迫下，他产生了厌世离俗、出家学佛的思想。1948年他到上海圆明讲堂，投拜圆瑛座前恳求出家。当时，圆瑛法师闭门谢客，幸蒙明暘法师引荐，明哲才得以拜见圆瑛。当时，明哲随明暘法师上楼后，看见清净庄严的殿堂供着西方三圣，东西两壁供着十八罗汉画像，香案上陈列着香花和供品，上面悬挂着九品莲灯，案旁还安放念经做佛事用的木鱼铃鼓。圆瑛法师手拈佛珠，身穿黄袍，慈眉善目，从禅房徐徐走来，如活佛一般。明暘扶着圆瑛坐在红木大法椅上，明哲走上前去，恭敬地说：“少年时，经本地居士林介绍登记，寄名皈依您老人家为师。今抱着学佛夙愿，专程前来，恳

求出家。’圆瑛亲切地问：“你这么年轻 为什么出家 出家的目的是什么？”这时，明哲满腹苦水恨不能倾泻而出，回答说：“老法师，我感到人生很苦，觉得佛门清净安乐。我出家想学象您老人家这样有道德、有学问、讲经说法，教化众生的法师。”圆瑛听后微微地笑了，严肃地对明哲说：“出家学做法师，不是最大志愿，必须发起‘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的大菩提心，才是最大的志愿。此外，还要认真地学修，住持如来正法，维护祖师道场，为人类多做功德事情，才是出家学佛的宗旨。”明哲听后非常感动，遂伏地叩拜，诚恳地说：“我一定记住您老人家的教训，遵照您老人家的教导去行。”在明暘和居士们的恳求下，圆瑛让明哲写了出家志愿书，收他做了最后的剃度弟子。

明哲出家后，圆瑛让他去风景幽美的福建鼓山涌泉寺受丛林道场的正规教育。圆瑛法师知道山上生活艰苦，经常给明哲寄零用钱和衣物，其他僧众也常得到他的资助，不管是全国各寺庙的当家知事，还是一般僧众，不管是为寺庙公事，还是为个人困难，只要求助于他，都会得到帮助。每逢圆明讲堂举办法会，上海一些不务正业的马流僧来到这里，圆瑛对他们也给予照顾。总是先叫人给他们好的斋饭吃，然后再给每人一个红包，又严肃地教诲一番，让他们欢喜而去。1952年，圆瑛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之后，回到上海圆明讲堂，举办了49天和平法会，收入的香金达亿元（旧币）以上，除开支外，其余全部供给各地大小寺庙，资助僧众生活。这种平等利人的菩萨精神，不仅为佛教徒所崇敬，也为世人所赞叹。

我国自唐代禅宗兴起，即提倡农禅学风。圆瑛常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来要求自己。1909年，在宁波创建接待寺道场时，圆瑛亲自操理百多僧众的衣、食、住、医药等，还要应酬人



情世事，讲经说法，教化信徒。遇到经济困难时，愁得连饭都吃不下。有一年春节快到了，寺内过年的东西还没有着落，圆瑛赶忙去宁波城里想办法，运回来一大车过年的东西，寺里僧众感动得流下了热泪。还有一次，他为寺里购运柴米，亲自撑船，不料船翻落水中，圆瑛紧紧抓住船帮，飘流很远，才被人抢救上来。寺里吃水用水困难，需要挖井，圆瑛就下井挖泥淘井，寺庙里房子坏了，圆瑛就上房修补。他不仅是高升法座的大法师，还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继承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高风，为僧众树立了榜样。

圆瑛自行化他，德望远扬，各地名山大寺，纷纷礼请住持。一生十主禅林，领众学修，都是清规整肃，海众安和。他曾先后在福州雪峰崇圣寺、鼓山涌泉寺、瑞峰林阳寺、浙江宁波七塔报恩寺、天白山天童寺任住持，远及南洋槟榔屿极乐寺，圆瑛也任过住持数载。这些历史名刹，都名德辈出，神僧云集。圆瑛对这些寺院都进行过程度不同的整修，既为佛教徒提供了良好的活动场所，又保护了国家的文物古迹。如大开元寺的两座石塔，是世界闻名的胜迹。20年代圆瑛住持开元寺时，塔身年久失修，多有破损，潜伏着倾倒的危险，于是，圆瑛法师劝得几位檀越布施净财，进行了修复和加固，获得了海内外人士的赞扬和敬仰。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三省。圆瑛当时担任全国佛教协会主席，他义愤填膺，通告全国佛教徒，建立护国道场，同时代表中国佛教会致书日本佛教徒，揭露日本侵略者占领我东北三省的暴行，要求日本佛教徒和中国人民一道，本着佛陀的大无畏精神，共同制止日本的军国主义。1937年卢沟桥事变，国难当头，圆瑛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他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并亲自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团长，召集苏、沪佛教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进行救护工作。又

奔走各地，组织救护队，办理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收容无辜难民和抗战受伤的战士。圆瑛法师还对僧侣救护队员们说，要每一个成员以“大无畏”“大无我”“大慈悲”的“三大”精神做好抗战救护工作，法师说，这个“三大精神”，是大乘佛教救世学说的原则，“无畏”就是无所畏惧，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奋不顾身地投入到抗战救亡中去。“无我”就是忘却身家之我见，置自身生死于度外去救护别人。“慈悲”就是救苦救难。有关“慈悲”的见解法师对弟子们说：菩萨慈悲，不能“一任强暴欺凌迫害”不能“坐视弱小无辜横遭杀戮”；不能眼看着无数生命在残酷敌机下被摧残，尤其不忍听那为了抗击日寇而负伤在沙场上断臂折足的哀呼惨号”，所以，“挺身而出，惩一敬百，诚少以救众，负起抵抗侵略的救亡工作”，这正是大悲大勇的菩萨行。

圆瑛法师不仅这样教诲别人，自己一直身体力行。为解决经费困难，他带领弟子明暘前往南洋筹集经费，倡导“一元钱救国运动”，得到广大爱国侨胞的支持，募得了相当的款项，以充佛教医院和收容所的经费。1939年9月初一，在圆明讲堂莲池佛会成立时，圆瑛正在大殿上礼佛，突然来了4辆日本宪兵队的汽车，几十个宪兵包围了大殿，以抗日分子的罪名，逮捕了圆瑛法师和弟子明暘。宪兵们面目狰狞，虎视眈眈，而圆瑛一心念佛，平静如常。每当深夜，日本宪兵就对圆瑛严刑审讯，圆瑛几濒于危，仍从容陈辩，理直气壮，义正辞严。表现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民族气节。他虽身陷囹圄，心念地狱、天宫皆为净土。除审讯外，他见缝插针，连续打了三个静七，并绝食以示抗议，和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敌人见严刑审讯无效，便改用劝诱“合作”。法师以老病拒之。日寇无奈，只好将师徒二人放出。以后，日寇又几经纠缠，企图利用法师的声望，为日本侵略者服务，均被圆瑛法师

一一托词拒绝。他对外宣称闭门谢客，专事著述《楞严经讲义》，以应付日本侵略者和汪伪的纠缠。但他对国家大事从未忘怀，为北京中国佛教学院师生赠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鲜明地号召佛教青年要肩挑“救国兴教”两付重担。圆瑛坚贞不屈的爱国精神，博得了广大群众和教友同声赞美，称之为“爱国老人”。

全国解放前夕，上海人心慌乱，居住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的教友和弟子，纷纷函电并买好飞机票，催促先师飞往南洋安度余生。先生复信均以“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往”为词，婉言谢之。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第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权。特别是建国初期国家经济还很困难的时候，就拨出了巨款维修佛教的名胜古刹，给信教群众以宗教活动的自由，保护教徒群众的合法权益，帮助有困难的教徒解决生活问题。这些，都给圆瑛许多新的认识。1952年9月，他在一次宗教座谈会上，作了以“我们获得了真正的宗教自由”为题的发言。他说：“我做了50多年的佛教工作，但直到最近的3年多，我才有了一个认识，这就是：真正的宗教自由，只有在和平民主国家里，才可以获得！这个认识过去是没有的，而是由于我3年来的亲身经历，一天一天地确定起来的。”这是法师从内心深处发出来的声音。抗美援朝时，法师积极响应号召，并做了捐献。当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确定于1952年10月在北京召开时，法师致函中央有关领导，表示竭诚拥护。不久，法师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代表中国佛教界出席了这次会议。为保卫和平事业做出了贡献。会议期间，并同与会各国佛教代表签署了《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佛教徒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制止侵

略，保卫和平，是当前每一个人的迫切任务，也是我们佛教徒的迫切任务。”又在北京佛教徒的欢迎会上号召：“佛教徒团结起来，争取和平，保卫和平！”他说：“圆瑛自愧年老力衰，身体多病，本来不能代表出席这伟大的和平会议，为了争取和平，不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要共同努力，尤其是我们佛教徒更应当要为和平而努力，因此激发了我的勇气和信念，所以带病来京出席。”

“我们佛教徒既为佛子，当作佛事，什么是佛事？这伟大的和平运动，真是佛事。”“我们佛教徒个个都应该做这个和平运动的大佛事！”

会议以后，圆瑛返回上海。为了祈祷和平，宣传和平，他在自己驻锡的圆明讲堂起建了盛大的祝愿世界和平法会，进一步扩大了和平运动的影响。

1953年5、6月间，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召开成立会议。这是中国佛教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盛会。圆瑛虽因病未能出席会议。由于他的威望和全国佛教徒对他的信任崇敬，仍被推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

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后，圆瑛法师由于积劳成疾，又受过日本侵略者严重摧残，病重住进上海华东医院。病中，圆瑛安定如故。一天，对弟子明旻等言：“我今病势严重，恐难痊愈，但我身后安排，一切宜从简约，只以佛教仪式，清净庄严为原则。我今身心尚感安乐，无罣无碍。出家人置生死于度外，以疾病为助缘。余号‘三求堂主人’，平生以求福、求慧、求生净土为宗旨。现在福慧已求，最后只有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再三叮嘱明旻等诸兄弟：“汝等立身处世，以三求为正确修学方针，更希望广大佛教道友信徒以此三求为真正学佛宗旨。”

1953年7月中旬，圆瑛自知尘缘将尽，决意归老于宁波天童寺，即嘱咐明旻说：“我们出家人，生归丛林死归塔，我决意要回

天童。”于是束装就道，由明旸和医师随车看护照料，沿途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专车护送，圆瑛对此万分感激。

此次临行前，圆瑛写下遗嘱一纸，交给赵朴初居士，留待身后发表，原文如下：

余一期将尽，力疾还山，身托祖庭，心栖净土，于兹当长别，愿留数言：

一、社会道德，普遍提高，时节因缘，不可思议。凡我佛子，各宜精进，力行十善，勤修六度，行菩萨道，报丛生恩。各宗各派，同宣斯义，出家在家，各尽其力，互助无争，团结第一。

二、余以衰年，幸逢盛世，去岁晋京，参加和会，得见开国之伟大气象，及各邦人士对吾国之衷心爱敬，使余于祖国建设与保卫和平事业增加无限信心，深感毛主席领导英明，旷古未有。愿我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和平事业。应思利民护国，饶益有情，乃成佛之基，众善之首。

三、四大幻住，迁化随缘，身后安排，宜从简约。发心开吊，世给所为，悉当免除，毋增罪咎。

公元 1953 年 8 月 15 日

圆瑛

圆瑛安抵天童寺时，瞻顾松风尚在，泉壑依然，巍峨庙貌，清净庄严。全寺诸师，在山门前热烈迎接。圆瑛喜慰非常，身心安乐，静养期间，仍关怀寺内兴修，由诸师扶抬病榻，参观全寺，殊感欣快。9月18日这一天，他精神极佳，毫无异状，下午1时，把明旸唤入室内，说：“将我夹袄、夹裤、黄鞋、布袜取来，为我更衣，扶我出去，到庭前看看。”于是，明旸将他扶起，跌坐达1小时。这次跌坐和行走为数月来所未有。深夜11时，诸

师和信徒们齐集师前一心念佛，圆瑛嘴唇亦微动，默念佛号，1时15分，圆瑛以慈眼向左右环视，作告别意后，闭目正卧，于大众念佛声中，安详辞世。

10月1日，为法师进塔典礼之期，天气清和，不寒不暖，慈云普覆，大地清凉。上午8时起龕，天童寺诸师、暨宁波各寺庙庵堂佛教团体代表并皈依信徒、四众弟子等300余人列队前行，幢幡先导，提炉后随，法乐俱奏，钟鼓齐鸣，四众弟子各各手执名香，口宣佛号，护送上山。时四方乡民2000多人，夹道瞻仰，途为之塞。10时整，法师莲龕奉安入塔，由应慈法师说法安位，仪式极为隆重庄严。午后2时，全寺诸师，复为称念普佛，慕送莲位供奉于天童寺祖堂。

圆瑛圆寂消息由新华社报道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刊载法师圆寂情况，并深致哀悼。北京广济寺、上海玉佛寺相继举行追悼大会。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等单位派代表出席了追悼会。国内外各地佛教团体教友同仁、相继为圆瑛举行公祭，诵经念佛，礼拜修持，回向师尊、高登莲品，乘愿利生，情谊恳挚，正如赵朴初副会长在追悼会上所说：“9月18日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去年9月18日，圆瑛法师抱病晋京，为保卫和平事业奔走辛劳，今年的9月18日，他示寂于天童，与我们永别了。虽然他与我们的距离十万亿佛土，但他爱护祖国的热忱，保卫和平的真诚，使我们之间的距离，即微尘也不存在。”

## 爱国诗僧宗仰

周文晓

加入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僧人前后有五人，而以方外列入南社社籍的只有湘僧永光、粤僧铁禅。柳亚子称广东曼殊法师苏玄瑛为“逃释而归儒”称浙江弘一法师李师同为“逃儒而归释”。江苏常熟乌目山僧黄宗仰则是忽僧忽俗，儒释同致，被人们誉为天下奇僧，佛教界的第一流人物。宗仰上人不仅是一位颇有影响的诗人、画家、教育家、佛学家，而且跟孙中山等许多革命党人有过密切交往，是反清革命组织兴中会和同盟会的会员，积极从事民族民主革命活动，是我国近代史上托迹空门的爱国志士。

宗仰上人，俗姓黄，原名浩舜，法名用仁，宗仰是他的法号，又号乌目山僧、中央，别号楞伽小隐，晚号印楞禅师。1865年5月生于常熟南城门外一户从事米业的商贾，其父祖辈在紧靠城门的西南河沿，临水开设一家黄大隆米行，算不得巨富，却也很殷实。母亲赵氏笃信佛教，为虞山三峰清凉寺信女。他从小聪明好学，才智过人，从不过问家中生意，除了读书求学外，每当母亲去三峰进香，总是随侍在侧，因而从小就受到了佛门的许多熏陶。16岁那年，因不嫌于父兄逼他学掌店事，愤而出走三峰清凉寺，削发为僧。他的母亲却以为“一人入戒，七世超度”，对此举并不加阻止。清凉寺主持玉峰大和尚药龕上人，戒行著于江南，与光绪帝师翁同龢、著名藏书家归山楼主人赵宗建等士人过从甚密。药龕得宗仰，奇其才，延聘名师王伊课其读。王伊

(1838—1908)，字影石，号聘三，为清乾隆名士王柳南玄孙，著有《四书论》、《五经论》、《白茆水利考》、《三峰清凉寺志》、《小塘东斋诗文钞》等。宗仰受学于名师，加上三峰寺藏书甚丰，可供其博览。他深研释氏内典，旁涉中外学说，诗画琴棋，无不窥其堂奥。他作山水，落笔如风雨，苍秀中见劲气；他的诗受到龚定庵、黄遵宪、郑珍等人的影响，苍茫突兀，排闥直入，充满爱国主义热情。一日，翁同龢省亲回到常熟，于三峰寺看到宗仰的诗文，极口称赞“辞茂义幽，莫测其际”。并说：“子习举子业，住著自缚，倘入缁门，慧海之舟楫也。”宗仰遂栖神内典，视功名如粪土。

清朝末年，政治腐败，时势阽危。宗仰虽入佛门，但与城里的一批读书人经常往来，议论时事，抨击朝政。20岁那年，他应那些青年维新派的邀请，出游无锡三月半庙会。春日庙会，风和日丽，熙熙攘攘，士女杂处，游人云集。他厕身其间，一些人认为触犯了戒律。此事被三峰寺施主含辉阁赵家知道了，认为有损寺誉，要玉峰和尚严加管束。玉峰狠狠训了宗仰一顿，扬言要逐出寺院。宗仰个性很强，受不得那般屈辱，决定离开三峰寺，去当一名云游四海的游方僧。玉峰和尚听说爱徒真的要走，反倒老泪纵横，如失扶持，亲自把他送到镇江金山寺挂单受戒，改拜该寺方丈长净（号显谛）为师，要求长净法师多加关照。长净见宗仰颖悟非凡，十分喜欢。先是叫宗仰在寺内研习梵、日、英等文字，以后又写给他一纸度牒，派他到南北名刹朝山进香。宗仰于是道齐鲁，游燕赵，继而浮海至闽粤，遍历各省名山大川。每到一处，他或详图画，或赋题咏，气益豪、诗益壮，画益进。“垂救沉沦”；“乘时崛起”的爱国之心更趋炽烈。

宗仰经一年多的游历，重新回到镇江金山寺，他虽很年轻，而他的才识已为金、焦、北固诸山寺院中的僧侣刮目相看，长净



方丈就派他做知客僧，任职监院。当时上海犹太富商哈同正在静安寺路筹建一座花园，其夫人罗迦陵是华籍人，崇信沙门，要在园中建设经堂，延致群僧讲授梵典，于是专程前往金山进香，礼聘宗仰主持讲座，并拜宗仰为师。宗仰应邀莅沪，受罗迦陵香火供奉，几于无言不从。宗仰既通释理，又懂得东方园林艺术，所以那爱俪园的计划和监造大部分都是宗仰一个人负责。他在园中设计了83景，并亲为题识，就连园名爱俪园也是宗仰从哈同的全名“欧司·爱哈同”和罗迦陵的英文名字“俪蕤哈同”中各取一字而成。

爱俪园建成后，哈同夫妇对宗仰更是言听计从，有事必与之咨商。宗仰劝哈同夫妇要把钱花在公益事业上，以便留名于后世，博个慈善家的名声，这对念经崇佛的罗迦陵来说正中下怀，于是斥资修葺名山古刹，赈灾救贫，广印经典。宗仰还到处搜罗文人墨客，崇尚古学，辑印书籍，以广流传。如罗振玉、王国维、邹景叔、冯煦、费恕皆等著名学者都先后到过爱俪园。爱俪园内曾办过明智大学、明智文学、华严学院、广仓学会、广仓学文会、广仓学古物陈列会，仓圣万年耆老会、迦陵学社等。请专家们从事经学、小学、史学、文学、佛学、文物、金石碑版等方面的研究，还出版过《学术丛编》、《艺术丛编》等刊物。这一切在宗仰而言，是利用哈同的经费，为中国古文化的研究和保存作一些贡献；但在客观上，这些慈善活动，也多少掩盖了哈同这个胸无点墨的冒险家的真面目。当时的民国政府多次晋给哈同以嘉禾章、文虎章，还赠以“抗怀希古”的匾额，颁发过一等三级、二级宝光慈惠章。所以罗迦陵晚年以“慈淑老人”为别号，以示慈善贤淑。

宗仰到上海未久，戊戌变法失败。他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祖国河山被列强瓜分的局面，忧心如焚，他原所接受的“尊王攘

夷”的思想逐步动摇。1899年，他与唐才常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国会，后称“四民公会”，意思是包括士农工商的爱国团体。当时帝俄图占满洲，逼清政府签订密约。“四民公会”和忧国之士集议张园（亦称味菴园），宗仰登台演讲，情词恳切，扣人心弦，听者无不动容。会后致电清政府，要求废除密约。1900年，庚子国难，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下逼盟，帝国主义列强逼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宗仰既耻又愤，遂于1901年作《庚子纪念图》并题诗：

戊戌惊秋迄已庚，三年政变太纷更，  
 难倾铁泪详图画，只记颓京城下盟。  
 骊龙颌下奇珠余，大地于今愤未摅。  
 驯致铜驼呜咽泣，尚听阍柝许袁徐。  
 中原逐鹿 亟 帖危，王路星轺日夜驰。  
 西幸诏多哀痛字，士民椎血向隅悲。  
 障尽狂澜孽海存，残山剩水气重温。  
 金轮馀燄依然炽，更有何人敢上言。  
 不有韩欧赞政新，养成藩阉窃鸣钧。  
 霜华秋水流丹血，反思灵爽 恸 尘蒙。  
 倘能銮辂归期 手，复辟应生讲睦戎。  
 今日安危望济康，大千世界仰当阳。  
 君民矢志前尘事，石烂海枯永勿忘。

他的画和题诗发表以后，轰动朝野，一时志士仁人附咏殆遍，“不忘国耻，振兴中华”成了当时国人的共同呼声，宗仰的爱国名声传遍海内。

宗仰在《庚子纪念图题诗》的序言中说：“昔枚乘作七发，以疗疾……衲自题 庚子纪念图 诗亦以七为数，犹是志耳。呜呼，中国之病痼矣，始患麻木不仁，支解罔觉，继成内伤，复召

外感，酿此不治之奇症，经曰丧心病狂之谓”，又说要治国病，必须“伐毛洗髓 剖腹湔肠”。可见宗仰已不寄希望于“投药石”搞变法，而是要“动手术”，尽管他未提“革命”二字，但至少已经接近了革命的思想。

戊戌政变后，中国的资产阶级进步人士和激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要救国必须推翻满清政府，建立共和制度。各种反清的秘密团体相继出现，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正在酝酿之中。宗仰的爱国主义思想必然导致倾向革命。1902年，他的献身济世之志付诸行动。他和蔡元培、章太炎、蒋智由、吴稚辉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教育会”。这是一个以爱国教育和推翻满清政府为己任的革命团体，推宗仰为会长，蔡元培为事务长（后任会长），教育会最初目的是要通过改良编制教科书，向青年灌输新教育，认为振兴中华，推翻满清，非从改造青年思想入手。1903年，清廷为防止留日学生受革命影响，照会日本政府，决定停派留日学生，禁止中国学生肄业陆军，于是一批留日学生退学归来。同年11月，上海南洋公学因禁止学生言论自由，发生罢课风潮，校方实施高压政策，迫令二百多名学生退学。这些退学的学生纷纷求助教育会。宗仰向罗迦陵募得白银五百两，又办了一所学校，取名爱国学社。收容从日本、南洋公学及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的学生。此前还创办过一所爱国女学校。这几所学校提倡民权和言论自由，宣传排满革命，并定期进行军事训练，成为完全新型的学校，是当时东南教育界的革命阵地，为以后的辛亥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同年5月，宗仰还资助浙江大学堂退学学生组织“新民塾”。他的这些革命活动大大加强了上海与东南地区革命者的联系，许多革命志士纷纷来到上海，使这座人称“冒险家的乐园”的大都市成了辛亥革命准备时期东南革命的中心。宗仰以他的特殊身分和与罗迦陵的佛缘关系，利用哈同花园这个安全区，为集结革命志

士，募集革命经费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1903年6月，章太炎针对保皇派康有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的谬论，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印成小册发行。《苏报》主编章士钊节录其中一段，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公诸报端，文中指斥光绪皇帝“载湫小丑，未辨菽麦”，大骂清政府是野鸡政府。于是清政府下令封禁《苏报》馆，搜捕章太炎、邹容、蔡元培、吴敬恒、陈范等人。教育会及学社主要人物纷纷逃亡日本。宗仰独留沪，百方设法营救。他在爱俪园还写了一首著名的古歌行 题目为《驳康书 书后》诗曰：

余杭章，南海康，章公如麟康如狼。  
 狼欲遮道为虎怅，麟起啖之暴其肠。  
 廿周新纪太平洋，墨雨欧潮推亚强。  
 军国民态正激昂，奔雷掣电孰敢当。  
 胡牛瞎骑逐臭忙，兔引狐牵金满装。  
 喻犹一盲导犀盲，夜半冲暗投深坑。  
 投深坑、自依殃，一颠再蹶徒心丧。  
 独立帜已飏霄光，国权誓雪民权昌。  
 昆仑血脉还系黄，呜呼噫嘻南海康。

诗中充满了民族的正义感，“章公如麟康如狼”，直截了当地歌颂了章太炎，怒斥了保皇派首领康有为。他还写了一首歌颂邹容的诗 题为《革命军 击节》其句更为铿锵：

海飞立兮山飞拔，西州男儿有英骨。  
 笔铁口血血茫洋，昆仑吐气气郁勃。  
 祖国沉胥三百年，九世混迹匈奴族。  
 杀吾父兄夺我国，行行字字滴鲜血。  
 悲不胜悲痛定痛，誓歼鞑鞑非激烈。  
 革命革命真英雄，一书英法传真译。

光芒电闪泰西东，咸祝汉人有豪杰。  
 勗哉神州好男儿，种族安危不容发。  
 终霄思之眠不成，寒窗剑影一痕血。

诗中借用了《革命军》中的一些原句，刻画和讴歌了爱国青年邹容的宏伟气魄和推翻满清王朝的坚强决心。

正当宗仰为营救章、邹奔走时，清政府已将他的名字列入追捕的黑名单中，于是他不得不在罗迦陵资助下逃亡日本。当时孙中山刚经越南抵达横滨未久，寄住在前广州博济医院同学廖翼鹏开设的振华商店楼上。宗仰素仰中山德望，趋寓拜谒，中山“一见如故，雅相推重，特辟楼下一室以居之”。在日期间，宗仰积极参加革命活动，闲时以诗画自遣。当时，江苏留学生秦毓鎰等人在日本创《江苏》杂志，由于缺乏资金，势将停刊。宗仰慷慨解囊资助，方得延续。这年秋天，孙中山先生赴檀香山等地接洽革命，临行，宗仰慨然赠以二百元，并为中山设宴饯行。回到寓所后，写了一首《饯中山》的诗：

握手与君五十日，脑中印我扬子图，  
 拿华剑气凌口汉，姬媿河山复故吾。  
 此去天南翻北斗，移来刊水奠新都，  
 矚看叱咤风云起，不歼胡虏非丈夫。

宗仰对中山的壮别，寄以莫大的期望，全诗充满了战斗的激情。“不歼胡虏非丈夫”，气概何等豪迈，他深知孙中山是“叱咤风云”的伟人，以此来鼓励，并非徒托空言。“此去天南翻北斗，移来刊水奠新都”，反映了他对胜利的来临充满信心。

孙中山在南洋和美洲一带与保皇派决战，处境十分艰难，兴中会受到保皇派的破坏，革命志士陆皓东、史坚如等人相继牺牲，中山甚感力量单薄。在此情况下，能得到宗仰、章太炎、蔡元培等江浙进步知识分子的支持，确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孙中山

把此视为在海外与保皇派斗争的后盾。1907年，孙中山几次写信给宗仰，要求在沪同志遥作声援。其信云：“中央上人英鉴：横滨来函，已得拜读，弟刻在檀岛与保皇大战，四大岛中，已肃清其二，余二岛想不日可以成功，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但彼党狡诈异常。见今日革命风潮大盛事，彼在此地则曰借名保皇，实则革命；在美洲则竟自称保皇会为革命党，欺人实甚矣。旅外华人，真伪莫辨，多受其惑。此计比之直曰保皇如康怪者尤毒，梁酋之计狡矣！闻在全国各地已敛财百余万，此财大半出自有心革命倒满之人。梁借革命之名，骗得此财，以行其保皇立宪，欲置中国四万万人永为满洲之奴隶，罪通天矣！何胜诛哉！弟等同志，向来专心致志于兴师一事，未暇谋及海外之运动，遂使保皇纵横如此，亦咎有所不能辞也。今当乘此余暇，尽力扫除此毒，以一民心，民心一则财力可以无忧也。务望在沪同志，亦遥作声援，如有新书新报，务要设法多寄往美洲及檀香山另售，使人人知所适从，并当竭力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也。匆匆草此，印候大安！弟中山谨启。”读了此函，知宗仰与中山确是斗争中的患难之交，宗仰匡襄革命厥功至伟。

无论在国内或在国外，宗仰始终以宣传革命为己任，即他自己所说的“播演灵文，弘宣妙旨”。他一面将国内进步知识分子的反抗精神带给留日学生；又用留日学生的反抗精神来鼓励国内的革命同志。当时，日本留学生中几乎人人传诵着一首诗，那就是宗仰写的《再寄太炎、威丹》：

大鱼飞跃浙江潮，雷峰塔震玉泉号。  
哀吾同胞正酣睡，万籁微闻鼾声调。  
独有峨眉一片月，凜凜相照印怒涛。  
神州男子气何壮，义如山岳死鸿毛。  
自投夷狱经百日，两颗头颅争一刀。

这首诗不仅对狱中的章太炎、邹容是极大的精神鼓舞，对那些热血青年更是最好的教育。宗仰在离开日本前，按照章太炎“利用宗教，发起信心”的建议，多次在东京留学生中作演说，这对当时留学生革命思想的发展和取得日本宗教界对中国革命的支持都起了积极作用。

宗仰从日本回国后，仍居爱俪园，为哈同夫妇讲道兴学。1906年，“苏报案”平息，章太炎刑满释放，出狱那天，宗仰守候牢门口迎接，并送章太炎一笔旅费，让章按照中山指示速去日本。宗仰又在“致公堂”和《中西日报》社协助下，集资刊印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致康有为政见书》分寄美洲、南洋各地侨胞，散布革命种子。

1909年，柳亚子组织南社后，特邀宗仰加入。

辛亥武昌军兴，9月上海光复，陈其美和李燮和为沪军都督一职相持不下，宗仰为大局计，出面调解，力劝李燮和退让，使李退驻吴淞，并为其筹集巨额饷银，以备率师北伐。不久，章太炎从日本回国，宗仰特去迎接并安排居住哈同园中。随后，孙中山先生经欧洲归来，船泊吴淞口。宗仰亲往吴淞，登轮执手话旧，迎中山至哈同花园与伍廷芳、蔡元培等30多位革命党人会晤，共商建国大计。

辛亥革命胜利后，宗仰的旧游都成为达官显贵，他却淡泊自甘，仍过他的头陀生活。他写过这样一首诗以明志：

乾坤事了续参禅，坐破蒲团不计年；

依旧江山依旧寺，推窗唤醒老龙眠。

不久，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妥协，孙中山被迫辞去大总统之职，北洋军阀登台执政，辛亥革命有功之臣反被摒弃，宗仰知事不可为，谢绝交际。民国三年，他又悄然回到镇江江天寺，闭关遍览十二部经，三载始毕。接着又遍登匡庐、黄山、九华、雁

荡、天台诸峰。每到一处，流连旬日，感叹不已。他对革命胜利果实被军阀攫取深感痛心，忧愤之心在诗画中反映十分强烈。洪宪称帝前夕，他作了一幅《江山送别图》，送给同邑好友刘永昌，题款称“共和末日写此用留纪念，画上题诗五章，郁勃激昂，感慨无穷：

籍君寒假返山虞，曾写乡心托画图，  
 此日重来相话旧，风光惜与别时殊。  
 江山风云多变态，潮流东去故迂回，  
 天南地北峰烟起，底事英雄心未灰。  
 北风寒厉岁云暮，阴晦朝曦暗夕光，  
 忆自送君归去后，苍茫独立怅空桑。  
 争春千帆逆水舟，暗潮风劲力难收，  
 凭谁赤手狂澜障，怅望云天不胜愁。  
 一袭神州百缀衣，频年缝纳过知非，  
 而今作画相持赠，我本无家君自归。

宗仰用“江山送别”、“共和末日”来抒发他对革命党人拱手送权的不满和对袁世凯窃夺革命成果的诅咒。他既看到“天南地北烽烟起，底事英雄心未灰”，革命党人还在继续奋战；但又感到逆水行舟“暗潮风劲”难挽狂澜，对时局充满怅惘和忧愁。袁世凯称帝后，蔡锷在云南宣告独立，挥师北上，讨伐袁逆，宗仰又作《丙辰纪念图》一幅，图上画有巍巍青松和崖坡，崖底有一只惊恐若失的猿猴，意指袁世凯害怕蔡锷云南起事。总之，宗仰虽杜门不出，谢绝交往，但他还是关心着国家的命运。

南京政府刚一成立，宗仰就发表了《佛教进行商榷书》，宣称：“儒释同源，本无二致……近始揭示教育，启发国民，二氏百家，共趋一的……民国肇兴，尤赖共和知识普被丛林，庶几天演漩涡，不遭沦溺”，“即工艺、实业两途，亦不妨量才造就，所谓



实际理地不受一尘，歹行门中无舍一法，何尝非菩萨行愿乎？”宗仰主张发展僧教育，使共和思想普及丛林；同时，他又主张以佛教思想为建立国民道德的基础，他在《论尊崇佛教为今日增进国民道德之切要》一文中说：“佛学之理，使上智精研而无穷；佛之戒律，使下愚警觉而易入。世间出世，彻上彻下，义极圆满。”他认为：“大本大源 端在道德。”而这种道德的基础不是儒学，也不是欧人的宗教思想，是能“普度众生，使众人头目脑髓，都可以施舍与人，毫无自私之意”佛教思想。所以，他积极支持建立中华佛教总会。1912年4月，在孙中山先生支持下，中华佛教总会成立，其章程明确规定：“本会系中华民国全体僧界组织”“本会系统一佛教，阐扬法化，以促进人群道德，完全国民幸福为宗旨”，甚至把佛教说成是“中华民国唯一之国粹也，中华民族特别之学术也，中华民国无上之灵魂也。”当时各省纷纷成立分部，企望把这一改革普被丛林。然而，年轻的共和国很快就失去了灵魂，政权被军阀窃夺，宗仰的主张，中华佛教总会的宣言和改革的尝试变成空想。在这种情况下，宗仰重新归隐山林是势所必至。再说，宗仰的旧游或当官，或离散，哈同花园中姬觉弥也已替代了他原先的地位，于是他毅然离沪，返回镇江金山寺。他离开哈同花园时，为显示光明磊落，将罗迦陵以前赠送他的一串由108颗翡翠做成的佛珠交还主人，连自己的衣服、书画等物一件不带，只身悄然而去。

宗仰回金山时，鉴于他的影响和学识，原方丈青权法师决定让位于他，而宗仰却无意于此，于是写了一副对联送给青权，联云：尔兄回山，不作此想；吾弟主席，尽可放心。”一时传为佛门佳话。

1919年，宗仰偕同青权法师、扬州的寂山、雨山法师去南京栖霞朝山。栖霞寺建于齐梁间，为金陵名刹，毁于咸丰兵燹中，尚未修

复，那古道场的山茅之中仅剩几间破屋，为法意老和尚栖身之所。法意和尚见宗仰等法师朝山，连称“善哉，善哉！”随即跪于宗仰面前，恳切地说：“恢复栖霞古寺，惟你可为，你若不应，老僧宁愿跪死不起。”宗仰急忙扶起法意，边说：“有话可以商量。”同行的几位法师也都认为唯宗仰可担此重任，并都表示全力支持。待宗仰回金山不久，法意和尚又备了礼品，亲赴金山，称宗仰为中兴栖霞的祖师，宗仰遂赴栖霞，主持寺庙复建工程。由于栖霞寺年久荒圯，原有山地寺产，已沦为江宁县学产。宗仰起而力争，正巧宗仰好友邑人刘永昌任职教育厅，为之奔走，力助其成。孙中山先生知道此事后，首捐银元一万，作为归还宗仰义助革命之款，其他达官贵人、各乡善士，闻宗仰宏愿，多乐助厥成，不久即善款大集。为便于物资运输和各界人士前往观光，交通厅行令京沪铁路局，将南京郊区的枯树村小站移至栖霞。宗仰开座之日，四众云集，山麓棒荒之中搭起20余座芦棚。俗话说：“因人成事。”栖霞因宗仰到来而日趋繁荣，寺庙修建工程进展很快，象征光明的毗卢宝殿从平地而起，规模略定，而宗仰竟因积劳成疾，于1921年7月圆寂，年57岁。常熟黄家宗仰的侄孙意欲扶柩归里，安葬三峰寺侧，但由于他是复兴栖霞的第一祖师，在寺僧和各界人士的要求下留葬于栖霞山麓。他的弟子惟德为他在大殿后面建宝塔一座，章太炎为撰塔铭，云：

彼世如蝇，菌蕘腐蒸，公逃于僧，朱张不恒，见龙在腾，戎狄之膺，汉道既升，归而担簦，凄然如冰。呜呼禅师，斯所以为如来乘欤！

曾任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亲书挽联一副：

奥旨遐尔，道根永固；

辞机旷远，名翼长飞。

宗仰生前的著述，所见和有著录的有《庚子纪念图韵》、《

上大观园》等，他写有很多诗，还写过不少有关佛学方面的论作，散见于《江苏》、《佛学丛报》等早期报刊上。另外，他还利用哈同经费，从1909年起，用了五年时间，根据日本弘教书院的《大藏经》小字本，参考日本的《缩副本藏经正误录》和我国黎端甫的《释藏丹铅记》及《龙藏》、《经山藏》等刻本，辑校出版了一部《频伽藏》。全藏依千字文编列，从天地玄黄到露结为霜止，共40函，连同总目计440册，经凡1916种，8416卷。这一巨大工程共耗资20万元。宗仰在“刊经记”中称：“此经之成，历事如是之艰，用款如是之巨，主人固推诚相与，坚定不移，余亦综核勾稽，因果自矢”，“今兹藉非佛法感通，天人合相，则何以遂初心而释重负，由后思前，不觉色然喜而又怦怦心悸也。”可见宗仰为这部《藏经》化费很大的心血，精神上也是够痛苦的。但是，他毕竟担起了重任，为我国整理了一部较全的藏经，于佛教和古文化的继承是一大贡献。章太炎在所作的《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序》中称颂宗仰：“绍隆一秉，救慈末世，为晚明旭大师三百年发扬胜义之第一人。”

纵观宗仰一生，始终贯穿着一条爱国主义的红线，他不为名利，热心奔走呼号，筹募经费，接济革命党人，沉浸于革命狂涛之中而无所置疑，他才华横溢，为人光明磊落，于社会公益事业和宗教事业贡献卓著。

# 能海法师传

舒 华

从驰骋疆场的威武军官，到吃斋念经的佛门弟子，这是一条多么独特的人生之路。

能海法师俗姓龚，名学光，字缉熙。1886年腊月二十二日，生于四川省绵竹县汉旺场，父亲龚常一，曾在成都经营古董，后来全家迁住绵竹县城。龚常一以小商贩为业，能海法师10多岁时，父亲便把他送到一家绸缎铺当学徒。父母去世后，能海法师只有依靠姐姐为生，尝尽了生活的艰辛。

庚子之乱后，清朝政府日益腐败，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激起每一个爱国男儿的热血沸腾。能海法师满怀青春热血，弃商从戎，考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与刘湘、刘文辉等同学。能海法师刻苦攻读，成绩优异，毕业后就被派赴康定任侦察大队长，不到一年，就升任营长。1909年，能海法师被派到云南讲武堂任教练员。当时，朱德正在该堂上学。解放后，能海法师在北京见到朱德总司令，朱总司令还追怀这段师生之谊，说：“别来将近40年，老师的面貌虽老了些，但精神还和早年在云南时差不多，可喜可贺。”

1911年武昌起义后，四川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四川政局动荡，政府不断更迭，先是督军赵尔丰退位，蒲殿俊成立汉四川军政府任都督，接着尹冒衡平息兵变杀了赵尔丰继任都督，扩编了军队。能海法师随着援川部队由云南回到四川，任第四镇

管带（营长），在成都驻防，后任团长兼川北清乡司令。

1914年，一个偶然的的机会，能海法师在成都提督街三义庙听佛源法师讲经，大为醉心，遂拜在佛源法师名下为弟子，开始热心地研习佛法。

当时，四川军阀混战，战火遍及全川。人民在战乱之中受尽苦难，而军阀只想扩充实力，扩大地盘，互相残杀，互相吞并。刘湘在混战中一升再升，由营长升为军长，以至川军前敌总司令，为了巩固军队基础，把原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同学尽量招纳进来委以重任。能海法师也被招到刘湘部下。这时，能海法师已开始信佛法，不愿当带兵官，只任了幕僚职务。刘湘派他以该部顾问名义，去北京与各方周旋。能海法师常常奔波于北京、天津、上海、武汉、重庆之间。1915年他还东渡日本，考察政治实业，与此同时，他对日本佛教盛行颇有感触。回国后，每到一处总是竭诚访求名师，研习佛法。在北京时，他经常诚恳地向北京大学哲学教授、佛学家张克诚先生学习唯识之学，每天徒步往返40里。1921年以后，他辞去外务，在成都少城公园办“佛经流通处”。1924年，在成都文殊院剃度出家，取法名“能海”，剃度后即到新都宝光寺从贯一老和尚受具足戒。当时39岁。

能海法师由军官成为佛门弟子，一方面是政治上的原因，他早年在陆军速成学堂加入同盟会，积极投身国民革命。后来，川军中拥护袁世凯的将领反对国民革命，积极出兵作战。速成同学中同情国民革命的被杀不少。能海法师看到昔日同窗惨遭杀戮，血流成河，内心悲痛，转信佛法。另外，能海法师家庭不幸，厄运连起。他元配夫人庄氏早逝，留下一女，后娶张氏，又娶庄氏之妹，生下一子，和他感情很好，没想到会一病不起，这使能海法师陷入极度伤感之中。他受到政治、家庭两方面的刺激，一遇到“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的佛家妙旨，便萌发了剃度出家

的念头，以便解脱内心的苦恼而发心向佛，以期“自利利他”。

能海法师受具足戒后，在宝光寺住几个月，一面学习戒律、禅教诸宗，尽涉堂奥；一面积极准备赴西藏学法。在康定跑马山的喇嘛庙学习藏文藏语。1928年5月能海法师进藏学法，历时4个月，于9月抵达拉萨。旅途备受艰辛，到拉萨后，即拜在著名大喇嘛康萨门下为弟子。在藏学习约10年之久。学习成绩优异，康萨对能海法师戒行精进，尤为赞赏，把自己用的衣、钵和许多珍贵经典交给能海，这说明康萨已认定能海是继承他法流的承传弟子了。

1936年，能海法师离开西藏，取道尼泊尔、印度，乘海轮回到祖国。能海法师先在上海讲经，继赴五台山广济茅蓬闭关。出关后不断从事译述，为弘法准备，并在上海、太原等处多次讲经。

“七七”事变爆发后，能海法师率弟子20余人返回四川。成都文殊院法光和尚请其住南郊近慈寺。寺为文殊院下院，年久失修。能海法师率弟子数十人来到近慈寺，惨淡经营，不但复其旧观，还先后建成威德殿、大师殿、藏经楼、沙弥堂、译经院、金刚院、方丈寮等建筑，蔚为一大伽蓝。在这里，能海法师开办了内地第一个密宗道场。国内各寺院僧人闻风前来学习，其中有许多成为能海法师的著名弟子。当时许多军政要员，作为在家居士，也有不少前来听讲经说法。能海法师讲经，因其教理圆融，人情练达，又具有辩才无碍的素质，深入浅出，妙喻横生，信手拈来，都成妙谛。故能摄引上中下三根都能各得其趣味，所以，听众非常踊跃。

能海法师在近慈寺的日课和戒行，都是非常严谨的。不仅绝对素食，而且还实行过午不食，每天早晨3点钟便到大殿上座，开始讲经，或在讲经前先讲一些寺内的事务问题，约两小时讲毕，下座后进早餐。上午9时至11时又上座讲经，12时前进午餐。午

餐后是会客时间，下午有时也讲两个小时经，不讲经则译经或静坐。傍晚有时同居士们在寺内园林中散步谈天，前半夜静坐。总之，全日夜在榻上时除静坐修止观外，如微有倦意，也只能盘腿靠靠，绝不容许倒头大睡。多年如此，没有毅力的人是不可能办到的。能海法师带头这样做，也要求全寺僧众都谨严地完成这样的日课。

绵竹云雾寺是能海法师每年夏天都去的静坐之地。他静坐不在寺内，而在另修的茅篷内。静坐不是简单的事，而要按照功夫深浅分为几个等级，不仅课目不同，而且场地也有区别，必须达到一定的等级者才能在茅篷静修。可以随他去习静坐的弟子能坐茅篷静修者不多，其余功夫浅的只能在寺内静坐。

1940年，康萨格西愿意来内地弘法，能海法师亲自去迎请，再一次入藏。康萨因病没能来内地，把自己的衣钵、法器尽授能海法师，嘱其回到内地弘传其法。于是，近慈寺道场成为沟通汉藏佛教中心。藏僧来成都，必朝近慈寺，对道场风规，均甚赞叹。能海法师建立译经院，自题门联云：“通圣言而遍寰宇，导世界以趋大同。”能海法师致力于汉藏团结，做出了重大贡献。

能海法师说法49年，影响遍及国内外。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致函请他去美国弘法，能海法师没有去。林森亲题护国金刚道场匾额，能海法师视之漠然。蒋介石曾派人邀请能海出任“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以后又征聘他加入“陪都宗教联谊会”，他都毅然拒绝。能海法师不仅深于佛法，而且对政治很有见解，绝不随波逐流，图谋虚荣。他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做了许多有益于中国革命的事。他常说：共产党拯救人民大众出苦海，这是好事，我们佛教徒应该拥护。成都解放前夕，有一位僧人从上海来到近慈寺，对大伙说：“共产党要消灭宗教。”能海法师知道后，立刻叫当事人把他赶走了。有一次，能海法师在彭县修舍利

模型塔，彭县住着一些起义军，共产党的代表也住在彭县，县城十分宁静，人们都高兴地议论解放的事，能海法师也高兴地和大家谈论着，监工修塔的僧人跑来对法师说：“赶快把塔顶安上吧，不然共产党来了……”没等他把话说完，能海法师就生气地说：

“来了怎么样？中国人嘛，又不是外国人。”

能海法师相信中国共产党，还尽力帮助共产党。有一次，他不顾旅途劳累从彭县赶回成都，设法营救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的共产党人王干青。他们同是绵竹老乡，也是好友。可是，当天晚上，王干青就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了。后来，能海法师专门为这些死难烈士念经，以示超荐哀悼。1948年，有个叫成佛的僧人，国民党特务怀疑他是共产党员，将他抓走，能海法师千方百计托人把他救了出来。

成都解放不久，西南军政委员会派人来见能海法师，商谈西藏和平解放的问题。能海法师给西康、西藏的友人写了一封信，说明共产党保护宗教的立场，要他们配合进藏部队，和平解放西藏。同时，能海法师建议进藏部队要执行宗教政策，还建议把班禅接到北京。不久，西南军政委员会来信要能海法师一同随军进藏。能海法师虽因年老体弱未能同行，但派了刚从西藏回来不久的弟子隆果随军进藏，做了不少工作。

全国解放后，能海法师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后当选为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2年12月，出席过维也纳世界人民和平会议。取道莫斯科，经蒙古回到北京。

1953年，能海法师率弟子上五台山开荒造林，定居于中台下五里之清凉桥。此地处于高寒地带，能海法师已届70，但译经讲律，老而弥笃。常率僧众与山上农民通力合作，修渠植树。1955年，赴新德里参加亚洲和平会议，取道仰光回国。



1966年，能海法师在五台山碧山寺圆寂，享年81岁，遗骨塔建于兽财洞侧宝塔山麓。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为题塔铭，文曰：

承文殊教，振锡清凉。

显密双弘，遥遵法王。

律履冰洁，智刃金刚。

作和平使，为释宗光。

五巅巍巍，三峨苍苍，

闕塔崇岳，德音无疆。

# 谛闲法师传

朱哲

谛闲法师，1858年出生于浙江黄岩。俗姓朱，名古虚，号卓三。父度润，母王氏。9岁进入乡塾，读书成绩优异。后来因父亲去世，家境贫寒，中途退学，到舅舅开的药铺学艺。

19岁时，他在黄岩北门开了一间药铺，同时也替病人切脉看病。遇到贫苦的患者，他就送诊施药，分文不取。未几，妻、儿、母亲相继病故。他非常伤心，深感人命无常，认为药物虽然众多，医术虽然高明，但“只能医身，不能医心；只能治病，不能治命”。遂于20岁时（1877年）到临海县白云山从成道法师出家。不久，他大哥跟踪追至，迫令还俗。两年后，大哥去世，他再到白云山，随师研读佛教经典。

他24岁至天台山国清寺受具足戒，留寺参禅，晓夜精勤，不休不息，功夫日进。

25岁（1882年）他至平湖福臻寺从敏曦法师听讲《法华经》。因初次听讲，茫然不知所云，颇多费解。幸得授虚法师襄助，给了他一本《法华会义》。于是，他白天听讲授，夜间看注释，淬砺奋发，废寝忘食，一连十多天参究，终于玄解顿开，阅全经如观指掌。合座倾服，授虚叹为“稀有”，敏曦赞为“法门龙象”。

二十七、八岁时，他两度至上海龙华寺，听晓柔法师讲《法华》，听大海法师讲《楞严》。精益求精，频频探讨；究本寻源，务穷其奥。旋为同学所邀，至杭州六通寺升座讲《法华》，答难析

疑，辩才无碍，听众无不叹服。

1886年，他在上海龙华寺听瑞芳法师讲《禅林宝训》，并由龙华寺方丈端融和尚授记付法，传持天台教观第四十三世。端融语重心长，谆谆嘱咐他要好好继承法统，光大佛门。

他32岁时在龙华寺讲《法华》，听众2 000多人。经期圆满后，至镇江金山江天寺，连住两年，弃教参禅。以后，至宁波慈溪芦山圣果寺掩关，专修天台教义。旋又接受信众的要求，复至龙华寺讲《楞严》并完成《楞严经序指味疏》的著述。《楞严经序》为天如禅师唯则所撰，当时在龙华听讲的信众，每日常达2 000多人，但其中“肤学居多，尚不谙字义句节，安求理趣”，而此《序》又关节较多，文义较深，故谛闲法师特作《指味疏》，俾初学的人有所遵循。此《疏》提纲挈领，剖析玄微，言简意赅，对经义和教理阐发得非常详尽透彻，初学者称便。此后，他接连应各方信众的邀请，经常在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山东、辽宁、黑龙江等地讲经说法，座无虚席。

他于47岁朝礼五台山后，到北京请得《龙藏》一部，运回温州。

1910年，江苏各界人士在南京创办全省佛教师范学校，众推法师为校长兼总监督。清代末叶，干戈云扰，神州鼎沸，灾劫相寻，佛化不振，讲席销沉。谛闲法师有鉴于此，乃慨然应聘，驰赴任所，遴选各省笃实有为的青年僧徒，分班讲授，解行并进，开创了近代中国僧伽教育史上的新纪元。

1912年冬，他受聘住持宁波观宗寺。观宗寺原为延庆寺的观堂旧址。宋元丰中（约1078—1085年）四明五世孙介然法师按照《观无量寿佛经》修观行法，于延庆寺东北角空地建房60余间，中有宝阁，四周环有十六观堂，以修观行，故名观宗。几经兴废，至清乾隆、嘉庆年间（约在1796年前后），重修殿堂，增建僧

房，方始独立门庭，别设方丈。谛闲法师处众谦和，持身有则，自受任住持，不辞辛劳，将大殿、天王殿、念佛堂、禅堂、藏经阁等，整修一新，并创设了观宗研究社。各方缙素，云从景集，蔚为东南名刹，谛闲法师勋劳卓著，被誉为观宗寺中兴之祖。

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向中国提出骇人听闻的“二十一条”，举世震惊。其中“传教自由”一条，国内佛教徒反对尤为强烈。为了安抚民意，孙毓筠秉承当局之命，不得不在北京设讲经会，延请谛闲法师开讲《楞严》。为维护国权，发扬大法，谛闲毅然应邀北上，任大乘讲习会主讲。中外人士赴会听讲者，日达数万。时民国初定，百废待举，各处有毁庙兴学之议，围绕地方庙产，屡屡发生纠葛。内务总长朱启钤特拟定了《寺庙管理条例》，征求法师意见后，颁发全国各地。袁世凯以总统名义，赠以“宏阐南宗”之匾，饬令地方官悬之寺中。

未几，袁世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筹备恢复帝制，公然设立“筹安会”，授意各界劝进。国人对此无不咬牙切齿，义愤填膺。趋炎附势、上书劝进的无耻政客，不乏其人。谛闲法师志尚清高，不为名利所动，不为权势所屈，多次表示：“僧人唯知奉持佛法，不知有民主君主。”洁身自爱，未曾以一言劝进。讲经期满，即振锡南归。

1917年，法师60寿庆，全寺僧众和当地知名人士，为他祝寿，并送了“畅演宗风”、“与佛齐年”两块匾额。

1918年，北京发起讲经会，徐文蔚居士主其事，拟请谛闲法师开讲《圆觉经》及《大乘止观》。徐文蔚亲自南下至观宗寺迎请，遂由仁山、倓虚两法师同谛闲乘轮北上。到达北京后，谛闲法师不顾长途跋涉的劳累，白天撰写讲义，晚上登座宣讲，一连讲了三个多月。法众济济，请求皈依的不下数万。《圆觉》刚讲完，观宗寺就来电催归。束装就道时，叶恭绰、蒯寿枢等设宴为他饯

行，并慨捐巨资，请设观宗学舍，以为培养佛教师资之所。执政段祺瑞送了“阐扬台宗”匾额。翌年，观宗学舍正式开办，谛闲法师自任主讲，开讲《教观纲宗》、《十不二门指要钞》等，苦心孤诣，造就了不少弘法人才。仁山、常惺、宝静、显慈、倓虚等法师，皆观宗之翘楚也。皈依他的弟子也很多，如叶恭绰、蒋维乔、屈映光、黄庆澜、庄庆祥等。

1921年，他应浙江省督军卢永祥、省长张某之请，在海潮寺讲《仁王护国般若经》。卢永祥还命令全省禁屠三日。

65岁时，他在上海净土庵讲《弥陀经》，于芜湖讲《法华经》，后应南园居士的请求，开讲《大乘止观》。《大乘止观》为南岳慧思大师所著，“诠假有真空之奥，明体达用之方，说止观二门之深义，……义括始终而不繁，理析毫芒而不锁。”唐末经典，诸多流散海外，这部书国内亦久已亡佚。1000年，日本高僧寂照始持此本来至四明。惟“去圣时遥，措意者稀”，昔已有“障深者莫遍津梁，慧浅者罕窥其宗趣”之慨。谛闲法师有虑及此，乃“演绎贯穿，幽深者曲折而明之，微妙者譬喻以形之”，撰成《大乘止观述记》20卷。《述记》广征博引，理明辞畅，颇便于敷弘宣扬。

1924年，谛闲有感于历年水火刀兵，饥馑瘟疫，相继滋蔓，民不聊生，国无宁日，以为若再不忏悔，祸患就将不堪设想，特在观宗开讲《梁皇忏》，并撰成《梁皇忏闻录》3册，欲使礼忏者一见此书，即顿生惭愧恐惧之心，由此超凡入圣，返迷归悟。

1927年，谛闲法师70大寿，全寺僧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祝寿仪式。他的弟子黄庆澜等写了一首长达500多字的五言诗，热情称颂他的功德。

谛闲法师怀着弘法利生的大愿，毕生辛勤为法，诲人不倦。他到处讲经，不断写作，从来不知疲倦。1928年，他已71岁高

龄，犹不惮其烦地完成了长达八、九万字的《观经疏钞演义》的编述。《观经疏钞》全名为《观无量寿佛经疏妙宗钞》。《疏》系天台智凯所作。《钞》为四明尊者知礼所撰。谛闲受戒后，即以这本经为每日必读的功课，已历40多年。只是《疏，钞》已历时500多年，代远年湮，时殊世异，人的根器又不一，有的人就常常感到徘徊门外，苦乏路径。为此，谛闲发心将40多年奉持此经的心得体会和盘托出。于是将《疏》中科释移注文下，《钞》中过详者，略加删定。经过他加工修改的《演义》，条分缕析，机畅神流，初学的人总算有经可循，易于拾级而上了。这一年，他还把观宗寺的宏法社和研究社合并为一个宏法研究社。

1932年7月初二日，这位闭关3次，说法48年，毕生以住持正法，净化人间为己任的老人，于大众念佛声中含笑坐化，世寿75，僧腊55。开吊传供日，各界前往凭吊者不下万人。10月16日，灵龕送至慈溪五磊山入塔，沿途群众焚香作礼默哀，相送者达数万人之多，足见谛闲法师道德感人之深。

中国佛教的各宗各派，不时相互排斥。而谛闲法师虽专宗天台，却胸怀磊落，绝无门外之见。为保护佛教文物古迹，他还不断余力，几次兴修观宗寺，并募资将天台山万年寺和海门西方寺也修葺一新。对培养佛教人才，他更是殚精竭思，不遗余力。谛闲不仅是中兴天台宗的元勋，对近代中国佛教也有扶衰起敝之功。

谛闲法师教通三藏，学究一乘，为台宗泰斗。梵行高尚，缙素钦仰。倓虚法师曾在香港新界弘法精舍华南学佛院撰文赞美他：“古人有三不朽，一日立德，次日立功，三曰立言。然则世之立德者，未必立言立功。立功者未必立德立言。而立言者，亦未必立功立德。唯我大师兼而有之。夫乘戒俱急，止观圆融，勤苦自处，慈悯待人，立德也。兴建伽蓝，树立学社，培植后进，卫

教弘法，立功也。法嗣天台，行修净上，疏经流布，昭示因果，立言也。诚以大师乃智者嫡传，灵峰嗣响，法门龙象，近世耆德。曩年弘化南北，海宇钦崇，凡当时知名之士，莫不以归依座下为。

谛闲法师一生奔走宏法，讲肆遍于南北。他的著作很多。1951年，倓虚法师搜集遗述 120余万言，撷英摭华，删繁就简，斟酌去取，编订校勘，并由叶维绰、蒋维乔复勘，编成《谛闲法师遗集》(共10册)及《谛闲大师语录》(4册)先后由香港华南佛学院出版流通。

## 六 寺 住 持

### 戒 圆

寄禅（1851—1912年）名敬安，别号八指头陀，俗名黄读山，既是禅僧，又是诗人，是我国近代佛教界的著名人物。

寄禅，1851年1月3日生于湖南湘潭县石潭镇的一个农民家庭里。他有时自称“世居姜畲”，石潭与姜畲相隔不过20华里。父名黄宣杏，母胡氏。7岁母亡。11岁入私塾读书。12岁，父又死。贫无所依，乃为农家牧牛。有一天，与群儿避雨村中，闻读唐诗中“少孤为客早”句，不觉泪簌簌下，塾师周云帆问其原因，答以父死无法读书。周同情他的不幸遭遇，乃收留他在家，扫地煮饭，一有闲暇，就教他读书，并经常向人夸奖说：“这孩子忍苦耐劳，将来一定是有出息的。”不久，周云帆死。在强烈的求知欲的驱使下，他又自动去替一个富家子弟当书童，整天侍候主人，如私自读书就要受到辱骂。他暗想：这种屈辱生活，必须改变！于是决心离开那里，另行去学手艺。学艺期间，他又经常遭到主人残酷的鞭打，昏死数次。这位聪明好学的孩子，就这样度过了他苦难的童年和少年。

1868年，寄禅看见篱间盛开的白桃花被狂风暴雨打落，不觉触景生情，放声大哭。于是投湘阴县法华寺出家，拜东林和尚为师，法名寄禅。同年冬到南岳祝圣寺，从贤楷律师受具足戒。19岁，赴衡阳岐山仁瑞寺（今属衡南县），从恒志禅师学禅5年。

1871年，21岁的寄禅在岐山参禅，至巴陵（今湖南省岳阳市）



看望舅父，游岳阳楼。有人分韵赋诗，寄禅独自一人，纵目四顾，水天一色，忽得“洞庭波送一僧来”之句，归告诗人郭菊荪。郭因此劝他学诗，并授以《唐诗三百首》一书，寄禅学诗从此始。23岁时开始写诗，曾一度乘船到长沙麓山寺参访笠云芳圃（1837—1908年），旋游岳阳洞庭湖，后仍回岐山。

1875年，寄禅25岁，住湘阴法华寺。夏秋之交，他离开湖南，远游江浙各名山大寺，先后9年时间。首先，到禅宗著名道场镇江金山寺，从大定密源（1824—1907年）参禅。不久，行脚江南，漫游杭州、宁波等地，遍参禅林耆宿。

1877年，他27岁，在宁波阿育王寺佛舍利塔前燃二指，并剃臂肉燃灯供佛，自此号“八指头陀”。其后3年，历游天童、茅山、普陀、雪窦等处。

1881年，寄禅最初的诗集《嚼梅吟》在宁波出版，使他在当时诗坛上获得了一席之地。

1886年，王闿运集诸名士在长沙开福寺创设碧湖诗社，参加者道俗共19人，寄禅被邀参加，为社友。秋，北上武昌，乘船重游金山，冬又还湘。

1888年，陈伯严、罗顺循在湖南将寄禅同治十二年至光绪十四年的作品定为5卷，校刻行世，名曰《八指头陀诗集》。过了10年，叶德辉在湖南重印5卷，并将寄禅光绪十五年至二十四年的作品编成卷6至卷10，为之续刻，成《八指头陀诗集》10卷，发行全国。

1904年，浙江又出版了寄禅的《白梅集》。

寄禅从36岁起至51岁（1901年）止先后担任过湖南6个丛林的住持：衡阳大罗汉寺、南岳上封寺、大善寺、宁乡沩山密印寺、湘阴神鼎山资圣寺、长沙上林寺。

1902年，浙江宁波天童寺首座幻人率领两序首领代表前来长

沙，请寄至天童寺任住持。

天童寺为东南名刹，自明末密云圆悟（1566—1642年）重兴以来，规模宏大，俨然为十方丛林模范，清末渐趋衰落。寄禅担任住持以后，天童寺再度重兴起来。

5年后，寄禅住持天童寺任期已满，僧众留他重任。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此时，寄禅61岁。他说：“政教必相辅，以平等国，行平等教，我佛弘旨，最适共和。”表示了他对革命的拥护与支持。次年，中华民国建立。4月，各地佛教徒的代表集会于上海留云寺，筹组中华佛教总会，公推寄禅为首任会长，并设本部于上海静安寺，设办事处于北京法原寺。这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佛教团体。

当时，各地侵夺僧产、毁像逐僧之事时有发生。为此，寄禅曾赴南京谒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请予保护，并在同年11月10日和他的嗣法弟子道阶法师前往北京请愿，会见内务部礼俗司杜关，要求政府下令禁止各地侵夺寺产，但谈话未获结果，反被侮辱。他即愤而辞出，当晚胸膈作痛，圆寂于法原寺。死因说法不一，或言中煤气而死，或言吞金而死。享年62岁，僧腊45。北京各界73人倡议追悼，参加者达千人。道阶等奉龕南归，葬于天童寺前青龙冈，塔曰“冷香”。

# 华严座主应慈法师

周文晓

佛门耆宿仰慈公，德重道高四众崇，  
一片丹心爱祖国，大悲宏愿护禅宗；  
经谈般若真空理，教演华严玄妙功，  
二十年前撒手去，今朝又显六神通。

这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明旻法师于1985年为纪念应慈法师圆寂二十周年题写的一首诗。诗中对这位教界的楷模作了高度评价。同年，美国纽约光明寺寿冶法师亦为纪念应慈法师题词：

遮那妙体编法界以为身，恭录古德语；  
华严庄严等太虚而为量，充实今人耳。

应慈法师之所以为国内外教界宗仰，这与他一生的硕德高行分不开的。

应慈法师，俗姓余，名铎，号振卿，法号显亲，中年自号华严座主，晚年别署拈花老人。俗籍安徽歙县。1873年农历二月初五日，出生于安徽歙县新安江上游的一个盐商家庭。父亲长于经商，资财富有，早在应慈幼年时即病故。母周氏，笃信佛教，日课《金刚》、《弥陀》诸经，《大悲》、《准提》等咒。应慈自幼由母教读，深受其母影响，12岁随母茹素，母亲日课之经、咒，应慈童年即朗朗成诵。周氏见儿子天资颖悟非凡，读书上进，所以希望他早登仕途，应慈亦不负母亲期望，真的考取了秀才。适值应慈弱冠年华，中日甲午战起，清政府腐败无能，目睹国耻民辱，

应慈亦无意仕途，母亲即为他婚配，希望他早日成家立业，至少得守住父亲留下的那笔产业。谁知婚后不久，其妻旋即悼亡。母亲又为他续娶，不久亦悼亡，邻人和亲友们私下都说他是“和尚命”，“尅妻”。这些议论难免传到应慈耳中。应慈深感人生虚幻，生死无常，如再续娶再悼亡，岂非如同杀生，遂决意出家修行。

1898年，他毅然辞家去南海朝礼普陀，恰好遇上南京三圣庵明性禅师，于是力请收为弟子。明性听他一番叙说，知其富室子弟，恐难修梵行，所以提出要考验3年，以观出尘之志。应慈一口应诺，明性才把他带到南京庵中。在庵中，应慈一改出家前养尊处优的习气，布衣粗食，执爨负舂，不辞劳苦，如是力修苦行达三载。明性见其励志笃行，修学勋严，以为孺子可教，乃为之剃度出家。1900年起，乞戒于天童寺寄禅和尚座下，后又习禅于镇江金山寺大定和尚。1901至1902年，礼天竺云栖寺，卓锡于西湖灵隐、昭庆达两年。1903年秋，他奉师命往常州天宁寺参谒冶开禅师。一天，他入禅堂答冶开法师话头，冶开勘问：“念佛是谁？”答曰：“无是谁 无非谁！”得到冶开法师器重 并于1904年与明镜、月霞、惟宽一起引为冶开入室弟子，受记为临济宗第42世，赐法号曰显亲。嗣后，他以师礼事月霞，深究华严大旨，前后追随达2年。1917年，月公圆寂，他遵循月公“力弘华严，不作方丈”的遗嘱，始终以弘宣华严为己任，讲经传戒，参禅说教，为我国近代发扬华严精义之大德。

应慈法师仰慕大智文殊师利菩萨道场。自1905年起，他曾先后5次朝礼五台山。他注重戒律，严格奉行“教宗贤首，行在禅那”的准则。为了加强自修，他于1922年起在杭州普提寺闭关习净用功3年。他每日礼诵华严，毕生不懈。他恪守冶开法师“禅为根本，教（华严）化法”的教诲，坚持“一年无日不参禅”，提倡每年至少要打一次禅七，以克期取证。他曾多次主持天

宁、天童、福州涌泉等禅宗名刹的禅七。他告诫弟子们说：“历代祖师都是先定后慧，先智后悲，冶老在终南山悟道，月老亦在终南山习定有悟后，亲近赤山法忍。我虽讲经说教，但数十年来无一年不打禅七……”

应慈法师生活俭朴，他要求僧众发扬百丈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优良传统，痛斥不上求下化，不策励修持的享受派，提倡勤俭节约。他终年穿的是粗布衣服，吃的是普通蔬菜。他有一个规矩，吃饭时不准讲话。一次，他与弟子一起吃饭，弟子们你言我语，讲个不停，应慈法师默默立起身来，提笔写了一首诗，批评饭时讲家常的不良习惯。自此以后，弟子们吃饭时不再讲家常了。应慈法师严以律己，宽厚待人。一次，老居士窦存我，误听别人传言，结怨于应慈法师，竟闯入他的房中，打了他一巴掌，其时应慈法师正在读经，这突然一巴掌，把他戴的帽子也打下来，他一看是窦居士，于是从地上拾起帽子，戴好了，继续看他的经书。这反使窦居士无法下场。过了不久，待事情弄清楚了，这位居士亲又登门谢罪，请求忏悔。应慈法师笑着说：“不知不罪，知错认罪，难能可贵。”

应慈法师在旧社会中立身严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宁愿终身入忧苦，不将佛法作人情”，他不贪图名利，不巴结权贵，他所关心的是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安乐。他抨击旧社会的反动统治，他曾对弟子们说：“今夫五俭八德，舜日尧天都被黑暗笼罩，伤心惨目，无何而救我同胞乎！所以邦有道则兴，无道则废，立国之大本何在！孟子死矣，交征来矣，吾不禁为人道忧，更不禁为国家忧。”

他坚持不当方丈，不著书立说。他认为古往今来佛经注释，汗牛充栋，只要依教奉行，足够应用，他一生身无长物，乐于“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的云水生涯。1948年，他参加南京

华严法会圆满时作了一首诗，诗云：

策杖离京去，西湖野外家。

跣趺遍地座，行脚走天涯。

有缚终须解，无缘路亦除。

寒冬花坞里，相伴卧烟霞。

1952年，他80岁时，又作诗自誓：

幻迹娑婆八十春，弘宗演教两天闻，

常惭一钵千家饭，遍种华严法界林。

百岁经眼才刹那，死生病老转蹉跎，

人人般若波罗密，遍界光明指似他。

这些诗，反映了应慈法师立身修行的高风亮节。

应慈法师待人和气，易于亲近，但于佛礼原则，毫不苟且。

民国元年，他与月霞法师应狄楚青的介绍，在上海哈同花园创办华严大学，他除讲授佛学外，每日还规定要坐禅习定，曾造就了如持松、常惺、戒尘等僧材。后来，园主人罗迦陵要法师们于每月农历初一、十五日给主人礼拜，应慈法师与月公坚持出家人不向在家人礼拜的原则，愤然离开上海，在杭州继续办学。

明代紫柏大师创刊方册藏经，为缙素称便，后毁于战火。此后有金陵刻经处名闻遐迩。民国时期，常州天宁寺冶开禅师尝言：“石棣杨仁山居士年高，恐独立不继，天宁盍分任之，庶全义早日告成。”应慈和惟宽和尚竭力支持冶公的创见，于是办起了毗陵刻经处，该处刊印经书卷帙之富，几与金陵刻经处比美。期间犹以应慈法师出力甚多。1933年，应慈法师在上海功法林佛经流通处会见江味农居士，得见《普贤行愿品疏》，于是他募集资金，重新刻印。1942年，他在常熟兴福寺刊印《妄尽还源疏钞补解会本》。

1943年，在上海印行华严祖杜顺和尚的《法界观门》。1944年，他

担任了《华严疏钞》编印会理事长。《华严疏钞》系唐清凉国师所著，历经宋、元、明，屡经离合，颇多讹误。应慈会同叶恭绰、蒋维乔、黄妙吾、李圆净等居士组成编印会，对全书进行校勘。应慈等编印会同仁不怕事巨时艰，辗转迁延十余载，汇集了中日《华严疏钞》各种版本进行校核，终于使湮没了一千多年的《华严疏钞》巨著，得以恢复本来面目，重刊流通。1939年，应慈法师购得《华严探玄记》30余部。接着，他请刘大照居士等校勘《贤首探玄记》、《地藏三经》请黄妙吾、刘大照居士校勘《清凉行愿品疏》先后于1945年和1948年出版。于是，晋唐三译华严，藉应慈法师之愿力，大功告成，为我国的佛教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52年，他又于扬州重刻大小品《般若波罗密经》。

应慈十分重视僧材的培养，民国初年，他协同月霞法师在上海开办华严大学。1917年，又在常熟兴福寺创建华严讲堂，培养十方僧材。1919年至1921年，先后在南京、芜湖等地开坛传戒。1925年，他在常州清凉寺开办清凉学院，培育华严预科学僧，第二年招生32名，他与南亭法师合讲大小乘。1928年，他在上海辛家花园兴建华严七处九会大殿，续办华严正科。在学院中，他不仅亲自讲课，编订讲义，举凡葺修殿宇，重光法相，皆善理其役。此后，他于常州、无锡、上海、常熟、南京等处开办华严速成师范学院。1929年冬至1930年夏，应慈在常州永庆寺开讲八十华严，后因寺内驻兵，于秋季移无锡龙华庵。1936年至1943年，他又先后在杭州青莲庵、庐山宝岩寺，上海玉佛寺开讲华严，并刻成《华严六十卷》。1943年初，移居上海沉香阁。1948年，南京成立华严法会，应慈主其事，亲自讲授贤首国师的《华严探玄记》法缘极一时之盛。他经常告诫学人：“学华严利名放下，行般若人法两亡。”当他86岁高龄时，仍于上海玉佛寺斋讲不辍，他一生为弘宗演教，足迹遍江、浙、皖、鄂、冀等省市。

应慈法师凛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大义，抗日战争时期，南京、上海的敌伪政权曾多次派人延请出面主持法会，都遭到他断然拒绝。1943年，我国僧侣抗战工作史《奋迅集》一书再版，请应慈法师作序，敌伪曾一再阻挠恫吓，而应慈置之不顾，欣然命笔。他在序言中说：“当‘八·一三’抗战军兴，凡我中华志士，莫不奋臂挥戈，拱卫祖国。斯时也，我佛教明眼知识，首有僧侣救护队之组织。当国家清平之时，自应隐逸德修，一旦有事，仍当作狮子奋迅以赴……”他认为，救国救民，本佛教之旨，岂有普度众生，救苦拔难者而不顾国家兴亡、人民死难的。早在辛亥、武昌起义时，应慈随师兄月霞在洪山宝通寺讲楞伽，月霞一度由黎元洪委任统带僧兵，应慈亦参与其事，兵败，遂与月霞同逃上海。

1949年之初，上海临近解放，国外信徒曾多次邀他出国，安度晚年。应慈法师一概婉谢。他说，投身异国，本非所愿，且弘法利生大业为终身之志，岂能图一己之利而不顾。同时他不轻信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的造谣污蔑，在讲课时还劝告学人不要因此受惑。

解放后，他看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切为人民谋福利，相信他的弘法利生的一贯主张只有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得以实现。他拥护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法规，积极参加国家的各项政治运动。1954年，他当选为上海市第一届人民代表、上海市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57年，他出席了全国佛教协会第二届全国代表会议，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副院长。1962年，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

应慈法师不喜从故纸堆中寻章摘句，所留著作有《正法眼藏》、《心经浅说》、《八识规矩颂略释》。暮年，他驻锡上海沉香阁，以所制联语自律：“四壁有经皆可读；一年无日不参禅。”他的受业门人都已摄化四方，唯常随弟子真禅法师，给侍左右。1965年



历八月初五日，应慈法师圆寂，世寿<sup>〇</sup>岁。僧腊<sup>〇</sup>载。归葬于庐山冶开祖塔墓之侧。临终时，他还在遗嘱中谆谆叮嘱弟子：“我去世后，望我后辈弟子及学人等，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下，努力学习，拥护政策法令，积极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自己力量。至要！至要！”

# 慈舟律师

唯 通

慈舟律师俗姓梁，1877年生于湖北随县。

慈舟律师幼年受父母熏习，便怀出家的志愿。因为亲老家贫，不忍离开双亲，遂开馆授童，教书10年。

1911年春，慈舟律师年34，父亲西归，母亲原是虔诚奉佛的人，忍泣割爱，嘉许师志以遂其宿愿。律师依本县佛垣寺照元老和尚剃染，法名普海，字慈舟。是年冬，于汉阳归元寺大纶和尚座下受具足戒。律师以解脱生死为念，一扫在俗时文人习气，不蓄笔砚，依律修持。次年，回佛垣寺，侍师念佛。

1912年，结夏安居于随县天齐寺。次夏，去扬州长生寺听元藏老法师讲《楞严经》；入冬，依镇江金山江天寺慈本首座参究禅那。越明年夏，往扬州宝轮寺，听元藏老法师讲《法华经》。是秋，贤首宗老宿月霞大师于上海哈同花园创办华严大学，并于是冬迁华严大学于杭州海潮寺，慈舟律师始终就学未辍，专研华严宗。1916年毕业后，朝礼了普陀、九华两个佛教圣地。

1917年，慈舟律师41岁，随侍月霞大师辅讲《楞严经》于汉阳归元寺；辅讲《起言论》于武昌中华大学，这是师弘法的开端。

次年春，河南信阳贤首山邀请律师开讲《大乘起信论》，法会圆满，与慕西法师朝礼五台；南还经北京，参预谛闲老法师宣讲《圆觉经》的法席，深得张克诚老居士的敬仰。越明年，掩门静

修于武昌普度寺。

1920年春，参预德安老法师在归元寺宣讲《观经疏钞》的法会；是秋，辅助了尘、戒尘两法师在汉口九莲寺筹办华严大学。曾一度住持汉口栖隐寺。1923年夏，受杭州灵隐寺住持约聘，开办明教学院，旋因故停止。是秋，应上海灵山寺约，讲《普贤行慕品》；冬应常熟虞山福兴寺惠宗和尚邀请，筹办法界学院，次年春，正式开学。1925年至1926年，曾先后在河南开封、安徽当涂讲《地藏经》、《般若经》。慈舟律师以弘法劳累 体弱多病，1926年辞去法界学院的讲学，转赴苏州灵岩山念佛静修，有法界学院的学员 8人，随同来灵岩。

慈舟律师于讲学念佛以利人自利外，持戒尤精严，并以此考验学员的日常生活。1927年秋，镇江竹林寺仰律师名，邀办竹林佛学院，终以戒不和合，于1929年春返灵岩山。

时印光老人与真达老和尚，劝慈舟律师任灵岩住持，二老人并允力为扶助。灵岩得师住持，建立了念佛堂，传播净土宗风。慈舟律师住持灵岩期间，仍未拒绝山外法缘，受武汉佛教会、洪山宝通寺邀请 讲《起信论》、《圆觉经》。

福州鼓山虚云老人邀师入闽，1933年在鼓山开办法界学院，讲80卷本《华严经》共 3年。继之，慈舟律师于福州法海寺主办了法界学院。这时，青岛湛山寺倓虚法师也来邀律师弘律，更触动律师的生平行履处。1936年春，律师年已60岁，北上青岛，讲律于湛山寺，使久已衰微的律学重振。是夏，依律给厦安居。

倓虚法师于这年秋天请慈舟律师住持北京净莲寺，律师即将远在福州法海寺的法界学院迁至净莲寺。1937年 2月至1939年，律师在净莲寺法界学院将《华严经》全部讲完。

慈舟律师到北京弘法以后，广济寺、拈花寺、雍和宫、团城、居士林等缙素道扬，以及天津、济南、烟台、大同等名胜古刹居

士团体，都应机区锡，转佛法轮，归信男女极多。

古都韩慧性居士，以慈舟律师年迈体衰，日夕领众办道，过于苦劳，乃购民房一座，改建为“安养精舍”，欲专为供养师弘法之余休养身心之所。但慈舟律师接受之后，即把它改成十方常住，作为一个讲学的新道场。慈舟律师忘我为法的精神，极为感人。

1947年秋末，应榕市（福州）四众邀请南下，卓锡于罗镗居士修建供奉印光、弘一两大师的舍利院。次年春，慈舟律师在该院讲《金刚经》时届71岁高龄。

1950年冬，慈舟律师讲学于泉州，并讲《八大人觉经》于南安雪峰寺。次年春，在雪峰寺讲《起信论》；是冬，在泉州承天寺主持念佛法会；并先后在朵莲寺、觉华佛学院讲《普贤行愿品》。

全国解放初期，慈舟律师经常弘法于福州、泉州间。1952年，受厦门诸山礼请，以76岁的耆年硕德，接任南普陀住持。是年11月，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律师为拥护这一伟大的和平事业，主持了厦门市佛教界祈祷和平法会，在法会中宣讲了《普贤行愿品》。

1953年夏，律师应邀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会议，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会议结束后曾一度返厦。京中师友弟子以慈舟律师年迈力衰，坚邀北返休养，终于是秋回北京安养精舍。但慈舟律师之自修教人，仍未放松，念佛讲学从未间断。

1956年夏，慈舟律师因患感冒并发中风，舌头麻木，半身不遂。在中国佛教协会的热心关怀下，住中央直属第二医院治疗3个月，以人工营养法希冀挽回法寿，但没有多大起色，回安养精舍后仍继续治疗1年多。在患病期间，慈舟律师之态度安详，一如平时，终于在1958年1月6日上午7时，安详示寂。中央人民

政府国务院宗教事务局与中国佛教协会，给他以隆重的哀荣；北京市以及全国佛教界的僧俗佛子，莫不同声感悼。

慈舟律师之遗体，如法荼毗，获舍利甚多，分供于北京安养精舍纪念堂、苏州灵岩山寺普同塔。

慈舟律师生于祖国国势极衰的时代，圆寂于祖国革命胜利、建设事业气象万千的时代。一生致力于和平事业，弘扬佛教，教育僧伽，深入华严堂奥，坚持毗尼净行，终以净土为归宿，是无愧法门的一代师匠。

# 静权法师

王 新

静权法师，是佛教天台宗的现代高僧。他一生戒行精严，爱国爱教，天台、净土兼宏，而以净土为归；虽兴修寺庙而不当住持；虽精通经论而不著书；虽毕生讲经弘教，却力图隐姓埋名。

静权（1881—1960年）俗姓王，名良安，浙江永嘉县陈岭陈坑口村人。其父王贤堃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良安从小受佛教思想的熏陶，因而乐善好施，喜欢为别人解忧除难。青年时，父亲去世，继承家产12亩土地。他将5亩捐给母校黄皮村塾扩建校舍，使地处山区的儿童有较多的入学机会；又将5亩变卖银元500元，加上家中的资金，独资建造一座黄皮至龙潭坑、章山一带的要冲石拱桥，从而消除了雨季水涨之际过往行人溺水之险；下余2亩交给侄辈作为祭祀祖先的茔产，以及公共福利基金。自己只身空手，另谋生路。邻近陈庄与半山村，为了一片山林，争执不休，从对骂、打架，发展到双方聚众持枪，策划大规模械斗。青年王良安闻讯前往，竭尽全力，开导双方，使之分清利害得失。经过多次苦心斡旋，终于化戾气为祥和，免除了一场不应有的武斗流血事件，使山林纠纷得到合情合理的解决，为当地人们所称颂。

良安自幼入黄皮村塾读书，后随名儒朱云乡就读于皕滩丽正、城内蒋宅等学校10余年，能诗善文，儒学造诣颇深。但与功名无缘，屡考秀才不中，加之父亲病故，悲伤忧郁，于是将后事

和所遗家产一一理毕，即投本省天台山国清寺，礼授能和尚为师，披剃出家，法名宽显，字静权。时在 1905 年，法师年 25 岁。不久辞别师长去宁波，从谛闲法师学天台宗教义。谛老为天台宗名宿，门下英俊云集。静权法师有儒学基础，更因刻苦钻研，经过 10 余年刻苦学习，谛闲便把观宗弘法社主讲重担交付与静权法师。从此，法师即以讲学讲经为己任，蜚声浙东。

静权法师德望日高，一些名山大刹多希望借重其力兴隆常住，因而纷纷请当住持。但法师立志不做方丈，对诸名山大寺凡力所能及者，一律设法维护。如创建于隋的浙江天台山国清寺，是天台宗的祖庭——天台宗创立人智者大师的道场。1930 年，静权法师回山礼祖时，见到殿堂失修，香火冷落，感叹不已。适逢可兴和尚来任国清寺方丈，请法师驻锡弘法，共图复兴，法师欣然应允。为了重振宗风，法师提议设立天台宗研究社。自任主讲，指导学僧研究天台教观。数年以后，学僧的止观修养和教义水平普遍提高。由于静权法师一向严以律己，所以研究社的学员和国清寺的僧众，多能自觉地遵守寺规，奉行律制，出现了教观并重，讲修双进，清规整肃，海众乐道的寺风。国清寺出现了新气象。远近四众多朝拜参学，台宗净风，称盛一时。静权法师助可兴住持对国清寺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建、扩建工程。从 1932 年到 1937 年间，重建、新建了大殿、天王殿、韦驮殿、金刚殿和两侧配套厢房、迎塔楼、斋堂等共 13 处。1937 年至 1940 年，又新建了妙法堂、静观堂、三贤殿和香光茅蓬等。全寺焕然一新，金身佛像清净庄严。至今国清寺僧众对静权法师中兴祖庭的丰功伟绩，仍然称颂不已。

静权法师在俗时有良好的语文修养，出家后又经过十五、六年的刻苦钻研，精通经藏，特善天台教义。从 1921 年开始担任观宗寺主讲以后，就开大座讲经说法，一直到 1960 年入灭，40 年

间，主要精力都用在讲经教上。这中间大体可分三个阶段：（一）1921年至1937年间，以所居的观宗、国清二寺为主要讲坛，着眼于培养学僧，讲授的内容是天台所宗的《妙法莲华经》和有关经论，有时亦带着僧应邀到其他寺庙或居士团体讲经。谛老创办的观宗弘法社，培养了一批对天台教义造诣较深的法师，有一部分法师即出自师门。（二）1937年至1945年间，全国抗战，静权法师走出寺门，应邀到江浙一带名山大寺和居士团体等说法，运用讲经之机，启发佛教界抗战救国。他针对日寇侵略，生灵涂炭，国难民危的具体情况，讲《仁王护国般若经》，着重阐明“护国”才能安稳等教义，开导佛教徒要热爱祖国，参加抗战。（三）1945年至1960年，抗战胜利后直到入灭的25年间，静权法师以利生为业，弘法是务，任缘应化，居无定地，四海为家，教化的重点是在家信众。这时期，他主要讲授《地藏菩萨本愿经》。法师对《地藏》一经，研究精微，讲说独步当时，有“活地藏”的美称。每当开讲此经，他总是身披红色袈裟，结跏趺，两目下垂，不看经本，侃侃而谈，对经意和故实又井井有条毫无遗漏，听者无不深为感发。建国之初，静权法师的同门、上海法藏寺创始人、天台宗尊宿兴慈法师圆寂后，该寺全体僧众礼请师莅寺讲《地藏经》和《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静权法师在宣讲经义的同时，要求佛教信徒遵照新中国的宗教政策行事，热爱祖国，保卫世界和平，发扬佛教优良传统。讲期将满之际，该寺僧众和上海佛教界恳切留师驻锡，任法藏寺主讲。从此静权法师于法藏寺讲经较多，但仍游化诸方。

1957年，静权法师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和上海市政协委员。

由于静权法师年事已高，应天台国清寺僧众的一再请回山息养。1960年12月20日（农历十月二十二日）西逝，世寿80岁，葬



于该寺的香光茅蓬内。

静权法师的一生，是宏扬佛法的一生。他生平深入经藏，精研天台教观，热爱祖国的硕德高风，至今犹令四众景仰归心。

静权法师青年时代，有较深的文字功夫，但出家后不肯作文，不肯著书。弟子中有劝著作者，他总是自谦地回答说：“我讲经，都是依据祖师的见解讲的，自己对佛法没有新的心得，还有什么书好写呢？”世有《地藏经略解》、《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圆通章讲义》等流通。都是其弟子在听讲时记录整理成书的。他在佛学方面的主要思想是“教在天台，行归净土”。他青年时期攻读儒书，倾心儒家的孝道，他对《地藏》一经的研究较深，其原因亦在于此。《地藏经》记录了释迦为其生母说法的内容，提倡子女应当孝敬父母。静权法师擅长讲说此经，同他重视孝道的思想是分不开的。

# 太虚大师

## 黄常伦

太虚大师是国内外有名的佛学家和佛教改革家。他的一生中，为中国佛教改革与复兴，为抗日救国、维护民族尊严，做出了很大贡献。他虽然逝世40多年了，但佛教界还不断为他出版专辑，不断召开他的学术讨论会，以各种方式怀念他、纪念他。

太虚大师（1889—1947年），俗姓吕，名淦森，法名唯心，号太虚，浙江省桐乡县（原崇德县）人。5岁丧父，6岁丧母，由外祖母抚养成人。外祖母笃信佛教，他9岁随外祖母朝过安徽九华山，13岁朝浙江普陀山，受到外祖母信佛的影响，信仰了佛教。15岁在海宁县长安镇一家百货商店做学徒，因不愿为店主做家庭琐事，萌发出世之念。16岁在苏州平望山小九华拜士达和尚为师，剃度出家。不久，由士达和尚带他到镇海团桥镇玉皇殿旻年和尚处。1905年冬，由旻年和尚带到宁波天童寺，依敬安和尚（即八指头陀、诗僧寄禅和尚）受具足戒（包括沙弥戒、比丘戒和菩萨戒）。因太虚聪慧过人，深受得戒师寄禅和尚赏识，并得到他的培养。后来，随敬安参加了江苏僧伽教育会，来到金陵刻经处祇洹精舍，跟随杨仁山居士学习佛学。原来生活在深山古寺，从此从事佛教运动。

清朝末年，改良派、革命派思潮风起云涌。1908年，因遇革命僧华山，得读康有为的《大同书》、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复的《天演论》、谭嗣同的《仁笈》等书。同年秋，又遇革命僧栖

云，介绍他看章太炎的《新民报》、邹容的《革命军》等书报，使他受革命浪潮冲击，毅然怀着以佛教救国救天下为己任的思想，离开了深山。次年 2 月，大师偕栖云抵广州，为双溪寺住持，时与国民党人潘达微、朱执信、邹海滨等往来。大师的思想则由君主立宪而转向国民革命，不断随朱执信等参加秘密集会，从事起义工作。3 月 29 日，广州起义失败，党人殉难者七十二人，葬于黄花岗，他极为悲愤，写诗吊唁黄花岗烈士。

书剑原成千古恨，英雄化作两间尘。  
从今删却闲愁苦，卧看荒荒大陆沦。

孤吟断送春三月，万事都归梦一场。  
护取壁间双宝剑，休教黑夜露光芒。

南粤城里起战争，隆隆炮声警天地。  
为复民权死亦生，大书特书一烈字。

从诗中可以看出，大师对烈士的悲壮情怀。他同情和支持革命，并从政治上的革命实践，引发了他的佛教改革思想。

1913 年 3 月 31 日，中华佛教会正式成立于上海，举冶开、熊希龄为会长，清海（静波）为副会长。任命大师为《佛教月报》总编。他在《佛教月报》上发表《致私篇》、《宇宙真相》、《无神论》、《幼住室随笔》等文章。大师在《无神论》一文中，提出无神论宣言和宗教消亡的问题。无神论宣言的主要论点：“无神即无造物主，亦无灵魂，而一切皆以无为究竟也。”后来，又根据这一思想，提出人生佛教。主张佛教以人类为中心，破除以迷信鬼神为本的宗教，反对离开现实的人生，侈谈什么来世和超度亡灵等无稽之谈。在近代佛教史上，象他这样深刻反对造物之神，反对

灵魂之鬼的，还找不到第二人。

1923年，张君勱作人生观的演讲，引起了丁文江的反驳，出现了科学与玄学之战。接着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转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之争。大师参加了这一论战，撰写《科学的人生观》，主张科学之经验，是一切学术之根本。宗教、玄学、哲学等领域，均依感觉经验为出发点，但一般科学经验，未得究竟，唯有佛法才能完成这一使命。

他在科学方法中谈到，今之人类，于六识（视、听、嗅、味，触、意）中，唯有视觉、听觉，尚能得到一定的发挥，而嗅觉、味觉、触觉发挥得极为不够。至于意识，更不能达到穷幽极微的境地。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大师认为应以瑜伽的方法，改造狭义的科学方法。所谓瑜伽的方法，即先使意识集中，沉思静虑，进而对事物分析观察，得到直接的感觉。

论及人生观，大师认为大乘佛教，为佛教的基石。释迦出世的本怀，在于《法华》、《华严》等大乘经内，明显说明了众生平等的真实含义，阐明了科学的人生观及佛教的本来面目，反对神佑论、宿命论等反科学的婆罗门教的教义。

1925年1月，大师在上海，将《科学的人生观》交泰东书局发行。

1928年5月，太虚大师应上海俭德储蓄会邀请，演讲人生佛学。主要内容：

（一）佛法既然主张普度一切有情，应适应现代文化，当以人类为中心，建立契合时机之佛学，一变过去神本鬼本之佛教为人本之佛教。

（二）佛法既然主张生命无始无终，应着眼解决现代社会人生问题，当以求人类社会发达为中心，建立契合时机之佛学，是人生佛教的第一要义。

(三) 佛法虽有诸法无我个人解脱的小乘佛教，然应适应现代社会的群体，当以大智大悲开展群众运动为中心，建立契合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教的第二要义。

(四) 大乘佛法虽以一切有情者皆成佛为究竟圆满法，然大乘有圆渐与圆顿之别，为适应重实验、重秩序、重证据的现代科学，当以圆渐的大乘佛教为中心，建立契合时机之佛学，是为人生佛教的第三要义。

这篇演讲，奠定了大师人生佛教的思想基础，以后虽发表多篇此类文章，都离不开这三个要义。

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积极行动于佛教改革。

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大师凭藉和国民党的关系，在镇江金山寺组织佛教协进会，着手改革佛教。在召开大会时，出席僧众及来宾600多人，大师任主席，阐明协进会宗旨和任务，提出“人间佛教”、“走上社会”。他的思想，受到了常惺、法权、仁山等有名法师们和青年僧人的支持。后由仁山法师提议，在金山寺办佛教协进会，创办佛学院，全部寺产充作经费，得到全体通过。

大师以金山江天禅寺为基点，搞起改革来了。他首先将庙里房子贴上了大礼堂、接待室、办公室、教室，食堂……等纸条，将大雄宝殿、禅堂、斋堂……等佛教名词全改为社会化了。方丈青权、监院霜亭、荫屏等法师坚决反对。他们向镇江市其他寺庙呼吁。在市里各寺庙的支持下，向太虚和仁山法师一班人马展开围攻。那时，太虚法师不在，仁山法师差点被打死，幸亏跑出去了。

太虚和仁山跑到江苏省政府告状（当时江苏省政府在镇江），从镇江市里领来一批人把青权和霜亭两位老和尚抓起来，关在监狱里。庙里没人领导，一切都是乱糟糟的。监院荫屏回来后，冒

着大雨，连夜赶到上海，在哈同花园找到了原金山寺老方丈宗仰大和尚。那时，宗仰在哈同花园办报，支持孙中山闹革命。荫屏脚穿草鞋，一身泥水，突然跪在宗仰面前。宗仰让他起来，换了衣服再说。

“你赶快给北伐革命军总司令部写个电稿交给我，不写我不起来。”又说：“我不发完电报不换衣服。”

荫屏把金山的住持青权和当家师霜亭老和尚被抓一事，前前后后说给宗仰大和尚听。宗仰答应了。

正在北伐的革命军总司令黄兴接到电报后，马上给江苏省政府发来了电报。这两位老和尚很快就释放了。

这就是有名的太虚大师为改革佛教，三进三出，大闹金山的故事。

太虚大师改革佛教的设想，本来上有上面的批准，中有同道学者们的支持，下有一批少壮派拥护，但由于当时局势很乱，僧众内部改革时机不很成熟，使得理想仅拉开 3 个序幕，没有完全实现。

1913年，中大教授邵爽秋提议将佛教寺产兴办学校。各省占寺夺产之风热烈，僧界陷于纷乱，要组织佛教总会，未获政府批准，众举八指头陀寄禅北上，争取早日成立。适逢内政部杜某，拟提拨寺产办教育，寄禅力争无效，愤甚，当晚回法源寺圆寂。当时熊希龄等即报告大总统，中华佛教总会章程，始经内政部批准设立，佛教寺产得以保存。

2月2日，上海佛教界于静安寺举行八指头陀追悼会。大师为了化悲愤为力量，在会上提出佛教宜三种革命说，力主除旧布新。

（一）组织革命：即制度革命。因自佛教传入中国后，在部建立宗派制度，成立子孙制，产生很多不良后果，提出废除剃

度制度和传法制度，主张创办佛教大学，从学僧中选拔品学兼优的人才，主持寺庙。

（二）财产革命：即经济革命。提出废除财产寺庙所有制，主张寺庙财产为佛教公有，用来兴办教育、培养僧才和社会慈善事业。

（三）教理革命。即思想革命。提出剔除佛教思想中之神教、鬼教、巫教等迷信成份，主张建立人生佛教，并作出“如果发愿成佛，先须立志做人。”“人成即佛成，完成在人格”的著名论断。

大师三种革命之说，是我国佛教史上第一次提出的全面改革方案。

大师的演说，引起上海佛教界的激烈争辩。《佛学丛报》主编薄一乘撰文说：“佛教革命之名词，发现未久，度亦妄人之邪说耳！若大庭广众之间，明目张胆，放言高论，则未免肆无忌惮矣！然即如某僧演说，佛教宜革命有之，亦唯第二条财产问题，尚有讨论之余地。若第三条牵涉学理，窃恐非自新佛之提婆达多从地狱复起不可！至第一条之组织革命四字，则不但无理由之可言，且并逻辑亦不可解矣。”大师为此作《敢问佛学丛报》一文而回答。所谓三种革命说，是指思想、制度、经济并重，完全能把握住佛教革新的全部问题，绝不是薄一乘之辈可能理解的。

此后，大师力抗阻力，勇猛精进，不断为改革佛教而努力。

1915年，他发表了《整理僧伽制度论》。我国佛教到了近代，依然承 林古制。僧众热衷于赶经忏，超度亡灵，品质低劣，思想僵化。那些护法的居士们，除了造庙修塔、求感应、祈保佑之外，还有什么作为呢？这样老态龙钟的佛教，怎能立足于现代社会！大师有鉴于此，奔走呼号，提创革新。其中最突出的是主张政教分立，建立由僧伽统一自己的僧团。此文，日本译成日文

出版。

1921年，大师在《僧自治说》一文说：“佛之因行以敬三宝报四恩为本，应随时代之不同而有差别，在自由的社会里，应从事农矿、农工、医药、教育、艺术，成为佛之因行。在和平的全民主义下，则加为警察、律师、官吏、议员、商贾等。”他认为从事社会职业、利益人群，造福社会，才是成佛的因行。他的人生佛教要点，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仁义代替残杀，以义利代替偷盗，以礼节代替邪淫，以诚信代替欺骗，以节制饮食代替酗酒暴食，做一个人格圆满的人。推而广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和平友好代替战争仇恨，这样，人间人人都是佛，处处即是佛国。从佛教制度上，他认为佛教徒首先是一个公民，公民的义务和责任，是建设国家，保卫国家。只有尽了公民的责任，才能谈得上酬报四恩，福利社会，以佛教徒的三皈、五戒、十善来要求自己的言行。佛教徒不能把信仰当成职业，赖此谋一身一家之生活。信仰是个人的私事，每个宗教徒必须有一正当的社会职业。

1927年，发表《僧制今论》。主张健全佛教组织，提高僧侣和信众的德学，积极从事社会文化事业、福利事业。

1930年，提出“建僧大纲”。主张全国寺庙不分宗派，建立统一的学僧制，职僧制和法僧等三级僧制。他计划用12年时间，大量培养大学本科生和佛学专家等佛教高级知识分子，培养约25 000名寺庙高级管理人才，对那些丧失工作能力，年老多病的僧尼，把他们集中到山林寺庙里去静养潜修，使老有所养。

1940年，他在《复兴中国佛教应实践今菩萨行》一文中说：今菩萨行实行者，要养成高尚的道德和品格，精博优良的佛学和科学知识，参加社会各部门工作，如出家的可以参加文化界、教育界、慈善界等工作。在家的则政治界、军事界、实业界、金融界、劳动界、使国家社会民众，都得佛之利益。大师这一设想，



突破二千年佛教制度，把和尚尼姑一变而为文学、艺术、考古、博物、大中小各类学校，民政救济、社会服务，医疗卫生等部门工作人员。

这些设想，大师在世时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现，但是今后佛教发展的必然趋势。1982年，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会议上，赵朴初会长正式提出了“人间佛教”的口号，提倡继承发扬佛教“二禅并重”和“农禅并重”的光荣传统。台湾名僧星云，在台湾经过40多年的努力奋斗，为实现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做出了显著成绩。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于1956年10月在尼泊尔第四次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上所作《中国的佛教》一文中说：“高唱僧众教育最力者是十多年前的太虚法师，他是一位博学的佛教活动家。”

大师是一位佛学家，佛教改革者，更是一位爱国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战争烈火横烧亚、非、欧、美各国，世界动荡不安。国内也处于列强入侵，军阀混战、灾害濒繁的局面。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思想混乱，精神空虚。

正当国内思想杂乱之际，大师认为唯有大乘佛教精神，才能担负起改造世界，挽救中国的历史使命。1918年秋，大师在沪与章太炎、王一亭、刘仁航、蒋作宾等人创立觉社，发起佛化觉世运动，主编《觉社丛刊》，出版《觉社丛书》，希望以佛陀无上正等正觉之教，平等流入人类心中；以六度、十善的菩萨行愿，创造人间净土，企图拨一代之乱，图永世和平。

1919年2月20日和4月1日，在上海宣讲“二十唯识论”和“因明人正理论”等佛教哲学及人生哲理。

1931年，大师因“九·一八”事变发生，立即发表告台湾、朝鲜、日本4000万佛教徒书，号召秉承佛训，反对日本军阀侵略战争。

1932年3月18日，大师痛心于中日民族之相互残杀，发表“因辽沪事件为中日策安危”，大意是说：“战则必致两败，和则相得助益。”

1933年5月，大师于上海永生无线电台，播讲《佛教与护国》。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山海关，入侵热河问题，又电全国各省市佛教会，组织“青年佛教徒护国团”，团员力主从军抗日，部份从事募捐，参加医疗救护队，慰问队、运输队、宣传队等方面的活动。

1939年，大师在国际反侵略协会欢送会中，发表佛教立场，提出武力防御与文化进攻之说。并组织访问团访问缅甸、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新加坡、越南等国。访问成功、各佛教国表示同情援助。

1943年，面对着中华民族深受凌辱、国家濒临沦亡的战乱局面，为拯救和平，团结抗日，大师积极支持基督将军冯玉祥等人发起，建立各宗教界团结统一的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1944年5月24日上午9时，在重庆市基督教卫理会堂召开成立大会。会议推选冯玉祥，中国回教（当时称呼）救国协会会长白崇禧，中国佛教会会长太虚、中国天主教文化协进会总主教于斌、中华基督教全国协进会总干事陈文渊为常务理事。太虚大师偕同陈铭枢将军和总干事长卫立民，协助冯将军积极组织抗日力量，不断掀起抗日热潮。在重庆遭受日本侵略者大轰炸时，又建立佛教徒僧侣救护队，参加当地救护工作，受到了社会赞扬。1946年，国民党政府授予他宗教领袖胜利勋章。

太虚的基本佛学观点：“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但他又认为中国佛教各宗各派都不能代表佛教，他的思想不拘泥于某宗某派，而是从佛法的根本精神上统看各宗各派，打破门户界限，还归各宗的本来地位。

他领会了佛法的真谛，强调“去私戒懒，为公服务。”他常以一般人的苦乐为苦乐，按真正的菩萨行，牺牲自己的一切，做有利于天下有情之事。他的一生，不为名，不为利，总是为人类，为佛教事业而奔波，或为了佛教利益出入于政界，或深入于寺庙进行组织、实践、演说。只要对佛法、佛教、寺院，僧人有利的事业，他都关心，不避艰难，不怕麻烦，尽心竭力去计划、维持，或发起。他这样辛勤往来于社会，自然招来了一部份人的谣诼和非议。有人说他是风头和尚，有人说他是政治和尚等等。

若实际了解，并非如此。画家丰子恺遗著《对太虚大师抱歉》一文中写道：“未见面之前，我听别人传说，甚是惊奇。有人说他是交际和尚，又有人说他是官僚和尚，还有人说他是出风头和尚。我不相信，亲自去访问他，一见之后，果然证明了外间的传说都是误解。他是正信、慈悲，而又勇猛精进的，真正的和尚。我这话决不是随便说的。正信者，他对佛法有很正确的认识和信仰。慈悲者，他的态度中绝无贪瞋癡的痕迹。勇猛精进者，他对弘法事勇猛精进之外，又恪守僧戒，数十年如一日，俱促比丘的资格。”丰子恺先生对太虚大师作了高度而全面的评价，这样评定是正确的。

正确看待太虚大师的人很多。鲁迅先生说，太虚平易近人，思想通泰。现厦门大学孙伏园教授说，许多人说太虚是政治和尚，我说他是一个“近代和尚”。

这个近代和尚，中国佛教协会赵朴初会长在1947年所作因悼念太虚大师而谈到佛教人权的评论中，充分赞扬了他的努力。他说：所谓“自度度他”，必须从当前一切迫害欺侮下自己度脱出来，才能度脱众生。因此当前佛教人民的任务，应当是为佛教的人权而奋斗。太虚大师一生的努力，正是如此。他的办佛学院，办佛教会，整理僧伽制度，倡导人生佛教，乃至最后有意参政，

无非为了这个目的。不管他的方法与结果如何，他的用心是值得同情和效法。大师已经入灭了，他对于佛弟子的启示，依然是新鲜而有力。他为维护中国佛教界的声誉，曾愤起为之，唇枪舌战。锡兰僧人纳罗达曾公然声言“中国无僧伽”。他的第一个论点是中国无僧伽、无比丘。大师说：“我国传授戒律之历史，自曹魏嘉平年。已有昙摩迦罗——法时阿罗汉，来洛阳举行开坛传戒，此为中国正式受戒之始，有信史可查。为中国比丘尼受戒，又派专人到印度迎请二十位比丘尼来中国传戒，在途中死了几位。现在中国各律寺传戒之仪式，犹保存昔日之传统。今日中国持律清净比丘，如过午不食等，仍大有人在，怎么能说中国无比丘！”

纳罗达第二个论点，中国无清净比丘传戒，受戒者也就谈不上清净比丘。大师答：不能说中国传戒的人都不清净。我昔年曾作《整理僧伽制度论》，参考南传佛教各国僧伽之生活，重兴中国佛教律制，整理僧律，印度佛教史上已发生过多次，故我国现今也应自行整理。

纳罗达第三个论点，中国无清净僧团，如苏州灵岩山虽较清净，但不能参加锡兰之僧伽律仪。大师答：在印度往昔有部派佛教之别，传到中国也有多派。中国持律僧不参加锡兰持律僧团，犹如印度部派佛教时期，此部僧不能参加彼部僧团，是一样的道理。

他为了维持寺庙合法权益，曾不顾一切据理力争。1943年11月，内政部忽颁布8月间修正之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实施办法。内定由县市政府主组委员会征收兴办，致各地佛教陷于纷乱。大师通电反对，内政部不允取消。大师愤而致书蒋介石，舍命力争。后经蒋介石令内政部取消，佛教得以保存。

抗日战争时期，成都大喇嘛寺被中央军校占用多年不肯迁让。能海法师偕同该寺住持80多岁的老喇嘛来到中国宗教徒联谊

会。太虚大师致函考试院院长戴传贤。戴院长接信后，当即专电中央军校。中央军校将所占庙房立即全部让出。

1945年3月，湖南省衡阳市佛教寺庙财产被当地政府提拨，太虚大师由重庆飞往衡阳，与当地政府首脑会商后，顺利得到解决。

大师对佛教作出了很大贡献。他对佛教提出大胆的改革，为佛教培养出很多僧才。他对欧、美、日本弘扬佛教，对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提高不少。1926年，应南洋新加坡“星洲讲经会”之请，遍访南洋群岛，说法于英人所建维多利亚大礼堂，为华侨开一异彩。他对佛教和人类的贡献，在当今是屈指可数的。

1947年2月17日，大师病于玉佛寺。3月17日下午1时1刻，逝世于上海玉佛寺直指轩。由于过于辛劳，仅享年58岁。



# 名僧茗山

吴友松 黄常伦

江苏省政协常委会的行列里，有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在谈到向海外广交朋友，增进友谊的时候，显得有些激动。这是一位出家人，穿着一件银灰色的僧装，头顶的戒疤清晰可见。他几次提到在有生之年，以佛教文化和佛教教义，广泛联络海内外佛门弟子、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继续献出自己绵薄之力。这位老法师就是全国闻名的镇江焦山寺住持，句容宝华山隆昌寺住持，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副院长（赵朴初任院长）、江苏省佛教协会副会长茗山法师。

茗山法师，俗名钱延龄，法号大鑫，生于1913年。江苏盐城人，1989年76岁。

茗山法师从小生活在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父亲钱玉焯，清末秀才。他从8岁到18岁，一直随父读《四书》、《左传》等儒家学说。因受母亲信佛影响，经常随母入寺参加念佛讲经等宗教活动，深信佛教善恶因果之理；又因家庭经济困难，不能进入中学读书，19岁（1932年4月），入西乡收成镇（现属建湖县）罗汉院依宏台老和尚出家，学习僧家规矩仪式，早晚功课，经忏佛事。入寺后，乃好读书，学诗文，不慕荣利，志求解脱，普度众生。

两年后，他进入了佛院校深造。21岁（1934年）春，从收成镇到镇江焦山定慧寺受戒，上半年学敲打唱念，下半年入焦山

佛学院读书，（以佛学为主，语文等次之），每期考试，名列第一。

1936年上半年，他在焦山任职（知客、衣钵）。但他不愿受职，志在深造，因太虚法师来镇江讲经之便，请他介绍到武昌佛学院高级研究院研究佛学。此后，时有佛学论文散见于《海潮音》等佛学刊物。

“七·七”芦沟桥事变，打破了他平静的求学生活，辗转于湖南各地从事教学和教务活动。

1937年冬，因日本侵略军逼近武汉，奉命转往湖南南岳祝圣寺佛学讲习所继续研究佛学。1939年，他调到福严寺任维那和知客，在此期间，曾会见了蒋介石、李烈钧、赵恒惕等人。1940年，他又从南岳应邀往衡阳罗汉寺创办佛学讲习所，兼办佛教会。

1941年，他从衡阳应邀到耒阳钱山寺任住持。传戒后，创办澈悟僧众学校。

29岁，太虚法师来衡阳讲经，任花药寺住持，办理衡阳佛教会务，并与福善法师办理《海潮音》刊物。

1943年，日军侵犯衡阳，转往祁阳岐山仁瑞寺避难，与僧众生产自救、种红薯，过着艰苦生活。

日军投降后，从岐山返回衡阳花药寺，兼郊区培元寺住持。

1945年冬，奉太虚法师命，往长沙主办湖南省佛教整理委员会，次年转宁乡大沩山寺任住持。1946年夏，太虚大师在镇江焦山寺创办中国佛教会务人员训练班，他又从长沙返回镇江焦山受训，并任训育员。结业后，在焦山佛学院主持教务，兼《中流》月刊主编。1948年春，在南京参加中国佛教代表大会，被选为理事。1949年春，到上海三昧寺协助雪烦法师搞生产，创办六和酱油和瓜子厂。1951年春，任镇江焦山寺监院，秋任住持。1956年秋，奉命到南京毘卢寺，办理江苏省佛教界学习委员会爱国主义学习班。1957年，到北京参加中国佛教协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当



选为理事。1955年至1957年，任焦山寺住持及镇江市佛教协会副会长。1962年春，往北京参加中国佛教协会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被聘为中国佛学院助教，并助编中国佛教史。是年冬，回镇江办理焦山寺务及佛教会务。

“文革”开始，他和其他僧人一样，被赶出庙门。先在镇江大埂街住了半年。那时，他才53岁。又在盛家巷住6年，黑桥西住6年。过着一般居民生活，但宗教信仰并未放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回镇江焦山定慧寺任住持，又兼任南京栖霞寺、句容宝华山隆昌寺住持，江苏省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第四届、第五届理事，中国佛教协会栖霞山寺僧伽培训班第一副主任，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第一副院长和江苏省佛教协会副会长。

长期的学术和教务活动，为他广交朋友打下了良好基础。

近几年来，他从事了大量的外事接待和出访工作。在频繁的接待中和谈到他几次成功出访时，他心情总是非常激动。

老法师为何有些激动呢？他对我们说：“旧社会，佛教徒是不问政治的，什么国大代表、参议员等等，一般僧侣沾不上边。在新社会，党和政府安排我为江苏省和镇江市政协常委，让我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参与国家和地方大事的讨论。我是国家的公民，就应该为祖国的统一和振兴服务。我是报国有门，苦日无多啊。”

1982年，中国佛教协会栖霞山僧伽培训班开学，赵朴初会长曾到会讲话，其中有一句名言：“爱国不得爱教，爱教必先爱国。”茗山法师始终记着。他说：“我爱国爱教的行动就是立足古刹，报效祖国”。

古刹，通常在深山老林之中，与外界隔绝。有“山中方一日，世上越千年”之说。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情况变了。茗山法师身居古刹，心却连着全球。几年来，他先后接待了日本、

美国、法国、斯里兰卡、瑞士、泰国、菲律宾、英国、瑞典、尼泊尔、新加坡等国的佛教代表团，增加了相互了解，加深了友好感情。他也频频外出访问。

茗山追溯到鉴真和尚的宝象来我国巡展的岁月。那是1980年4月，日本森本孝顺长老率各界人士护送唐代高僧鉴真宝像来扬州巡展7天，森本长老等不到结束就到镇江来参观。在焦山寺，中日两国的两位高僧茗山与森本边走边谈。森本长老有个特点：好问。他到了斋堂，只见当中屏门上写着四个字：“当思来处。”他问茗山，这作何解释？茗山立即讲出了出家人吃饭的5种观想，“当思来处”就是吃饭时要想想粮食来之不易。森本马上领悟，笑笑说：“是的，是的，我们日本也有这个意思。”从念佛堂到方丈室门前，天井里有4棵枇杷树，正长得枝繁叶茂，森本又问栽这种树有何用意，茗山告诉他：“这是为了四季长青，供奉菩萨。”森本是鉴真的第81代弟子。他马上说：“那我要拿两片树叶回去供奉鉴真大师。”茗山脱口而出：“好！好！你真孝顺，难怪你的大名也叫孝顺哩。”森本非常满意。他清楚，佛教经典上就有句话，要求出家人持戒当孝顺。他的这一举动，正表明他是虔诚的佛门弟子。到了方丈室，上面悬着一块软匾：“海云堂”。森本又问其意，茗山如数家珍地告诉他：华严经上有位菩萨叫海云比丘，就住在焦山。此堂是宋朝为纪念海云菩萨所建。森本恍然：“我想起来了，我在日本也看到过海云经，上面有此记载。”当下双方就在“海云堂”吃焦山特产无心白果。森本长老兴致勃勃，即兴挥毫，写下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八个字。森本长老的随行——德田先生提议茗山法师也能留下墨迹给他们留念。茗山法师欣然允诺，提笔在手，几乎未加思索就写下了“寄诸佛子，共结来缘”8个字。这犹如是一副对联，森本写的是上联，茗山写的是下联。这下子，81岁的森本长老高兴极了，连连向茗山合十致意。

为什么这般高兴？这是有来由的。在我国唐代，日本有位长屋王的一个太子，信奉佛教，他委托遣唐使赠送中国僧侣1 000 领袈裟，每件上都绣有这四句话，16个字，意思是日本和中国虽然隔山隔水，可同是一个天，祈望诸位佛门子弟，共同缔结无止境的未来的因缘，也就是要长期地友好下去。想不到1 000多年前的美事，中日两国的两位高僧居然仍铭记在心，心心相印，并不约而同地书写下来，可见人民的友好愿望之深。

茗山法师讲到1981年4月去香港讲经的事，也使人饶有兴趣。香港宝莲、宝林二寺方丈圣一法师，本是茗山在解放前焦山佛学院的学生。当时圣一法师在香港把庙建好，佛像塑好，专等有名望的茗山法师主持开光（即揭幕之意）。圣一法师先是专程到焦山登门拜请，待茗山和苏州西园寺的安上法师一同到达深圳时，又带了6位佛教徒在边境海关欢迎，到大屿山庙门时，几十个僧人跪下来迎接，显得十分隆重。但是，也有少数人怀疑茗山，认为他是假和尚，是共产党派来做宣传工作的。他们处处注意茗山的言谈举止。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茗山法师从十几岁起就出家当和尚，至今已60多年。有一次，他与香港僧侣一道拜佛，有心人正在辨他的真伪，只见他双膝跪下，抓地翻掌，做得是那么纯熟和得体。他在讲经时，讲的都是佛经，那些人才晓得茗山是真正住过丛林的僧人。少数人原来的怀疑才从此消除。宝莲寺开光那天，盛况空前，全港1 000多僧侣前来参加。有个女佛教徒叫陈玉兰的对茗山说：“我听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听了四次，没有一个有你老法师讲得圆满深透。”还有个教徒告诉他：“以往听讲经，许多人是第一次和最后一次来捧场，只有你老法师天天满堂，真是难得。”

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僧侣在香港见到茗山，觉得很奇怪，他们听说中国大陆已经没有和尚。茗山告诉他们，打击佛教是在“四

人帮”统治的时期，现在早已恢复正常了。特别是他们看到眼前的茗山法师是如此有学问，有修养，那么自由地宣讲佛经，行动自由……活生生的事实，使他们相信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

1982年4月，中国佛教协会组织了“中国赴泰迎奉佛像代表团”，茗山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正果法师等一行4人出访泰国，受到了10几个佛教团体、10几处寺庙长老的款待和欢迎。泰国僧王和茗山、正果作了长达40多分钟的友好交谈，谈天说地，很有兴味。这在僧王的交往中是罕见的。泰国僧王不轻易接见外国法师，更很少交谈，而中国佛教代表团去的第四天就如此礼遇，这就不单是对二位法师的尊重，更是对中国人民友好的表示了。泰国僧王还同中国佛教代表团共同主持了隆重的浇铸佛像的交接仪式，并赠送我国五尊铜质镀金佛像（三尊释迦牟尼佛像，一尊观音菩萨像和一尊弥勒菩萨像），经过浇铸、包装、运输，便运抵我国。按照他们的意愿，分别在广州、南京、昆明三地各供奉一尊释迦牟尼佛像。南京的一尊释迦牟尼佛像和观音像已供奉在鸡鸣寺（弥勒菩萨像供奉在无锡开原寺）。1986年，以帕拉·斯里拉塔纳·苏迪为团长和帕拉·克鲁白迪卡帕亚昆长老为首的泰国僧王代表团一行19人专程来南京，参加了鸡鸣寺的佛像安放仪式（也参加了无锡的弥勒菩萨像安放仪式），又与茗山作了友谊的交往，它象征着中泰友谊如同铜佛像一样万古长存。

随着对外开放，到我国来参观的外国佛教界人士和其他宗教界知名人士日益增多。茗山法师为增进对外友好不辞辛劳，先后接待的就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代表团。1980年与茗山法师接触的森本孝顺长老，回国后差遣徒弟远藤证园来华访问，送来了几十棵樱花树苗，茗山已经把它一一地栽在焦山定慧寺，同时也赠送了一些枇杷树苗给森本，愿中日友谊如同樱花树、枇杷树一样万古长青。美国的印海法师（华人）到栖霞寺来观光，茗山

法师告诉他，1982年，他受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的委托，出任了中国佛教协会栖霞山寺僧伽培训班第一副主任（主任赵朴初）兼栖霞寺方丈，经过1年教学，已为18个省、市培训青年僧侣164名，他们已返回各地管理寺庙，办理教务，成了佛门接班人。有的当了知客、维那，有的当了方丈，成了当地佛教协会秘书长、副会长，也有的上北京深造后又到斯里兰卡留学。台湾星云法师在香港听后，非常高兴，并和香港鹿野苑的法宗、达道等法师们捐港币50万元完善和恢复栖霞寺建筑，赞助栖霞寺办学。印海法师听后更有兴趣，当即把培训班的一整套录象带带了回去，在美国，给马来西亚、台湾的佛教徒放映，许多人觉得是多年来未见过的场面，不约而同地热烈鼓掌。1984年，栖霞培训班改制为“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赵朴初任院长，他任第一副院长。佛学院将造就佛门更高一级的学子，做佛门爱国爱教的接班人，现已招收第三期学僧了。

1984年岁末，江苏省政协召开表彰先进大会，当年近古稀的茗山法师走上台去，接受省政协颁发的奖状时，没有想到“出家人”居然会得奖，走下台来，即席赋诗自勉：

先进名单列茗山，光荣榜上细寻看；  
深惭老病无多力，多愿躬亲促两番。  
国际往来增友谊，僧才培养也心甘；  
今朝幸遇群英会，欲效黄公一片丹。

1989年八、九月份，他和镇江金山江天禅寺方丈慈舟法师，受宣化法师邀请，以高僧大德身份赴美国万佛城参加传戒法会，将我国真实情况向西方传播，又起到了良好效果。

# 佛教高僧澍培

侯 铁

澍培法师，蒙古族，1897年<sup>①</sup>10月20日出生于辽宁省（原热河省）朝阳县黄土坎子村，是我国北方著名的佛教高僧、书法家、诗人。

澍培俗家姓包，父亲名宪儒，世家务农，家境贫寒。传说，澍培的母亲包敖氏受孕时，夜梦红云，托月而娠，所以他有乳名“红云”之称。他另有俗名凤鸣、鸿运等。出家后，他的曾用名有念根、深根、深培等。他的同胞兄妹有4人，其中有2个哥哥：大哥包凤举、二哥包凤阁。有1个妹妹王包氏，嫁给了本县大营子村的王秉信为妻。

1905年，他开始在本村的私塾读书。他勤奋好学，品学兼优，尤其喜爱古文、书法，寒窗6年，深得师长的称赞。几年的私塾学习，为他以后研读佛经、赋诗、书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11年，年少的澍培在家做了1年庄稼活。时值清末民国初年，国贫民弱，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民不聊生，世道混浊。澍培受他僧人七叔的佛教思想的影响，认为“出家能成佛得道”，逐渐产生厌弃红尘，立下遁入佛门的志愿。澍培的双亲念其与佛有缘，遂答应了他的出家之愿。

① 说为1898年（清光绪二十三年）生人。

1912年<sup>①</sup>农历10月，经居士王达成之荐，澍培告别了父母，离乡背井，到辽宁省锦州市北大街毗庐寺，拜致庵老和尚为剃度师，落发为僧。毗庐寺又称毗庐庵，为锦州名寺，位于锦州古城北街。清乾隆年间流传的锦州有“七寺八庵二十四座大庙”，其中便有毗庐庵。据史书记载，毗庐庵始建于明朝，为朱元璋的爱将冯振源所建。冯振源在败元将江文清的锦州血战中负伤身残。以后，由锦州大广济寺的慧波法师照顾养伤，剃度出家，法号“碧空”。朝廷每年给俸银500两。1391年（明洪武二十四年）指挥使曹凤奉朱元璋旨修筑锦州城时，帮助碧空创建了毗庐庵，碧空遂成为开山祖师。现在的毗庐庵重建于1916年，有正殿3间，供奉毗庐遮那佛，东西廊禅房各3间，整个建筑古朴。当年，澍培做沙弥时，广习儒典，读四书五经、诸子百家，诵诗赋词，习书画，皆有心得，一一贯通。致庵老和尚目睹澍培攻读经文孜孜不倦，且有所新的领悟，十分欣喜，视他为得之僧才。可是，在后人问及澍培时，他却是十分谦虚，淡淡地说道：“出家后的8年是在锦州的祖师庙断断续续地学了8年荐亡超度、敲打唱念的事情。”

1920年<sup>②</sup>澍培同杏山上帝庙的照一老师傅一起投奔沈阳市万寿寺青山老和尚座下受具足戒。当年，万寿寺举办戒场，戒师是豁峰老法师。受戒之后，澍培继续留在万寿寺的佛学院研习教典和戒律。他聪敏、夙慧，没有多久，便将经、律、论三藏，通晓梗概。

澍培回到毗庐寺以后，致庵老和尚将他留在自己的身边，佐

① 一说出家那年为前民国元年，即1911年，但也有资料介绍是1912年。澍培在《自传》中称自己“十六岁出家”，似是虚岁16岁，即1912年。

② 一说澍培在民国九年沈阳市万寿寺受戒，受戒那年他24岁，周岁23，即1920年，

理寺务，着意培养。澍培的确也没有辜负师傅的苦心栽培，晨钟暮鼓，勤于寺务，精心学佛，辛勤劳作，转眼度过了 14 个春秋。在锦州城北的山村，有毗庐寺祖上留下的香火地 200 多亩。因为租粮的事情，毗庐寺和地户发生了纠纷，僵持不下，地户不种地，澍培和庙里的师兄弟只得亲自去那里耕作。从 1921 年开始，在先师的带领下，他们师徒数人在乡下经营了 3 年土地的耕种。春耕秋收。一直到 1924 年，纠纷才得以解决。澍培重回毗庐寺，协助先师翻修旧房 10 多间。

1926 年，澍培 28 岁。正值一代名僧倓虚大法师设佛学院于北京西直门内南小街弥勒寺。澍培尊先师之命，有幸入学深造，聆听倓虚大法师讲经说法，悉心面教。天资聪慧的澍培，在 6 年里刻苦学习佛理，深窥释氏内典，旁涉内外学说，达融汇贯通，引述自如，书画日臻成熟，独具一格。倓虚大法师每次赞叹澍培说：“澍培 续佛慧命之大器 乃法门中之龙象乎。”

佛学院毕业以后，澍培随同倓虚大法师在北京弥勒寺讲学。当时，倓虚大法师每日忙于寺务，应酬无暇，遂责令澍培与之代讲功课，并任他为副讲法师。倓虚大法师教弘天台，行门净土，是浙江观宗寺谛闲老法师嗣高足。澍培是倓虚大法师的法嗣，亦教弘天台，行门净土。澍培在弥勒寺讲演楞严、法华、天台教观、四教仪集注、摩诃止观等。

倓虚大法师为了实现“建寺安僧弘法”的大愿，先后在我国北方兴建了营口楞严寺、哈尔滨极乐寺、长春般若寺、青岛湛山寺等数座十方丛林。1922 年，倓虚大法师开始创建长春般若寺，至今已有 60 多年。长春般若寺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开放寺庙。在长春般若寺的钟鼓楼之间、天王殿前的一块石碑上，刻勒着原伪满洲国民生部大臣孙其昌在 1939 年撰书的“般若寺建筑始末碑记”，记述了般若寺的历史沿革。澍培法师也是长春般若寺的创建人之



1922年，哈尔滨佛教宣讲堂于7月15日举办盂兰盆节法会，他们请倓虚法师到哈尔滨讲经。当时，倓虚正住在沈阳万寿寺。接到邀请之后，他自沈阳去哈尔滨，途经长春，为长春的吉黑慈善联合会得知。应联合会之请，倓虚法师在长春讲了几天经。大家听得很高兴，许多人因此而皈依佛教。并由此而发起修庙，因为倓虚法师讲授的是《金刚般若经》和《般若心经》，所以寺庙的名字定为“般若寺”。为了建庙，佛教徒蒋洁珊居士舍庙地一块（原址在现斯大林大街上，1932年因城市修建，迁移至现址）约于1923年破土动工，由于经费不足，倓虚又兼顾哈尔滨极乐寺的修建工程，一直到1930年，仅修成大佛殿、天王殿和东西客堂。1931年，倓虚正筹划修建藏经楼，东三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兼特别行政长官朱庆澜（字子桥）请倓虚去西安市传戒。朱子桥在陕西省西安市复兴柏树林的卧龙寺，接着又要在那里举办传戒道场。正在倓虚左右为难的时候，澍培法师自锦州来长春，找倓虚法师募集修建锦州毗庐寺的款项。倓虚便把澍培留下，请他当了般若寺的监院，代他完成藏经楼的修建工程，监工修建般若寺。以后，在居士陈曜亭、赵玉田、田雨霖等人的协助下，修建工程越搞越大，不仅建了藏经楼，还相继修建了东西配殿、斋堂、厨房、山门、钟鼓楼、四周院墙等等。澍培法师还主持完成了大雄宝殿释迦牟尼尊像、阿难和迦叶两尊者的像，天王殿的弥勒像、天王像、藏经楼的三圣像等塑像。

倓虚法师的陕西之行，原说三四个月就能返长，可是，传戒以后，被当地佛教徒推举为西安市大兴善寺方丈。以后，他又到青岛修筑湛山寺，再也没有回到长春。这样，在般若寺的工程完工之后，倓虚法师提议，又经长春四众弟子之请，澍培法师于1932年10月13日被推举为般若寺的第一任住持（方丈）兼任伪京

师佛教会副会长。从此，使他得以结识孙其昌、张海鹏等伪满洲国的要臣。一连几年，溥仪年年都派员到般若寺降香。伪皇宫内的一些大臣及眷属也都相继去般若寺进香拜佛，伪国务大臣张景惠、伪新京市市长吕荣寰等人也都与澍培有过许多交往。1934年，溥仪为般若寺送去亲笔书写的金字牌匾“正觉具足”，更进一步巩固了澍培与伪皇宫的关系。

当年，日本佛教界在东京召开“泛太平洋佛教青年会”，目的是巩固日本帝国主义鼓吹的大东亚共荣圈。4月1日，澍培协同哈尔滨极乐寺的如光率佛教青年代表团，从长春出发，东渡日本，去参加这次大会。在日本期间，他曾晋香奈良的唐招提寺，朝拜鉴真大师像。

1935年秋，澍培法师应辽宁省锦州毗庐寺和锦州佛教会的邀请，前往讲授《金刚般若波罗密经》。这次法会的缘起，是锦州教育局和地方人士的提议，并经锦州县县长冯安和和地方公议会的赞助而举办。会场设在城内中心公议会办公的地方，院落宽敞。从1935年9月5日起，澍培讲演《金刚经》，连续讲了有半月之久。后来，澍培的讲演经陈绍平居士整理成册，定名为《金刚经笔录》于1935年初版1 000册，1937年再版1 000册，颇受佛教界人士的欢迎。印空法师在《金刚经笔录重印缘起序》中称：“师澍公自覩斯势，惻然悯之，乃于锦县公益会法座转此法轮，以浅显通俗之辞，演说真空实相之旨，言符圣意，语洽群机，般若奥义，因而大显，四众闻法，莫不开悟，欢喜赞叹，得未曾有，经陈绍平居士笔录成册，为宏法故四众弟子坚请流通……。”寂光法师在《金刚经笔录印缘起序》中称：“师澍公前在锦邑印行所讲金刚经之笔录，见其条分缕晰，章法井然，以雅俗共赏之笔，发挥般若真空奥义，契理契机，且详且尽，初学得此有如暗睹明灯，病获良药，洵足为人天之眼目，苦海之慈航也。”《金刚经笔录》前，

还刊有澍培法师的序言，从中可以看出他的佛教基本思想：

夫大无不包，细无不举者，其惟佛法乎。依之可以断惑证真，了生脱死，即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明德新民之理，若以佛法会通之亦可事半功倍。盖孔孟设教仅于日用伦常之显而易见者，性理之微不可得闻，佛则反复开示，直指见性成佛，兼示以因果轮回之理，俾上智一超直入，即下愚不敢任情自恣，尽人改恶向善，希圣希贤，小之反浇复淳远离三途之苦，常享人天之乐，其高深者更无论矣。近年来，一般人士知佛法为挽救世道人心之妙法，不独与一切哲学科学不相抵触，且资相发，故研讨之者，几徧世界。此本邑所以有讲经会之发起也，澍培寡学少行，滥膺虚名，承诸善信之谬举义不容辞，乃为教演金刚经一卷。当时口陈指画，直同措摩虚空，声浪消沉，何异清风过耳，竟有陈绍平大居士粗言细语一一记录于教海中，留一幻痕。俾公同好，所谓云已渡而摹其悠扬，波已逝而貌其翻涌者欤。录毕嘱余鉴定，因见内容次第井井，语义圆融，不禁欣然喜之，慈当就印。乃信手书此数言，以为流通之助，愿阅斯录者，咸发大心，则不特一念生净倍获福无量，当得阿耨菩提，即此发起法会，印送讲录诸君，不朽之功德均在焉，是为序。

1933年以后，澍培法师主持将般若寺的各殿各室全部油漆粉刷一新，将伊通县绅士齐耀珠、齐耀城等所印舍的北京版龙藏折本《大藏经》，装置经柜供设在藏经楼上，并塑造了观音像、地藏像、伽蓝像，定制了幢幡、宝盖、宫灯等庄严用具。以后，又修建了二门两旁的砖房，禅堂与西客堂之间、司房与东客堂之间的寮房。另外，澍培还和伪佛教会会长孙其昌、会员陈耀享、赵玉田等人协商，将居士王百川舍给伪佛教会的义地转让给般若寺以补助香火。

年 月 日，长春般若寺举办首次传戒道场，规模弘大，组织者便是澍培法师。这次戒场有 692 人受菩萨比丘戒，29 人受菩萨沙弥戒，336 人受菩萨比丘尼戒，2 人受菩萨沙弥尼戒，235 人受菩萨优婆塞戒，140 人受五戒优婆塞戒，124 人受菩萨优婆夷戒，103 人受五戒优婆夷戒。澍培亲自主持，向受戒的僧尼、居士讲经说法，宣扬佛理，深受佛教界人士的欢迎。戒期圆满以后，澍培选留 60 多位比丘，成立般若寺僧学校，培养僧才，澍培亲自授课，担任主讲。

般若寺和极乐寺的开山和尚都是倓虚大法师。经他规定，这两座寺院均为十方选贤丛林，方丈 3 年一任，也可以连连连任。若方丈违背职责，四众公议也能不待任期届满，就可以撤职另选。1936 年 10 月，澍培的任期已满 3 年又被四众挽留连任 3 年。当年，善果法师随倓虚由青岛到长春传戒，经澍培的挽留，请为般若寺的首座，佐理寺务。冬季，澍培在般若寺建立华严坛，带领僧众读诵大方广佛华严经 100 天。

1937 年，经澍培主持，将般若寺的殿堂全部油漆刷浆，装设暖气，铸造天王殿内供奉的韦驮菩萨像，修建钟鼓楼，般若寺越加庄严。朝阳寺住持空海法师看到般若寺僧众 100 多人 每日晨钟暮鼓，经声佛号，时常举办讲经说法，十分昌盛，遂主动将朝阳寺全安街的 20 多亩地和 10 多间房子，全部无偿地舍给般若寺，作为弘扬佛法，兴办道场之用。同时，空海还将朝阳寺的分院长春大佛寺（该寺原在孝子坟的西侧，后迁至南湖湖畔）也舍给了般若寺。这些事情，也都是在澍培的主持下办理的。

这一年，还是日本天台宗的本山延历寺开山 1100 周年。5 月间，在日本召开纪念开山法会。澍培法师应邀参加纪念会，和极乐寺方丈如光率领观礼访问团，二次东渡日本。全团有 30 多人，团长如光，副团长澍培和善果。5 月初，访问团到达日本延历

寺，受到该寺的住持梅谷孝永、武藤顺应、盐八英男等僧人的接待。在纪念会上，如光和澍培致贺辞，并向延历寺赠送了玉如意、锡杖、《法华经》、拂尘等礼物。两天的纪念法会结束以后，访问团到东京、横须贺、大坂、神户、名古屋、广岛、奈良、日照等地参观。

1938年，澍培法师主持扩建般若寺大雄宝殿前的卷棚，筹备法器。并于当年举办水陆道场。农历4月初八，伪满洲国成立佛教总会，澍培任副会长，如光任会长。浴佛节期间，澍培主持祈祷庆典，在般若寺前演戏5天，招待市民观戏。他主持讲演“大乘佛教”等。市民拜佛、听经、观戏的人络绎不绝，非常热闹。

同年10月，澍培法师辞退般若寺方丈一职，四众推选善果法师为方丈。

1939年，澍培被推选为伪满洲国的六大佛教长老。

1940年，澍培法师主持创办伪满洲国佛教总会的会刊《梵声》杂志。

同年开始，至1941年，澍培协同善果方丈在长春朝阳寺建筑楼房。

1942年11月22日（农历10月25日）澍培协同如光、善果在长春般若寺举办第二次传戒道场，向近千名受戒僧尼居士宣扬佛法。

1943年，澍培在朝阳县十六区沟门子村修建云培山兴福寺，并在山上造林栽植果树。兴福寺自1938年开始修建，1944年完成造林。

1946年7月，澍培去锦州为已故先师致庵老和尚修建灵骨塔。塔址位于锦州东四甬碑村兴隆寺旁。同年10月，澍培离锦州，经北京，到青岛，应邀任湛山寺僧学院的僧学讲师。1949年，僧学院解散。同年9月，他从青岛到北京，住西郊八里庄摩诃

庵。

新中国成立以后，澍培法师在北京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并参加了街道的工作。

1953年，澍培到山西省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晋香15天，在五台山广济茅蓬听能海法师讲经10多天。下山之后，他又到大同云冈参观佛教艺术。7月15日盂兰盆会，山西省大同南善寺邀请澍培法师讲经说法5天。8月间，他回到北京。

1954年，澍培法师又应邀赴甘肃省兰州市，参观著名的天水麦积山石窟。

1956年，澍培回到阔别已久的长春，触景生情，十分感慨。

1957年，澍培法师在反右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迁居长春市南湖大佛寺长住，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澍培日诵佛经，诗词歌赋，曾有若干首诗作反映了他当年的心境：

静坐心中挂碍无，六尘幻影尽消除。

椽眉举目皆佛境，烦恼堆中也自如。

静坐焚香是门风，一念不生万事空。

彻悟此中真意义，止观兼修成佛终。

静坐是生涯，南湖度岁华。

果园即道场，无处不僧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为澍培法师彻底平反，恢复了他的般若寺方丈的职务。他先后担任吉林省佛教协会会长、长春市佛教协会会长、吉林省政协委员、长春市政协常务委员等职务。为了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恢复佛教活动场所，修复长春般若寺，他协助政府宗教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

1981年6月，他同政府宗教工作部门的干部一起，前往浙江省天台山国清寺请楠木佛像。现在长春般若寺内供奉的佛像，大多系政府拨专款，由政府宗教工作部门同澍培出面所请。以后，他又往天台山、普陀山、五台山朝圣进香。

返回长春途中，澍培于北京挂单广济寺，拜见我国著名高僧巨赞法师。他又应巨赞大师之邀，居京讲经说法。在广济寺，澍培遇到一位名为李諒的佛教居士，两人一见如故，互赠书画，澍培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以锦州毗庐寺比丘澍培为名，给李諒居士题辞，并为后人留下了一段很长的题话，对人们了解澍培晚年的思想颇有参考价值：

“予于1981年6月初为请未雕佛像原因去浙江省天台山国清寺工艺厂任务完成后于6月末回长春经过首都挂搭广济寺遇一老人名李諒年七十余道貌岸然相谈甚洽谓我曰愿为师画罗汗像结缘于是挥毫于刹那顷绘出两尊罗汗画像生动活泼惟妙惟肖瞻仰之宛如尊者罗汗立我目前以七十高年竟能有如此神妙之笔普门品云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由此观之焉知李諒居士非观世音菩萨之化身为我画像结缘之法哀愍我度我耶？感激之余敬题其原委用以志我诚敬作拜稽身之意并发愿写偈

愿我临于命终时  
净除一切诸障碍  
愿见导师阿弥陀  
弹指得生极乐国中”

在般若寺确定为国家重点开放寺庙以后，澍培法师又多次在寺内接待国外佛教界人士，为发展我国的对外友好工作，发展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83年5月，澍培在般若寺接待了日本佛教访华团。澍培向外国的佛教僧侣宣传党的宗教信

仰自由政策，受到了人们的称赞。

1983年，澍培法师应邀赴沈阳，为千名僧侣传戒，讲经说法。

1985年仲秋，澍培于长春般若寺主持生平最后一次传戒道场，为千余名佛学弟子传戒。

在党的宗教政策的阳光沐浴下，澍培看到弟子云集，佛门兴盛，不胜欣喜，赋诗曰：

八十余年梦幻身，饱尝苦辣和艰辛。

喜承党政为昭雪，复作佛门爱国人。

1986年农历11月7日10时，澍培法师在长春圆寂，享年90岁。



# 九世班禅曲结尼马

## 牙含章

九世班禅在西藏近代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他有四个方面的突出表现：（一）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二）坚决维护祖国对西藏的主权，始终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三）一贯强调汉藏民族的团结、藏民族同祖国各民族间的团结；（四）主张改变西藏贫困落后的面貌，建设西藏要依靠祖国，尤其是汉民族的援助。九世班禅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宗教界，他同时是个重要的政治人物，在西藏地方史上，是位杰出的反帝爱国领袖。

九世班禅生于公元 1883 年，藏历十五饶迥的水羊年正月十二日，本名仓都嘉措。他自小无父，母亲是一位贫苦的哑巴牧民，兄弟 2 人，仓都嘉措被选为九世班禅，其弟后来也成为西藏的大活佛（策觉林呼图克图）。

九世班禅的确定是经过清朝政府批准的。按照清朝乾隆皇帝的规定，达赖和班禅圆寂后，要经过金瓶掣签的方法来确定“转世”灵童。1887 年 3 月，八世班禅圆寂后，札什伦布寺即派人去拉萨向达赖禀报，请示寻找九世灵童的方向。根据达赖算卦的结果，访得了 3 个小孩。6 月，筹备金瓶掣签准备事宜。11 月，经过光绪帝批准，定于 1888 年正月十四日举行九世班禅灵童金瓶掣签仪式。是日，在布达拉宫皇帝牌位前面，将 3 个灵童的名字用满汉藏 3 种文字写在 3 个象牙签上，呈达赖、摄政、驻藏大臣等过目，然后将牙签用纸包好，投入金瓶，在场的全体喇嘛一同诵金

瓶经。然后，驻藏大臣文硕起立，向东磕头，举金箸在金瓶内搅 3 匝，钳出 1 个纸包，打开一看，牙签上写的是仓都嘉措，九世班禅就这样确定了。

正月十五日，达赖在布达拉宫为班禅灵童剪发，取法名为“吉总罗桑曲结尼马格勤南嘉”简称曲结尼马。二月初五 班禅返回札什伦布寺。

就在九世班禅被确定期间（1886—1888 年）西藏爆发了第一次抗英战争。西藏人民自发抗英，清政府妥协退让，终于在 1890 年签订了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第一个条约《藏印条约》，将发生战事的隆吐等地划出中国版图，并决定开放亚东为商埠，打开了英人入藏的门户。

1902 年，九世班禅年近 20，他行抵拉萨，由十三世达赖为九世班禅传授了比丘大戒。4 月 15 日，达赖、班禅并肩走上大照寺大殿，向释迦牟尼佛像献了哈达。班禅向达赖行礼，献上各种礼品，达赖成为班禅的师傅。据说，班禅一行到达拉萨时，乐队经过达赖府邸前不曾停止奏乐，达赖因此十分不悦，两人从此埋下了不和的种子。

事实上，达赖与班禅的分歧并不在此，而在于祖国对西藏的隶属关系上。

1903 年，由于西藏地方政府不同意《藏印条约》开的 3 个商埠，就在班禅属地康巴宗（宗即县）召开了一个由驻藏大臣、英国和西藏地方政府 3 方官员参加的会议。事先未征得班禅同意，班禅对此会也不以为然。西藏地方政府仅派了一名使者传话，要求英国官员及其士兵撤离康巴宗，但无结果。

1904 年，第二次抗英战争爆发，英国军队占领了拉萨，十三世达赖被迫离藏到外蒙古。清政府对英帝入侵态度仍然暧昧，加以十三世达赖素来与驻藏大臣有泰有隙，此次出走又未得有泰同

意，驻藏大臣就给皇上上了奏折。皇上下令革除达赖的名号，并通过驻藏大臣任九世班禅暂代摄政职务。班禅比较明智，自忖代摄不妥，坚辞未就。

英帝国主义占领拉萨后，对西藏人民进行残酷压榨，勒索巨款作为赔偿。西藏地方无力承担，被迫签订了《拉萨条约》。1906年4月，中国与英国在北京签订了第二次关于西藏的条约，赔款由中国政府偿付，并将赔偿由750万卢比减为250万卢比，分3年还清。西藏上层对此屈辱条约并不甘心情愿服从，达赖出逃青海转赴蒙古后，曾想利用沙俄的势力来遏制英帝，当然不可能实现。

1905年，英国胁迫九世班禅去印度与英国皇太子会见，班禅不愿去，求助于驻藏大臣，驻藏大臣无能为力。迫不得已，班禅于1905年10月去印度，仅礼节性地拜会了英国皇太子，不谈政府问题，两个月后返回札什伦布寺。英国方面拉拢班禅的心不死，1906年又派贝尔入藏再同九世班禅会谈多次。班禅始终坚持西藏是服从清朝中央政府领导的，会谈没有达成任何政治上的协议。

1907年，沙俄也派了代表进入西藏，到札什伦布寺面见九世班禅，企图插足西藏。九世班禅谨慎从事，沙俄代表从他身上一无所获。

1908年，清政府委派查办藏事大臣张荫棠（广东人）进藏。他查处了驻藏大臣有泰及其他官员的许多为非作歹的罪行，并奏请将有泰革职，颇得西藏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张荫棠经过江孜时，班禅曾面见张，提出进京陛见光绪帝，面陈藏事的要求。张荫棠允诺代为上奏，光绪帝未批准。1908年8月，十三世达赖被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召见，恢复了被革除的名号。过了没多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逝世，西藏三大寺和噶厦又派人进京接十三世达赖回藏。1909年11月，十三世达赖返回拉萨。

九世班禅得悉十三世达赖返回的消息，专程从札什伦布寺到黑河去迎接以示尊重。据说达赖对他表示冷淡。九世班禅就此返回札寺。

达赖回拉萨后，与驻藏大臣关系日益紧张。驻藏大臣不顾达赖和噶厦的反对，派了2 000名川军进入拉萨。川军入拉萨后，光天化日之下，在街上枪杀喇嘛，甚至向布达拉宫达赖住持开枪。达赖无奈，于1910年2月带领少数随从人员秘密逃往印度。清政府得知十三世达赖出走，第二次下令革除达赖的名号，并让班禅代摄。班禅顾全大局，婉言谢绝。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拉萨也发生了兵变，驻藏川军由起初“勤王”变为拥护“革命”，后又包围了色拉寺，意图抢掠，被色拉寺喇嘛打败。川军又向地方政府要钱，挥霍无度，激起西藏各阶层人民不满，宗教界因此而分成“亲汉派”和“反汉派”。十三世达赖因与清政府及驻藏大臣存在矛盾而落入英帝国主义掌握之中；九世班禅则始终同清政府及川军保持一致，公认为是“亲汉派”的领袖。1912年6月，达赖从印度返回拉萨，九世班禅从札什伦布寺去江孜迎候，被达赖拒绝，改在热隆寺会面。据说会谈的结果并不愉快。九世班禅在清帝逊位、内地战乱纷纷的情况下，无人过问藏务，也无人替他撑腰，只好无可奈何地忍受。从此，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从政治到经济，关系日趋紧张，以至矛盾激化。

1913—1914年间，北洋政府与英国在印度西姆拉开会谈判，解决西藏问题。英方坚持西藏地方政府也作为一方代表参加谈判。会议开了1年多。英国代表提出了所谓“内外藏分治”的方案，即将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区作为内藏，由中国政府管辖；外藏—西藏本地与昌都地区，由西藏人自辖，中国政府可派一官员驻拉萨，但所带兵员不得超过300人，西藏地方的内政外交都不

由中国政府过问。这次会议实质上是一次分裂中国的会议，中国政府对这次分裂会议始终未予承认。

1915年，十三世达赖在后藏新设一个专区，把班禅的属地也管辖进去。此时班禅地区的经济收入仅为达赖地区的1/10，但达赖却要他承担1/4的军费，经济利害的冲突又加深了两个集团的矛盾。

九世班禅曾试图改善同十三世达赖的关系，1916年去函表示愿去拉萨会面，达赖复函让他听回音，一等就是3年。1919年，甘肃督军张广建派朱绣率代表团去拉萨，十三世达赖给以礼遇，临别饯行，说他“亲英非出本心，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班禅听说代表团来，也派人送信致意。据朱绣记载，九世班禅“倾向共和之心”强于十三世达赖。

1919年，九世班禅获许去拉萨与十三世达赖谈判，无结果而返。他在江孜遇到英人麦克唐纳，班禅对他说自己负债累累，处境艰难。对前途毫无把握。这些话，后来麦克唐纳都记入了他所写的回忆《旅藏二十年》中。

英国驻锡金的专员贝尔于1920年来到拉萨，唆使达赖扩军东侵，与刘文辉的川军开战。十三世达赖因战事而增加了军费，向九世班禅勒索也更紧，如此达4年之久。至1923年，十三世达赖寻机将九世班禅手下几个重要管事人召到拉萨，全部拘留。班禅获悉，情知不妙，11月15日晚上，带了几名重要侍从连夜出逃了。他的侍从比布等百余人在3日后也随之出逃。这一行人星夜遁行，经旷野草地径直北上，来到青海境内。

十三世达赖得报班禅遁去，派了2000余骑兵向北追截，但遇大雪铺地，掩盖了班禅等人的行迹，路歧不知所向，只得收兵。达赖乘机收回札什伦布寺一切权力，派一噶伦级的札萨喇嘛管辖班禅地区的政教两权。班禅辖区的百姓受到非常苛刻的虐待，班

禅本人则开始了他 10 多年的流亡生活。

班禅一行百余人半个月后到达渺无人烟的青海西部，他们带的食物不多，后来只能靠打猎维持生命。野兽打不到时，有时不得不杀了坐骑来充饥。眼看这一伙逃亡者有可能饿死在荒野，幸而遇上了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的师傅孝珠堪布的骆驼队回蒙古，九世班禅等人绝处逢生，喜出望外，于是加入了这支去蒙古的队伍。前后经历了 4 个月的时间，行至甘肃最西部的安西县。九世班禅在安西同孝珠分手，然后给甘肃督军陆洪涛去电说明原委，陆当即请示当时的大总统曹锟，曹锟下令将班禅接至兰州，再护送到北京。

九世班禅于 1924 年 5 月 9 日到达兰州，受到当地隆重欢迎。8 月到达西安。当时正值军阀混战，班禅向交战各方说明情况，希望放他通过，就这样走走停停，好不容易过了黄河到达太原。阎锡山以礼相待，安排他在太原过了冬天。

此时，北京发生政变，段祺瑞上台，出任临时执政。班禅通电段执政、参众两院、所有政府机构要人及全国各地知名人士，表示拥护共和，强调西藏永远属于中国，并呼吁各方停止内战，共同建国。这是九世班禅到内地后第一个重要的政治态度。这一电文表达了班禅顾全大局、忧国忧民的心情。他在通电中说：“……共和布政，五族归仁。布岭萨川，同隶禹甸。……我国值风雨飘零之际，正危急存亡之秋。亟应速息内讧，力图上理。乃者烽烟未靖，风鹤频惊。同室操戈，既貽煮豆然萁之消；渔人伺利，将成摘瓜抱蔓之非。唇既亡而齿自寒，皮不存而毛焉附。非惟中原锦绣，同陷陆沉，且虞边塞藩篱，亦供刀俎。怵心焦虑，惴惴滋深。班禅身受国封，与同休戚。年来受外界人刺激，见沿途闾里之萧条，知战祸不可再延，元气亟宜休养。私望彻底觉悟，共保和平。免阍墙之纷争，谋根本之建设。俾共和真缔，广被重

潘。……民国十三年十二月。”

以上电文可看作九世班禅的一个政治宣言。这是他在西安发出的。

1925年2月，临时执政段祺瑞自北京派专使接九世班禅进京。班禅进京后，被安排住在中南海内的瀛台。但时局混乱，无人过问西藏问题。4月，九世班禅应孙传芳之请，到上海、杭州、普陀山一带去讲经、朝拜。5月份他又去山西五台山，停留了3个月。8月回到北京，接受了段执政的册封，成立了班禅驻京办事处。政府每年拨给他一笔经费，表示对他的承认与重视。

九世班禅从西藏流亡到北京，从西藏投奔他的人越来越多，生活费用入不敷出。为了解决经费困难，九世班禅设法在内蒙古打开一条通道，由于蒙古对喇嘛教极度崇信，九世班禅去那里讲经“放头”（即摸顶）靠他的影响可以获得不少收入。从1928年至1932年，九世班禅在内蒙先后举行5次时轮金刚法会，每次参加的人平均在10万左右，既扩大了影响，又以此收入养活了他手下的数百人员。

1929年（民国18年）2月，国民党政府成立蒙藏委员会，曾议订统一西藏的五项原则，第一条即设法调和达赖与班禅的矛盾，要护送九世班禅回藏并保证其人身安全。班禅本人也多次提出解决矛盾的意见，但始终未能与达赖达成协议。经国民党政府批准。在南京成立了班禅驻京办事处，正式同国民党政府建立了关系。班禅为此发表宣言强调：“征诸历史与地理关系，西藏欲舍中国而谋自主，实不可能。反之，中国失去西藏，亦犹车之失辅。故中藏关系，合则两益，分则俱伤，此一定之道也。”

1931年5月，九世班禅到南京出席国民政府召开的国民会议，同时国民政府封他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颁给玉印一方，玉册一份，并定年俸为12万元。班禅在南京停留期间，5月10日，在

南京新亚细亚学会第三次大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题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他在讲话中，回顾了自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以来的汉藏血统，感情的融合，又历数了几届达赖、班禅受中原皇帝保护方得安然生存的事例，证明西藏历来是中国的领土。他说：

“西藏如果被帝国主义者侵略，则无异于自己的门户被人拆毁，不免有唇亡齿寒之忧；蒙藏要与汉族团结成一整体，实现这两点，上自中央政府，下至全中国国民，都要一致努力。”

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蒙藏委员会乘达赖的代表与班禅的代表都在南京开会，认为是协商解决西藏问题的一个机会，要求双方提出方案。班禅方面提出了16条意见，明确解决藏事应以恢复中央、西藏间固有的统属关系为原则，并宣布西藏与任何国家或地方所签订的条约未经中央批准的，一概无效。在此基础上，再商谈解决达赖与班禅两个集团属地和个人间的关系问题。最后班禅方面提出，要政府遴选专员护送他回藏，允许并资助组织他自己的卫队。

不久，噶厦针对班禅方面提出的意见，也出提他们的5条反对意见。所提的内容仅为阻止班禅进藏，而对西藏与中央的从属关系，却只字不提，进而抵制国民党政府恢复对西藏的主权。当然，这是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和班禅都不能同意的。7月，班禅仍返回内蒙。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我国东北发动了侵略战争，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极其错误的抵抗政策，东北三省不久全部沦陷。当时班禅正在内蒙海拉尔一带进行佛事活动，闻变恐遭日寇扣押，即由海拉尔向西越过外蒙古草原，疾行12日，始达内蒙锡盟的乌珠穆沁旗，得脱险境。

1932年7月，班禅在内蒙百灵庙应当地方王等王公之请，举行了第五次时轮金刚法会，参加者约37 000人。



1931年12月，班禅应北平各佛教团体之请，回到北平。12月21日，在故宫太和殿举行了第六次时轮金刚法会，参加者约10万人。

1932年12月，国民政府任命九世班禅为“西陲宣化使”。12月12日，班禅应国民政府邀请，到达南京。12月25日在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了西陲宣化使就职典礼，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授印，国民党中央代表张继监誓。班禅的答词由秘书长刘家驹代读，表示“嗣后当竭忠诚，宣扬德义，冀以宗教之力，上裨中央，振导人心。”然后班禅于1933年1月仍回内蒙，进行宣化，劝导蒙旗王一致抗日。班禅个人并向军事委员会捐献战马190匹俾供抗日军用。

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在拉萨圆寂，班禅向西藏、西康、青海、内蒙各喇嘛庙布施大洋7万余元，祈祷达赖大师早日“转世”并向全国发出了沉痛的唁电：

“顷接京电，骇悉达师圆寂，噩耗传来，哀痛欲绝，众生不幸，我尤独伤……回首西土，弥益怆怀！……感祷呼毕勒罕，早日转世，以维藏局而慰众生。”

1934年1月24日，班禅应国民党政府邀请，前往南京，除主持十三世达赖的追悼大会之外，同时就任国民政府委员职务。

1934年4月，班禅应上海闻人与杭州高僧的邀请，前往杭州，在灵隐寺举行了第七次时轮金刚法会，参加者约7万人。6月，又应上海市长吴铁城邀请，前往上海，出席了约30万人参加的欢迎大会。班禅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蒙藏为中国重要国防》的讲演，强调：“蒙古和西藏是中国西北最前线的国防，……班禅为恢复汉藏感情，不辞劳苦，东驰西奔，迄今十有一载，期于五族早日团结，同登极乐。西南重要国防，吁请及早注意，努力建设，区区诚意，仍愿贯彻始终。”6月20日，班禅从上海乘机飞北平，

又转赴内蒙百灵庙，在此积极进行返回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

1934年，国民党政府成立了护送九世班禅返藏的专使行署，派遣诚允为护送专使，后改派赵守钰继任。并派遣300人组成的仪仗队护送。这些护送人员中，有班禅请派的政府各部如交通部、邮电部、参谋本部测绘局等的专家，班禅打算让他们当开发西藏的顾问。但是，九世班禅入藏的计划被英帝国主义打乱了。英国提出抗议，声称中国军民不得入藏，要求九世班禅从海道进藏。这一明显干涉中国内政的举动被国民党政府和班禅本人拒绝了。这时西藏地方政府也表示，护送九世班禅的蒙汉官兵不许到拉萨，只能在札什伦布停留5个月，然后从海路返回内地，并要有所谓“国际担保”——即英国的同意。这些都遭到国民党政府和班禅的拒绝，噶厦就取消了最后一项，改为要九世班禅立字据，保证蒙汉官兵在西藏只住5个月；保证班禅从此归达赖管辖。这些条件显然也是班禅和国民党政府不能接受的。

1936年12月18日，班禅一行抵达青海玉树，噶厦的代表又赶到玉树，要求“不带蒙汉官兵”并威胁说“否则，不惜以武力抗拒”云云。九世班禅因此耽误在玉树。后来抗战爆发，到处一片战火，国民党政府已顾不上解决西藏问题，遂决定班禅在“抗战期间暂缓回藏”。此时，九世班禅已身染重疾，医治无效，于1936年12月1日在玉树圆寂，时年54岁。

# 弘一法师

舒 华

一位潇洒豪放的公子，一代多才多艺的文人，柳亚子等名家的莫逆之交，丰子恺、潘天寿等名人的教师，被称为“绝代才华绝代姿，一生身世一篇诗”的艺术家、文学家，竟会抛弃这一切披剃为僧，成为穿草鞋、晒破席的苦行头陀，并且信仰虔诚，严持戒律，勤学苦修，广事弘扬，被佛教界推崇为中兴南山律宗的一代高僧。此人就是名噪一时的弘一法师。

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原籍浙江平湖，祖父寄居天津，经营盐务和银钱业。父亲李世珍，字筱楼，曾考取过清朝进士，并当过吏部主事。这是李家财势最盛的时期。高宅大院，门前挂有“进士第”匾，过道悬有“文元”匾，还办了一个赈济贫寒、施舍衣食的“备济社”人称“粮店后街李善人”。李世珍为自己家起的堂名叫“存朴堂”，并亲笔书匾挂于客厅正中。时人称“存朴堂李筱楼家”，可见当时家况其盛。

1885年，李世珍故去。当时，留下5岁的儿子李叔同。李叔同幼从家学，18岁时和俞氏结婚，生了3个儿子。1898年，李叔同结婚第二年，正值康有为、梁启超变法失败，因李叔同十分崇拜康有为，赞同变法，曾刻过“南海康君是吾师”的私章，为了去嫌避祸，便奉母携眷，南下上海。

在上海的几年，李叔同读书求知，广交士林，为文结社，还参加了不少社会公益活动。他曾对他的弟子丰子恺说过：“我二十

岁至二十六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以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一直到出家。”

六、七年后，母亲王氏在上海病故，李叔同扶灵携眷，带着全部家什，坐轮船返回天津，为母亲发丧后。为寻求救国济世之道，他东渡日本留学，时值1905年秋后。此时，他正值年少，潇洒豪放，满腹抱负。作为一个贵公子，走马章台，把酒放歌。将去日本时，他留下一首告别祖国的《金缕曲》词：

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雅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辜负？

从这首词里，可以看出李叔同当年是怎样一腔爱国情怀。著名画家丰子恺是李叔同的学生，在他念小学时，参加“劝用国货”等爱国运动，曾唱过一首《祖国歌》，歌词是：

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呜呼，大国民！呜呼，唯我大国民！幸生兹世界。琳琅十倍增声价。允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呜呼，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

丰子恺每次唱到这首歌时，都深深受到感动，但这首歌词是谁做的，丰子恺当时并不知道，直到他后来考取了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才知这首歌的作者是学校的图画音乐老师李叔同。由此可见，李叔同少年时才华横溢，满腔激情，对祖国对生活充满了爱和渴望。这种爱国精神，犹如佛后面的一圈“背光”，衬托着李叔

同的面面，赢得众多人的敬仰。

李叔同多才多艺，名噪一时。他在俗仅 39 年，足迹遍及文艺领域各个园地。他能演戏，唱过京戏，演过话剧，是中国第一家话剧团“春柳剧社”的创办人，而且是中国第一个茶花女扮演者，留下了令人难忘的风采。在日本，他登台演过《黑奴吁天录》中的女主角爱美柳夫人。为此，他自己花了百多元的服装费，还牺牲了自己的胡须。在话剧《茶花女》中，他饰演女主角茶花女，影响很大。日本戏剧杂志《芝居》登了一位松居翁写的评论文章《对于中国戏的怀念》他说：“中国的俳優，使我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当他在日本时，在乐座上演《椿姬》（即《茶花女》一剧），实在非常之好。不，与其说这个剧团好，宁可说就是这位饰椿姬（茶花女）的李君演得非常好……尤其是李君的优美婉丽，决非日本的俳優所能比拟……我当时看过以后，顿时又回想到孟玛德小剧场所见裘菲列表演的椿姬，不觉感到十分兴奋，竟跑到后台去与李君握手为礼了……”。后来，他在当教师时，曾把他扮演茶花女的剧照送给学生李鸿梁。当时，李鸿梁望着庄严的李先生，几乎笑了出来。他没想到，面前堂堂的须眉男子竟会装成袅娜的西洋女子，其腰之细，令人吃惊。他后来回忆说，就是西洋女子，恐怕也要减食饿肚以后才能束成这样的细腰呢。

李叔同擅长丹青，保存下来的作品虽少，却件件是精品，其中有素描、水彩画、油画，国画，图案设计。他是中国最早引进西洋油画的人之一。他能作词，还会谱曲，会演奏，能弹贝多芬的乐曲。1906 年，他在东京创办了《音乐小杂志》，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本音乐杂志。他对于诗词歌赋，无不精通。诗文用词典雅，意味深长。他还善书法金石，各体的碑刻他都临摹过，写什么象什么。他懂日文，通英文，研究过外国文学，精读过《莎士比亚全集》。他实在够得上我国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称号。

李叔同的道德品质也令人敬佩，做任何事都非常认真。丰子恺先生说过：“李先生”少年时做公子，象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象个风流名士；做话剧，象个演员；学油画，象个美术家；学钢琴，象个音乐家；办报刊，象个编者；当教员，象个教师；做和尚，象个高僧。”

李叔同在日本时，又娶了一位年轻的日本女子为侧室，带回上海。

李叔同于1910年回到祖国，先在天津任教，但只呆了一、二年，又南下上海，后到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图画音乐，直至出家再没回过天津。

李叔同在杭州任教后，灰布长衫，黑布短褂，平底鞋，忽然变为一个严肃的教师。他教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且又多才多艺，深得学生和同事的尊敬和爱戴。在他的培养教育下，许多学生成为了音乐家、画家。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吴梦非等许多名家都出自于他的门下。

李叔同幼年尊荣丰厚，青年蜚声艺苑，壮年勤栽桃李。然而，当时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卖国“二十一条”，称帝不成，国内军阀混战，乌烟瘴气。这位“是祖国，忍孤负”的爱国者“仿佛是屈原为了楚王无道而忧国自沉”（丰子恺所写“李叔同先生的爱国精神”一文语）产生了离俗之念。

李叔同先是在一本日本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又读了一些理学和道学的文章，于是，跑到虎跑大慈寺开始断食。第一周，半断食，渐减食量。第二周，全断食，只饮泉水。第三周一反第一周的顺序而行之，一直断食十七天。后来他在谈到断食感受时，说：全断食开始的一二天，虽然有时想吃东西，但到后来也就不想了，所难受的倒是须饮大量的泉水。当时心地非常清凉，感觉特别灵敏，能听人所不能听到的，悟人所不能悟到

的 .....

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在杭州虎跑大慈寺剃除须发，披上袈裟，正式出了家。法名演音，号弘一。

关于李叔同出家的原因，众说纷纭。有的说受家庭影响，因他父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有的竟妄猜为破产、失恋。丰子恺先生对弘一法师的出家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前面已谈过的社会原因，当时社会太黑暗；另外一种解释，1948年，他在厦门为佛学会作《我与弘一法师》的演说时，把人生比做“三层楼”，而李叔同就是为登“三层楼”而出家。他说：“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于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我虽用三层楼做比喻，但并非必须从第一层到第二层，然后得到第三层。有很多人，从第一层直上第三层，并不需要在第二层勾留。还有许多人连第一

也不住，一口气跑上三层楼。不过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地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工，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

李叔同出家后，给家中一信，告知此事，让家人也吃斋信佛，还嘱咐儿子要用功读书，长大后在教育界做事。妻子、儿子见信后都哭了。此事对妻子俞氏刺激很大，她为了打发无聊的岁月，只好学绣花，不到50岁就去世了。家中向李叔同送去了报丧的信，但未接到他的回信。后来，家中添了一个男孩，求这位出家当了和尚的老人给这个孩子起个吉祥的名字，李叔同回信，给孩子赐名“祖慈”。李叔同出家时，托友人遣返自己的日本夫人归国，那位日本夫人说，日本的和尚是容许有妻室的，为什么李先生要遣返她？她坚持找到李叔同。李叔同赠她一只手表留念，安慰学过医的夫人说：“你有技术，回日本去不会失业。”会面毕，李叔同乘船离去，头也不回一下，夫人失声痛哭，最后也只得返回日本去了。

李叔同出家后，生活极其严肃，起初修净土宗，后来修律宗，被后人尊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律宗是很严格的，一举一动都要严守戒律。弘一每次坐藤椅时，都先把藤椅轻轻摇一摇，怕一下子坐下去会压死藤椅缝中的小虫。弘一生活非常俭朴，常常把别人对他的供养移作佛教事业经费，自奉很薄。他曾云游浙南、闽南等地，行游时，锡杖芒鞋，三衣一钵，有时还自挑行李，完全是一个苦行头陀，昔年富贵公子的面貌，这时已影迹全无了。

宽愿法师是衢州人，家境贫寒，为求生活来到大慈寺，得遇弘一法师。在此出家，并拜弘一法师为师，从此，他一直跟随



在弘一法师身边。弘一教他学文化，教育他怎样处世接物，认真做人。教他写过许多格言：如“放宽肚皮容物，立定脚跟做人”，“临事须替别人想，论人先将自己想”，“心志要苦，意趣要乐，气度要宏，言动要谨”最令宽愿难忘的，是弘一曾这样讲过：“宽愿，你要知道人生在世，有三大难得，一是中国难得，二是佛法难闻，三是良师难遇”并一条条解释说：“中国是世界上人口众多，地大物博，风景秀丽，历史悠久的文明大国，能做一个中国人，是多么幸福啊，尤其是生活在上天堂下有苏杭、风光旖旎的西子湖畔更难。你看，不要说自己国内东西南北各省的人，都要到西湖来游览，都要到灵隐寺，虎跑寺、静慈寺、三天竺等寺院来进香，就是日本、南洋、美洲、西欧、非洲各国的人，他们也不远万里，到这儿旅游。他们花那么多钱，为的是想来中国看看，领略文明古国的风光。我们住在西湖边，天天与湖光山色为邻，饱享眼福，不花一分钱，你看难得不难得？”

“第二是佛法难闻。做一个和尚，不是穿上袈裟，就算是皈依佛门了，而是要排除一切杂念，坚持戒律，勤学苦修，才能得道，才能超度众生。所以说佛法难闻。要学佛得道，必先求得知识学问，深透理解佛经的精义。懂得修行的方法，这就需要有良师给你诱导教诲，给你引路，可是，这良师难得啊！”

法师真挚恳切的教诲，句句打动了宽愿的心，使他激动得热泪盈眶。

有一天，弘一法师带领宽愿去大东门青龙桥一家面店吃面，并告诉宽愿，他过去的老家，就住在青龙桥附近的鸡毛弄内，那里是他诞生之处，后来教书时，曾住在这家面店的楼上，与这家面店的老板很要好。不一会，面店的老板娘过来招待，弘一法师问她“老板在吗？”她回答说：“他去世已多年了……”弘一不再问了，要了两碗素面，默默地和宽愿吃着。老板娘过来说：“这位大

师父，我男人在世时，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记得是姓李的，什么名字我记不起了。他原在杭州两级师范学校教书，听说是教画画的，师母是一位贤慧的日本女子，夫妻俩感情也很好，可是，不知怎的，这位先生突然出家当了和尚，忍心丢下日本妻子不管了，可怜呀，这位日本师母每天哭丧着脸，伤心得饭也不吃，我们劝她也没有用，最后孤苦伶仃地回日本去了。”说罢，她瞟了弘一眼，又问：“不知你们两位师父认识不认识那位和尚？”

宽愿不敢回答，弘一法师却毫不动容，静静地听她说完，然后淡淡地回答说：“哦，你说的那位和尚，我认识，但不知他现在到哪里去了。”说完，付了面钱就走了。

弘一法师在俗时才华横溢，留下许多宝贵的书画文艺遗产。出家后24年，他屏除一切艺事，独独没有放弃书法，所写的字多是经文佛号，盖上精美的图章，幅幅都是艺术精品。仰慕他的人越来越多。叶圣陶、郁达夫、郭沫若等知名人士，也都以一见弘一法师或求得他的书法为荣。

1937年抗战爆发，弘一法师不顾炮火连天，依旧按预定日程行事。这年冬天，厦门时局紧张，大家劝弘一法师赴内地避难，他却坚决不愿离开厦门。自己给所住的房室题名为“殉教堂”，誓与诸寺院护法 与共存之 如逢变乱 愿以身殉。并引用古诗“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的句子来表示自己坚贞不屈之志。1941年初冬，弘一法师为红菊花题偈4句：“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1942年10月13日，弘一法师圆寂于福建泉州温陵养老院，圆寂前3天，病体缠绵之时，他写下了“悲欣交集”4字，这是他最后的绝笔。

现在，无论是佛教界还是文艺界，对这位多才多艺的高僧都给予很高的评价。他的故居和纪念地已逐一整修开放。成为游人

凭吊之处。福建泉州有弘一大师纪念馆，有安葬弘一大师骨灰的石塔，还有弘一大师最后讲经处的碑。1980年弘一大师诞生100周年时，北京举办了大规模的“弘一大师（李叔同）书画金石音乐展”。弘一大师的艺术和人品，恰如赵朴初先生为他所写的诗中所云：“无尽珍奇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

# 十世班禅大师

## 吡 琼

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中国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第十世班禅大师过早的圆寂，留给人们诸多遗憾，而其一生不平凡的经历与业绩又留给世人不尽的思考与启迪。

1938年2月3日，即藏历第十六“饶回”的土虎年正月初三日，传说在我国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县文都乡玛日村天降大雪，地披彩虹，文都乡千户官名尧西·古公才旦文弟还夜梦日沃且山被黄缎包裹。就在这一天，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生命在小山村中的千户家呱呱降生，家人给他起乳名慈丹。他就是后来的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赤烈伦珠确吉坚赞，简称“班禅”。“班禅额尔德尼”是清朝康熙皇帝封给第五世班禅罗桑益的封号。而一世“班禅”又是蒙古固始汗赠予罗桑曲结的尊号。“班禅”系梵藏语混合词，意为“大学者”或“大智者”；“额尔德尼”系蒙语，意为“宝县”。“罗桑赤烈伦珠确吉坚赞”是他的法名，也可简称“确吉坚赞”。至今册封班禅和达赖的金印、金册还保存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的布达拉宫里。它不仅是班禅、达赖各号合法性的宝贵依据，更是西藏隶属于中国的历史见证。

贡布慈丹体弱多病，但却聪颖灵异。他3岁时即被家人送进文都寺，以便在寺内治病。他虽然只顾玩耍，尚未学经，但却在宗教气氛熏陶下，不教自明地学会放布施、扎吉祥吉等。4岁

时，就向僧人声言，不久要当活佛，学佛经。

1932年12月1日，九世班禅在青海省玉树川圆寂。按照藏传佛教（亦称“喇嘛教”）的仪轨，活佛圆寂后，其肉身虽死，但灵魂不灭，可投胎再生，选定灵童作为上世活佛的化身而成为下一世活佛。如此传承不断。1941年，班禅行辕堪布会议厅派出僧俗官员在安多地区四出寻访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经占卜、降神、观湖中征兆及辨认前世班禅遗物等层层宗教程序，确认文都乡贡布慈丹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当时年仅4岁的贡布慈丹在大经堂上面对众人毫无怯色，落落大方。他回答问题机敏自如，认前世班禅用过的袈裟、戒指等遗物准确无误。

1944年，贡布慈丹被迎入藏传佛教六大寺庙元一的青海塔尔寺供养，并呈报国民政府审批。与此同时，西藏地方政府在西藏也寻访到两位灵童，并要求把青海灵童贡布慈丹送到拉萨，以便按清朝所定旧制，于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举行“金瓶掣签”，来确认真正的转世灵童。班禅行辕堪布会议厅经讨论坚持认为青海灵童确系九世班禅的转世，并已经过各种宗教手续确认，决定暂不护送青海的灵童入藏。

1949年6月3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颁发了批准青海灵童并同意“免于掣签”的命令。全文是：“青海灵童贡布慈丹，慧性澄圆，灵异夙著，查系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应即免于掣签，特准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按惯例，经中央政府批准后，班禅或达赖的转世灵童也就获得了正式继承班禅或达赖名号的合法地位。于是，又按照宗教仪规，请甘肃拉卜楞寺高僧拉科仑·晋美赤烈嘉措为贡布慈丹进行了剃度，换了僧衣，受了沙弥戒。取法名“罗桑赤烈伦珠确吉坚赞”，简称“确吉坚赞”。

同年8月10日，国民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赴塔尔寺为贡布慈丹主持了约5000人参加的坐床典礼，并当场颁发了金

印，赠送了礼品。至此，贡布慈丹就由一个普通的孩子而正式成为第十世班禅，时年11岁。拜拉科仓和嘉雅为经师，于8月14日偕堪厅成员迁居清高宗皇帝赐予六世班禅的住锡地香日德。

十世班禅在经师教育下，从8岁起开始学习佛经。几年之内就学完了《大庄严论》、《人行论》、《慈氏王论》等近10部经典。还学会了密集三部、时轮供养、大威德金刚灌顶、时轮金刚灌顶等教法和长寿灌顶、时轮金刚法会等各种宗教仪轨。

少年班禅面对风云变幻的时代，他不可能静坐禅院，修身养性，而必须在政治上作出抉择。

就在十世班禅降生的当年——1938年，西藏地方政府在青海省湟中县的祁家川找到一位乳名拉木登珠的藏族小孩，确认他就是于1933年10月30日圆寂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国民政府于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2月5日公布命令（一）“青海灵童拉木登珠慧性湛深，灵异特著，查系第十三辈达赖喇嘛转世，应即免于抽签，特准继任为第十四辈达赖喇嘛。此令。（二）拉木登珠业经明令特准继任第十四辈达赖喇嘛，其坐床所需经费，着由行政院转饬财政部拨发四十万元，以示优异。此令。”这样，拉木登珠就正式成为合法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于1940年2月22日在拉萨布达拉宫举行了坐床典礼。因达赖年幼，经国民政府批准，由热振呼图克图代理西藏政教事务。

此时，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已侵入西藏，并在西藏培植了一股亲帝势力。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不和，除内部原因外，主要就是帝国主义势力的挑拨。

达赖，班禅是经清朝中央政府册封的在藏传佛教中地位最高的两大活佛世系。在宗教上，他们之间是完全平等的。在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下，他们在政治上又都握有不同范围的特权。他们之间团结与否，对西藏的前途至关重要。

西藏亲帝国主义势力趁国民政府无暇西顾之机，演出了一幕幕分裂我国的丑剧。1941年，逼迫拥护统一的热振活佛（即蒙语“呼图克图”）辞职，由亲帝分子达札篡位；1943年公开打出“西藏独立”的旗号，成立所谓“外交局”，派出所谓“慰问同盟国代表团”到印度和英美等国活动；1947年3月，又派出所谓“西藏代表团”出席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泛亚洲会议”同年5月，热振被亲帝分子毒死；10月，由帝国主义豢养的代理人夏格巴为团长，带领“商务考察团”到印度、英、法、美等国乞求支持“独立”；1949年2月，在拉萨制造了“驱汉事件”。

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对外丧权辱国，对内镇压人民革命，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植根于劳苦群众之中。在领导全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之后，又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节节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1949年9月2日和7日，新华社两次发表社论，揭露“英美帝国主义就一贯地图谋侵略和吞并西藏”的阴谋。谴责西藏亲帝势力出卖祖国主权的行径，严正申明：“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允许任何外国侵略。”

1949年9月5日，青海西宁获得解放。当时有人主张去台湾；有人主张去西藏同噶厦（即西藏地方政府）合作；有人主张与中国共产党联系，但又有顾虑；最后请班禅作主。年仅11岁的班禅很注意观察、研究社会事物。他在后来回忆时说：“我那时想，跟着国民党吧，国民党腐败无能，节节败退；跟着藏政府吧，藏政府分离主义倾向严重，也靠不住。那时对共产党虽不甚了解，但看到它节节胜利，这必然有顺应人心，顺应历史的道理。”于是班禅断然否定了前两种意见，决定派斗晋美去西宁，主动与进驻西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联系。从此，开始了与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合作。同时，十世班禅深知九世班禅一生为祖国统一、

民族团结而奔走呼号，作为继承人，应继承上世班禅的遗志。因而在纷乱的世态中，毅然选择了跟共产党走、维护祖国统一的道路。这也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是历史的抉择和人民的抉择。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十世班禅于当日即致电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表示：“钧座以大智大勇之略，成救国救民之业，义师所至，全国腾欢。”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11月23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复电班禅，对来电表示“甚为欣慰”。

中央人民政府虽然成立，但西藏尚待解放。

1950年1月31日，班禅堪厅致电中央人民政府，谴责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秉承帝国主义旨意搞“西藏独立”的行径，吁请中央人民政府“速发义师，解放西藏”表示：“本厅誓率西藏爱国人民，唤起西藏人民配合解放军，为效忠人民祖国奋斗到底。”

同年7月，班禅及其堪厅从香日德迁回塔尔寺，得到中央人民政府和青海省政府的亲切关怀。班禅与廖汉生、彭德怀、习仲勋等党政负责人来往不断。

结束了战乱之苦，班禅得以在安定的环境中学习藏文和佛经。他在经师的严格教育下，日复一日，刻苦研读。班禅正值年少活泼，更兼生性开朗好动，对如此寂寞、枯燥真有些不堪其苦。但他求知若渴，又对经师尊敬，故能忍耐下来，受益匪浅，为以后深造打下一定基础。班禅还抽空求教于有学问的格西堪布，同堪厅官员议论国内外大事，甚至走出寺庙，到当地农牧民群众中了解民情，从而丰富了阅历。

1950年，党中央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和实施步骤。首先从西北、西南两路派人入藏，争取西藏地方政府响应和谈。但



西藏亲帝势力不听劝告，却在西藏东部一线陈布重兵，意欲负隅顽抗。为打破亲帝势力的梦想，中央不得不派人民解放军于10月19日一举解放昌都。在形势所迫下，亲帝分子达札辞去摄政职务，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

1957年春，达赖喇嘛致函中央人民政府，报告他亲政情况，并表达了谋求和谈的愿望。中央人民政府立即复电，祝贺他亲政，并欢迎派代表来京进行和谈。4月20日，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到京。班禅一行也应中央特邀，于4月27日到达北京。这是班禅首次来到伟大祖国的首都，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热烈欢迎。当晚，周恩来总理举行欢迎宴会，并与班禅进行了亲切的长谈。班禅对周总理仰慕已久。周总理衣着朴素，谈吐潇洒，举止端庄，知识渊博，思维机敏，处事严谨，待人谦和，在少年班禅心中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宴会后，班禅下榻在畅观楼。

“五一”节那天，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在京期间，班禅及其堪厅虽未直接参加和谈，但却在会外很好地做了配合工作，他多次与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孙志远等和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等晤谈。班禅能顾全大局，摒弃前嫌，主动团结，促进了某些棘手问题的解决。在党中央正确方针的指引下，经过各方共同努力，终于达成了意义深远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5月23日，在北京勤政殿举行了签字仪式。在陈云副总理主持下，李维汉和阿沛·阿旺晋美分别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协议上签了字。班禅派代表拉欧·益西楚臣和斗晋美·纳旺金巴参加了签字仪式。

5月24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阿沛等和谈代表及班

禅一行。当晚，毛主席设宴庆祝《协议》的签订。十世班禅应邀参加，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酒词，他说：“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各民族大家庭的一大喜事。中央人民政府、达赖与班禅三方面的团结，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才能实现。”这是十世班禅发表的第一篇重要的政治性讲话。讲话表现了少年班禅的强烈的爱国热情。

6月2日，班禅一行离京赴天津、上海、杭州等地参观，开阔了眼界，受到了鼓舞。6月26日，班禅一行回到塔尔寺。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订，标志着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并从原则上解决了班禅与达赖的地位和他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协议明文规定：“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系指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彼此和好相处时的地位及职权。”这就为班禅返藏从政治上扫清了道路。

十世班禅的出生地虽是青海，但驻锡地应该是西藏日喀则地区的扎什伦布寺。因为上世班禅是该寺的寺主。自九世班禅受十三世达赖喇嘛领导的噶厦政府的排挤而不得已于1923年去内地以来，至1951年已过去20余年。十世班禅早就急于回去。

1950年，中央已决定护送班禅进藏。1951年5月23日《协议》签订后，班禅即于5月30日主动致电达赖，对协议签订给予高度评价，祝贺达赖亲政，同时表示：“班禅愿竭绵薄，精诚团结，在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协助您和西藏地方政府彻底实行协议，为和平解放西藏而奋斗。”同年藏历7月19日，十四世达赖复电十世班禅，表示欢迎班禅返藏，电文中说：“我卜卦所得良好征兆，您确是前辈班禅化身。……现在希望您即速启程回寺，所经道路决定后希先来电为荷。”这标志着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失和后，十四世达赖与十世班禅又重归于好。此前，中央代

表张经武于1951年7月10日到达亚东，面见达赖，并交了毛主席的亲笔信，达赖也问候毛主席健康。8月8日，张经武一行到达拉萨，达赖则于8月17日回到拉萨。10月26日，由张国华、谭冠三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直属部队进驻拉萨，这标志着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经过西藏全区大会讨论同意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等人的关于和谈的汇报后，十四世达赖于10月24日致电毛主席，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电文中说：“已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谨电奉闻。”1951年12月，达赖派代表到达塔尔寺，欢迎班禅返藏。

在条件成熟后，经中央批准，班禅一行于1951年12月19日自西宁起程返藏。此前，西北军政委员会根据中央决定，特派范明为驻班禅行辕代表，牙含章为助理代表，负责护送班禅进藏。行前，班禅致电毛主席，表示返藏后要为彻底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而奋斗。毛主席复电班禅，祝他顺利到达目的地。12月18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从西安赶到西宁，代表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以及西北军政委员会欢送班禅。班禅表示：“我们只有跟着共产党和毛主席走，只有同祖国各兄弟民族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西藏民族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别的道路是没有的。”习仲勋对班禅说：“西藏一切工作都要贯彻慎重稳进的方针，……西藏工作要以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为主。”

1951年12月19日，在参加了由西宁各界举行的万人隆重欢送大会后，班禅一行离开西宁，踏上了返藏的归途。在香日德停留1个月，雇了赶驼汉族民夫300余人，赶牛藏族农牧民700余人，骆驼3000余峰，牦牛7000余头，采购乘马2600余匹，骡子400余头。

1952年1月1日从香日德出发，浩浩荡荡，走走停停，经过黄河源，翻越唐古拉山，到达藏北重镇黑河（即“那曲”）。正值西藏亲帝势力在拉萨策动伪“人民会议”事件，班禅对此极为愤慨，即致电达赖喇嘛，敦促“予以弥平”。

4月15日，班禅一行从黑河出发，换由西藏地方政府支应“乌拉”差役，共集中牦牛5000头，乘马1000余匹。4月28日抵达拉萨，受到拉萨各族各界僧俗人民和中央代表以及驻藏人民解放军的热烈欢迎。当日下午，班禅乘八抬大轿，赴布达拉宫，在日光殿与达赖喇嘛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见，从而结束了29年的不正常状态，实现了西藏民族内部的大团结。

班禅在拉萨停留1个月后，于6月23日安抵日喀则。经过自西宁2000多公里、4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终于在五、六万人的欢呼声中住进了扎什伦布寺，登上了该寺寺主——历世班禅的宝座。

班禅在扎寺安静的环境中，在恩久经师的督促和几名喇嘛侍读下，苦读经书，夙兴夜寐，宵衣旰食，孜孜不倦。他较系统地研读了《常颂经典》、《仪轨大全》、《八行论》、《大威德金刚灌顶仪》、《时轮金刚大全》、《诸护法神供赞文》、《祈愿文》等藏传佛教一系列经典、礼仪和黄极派创始人宗喀巴撰写的《菩提道次第广论》等黄教基本理论。初步做到会背、能讲。

后来他又修习了显宗五大部《因明学》、《般若学》、《中观学》、《俱舍学》、《戒律学》和“慈氏五论”（《现观庄严论》、《庄严经论》、《宝性论》、《辨法性论》、《辨中边论》以及密宗理论“四续部”（《事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

1954年9月，班禅和达赖喇嘛一同到北京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别当选为常务委员和副委员长。同年12月，又一同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二届一次会议，班

禅当选为副主席，达赖喇嘛当选为常委。年仅 16 岁的班禅成了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

班禅和达赖在京期间，多次受到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毛主席勉励两位活佛好好团结、努力学习，大胆工作，共同为祖国、为西藏人民多做有益的事情，并把“团结、进步、更加发展” 8 个字作为临别赠言。毛主席还嘱咐班禅学好汉语文，指示汉族干部要学习好藏语文。

1955 年 4 月 22 日，经国务院批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拉萨正式成立，达赖喇嘛任主任委员，班禅任副主任委员。中央特派陈毅副总理专程赴藏祝贺和慰问。从此，班禅与陈毅多年友情不断。

班禅在从事领导工作中，深感知识的不足，他要如饥似渴地充实自己。1955 年 5 月 经中央特许 班禅拜土族老师张定一为他的汉文教员。他学习的第一课就是“东方红”。以后他又学习了革命先驱方志敏写的《可爱的中国》。不仅学习了汉字，而且了解了祖国壮丽的山河、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班禅对这本小册子爱不释手，用黄缎包裹，精心珍藏。接着他还学习了中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史以及政治时事。这对他在政治上的成长起到了一定的启蒙作用。他对张老师非常尊重，每日下午按规定上课，从不间断。即使有要事不能上课，也必定请假。他还特为张老师安排一套舒适的住房，供张老师居住。

1956 年 11 月，鉴于班禅在宗教上的造诣，与达赖喇嘛一起应邀前往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纪念活动，并被婆罗奈斯佛教大学授予荣誉佛学博士学位。其间，叛逃印度的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在英帝国主义和印度当局的鼓动下，散布种种分裂主义言论，并进行挑拨离间，妄图阻滞两位活佛留印。班禅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一直坚持爱国立场，从未发表过一句有损祖国统

一的言论，最终挫败分裂主义分子的阴谋，在访印度的周恩来总理帮助下，排除阻力，毅然于1952年1月29日乘我国飞机返回祖国。

1958年，扎什伦布寺举行隆重的辩经大会。功夫不负有心人，已研习佛经多年，颇有造诣的班禅经过严格考核和答辩，考取了“噶钦”学位（相当于拉然巴“格西”学位，即黄教学识的最高学位）。然后，即在该寺和塔尔寺开讲显密教义，并撰写了《菩提道次第于论简释》和《双身喜金刚生圆次第》等佛学著作。

班禅通过刻苦学习和认真研究，不仅在宗教上趋于成熟，而且在政治上日益开明。他当时曾对下属表示：“现在的封建农奴制度是最坏的社会制度，前后藏政府的官员，上骗政府，贪污肥私；下压百姓，鱼肉贫弱，致使民不聊生，乞丐成群。我们堪厅的高级官员也，沿袭旧制，无益国家和民众。我是坚决反对这种腐败颓废作风的。我们要建立利国利民的新制度。”为培养改革人才，他亲自筹建了日喀则机械学校。提出“教育学员树立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新思想”。他还想在日喀则进行民主改革的试点。只是由于在西藏条件尚不成熟，为顾全大局，贯彻中央“慎重稳进”的方针，不得不推迟试点计划。但他仍尽可能的效仿进藏干部和人民解放军，为当地人民办了不少好事。如办学校、建医院、发展经济文化等。由此引起反动分子的忌恨，诬说班禅是“汉人喇嘛”。班禅听后只是付之一笑。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国际反华势力唆使下，为永远维护万恶的封建农奴制度和分裂祖国，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武装叛乱。他们以军区邀达赖喇嘛观看节目为借口，大肆散布“军区要扣留达赖喇嘛”的谣言，公开喊出“西藏独立”的口号，煽蛊不明真相的群众上街游行，纠集反动武装包围罗布林卡，向驻藏中央代表机关和人民解放军部队开枪进攻。他们打

伤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桑颇·才旺仁增少将，打死西藏自治区筹委工作人员堪穷·索朗降措。他们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做。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中央命令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一举平息了叛乱，保卫了西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叛乱失败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眼看大势已去，即挟持达赖喇嘛并裹胁群众七、八万人逃亡印度和尼泊尔等国。

早在1958年下半年，康区“四水六岗”等叛乱组织的成员就窜入西藏进行破坏活动。班禅对此保持了高度警惕，并进行了抵制。他向日喀则地区的僧俗群众和政教官员明确表示：“你们绝不能支持“四水六岗”和‘卫教军’的活动，更不能和他们搞到一起去。”他还耐心劝说一些康巴、安多人交出武器，从而保证了后藏地区局势的稳定。

1959年3月，当班禅得知拉萨发生了叛乱后，他感慨万千，说：“这场较量不可避免的，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脓疮总是要破的，破了也好，西藏事情反而会好办一些，民主改革也可以提前进行了。”毛主席早就说过“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嘛！”他积极配合分工委的部署，立即向扎寺、堪厅和班禅警卫营下达命令：各安其他，各守其职，不要惊扰，更不能支持藏军。在他的影响下，堪厅系统无一人参加叛乱。

当班禅得知达赖喇嘛出走后，十分惊讶，他祝愿达赖喇嘛平安无事，早日回到拉萨。

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命令：“决定从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由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主任委员代理主任委员职务”。3月29日，班禅致电毛主席、周总理，表示坚决拥护国务院命令。

3月30日，日喀则各界人士集会，热烈拥护国务院命令。班禅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历数叛乱分子的罪行：“他们

一贯阻挠和破坏中央人民政府、西藏人民和爱国人士为了彻底实现和平解放西藏协议所做的努力，一贯进行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的阴谋活动，一贯拒绝改编藏军，一贯反对西藏人民经过民主改革逐步走向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他坚定地表示：“现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叛乱武装已经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有力惩罚，这是他们自寻绝路得到的恶果。他们罪有应得的。……我完全接受国务院命令我担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的决定。我将竭诚努力，和大家一起，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平息叛乱。”他说到做到，指示堪厅以公平价格买马，支援日喀则驻军剿灭残匪。

4月5日，班禅从日喀则到拉萨，主持自治区筹委会的工作。经过西藏各族人民与驻藏人民解放军并肩作战，叛乱很快被彻底平息。

1959年4月14日，班禅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一次会议，并在会上作长篇发言，严厉谴责了叛乱分子背叛祖国、妄图阻止西藏社会进步的种种罪行。真诚希望达赖喇嘛摆脱反动分子的包围，回到祖国怀抱。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班禅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大会还决定保留达赖喇嘛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的职务。

9月20日至22日，班禅代理主任主持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讨论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4个决议文件：《关于废除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决议》、《关于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的实施办法》、《关于建立土地制度改革的实施办法》、《关于成立土地改革委员会的决定》。班禅关于“宪法进寺庙”、“废除封建特权”等主张也写进了决议。

改革的核心是没收叛乱领主的土地、牧场、牲畜和其他财产，而对未叛领主则实行赎买政策，变农奴主所有制为劳动人民个体



所有制。决议完全反映了西藏百万农奴的强烈愿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主改革的烈火烧遍了西藏高原。

封建农奴制统治下的西藏社会是个极其反动、黑暗、落后、野蛮的社会。只占西藏人口 5% 的宦家、寺院和贵族这三大农奴主占有西藏的几乎全部土地、牧场和大部分牲畜，而且占有农奴和奴隶，有生杀予夺之权，对广大农奴和奴隶进行惨无人道的压迫和剥削。而占西藏人口 95% 以上的农奴和奴隶则除了自己的影子之外一无所有，甚至毫无人身自由，世代成为农奴主会说话的工具。他们为农奴主从事各种繁重而无偿的劳役，过着地狱般的悲惨生活。在这种腐朽透顶的社会制度束缚下，西藏社会处于停滞状态，经济凋敝，文化落后，连人口也逐年下降。改革这种旧制度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意愿。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了西藏人民的革命，取得了民主改革的伟大胜利，废除了万恶的封建农奴制度，推翻了农奴主统治，建立了劳动人民所有制和人民政权，使西藏百万农奴和奴隶获得翻身解放，一跃成为社会的主人。这场伟大的变革为西藏开创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代。

班禅能顺应历史的发展、人民的意愿，在平叛改革的伟大斗争中，勇敢地站在人民一边，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做出了历史性的卓越贡献。

西藏在平叛改革后期出现了一些扩大化现象。1961年1月23日，班禅赴北京直接向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维汉、张经武等领导同志做了汇报。毛主席当即指示：现在西藏要纠正“左”的偏向，只搞互助组，不搞合作化；要把3000多上层人士的工作搞好。毛主席还说：我们从香日德起就合作，我们一起搞了这样久，从1959年以来，在平叛改革等大政方针上，我们都是一致的。能讲真话，你有这个作风很好。次日。周总理同班禅进一步讨论了西藏工作，鼓励班禅“见面什么话都可以

谈”。随后设宴招待班禅及其父母和随行人员。

班禅在京期间，陈毅、贺龙、习仲勋、汪锋等中央领导同志有时也去看望他，同他谈心。那时，我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各族人民同甘共苦，苦度难关，每餐只有两菜一汤，不吃肉食。一次，陈毅、贺龙元帅前来看班禅，班禅拿出苹果招待。初时大家客气，谁也不吃，后来班禅亲自把苹果送到两位元帅手里，两位元帅大口大口地吃起来。陈毅边吃边说：“好久没有吃到苹果了，真好吃！”大师半信半疑地问：“真的没有苹果吃？”陈毅答：“困难时期连饭都吃不饱，哪里还有水果？”大师惊奇地问：“您这外交部长，天天接见外宾，就不吃水果？”陈毅说：“那是给外宾的，我们不能吃，外交部几千人，我这个部长一带头违反纪律，下面的人怎么管得了！”临走，大师一再要他们把剩下的苹果拿去，推辞不过，陈毅笑着说：“既然大师作施主，给我们布施，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我拿一个回去给张茜，让她解解馋。”后来又有一次，陈毅、贺龙来大师家做客。贺龙抽烟，拿出打火机却打不着，因为火石没了。在场的藏族干部争着把自己的火石送给贺龙。大师问：“还要不要？”贺龙风趣地说：“贺龙用兵，多多益善。军委好些人早就没这东西了。”陈毅借机打趣说：“您这游击司令，太不象话，把游击战打到大师家来了。”

相比之下，当时班禅和他的随宾却受到特殊照顾，生活实报实销，保证供应。

班禅从这些小事中，悟出一个大道理：有这样廉洁的党，这样大公无私，克己奉公的干部，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没有什么敌人不能战胜，也没有什么失误不能纠正。他从小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更加尊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前途充满了信心。

1961年至1962年，班禅到甘肃、青海、四川、云南等省区的藏族地区视察，了解了不少有关平叛改革、合作化和贯彻民族、宗

教、统战政策方面的问题，听到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和地方干部的不  
少反映。他感到问题十分严重，有责任把有关情况和自己的意见直  
言不讳地向中央反映。于是，他写出了《通过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向  
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  
议》全文共 8 个部分，译成汉文达 7 万多字，这就是后来所  
称的《七万言书》。

《七万言书》中确实反映了不少实际问题，大部分意见和建议是  
好的，是襟怀坦白的。但也确有言不符实、过于偏激之处。

中央对班禅提的一些合理意见十分重视，周总理亲自召集有关  
领导同志进行研究，并责成习仲勋、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  
平杰三、夏辅仁、刘春等同志研究，起草了在西藏贯彻“稳定发  
展”方针的 4 个文件，报国务院批准。另一方面，中央领导同志  
对班禅的错误观点也进行了严肃、耐心的批评。周总理就曾诚恳  
地当面对班禅说：“我们工作中出了错误，有些错误的性质是严重  
的，但不存在‘灭族灭教’的问题。”周总理还说：“班禅大师的心  
是好的，但有些话说得不恰当，是错误的”，“说错了的要给你指  
出来”。

1962 年以后，由于“左”的错误日趋严重，导致了班禅大师  
受到不公正待遇。1964 年 9 月，在西藏开展了对班禅的批判。同  
年 12 月，撤销了班禅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委员的职务，  
并免去了他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  
务，仅保留政协常委一职。周总理为使班禅免受更大冲击，亲自  
安排他来北京，住在沈钧儒副委员长曾经住过的寓所。还在生活  
上给予照顾，使班禅过了一段虽然寂寞但却平静的生活。

1966 年，“文化大革命”浩劫殃及全国，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  
革命家遭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就连令人敬仰的周总理也遭  
到责难。在这种情况下，班禅怎能幸免于难？1966 年秋，他被红

卫兵抢走，受到批斗；1968年夏，又被隔离监护，过了9年的软禁生活。周总理在处境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千方百计指示有关人员保护班禅，使班禅免于发生不测。当班禅后来得知周总理一番苦心后，感动得热泪奔涌。他深深怀念周总理的恩情，在周总理逝世后，他每年都要在周总理祭日到天安门纪念碑献花。

在被软禁期间，班禅一度苦闷，迷惘，但后来终于冷静下来。他坚信党，坚信人民，坚信会有云开雾散的一天。他以顽强的毅力刻苦学习毛主席诗词、著作和马列著作，学习历史和时事，理论知识水平有了显著提高。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次年10月，班禅大师终于结束了被软禁的生活，过起北京市普通公民的生活。他每天念过晨经，便去跑步。早饭后，就专注地学习藏文、汉文、佛教经典、政治历史、民族理论。他从更多方面做准备，以便重新更好地为祖国和人民效劳。

1979年7月2日，班禅在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重新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80年，再次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与此同时，党中央给他在政治上彻底平反。他高兴地说：“我早就坚信会有这一天。”

他胸怀坦荡，不计个人恩怨，曾多次向亲属和友人表示：“与老一辈革命家所受到的迫害相比，我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这一切已经成为过去，党中央已经给我彻底平反，使我在政治上获得第二次生命，得到了为全国各族人民和藏族人民服务的机会。”他还对曾经给他提过意见或批判过他的人士说：“我恳切地希望大家捐弃前嫌，团结起来向前看，互相谅解，互相勉励，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团结一致，并肩携手，共同为四化建设出力。”

1980年，班禅大师重返工作岗位。不久，邓小平同志请他到家里谈心。小平同志恳切地说：“你是我们国家最好的爱国者”；你自己的活动，可以放手，不要顾虑”。大师深受鼓舞，日以继夜地

工作和学习，想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他曾向记者表露心怀：“党中央对我是关怀的，人民对我是信任的。过去，外国人对我很感兴趣，千方百计拉我，但都没有拉走我。现在，我再次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关心的是在有生之年，在有工作能力的时候，对党对国家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为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作出自己的贡献。”

1980年9月至11月，大师到其故乡青海省视察。在西宁市，他告诫干部、群众不要闹草山纠纷，要“互相谅解，合理协商，正确解决”；“千万不要动手”。在塔尔寺，他嘱咐僧俗群众爱国爱宗教，这是当喇嘛的原则。爱国就是爱我们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寺庙还要管好文物，搞好绿化。

在海南藏族自治州，他为前来朝拜的五万多群众摸顶祝福，勉励大家要听党的话，搞好生产，为四化出力。在海南州干部大会上，他专门指出：“1958年的平叛斗争、民主改革，都是势在必行，都是正确的，是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但是在改革中、平叛中由于当时的左倾路线指导下，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

10月24日，班禅大师专程视察了达赖喇嘛出生地——平安县石灰窑乡红崖村（过去属湟中县），亲切会见了达赖喇嘛的7户亲属，并向他们赠送了礼品。勉励他们在党的领导下，与各族人民团结互助，建设好自己的家乡。大师还表示欢迎达赖喇嘛回来。

班禅每到一地，都受到热烈欢迎。成群结队的群众前来朝拜，争献布施。大师表示：“布施自愿，不能摊派。我们是搞宗教的，不是搞钱财的。”他把收到的布施约12万元赠送给当地学校、寺院和民政部门，做为支援教育、维修寺庙、救济群众之用。基本做到了取之于民又用之于民，开创了一项宗教制度的重大改革。

1982年夏秋之交，班禅大师回到阔别20年的西藏自治区视察。他深入工厂、农村，为穷困面貌的改变而高兴。他为成千上万的

群众摸顶祝福，又在电台、电视台多次宣布：“今天告之僧俗信徒者，汝等来朝拜，……切勿以供奉愈多愈善。就我而言，决不需要供奉。何况汝等若因供奉过多，影响生产，妨碍生活，这将使我不安、伤心、遗憾。总之，我为完成西藏的公事而来，非为收集供奉等谋私而来。故汝等来时勿持供奉。”大师的风范，对于煞住一时兴起的“宁肯倾家荡产、也要争献布施”之风起到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大师作为副委员长，十分关心西藏的前途。他在7月17日拉萨干部大会上，对西藏与祖国的关系作了精辟论述。他说：“西藏成为伟大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历史的教训使我们懂得，爱祖国同爱民族是统一的，二者不可分割，更不应对立起来。现在有人企图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的残余，用爱民族否定爱祖国，打着民族的旗号来反对祖国。对此，应保持高度警惕，并及时揭穿他们所谓爱民族的虚伪性。”他还说：“坚持民族利益同国家利益的一致性，坚持爱祖国、爱民族的立场，才是唯一正确的立场，才能成为光明正大的、无私无畏的、有益于人民的人。”这段话对于某些口头上标榜“为西藏人民幸福”而实际上出卖西藏人民根本利益的人，是个绝好的劝戒和批判。

1985年9月1日，是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班禅大师作为中央代表团副团长于8月27日再次飞抵拉萨。在机场和市区受到自治区和拉萨市党政军负责人与3万多各族群众的热烈欢迎。

8月30日，班禅和阿沛两位副委员长在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多杰才旦主持的记者招待会上，首先介绍了西藏20年来的变化：从政治上看，由封建农奴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西藏人民充分享受到当家做主的权利，民族区域自治政权得到巩固和加强。到1985年，全区已有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31900人，占干部总数的62%；20年来，农牧业总产值增长了89%，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倍 各类学校的在校学生增长 1.5 倍。西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很大改善。

然后，班禅大师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当记者问到对国外有人搞“西藏独立”有何看法时，大师明确表示：“对于所谓‘西藏独立’我过去反对、现在反对、将来还反对。”当有记者提到国外有人说西藏人民没有自由时，大师指出：“解放前的西藏，在封建农奴制度下，农奴、奴隶完全没有自由。领主不仅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和劳动果实，还占有农奴和奴隶的人身，对他们握有生杀予夺大权。解放以后，农奴和奴隶成了国家与社会的主人，他们除了享有宪法规定的我国公民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以外，还享有少数民族特有的自由，西藏人民是满意的。”

9月1日，古城拉萨红旗招展，鲜花怒放。各族各界人民 35 000 余人云集布达拉宫下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广场，热烈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 20 周年。班禅大师在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号召：“我们要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各民族的亲密团结，要维护和不断增强藏汉族及其他各兄弟民族之间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同心同德，紧密团结，把西藏建设成为一个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

庆祝活动后，大师视察了拉萨市和日喀则、那曲、山南 3 个地区，参观、慰问了机关、学校、手工业作坊、农牧民家庭和寺庙，召开了 15 个座谈会，进行调查研究，向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反映了不少情况和建议。此外，他还进行了佛事活动，为 70 万人次的群众摸顶祝福。

1985 年 2 月中旬，班禅大师专程到拉萨，主持中断 20 年之久又重新恢复的传召活动。“传召”又叫“传大召”藏语称“门拉木钦波”意思是“祈祷大法会”。

传召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即黄教）始祖宗喀巴于 1409 年（明朝永乐七年）创立的。当时是为纪念释迦牟尼示现神变和弘扬佛法，后逐渐演变成较大规模的传统宗教节日。1965 年，进行了适当改革，废除了铁棒喇嘛等的封建特权，又增加了举石、跳舞等群众性文体活动。

1985 年，应西藏宗教界上层人士和信教群众的要求，为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恢复传召活动，并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给予了支持，还向参加传召的僧尼发放了数量可观的布施。

班禅大师下榻在他的行宫——秀则林卡小楼内。于 2 月 15 日前往大昭寺，朝拜了释迦牟尼佛像，然后在寺内主持了诵经仪式。

2 月 17 日（藏历正月初八），传召活动正式举行。巍峨的布达拉宫和肃穆的大昭寺金顶在晨光中熠熠生辉，市民屋顶上五色经幡迎风飘扬，八角街和大昭寺广场香烟缭绕，人流如潮。大昭寺内供灯齐明，供品累累，僧众济济一堂，从容自若。在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副会长波米·强巴洛珠带领下，齐声诵经。参加法会的喇嘛共约 1 500 名，他们主要来自拉萨的哲蚌、甘丹、色拉三大寺，还有红、白、花、黑等各教派代表以及国外藏胞。朝拜法会的施主和信教群众 10 万余人。英、法、日等国外宾和港、澳、台胞 70 余人也前来参观。

班禅大师在这天早晨就来到大昭寺内，一一朝拜佛祖殿、观音殿、松赞干布殿等。于中午斋会后，登上寺顶，双手合十，微笑着向聚集在大昭寺广场上人头攒动的群众表示祝福，广场上的群众欢声雷动，兴高彩烈。下午，大师驱车到小昭寺朝佛诵经。

2 月 19 日，大师监看了激烈、有趣的辩经活动，6 位高僧经



过严格考核，获取了“拉然巴格西”学位。

2月24日，法会移至寺外的“松曲热”举行。大师身披法衣，坐在法座上，主持法会并讲经。10余万僧俗群众涌上街头和广场，争睹法会盛况，聆听大师讲经。大师从容讲述了关于释迦牟尼宿世行传的《三十四本生传》，最后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僧俗人民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下午，大师同众僧共念颂经，向佛祖敬献“曼扎罗”供，并为佛祖新佛衣开光。

当晚，大昭寺广场和八角街灯火通明。传召法会的重要内容之一——“酥油花灯节”开始了。在明亮的灯光照耀下，各种精妙多彩的用酥油做成的花争奇斗妍。释迦牟尼、宗喀巴等佛像惟妙惟肖，结、伞、螺、轮、幢、瓶、鱼等8吉祥徽和金轮、神珠、玉女、白象等6长寿栩栩如生。花、草、云、水等斑斓多姿。……班禅大师与自治区党政领导一起兴致勃勃地观赏了良宵美景。成千上万的群众结伴而来，观灯赏花，放歌起舞，彻夜不眠。

2月25日上午，传召进入尾声。大师主持了迎请强巴佛仪式。下午，大师冒着凛冽寒风，参加了在拉萨河畔的固堤仪式，祝福拉萨免除灾祸，五谷丰登。

整个传召活动进展顺利。传召结束后，大师又到日喀则等地视察工作。

1985年4月底至5月中旬，我人大代表团应邀访问了澳大利亚。班禅副委员长任该团副团长，这是他30年来的第一次出访。

通过访问，增进了中澳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大师还相机接触了旅澳藏胞，并与达赖喇嘛通过电话进行了交谈。

大师在悉尼和墨尔本等地，几次应邀到旅居当地的藏胞及外国佛教徒家中做客，为信徒摸顶和讲经。他会见了40多名国外藏胞和100多名外国信徒，与他们进行了亲切、坦率的交谈，使他

们颇受教育。针对他们的思想疑虑，大师着重深刻地论述了西藏与祖国的关系，有力批驳了所谓“西藏独立”的谬论。大师说，我与达赖喇嘛是教友，我尊重他，但我们走的路不一样。我认为，第一，从历史讲，自元朝开始，西藏就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第二，从现实讲，祖国统一是全国各民族的愿望，是合乎藏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另外，又有哪个大国愿意同中国打仗？你们说要“西藏独立”，这根本不可能。第三，从前途讲，不丹、锡金人的今天，也就是“西藏独立”的明天。西藏只有在祖国大家庭中，共同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同时又搞好民族区域自治，才有光明的前途。脱离了祖国，藏族单独是没有好日子过的。所以，从历史、现实和藏族的前途着想，我选择了祖国统一的道路，这不是一时的、被迫的，而是永久的和坚定的。

5月9日晚，在班禅大师就餐时，突然接到达赖喇嘛自西德打来的电话，双方进行了26年来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话。在通话中，针对达赖提出的班禅“处境”问题，大师坚定地说：“我决心为了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大团结，为了藏族人民的幸福，而一如既往，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也改变不了我的信念！”当达赖提出所谓汉族向藏区移民问题，大师解释说：中央没有移民的政策。藏区地域辽阔，条件落后，应实行对外开放，需要汉族等各民族的支援。当达赖提到与中央的联系时，大师借机申明：中央欢迎你回来，我也欢迎你回来，共同建设新西藏。但你们却搞示威游行，发表各种文章骂人，这会伤感情，不利于改善与中央的关系。你们应该多与中央联系，有意见也可以反映。我觉得，只有维护祖国统一，为我们民族办一些实事，才会有所作为。

在访问期间，分裂主义的“激进”组织——西藏青年大会党鼓动班禅“趁这次访问的机会，去自由的国家美国、要求政治避难”。大师对此不屑一顾。

1986年1月下旬，班禅副委员长应尼泊尔王国全国评议会邀请，率领我国人大代表团访问了友好邻邦尼泊尔。同行的，还有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为团长、以贡唐仓活佛为副团长的中国佛教代表团应邀赴尼泊尔参加第十五届世界佛教联谊会。

尼泊尔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素称“美丽的山国”，人口约1500多万。南部城市兰毗尼是释迦牟尼诞生地。中国和尼泊尔是近邻，中尼友好关系源远流长。在加德满都、博克拉、木斯塘等地，旅居有自1959年以来从我国出走的藏胞，现约有3000多人。国外分裂主义势力在尼建有各种非法机构和据点，并以此为基地，向我国西藏地区进行政治、宗教渗透。

为维护中尼友好，尼有关方面取消了对达赖喇嘛的邀请。这就使班禅大师来访成为敏感问题，引起分裂主义势力的忌恨，阴谋阻止和干扰大师的访问，甚至扬言要从肉体上伤害大师。

班禅大师面对这种复杂情况并未却步，他深感责任重大，亲自安排，从各方面做了缜密准备。11月24日，班禅一行乘我国民航专机抵达加德满都，受到尼官方和人民的隆重欢迎。在一部分爱国藏胞的组织和带领下，几千名居尼藏胞也赶来夹道热烈欢迎。

在我驻尼使馆的全力协助下，大师出色完成了各项访问活动，并相机做了团结争取国外藏胞的工作。大师拜会了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会见了尼评议会议长和尼政府首相等政界要人以及尼宗教界等各界知名人士。大师还应邀参加了在加德满都召开的第十四届世界佛教大会，班禅大师在各种外交场合举止大方，说话得体，得到尼各方人士的普遍尊重。我国当时驻尼大使屠国维对大师的外交才能也给予了高度评价。通过各种访问活动，大师为增进中尼友好关系做出了贡献。

在访问活动间隙，大师朝拜了兰毗尼、加德满都的斯瓦扬布

和波乌达等佛教圣地，并在下榻的“清凉宫”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讲经活动。数万名居尼藏胞和尼泊尔群众冲破分裂主义分子的阻挠和尼警察为安全而设的警戒，扶老携幼，前来朝拜、听经和请大师摸顶。

大师还利用各种机会会见了许多居尼藏胞代表，向他们转达了祖国的关怀与期望，使他们受到教育和鼓舞。

另外，应达赖喇嘛方面要求，班禅大师在我国驻尼使馆接见了达赖喇嘛从印度派来的代表阿拉·晋美伦珠等 3 人及达赖喇嘛驻加德满都办事处负责人。大师严肃地向他们指出 3 点，并要他们原原本本地转告达赖喇嘛。这 3 点主要是：（一）你们如果真正爱自己的民族，就应该同我们一起努力，做些有益于民族和国家的实事。否则，你们成天找岔子骂我们，并不能使藏族兴旺起来。（二）我认为宗教的前途并不在于寺多僧多，而是要有高质量。我看到现在许多喇嘛很不象样子，包括一些所谓活佛，搞些乌七八糟的事。（三）我去年访问澳大利亚时，达赖喇嘛与我通了电话。我认为，中央的政策非常正确，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民族的兴旺肯定无疑。

由于大师的威望和机智，加之尼官方和我驻尼使馆的共同努力，以及爱国藏胞的积极配合与支持，使大师的访问圆满成功，粉碎了分裂主义势力的阴谋。

1987年至1988年，大师工作格外繁忙。他有时一高兴可以连续工作18个小时。

他热爱自己的民族，时刻为西藏人民的真正幸福着想，为西藏的稳定和发展办了许多实事。

他从对于各族人民根本利益一致性的深刻理解出发，一贯高举爱国、团结、进步的旗帜，坚决反对分裂和倒退，竭诚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他多次强调：“西藏只有统一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才有光辉灿烂的前途，才有民族的兴旺发达；西藏人民只有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汉藏民族之间以及祖国各民族之间的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真正幸福美满的未来。因此，我们一定要象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来维护祖国的统一。”他还经常指出：“加强各民族间平等团结，是藏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他于1987年7月9日在西藏自治区四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总结历史的经验，明确指出：“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西藏各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关心，共同把西藏建设好”，“什么时候民族团结搞得好，什么时候西藏就能发展、兴旺，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

1987年9月以后，国内外分裂主义势力在国际反华势力怂恿下，在拉萨制造了数起骚乱事件，煽动民族情绪，挑拨民族关系，以便混水摸鱼，搞所谓“西藏独立”，从根本上损害和出卖西藏人民的利益。班禅大师对此极为愤慨，多次发表谈话，义正词严地予以谴责。大师指出：国内外的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大喊什么“西藏独立”，这是违背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西藏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人民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凡是有历史常识的人，凡是实事求是的人，都承认这一历史的事实。如果按照自己的政治需要，违背历史地讲什么“西藏独立”，是一种令人厌恶的极不负责的行为。大师针对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鼓动僧人参与闹事而谆谆告诫说：佛教的宗旨就是普渡众生，为免除一切人世间的灾难。拉萨的少数喇嘛、尼姑参加了骚乱，这在佛教的教规上是不允许的。我们必须按照佛教提倡的“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教义，遵守佛教的教规和国家的法律，使每一个僧尼都成为爱国、爱教的好信徒。有一次，他听到拉萨发生骚乱后，心急如焚，夜不能寝，立即通电扎什伦布寺：

“佛教的教义是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利益有情，广积功德。请转达我的命令，如有人胆敢做坏事，应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大师十分重视和积极推动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实施。强调在西藏要“按照宪法和法律充分地、正确地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他非常关心藏族干部的成长，认为“我们培养的民族干部要能够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又能代表本民族的利益”；他关心西藏的经济建设，支持改革开放，与阿沛副委员长一起，筹建了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还亲自指导扎什伦布寺建立了既有利于“以寺养寺”，又有利于活跃西藏经济的“刚坚公司”；他十分重视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与阿沛副委员长一起，提出了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建议。

他身为藏传佛教领袖人物，努力弘扬佛法，并探索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他亲自在扎什伦布寺搞试点，并总结出一套有参考价值的寺庙管理经验；他亲自创办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并担任院长，为用现代化教学与传统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培养爱国爱教的高级佛学人才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1989年1月9日清晨，班禅大师乘专机再次离京赴藏，主持五世至九世班禅合葬灵塔，即“班禅东陵札什南捷”开光典礼。行前，他到医院看望了令人尊敬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并送给他一张请柬，以做纪念。1月8日，到天安门广场英雄纪念碑前，第十二次向周总理的英灵献上花圈，以纪念总理祭日，缅怀无限恩情和千秋功业。

1月9日下午，大师及父母、经师等一行抵拉萨，受到自治区党政军领导和上万名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当晚，大师与区党委副书记热地彻夜长谈，纵论西藏稳定与发展的大事。

1月13日，大师乘车自拉萨前往日喀则。途中，在海拔4700米的岗巴拉山顶，大师俯瞰广阔而碧绿的羊卓雍湖，心潮激荡，

情不自尽地放声呼喊，为西藏人民安乐、五谷丰登而祝福。

1月14日，大师安抵日喀则。近3万名群众身着节日盛装夹道热烈欢迎。当晚，大师下榻在整修一新的新宫——“德钦格桑普彰”。

1月15日至16日，大师忙于安置五世至九世班禅灵骨，亲自与几位高僧一起，将灵骨分别放置于特制的紫檀香木柩中，并填放各种名贵香料和藏红花。

本来，历世班禅都分别有安葬灵塔。但“文革”期间，五世至九世班禅灵塔被毁，灵骨失散。只是由于一些信徒暗中收集，才得以保存下来。1979年后，党的宗教政策逐步落实，大师提出为五世至九世班禅合建灵塔的建议，得到国务院的批准和支持，决定由国家拨款670万元。

1月17日，上午听取开光典礼活动安排的汇报，研究有关问题。下午举行迎请五世至九世班禅灵骨入灵塔仪式。十世班禅手持藏香在前面引路，后面众喇嘛抬着5个灵柩缓缓前行，在环绕扎什伦布寺主要殿堂一周后，将灵骨安放进新建的灵塔中。大师不顾劳累，迎请仪式结束后，又前往日喀则饭店等处，查看接待来宾的准备工作。

1月18日，大师在新宫最后一次接受记者采访。大师多次感激中央政府对重建灵塔的关怀，表示他虽在“文革”中蒙冤，但却未改热爱共产党的初衷。他说：“现在共产党纠正了那个时期的错误，这正体现了共产党的伟大。任何政党、组织和个人犯错误都是不可避免的。善于认识错误，勇于改正错误，这才是最重要的。”

1月19日，迎神安住仪式在班禅东陵札什南捷二楼回廊殿举行。大师亲自主持和参加了各种佛法活动，与数百名喇嘛一起高诵安神经。

1月20日，大师前往澎唐桥头迎接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胡锦涛等自治区党政领导人。

1月21日，大师对他在开光大典上的讲话稿作最后修改。又亲临现场，查看庆典准备工作，特意嘱咐工作人员在开光庆典按惯例向群众分发食品时，不要沿袭过去贵族们站在高处向人群抛撒取乐的做法，而要逐一送到群众手中。大师还看望了一些年老体弱的客人。

1月22日，扎什伦布寺一派节日气氛。殿内供灯齐明，寺顶经幡飘扬，处处香烟缭绕。中午12时30分，庄严、隆重的班禅东陵札什南捷开光庆典在一阵法号声、欢呼声、鼓掌声中开始了。扎寺民主管理委员会主任恰扎·强巴赤列活佛宣布开光典礼开始。班禅大师健步走上平台，接受各地宗教界人士敬献“曼札”。然后发表了热情洋溢、含意深刻的讲话，这也是他一生最后一次的重要、正式讲话。大师在讲话中，对各地来宾表示欢迎；对灵塔的建设者予以表彰；追述了历世班禅的爱国传统；正气凛然地揭露和批驳了分裂主义分子利用“文革”灾难和宗教问题挑拨民族关系、煽动民族情绪的恶毒用心。大师在谈到重建灵塔的意义时说：“这宏伟壮观的灵塔祀殿，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宗教政策的正确性和真实性的象征，是藏汉两大民族团结的象征，是西藏宗教界和广大僧俗人民爱国主义的象征，是藏汉两族人民共同劳动的结晶。”大师在谈及宗教本身时，谆谆告诫说：“我们修复开放寺庙，主要目的是满足广大信教群众宗教生活的需要，继承和发扬佛教教义，既不是为开放寺庙而维修寺庙，更不是按旧社会的老样子去维修和开放寺庙。我早就说过，寺庙不在多少，而在于能否成为继承和发扬佛教教义的场所，能否成为按佛教教义弃恶积善、自制利他的场所；僧尼不在于人数多少，而在于素质是否纯正，在于能否严守教规教律”，“佛教教义的核心是诸恶莫作，诸



善奉行，清净我心，庄严国土，利乐有情，广积功德。我们重建班禅灵塔的重要目的，正在于发扬历世班禅大师在宗教上净心修持，持护弘扬佛法；在政治上坚持爱国立场，为国运昌隆、人民安乐而努力的精神，……否则，我们将愧对历世班禅大师”。这段恳切的话，可以说是大师一生宗教生涯的高度概括，是启谕信徒和后继者的至理名言。

下午 3 时，大师高诵吉祥经后，亲自为灵塔解穗开门，并点燃塔前金灯，向 5 位先师遗像敬献哈达。顿时，数万群众一片欢腾，庆祝灵塔开光圆满完成。

此时，大师心情也格外激动，面对这座宏伟壮观的灵塔，怎能不激动呢？这是大师在国家帮助下，亲自抓筹划、设计、施工，倾注了心血的灵塔；是藏汉工程技术人员共同努力，集藏汉传统建筑工艺于一体的灵塔；是建国以来在全国范围内修建的最高大、最精美的灵塔。灵塔共占地 2 000 平方米 高 33.17 米 总投资为 780 万元，国家支援 670 万元，提供黄金 108.5 公斤，白银 1 000 公斤 水银 665 公斤 铜 5 638.7 公斤，木材 1 099 立方米，钢材 116.8 吨 水泥 1 105.67 吨 石料 7 782 块。扎寺和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自筹及捐赠 110 万元，白银 669 公斤，以及不计其数、价值连城的各种珠宝。灵塔的建筑工艺精湛，雕塑精美，彩绘纷呈，整体金碧辉煌。自 1984 年开工，至 1988 年 12 月 10 日竣工，历时 3 年零 8 个月。

1 月 23 日，大师主持召开了各藏区知名人士 200 余人参加的座谈会，共商促进藏区稳定与发展的措施。大师提出要坚定不移地支持改革开放，西藏和其他省藏区要趁改革开放的好时机，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必须加强藏汉民族的团结。但应自己学会“造血”，逐步减轻国家的负担。要重视智力投资，发展民族的文化教育，造就一支对党对人民对民族的事业有感情的队伍。

1月27日，大师同各地来的各教派宗教界人士座谈。他再次告诫要信守佛教教义，功德圆满。作为活佛，应当考虑如何多为老百姓作好事。要爱国爱教，普渡众生。他坦诚地表露一生心志：“我跟共产党已有39年了，到今年国庆节是我跟党走的40周年，我更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我的民族，热爱我的宗教。这四条是我一生的信念。”这四条也是大师一生光辉的写照，从而成为我国宗教界人士的光辉典范。

1月25日、26日，大师为宾客送行，为经师嘉雅祝寿，送父亲去拉萨治病。为近5万人次的群众摸顶祝福。晚上，研究日喀则发展规划图，筹划办水电站、改造低产田等造福人民的项目，准备第二天与日喀则领导制订落实措施。

1月27日，大师支撑着因连日劳累而疲倦不堪的身体，上午继续为前来的信教群众摸顶。中午和下午听取灵塔工程竣工总结汇报。晚上，设宴招待日喀则地区部分干部和群众及开光典礼工作人员。20时40分，大师参加篝火晚会，兴致极高。22时，回住所研究今后几天的活动日程，计划第二天慰问日喀则驻军。22时30分，大师按习惯阅读报纸，收听广播。深夜零时30分就寝。

1989年1月28日清晨4时30分，班禅大师因操劳过度，突然发病，感到胸部疼痛。随身医生立即进行检查，心电图显示急性下壁及广泛前壁心肌梗塞。经吸氧、扩充血管、止疼镇静和抗心律失常等治疗，病情有所缓解，小睡了一会儿。8时25分，病情转重。日喀则、拉萨各医院专家火速赶来会诊抢救。8时34分，发生室颤，医生当即进行胸外叩击、心内注射强心剂、胸外按摩、用呼吸机进行人工呼吸等抢救措施。中央得悉这一不幸消息后，立即派中共中央候补书记温家宝等率领北京医院著名心血管专家从北京乘飞机紧急赶赴西藏，于当日18时30分到达日喀则，立即投入抢救工作。1月28日20时16分，终因大面积心肌梗塞，多方

设法抢救无效，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1月29日，国务院发唁电，对班禅大师病逝表示沉痛哀悼，并向亲属致以衷心慰问。西藏等各藏区人民以及全国各族人民对大师圆寂深感震惊和悲痛。党和国家对大师早逝痛惜不已。

1月30日，国务院作出了关于班禅大师治丧、转世和修建灵塔等善后事宜的决定。同日，在北京组成了以国家主席杨尚昆为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和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为副主任的班禅副委员长治丧委员会。

2月1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庄严、肃穆的“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委员长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首都各界人士1000多人怀着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十世班禅大师。国家主席杨尚昆主持了追悼会。万里致悼词，悼词中说：“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我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中国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sup>①</sup>，班禅副委员长的一生是为我们伟大祖国的统一和富强而奋斗的一生。尤其是在西藏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中，他几十年如一日，旗帜鲜明地坚持爱国主义立场，为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班禅副委员长生前多次讲过，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己信仰的宗教，是他终生不渝的信念”。万里号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和发扬班禅副委员长的优良品德和高尚情操，为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为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而奋斗。”

在此以前，拉萨党政机关和各族各界群众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致悼词。西藏、青海、

四川、甘肃、云南 5 省（区）及全国有关地区和寺庙等，也都分别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和青海塔尔寺都按宗教仪轨，连续数日举行了悼念活动。

# 格达活佛

周锡银

在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长河中，为了祖国的统一、独立和完整而献身的杰出人物何止万千。西藏和平解放前夕，惨遭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毒杀而壮烈殉国的藏族爱国人士格达活佛，就是其中的一位。

格达活佛，法名洛桑登真·扎巴他耶，1903年生于四川省甘孜县白利土司辖区的德西底村。父亲是白利土司属下的一名差巴<sup>①</sup>。1910年，格达被选为甘孜县白利喇嘛寺的活佛。1920年，赴西藏甘丹寺（拉萨三大寺之一，为格鲁派祖庭）朝佛。由于他苦读经书，学识出众，尤其精通显宗经典，8年后获得甘丹寺格西学位，重返甘孜。他不仅谙熟藏族的宗教、历史、文学、艺术，而且对天文、历算、藏医学等都有较深的造诣。从西藏归来后，虽然他的生涯就是在雅砻江畔的白利寺念经礼佛，但由于他勤奋好学，为人俭朴、公正，廉明，极喜帮助穷苦群众，因而深受藏族人民的崇敬和爱戴。他座床的白利寺所得布施和其他收入，除寺庙供奉外，大都用来周济附近的穷人。他还经常用藏医为周围群众治病解痛，编写出词韵优美的藏族歌曲，教群众传唱，以驱逐寂寞和悲伤。他极端仇视国民党反动派对藏族人民施行灭绝人

<sup>①</sup>差巴，藏语音译，意为“支差的人”，为藏区农奴制度下农奴中的一个等级。

领种一份土地，占有少量牲畜和农具，按照规定向农奴主服各种差役并缴纳租税，人身也依附于领主。

性的民族压迫，一些遭受军阀官僚迫害而无家可归的藏民常常得到他所在寺院的保护。

1936年春、夏，震惊世界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长征先后来到了康北高原，两大主力会师于格达活佛的故乡——甘孜县。红军踏入藏区前后，一方面深入进行藏族社会、历史、宗教习俗的调查，有针对性地在军内开展民族宗教政策的教育；一方面则布告群众，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和红军的纪律。红军宣告，藏、汉、回民族一律享有平等的权利，禁止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任何人不得呼藏族同胞为“蛮子”，提倡汉族学番民语言，优待通司（翻译）；回、番民族实行民族自治，建立回、番民族自己的政府，由回、番民族自己管理自己的事等等。并号召各族人民象亲兄弟姊妹一样团结友爱，共同反抗国民党军阀的统治。

红军的革命宗旨和政策，象春风似的吹遍了川边藏区，迅速解除了广大藏族同胞的疑惧，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支持。通往甘孜的路上，无数欢迎的人群簇拥在路旁，有的献上糌粑、酥油、奶茶，有的帮助抬伤病员。

这时，格达活佛作为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在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和贺龙总指挥的亲切关怀下，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感召下，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逐渐认识到只有工农红军才是为各族人民利益的军队，只有跟着共产党走，藏族人民才能获得解放。因此，他勇敢地投身到人民革命的洪流之中，从此与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36年5月，藏族历史上第一个人民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埃博巴（藏族）自治政府在甘孜县庄严宣告成立了。年仅33岁的格达，以其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在藏族中的崇高威望而当选为自治政府的副主席，并在会上发表演说。自治政权在施政纲领中破天荒

第一次在藏区提出鲜明的主张：推翻国民党、蒋介石在博巴领土内的衙门官府，打倒英、日帝国主义，没收其金厂、矿山、土地和财产交当地藏族人民，实行民族平等、自主、博巴坐自己的江山；建立博巴独立军，镇压反革命捣乱，维护革命秩序；没收土豪劣绅的土地财物分配给藏族人民，藏民分得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出租或典当；组织群众生产，奖励兴修水利，发展牧畜，保护牛场、牧地、改善牧民生活；废除封建等级制度，解放娃子（农奴），藏民人人平等自由，特别要注意保护妇女和儿童；废除乌拉差役，取消苛捐杂税；信教自由，还俗自由，保护喇嘛庙的土地财产不受侵犯等等。同时还规定，自治政府要为红军筹措军粮、马料和羊毛，调派向导、通司及其他支前劳力，安置救护红军的伤病员。

自治政权的诞生，标志着川康藏区人民革命进入新的高潮，给在苦难中挣扎的各族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此后，格达活佛更加忘我地工作、学习和战斗，一方面热情宣传党和红军的革命主张和政策，力图让更多的人觉悟；另一方面则率领僧俗群众为红军作通司、当向导、救护伤病员、筹措军粮马料等。他动员群众多吃野菜，把青稞、豌豆节省下来支援红军。据当年红军政治部出具的收条或证明表明，仅格达活佛主持下的白利寺，半年内交纳的“拥护红军粮”就有青稞134石 豌豆22石 支援军马15匹，牦牛19头。为此，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特为白利寺颁发布告以示感谢和表彰。

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关向应的领导下，战胜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路线之后，继续北上。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农奴主还乡团疯狂地进行反扑，藏民政府的成员和革命积极分子惨遭杀戮。红军离开第二天，藏民政府的工作人员被杀者即达40余人。格达对此极为震

惊，他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到大金寺、甘孜寺进行说理、劝阻，同时派贴心喇嘛色波等将 205 名红军伤病员送至道孚县章谷寺，委托那扎夏活佛掩护治疗。他组织僧俗群众拿起明火枪、刀矛、锄头进行自卫，保护了大量的革命群众。格达活佛还写信给桑根寺的活佛根顿珠，谆谆告诫他不要辜负贺老总指挥的期望，要全力保护隐藏在贡拉森林里的红军伤病员。信中说：“据透露，红军冲破了险阻，已胜利到达北方，开始了新的战斗，甚慰。……要知道，我们这里明媚的春天已经过去，盛夏的鲜花将经受暴风雨的摧残。要留根种，等待着未来的春天——开花、结果吧。那娇嫩的羊羔、牛犊要保护，要备足草料越寒过冬。当心夜里的魔鬼，严冬的虎狼扑来吞噬人间的一切生灵。他们罪恶多端的劣迹，菩萨不赦，佛旨难容，终有一天会烈火焚身，让他们自食其果吧。”

“我格达的心和你桑根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有朱总司令临行时的嘱托，心里怀着宏伟的理想。当前群魔舞，风云变，我们心里要放宽，眼光要放长。当你看到东方霞光万道，那就是即将来临的希望。我们是佛门兄弟，你不会辜负我的期望。……”

“请转告森林中的伤病人员。”

桑根顿珠活佛接信后，立即向在森林里苦斗的红军伤病员传达了格达的信息。桑根在信中说：

“红军已胜利抵达抗日前线，开始了新的战斗。你们听到这一消息一定很高兴，可是别忘了春天快要到来的时候，还有暴风雨的春寒；天快亮的时候，还有黎明前的黑暗；临死的牛蝇最讨人嫌。躲开这场灾难性的搜捕和屠杀。”

在以格达活佛为代表的藏汉族人民群众掩护下，红二、四方面军留在康北高原的 3 000 余名伤病员，绝大部分都被藏汉人民救护和转移了。

格达活佛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利诱坚贞不屈，显示了高



尚的革命气节和民族的尊严。他曾严词拒绝了国民党当局的种种官衔和民意代表，国民党员等的利诱，并以自己是属于“红军方面的人”而自豪。后来，为了避免反动派的纠缠和迫害，他带着红军和藏民政府留下的文件告别家乡出走西藏拉萨避难。

在漫长的黑夜里，格达对朱总司令告诉他的“红军一定会回来，藏汉人民一定会翻身解放”这些金石话语始终坚信不疑，耐心地期待着天明。抗日战争爆发后，当他在拉萨打听到朱总司令率领的红军胜利抵达抗日前线的消息时，心里十分快慰，立即设法买了一本有朱德照片的书供在家里。后来，又请人从青海西宁买回一张《八路军山西奋战图》，挂在墙上，时常对着这些图片思念亲人，并为他们的幸福天天诵经祈祷。他和群众一道，编写出了一首首独具民族风格的诗歌来抒发自己的真挚情感，例如：

红军走了，寨子空了。

寨子空了心不焦，心焦的是红军走了。

彩云是红军的旗帜，高山是红军的臂膀。

红军啊，你们给我们留下了金石的语言。

藏族人民永远在你的指引下成长……

起来呀，赶走草原上的豺狼，

羊群才能兴旺。

起来呀，赶走阿门里的坏奔波

(官老爷)人民才有吉祥。……

又如：

云雨出现天空，红气遍满大地。

未见如此细雨，最后降遍大地。

高高的山坡上啊，开满了红艳的鲜花。

你跨上骏马，背着枪，

从长满荆棘的小径上，攀到山边去了，啥时光再回来！

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已在前头。1949年冬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传到藏区，传到格达的故乡。格达活佛兴奋异常，率先与藏民政府时期共过忧欢的战友夏克刀登、邦达多吉一起，派代表穿过敌人的严密封锁线，绕道青海、甘肃赴京，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献旗、致敬，表达藏族人民盼望解放的心愿。请求“神兵”迅速降临康藏。1950年春，西康重镇康定解放后，格达在甘孜县召开了3 000人的庆祝大会，并组织代表团赴康定欢迎解放军，动员藏族人民积极为解放康藏的部队修筑道路，充当向导，运送粮草。

由于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以及受到藏族人民的崇敬，因此，西南军政委委员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委员兼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成立时，他又当选为副主席，并兼康定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6月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第二次会议；他又被聘为特邀代表，毛主席、朱总司令电邀他赴京出席盛会，共商国家大事。

恰恰就在这段时期，英美帝国主义和印度反动派更加紧了分裂我国、阻挠解放西藏的罪恶活动。在他们的策划下，1949年夏拉萨发生了所谓“驱汉事件”，西藏地方政府突然通知国民党政府驻拉萨办事处全体人员及其眷属立即离开西藏。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只要把国民党政府派驻拉萨的办事机构和人员全部赶出西藏，断绝西藏与祖国的联系，就可以把西藏地方从祖国分裂出去，就可以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1950年1月又传出西藏当局派出所谓“亲善使团”，分赴英、美、印、尼泊尔和北京，表明其“独立”的消息。我中央人民政府当即发表严正声明，对于上述阴谋痛加驳斥，并揭露帝国主义、反动派公开干涉中国内政的罪恶。紧接着，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派格达活佛前往西藏进行规劝，以消除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对中央人民政府的误解，促使

谈判早日举行，达成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格达不畏艰险，毅然前往。行前，他对胜利充满了信心，向送行的军政首长和友人说：“我是为了藏族人民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为了西藏人民少受牺牲、早日获得解放而去西藏的，我要亲自告诉那里的人民和喇嘛们，人民政府和解放军是西藏人民的救星，西藏人民不要再受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的欺骗，应该回到祖国的大家庭。”他非常乐观的说：“等到西藏解放了，我再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也不迟。”同时，他又作了牺牲一切的准备，他说：“为了本民族的解放事业，万一出事也是光荣的，西藏人民了解我，他们都知道我是好人。谁杀害了我，老百姓就会反对他们，就会更加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他叮嘱白利寺的堪布（寺院主持人），除管理好寺内事务外，要全力支持解放军进军西藏。“如果我回不来了，就这样干下去！”

1950年7月10日，格达自甘孜县白利寺启程赴西藏。一路上，他耐心地向藏族僧俗群众宣扬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并列举所见所闻的事实，证明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如何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藏族风俗习惯，帮助人民改善生活等。他还宣传了中央人民政府维持西藏现行制度与一切改革事宜由西藏人民及领导人协商解决的决策。并劝说喇嘛寺及头人、藏军官兵不要与人民解放军为敌，汉藏民族必须紧密团结等。

7月24日，格达活佛抵达康西重镇昌都，立即受到英帝国主义间谍福特（Robert Ford，公开身份是英国驻昌都电台台长）的重重阻挠，不能前行。滞留昌都期间，他曾亲往西藏地方政府派驻昌都的“西藏边使府”，找“西藏边使”噶伦拉鲁桑旺勒巴交换和平解放西藏的意见。他苦口婆心地向边使其及下属宣传中国人民政协通过《共同纲领》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8月13日，格达拟用电报直接与拉萨西藏地方政府协商，拟致电拉萨友人，请

为西藏和平解放出力，乃到昌都电台接洽发报事宜。电台台长福特假献殷勤，以茶“款待”。格达饮茶中毒后，头痛腹痛不止，并被软禁在福特家里，连随行人员和贴身弟子都难以接近。但他仍然念念不忘西藏的解放，想尽办法与能接触到的人员说：“解放军和藏族人民是一家人，我们应帮助解放军解放西藏。能为西藏解放出力，我死也不悔。”充满对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感激和对敌人的憎恨。延至8月21日“西藏边使”拉鲁派私人医师前往“诊断”，付药一剂，格达服药后即不能言语。8月22日午前，藏族人民忠诚的战士，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格达活佛就这样壮烈地以身殉国了，时年47岁。格达“死后，全身发黑，口吐黄水，鼻孔流血流脓，皮肤裂口”。福特和拉鲁桑旺勒巴等为了消灭罪证，很快将遗体焚毁，并将格达随行人员押送拉萨“主持超度”。向家乡报丧的人员也直到同年10月昌都解放后才返抵甘孜县。

格达活佛不幸遇难的噩耗传来，举国上下为之震惊。西南军政委员会立即组成了以王维舟副主席为主任委员的追悼大会筹备委员会，并责成西康省人民政府办理身后事宜，委任张国华委员代表该会致祭。1950年11月25日，在重庆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的负责人邓小平、王维舟、李达、张际春、梁聚五等亲临大会致哀。出席追悼大会的各族各界代表800余人致决心以解放西藏的实际行动来告慰英灵。同一天，《新华日报》发表了《西藏一定要解放——悼念格达活佛》的社论和贺龙同志撰写的《悼格达委员》的纪念文章，赞扬他“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曾经和格达在甘孜高原共过患难的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将军送的挽联，颂扬了他的伟大历史功绩：

具无畏精神，功烈允垂民族史；

增几多悲愤，追思应续国殇篇。

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邓小平送的挽词，高度赞扬了他的献身精神：“为和平解放西藏，惨遭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的毒害而光荣殉国的格达委员永垂不朽。”

这一篇文章，一幅幅挽联、挽词，全面而公正地评价了格达活佛爱国、进步、革命的一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对这位藏族革命先烈无限的敬仰和深切的怀念。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生效，西藏和平解放了。格达生前为之奋斗牺牲而未竟的事业已经实现，帝国主义、反动派的侵略阴谋和暗害、阻挠都归于失败，残杀格达活佛的罪大恶极的英帝国主义间谍福特及其帮凶也受到应有的制裁。党和政府派人将格达活佛的骨灰从昌都迁回故乡甘孜县，安葬在苍松翠柏绿杨环绕、肃穆、幽静而美丽的白利古寺中。表达他们对这位革命先烈的崇敬和怀念。

格达活佛的献身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的中国各族人民。

# 坚白赤列传

## 周敦友

坚白赤列，是藏传佛教中的一位博学多闻，精通经、律、论三藏，以论辩著称，在藏传佛教各派信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高僧。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历任哲蚌寺结巴堪布、堪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藏自治区第二、三届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副会长，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秘书长、副会长、会长等职。他坚决拥护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拥护和主张西藏的民主改革，热爱祖国，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热爱和平，在开展国际友好交往等工作中作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更是衷心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共中央关于西藏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关心佛教事业，关心佛协的工作。他性情直爽，胸怀坦荡，为人忠厚，表里一致，几十年来真诚地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对建设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献计献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坚白赤列，通称结巴堪素坚白赤列，又名措康活佛，于1913年出生在西藏昌都地区芒康县锡仲区。系邦达家族的差民。父母业农，虔信佛教。兄妹5人，长兄留家，后弃农为商，三弟格桑、四弟登培皆出家为僧，入拉萨哲蚌寺学经。妹妹在家奉养母亲。坚白赤列3岁时被芒康丝乌寺认定为该寺东仓活佛的转世灵童，接入寺庙抚养，8岁坐床后开始依阿西阿乃经师学经。

从小聪慧过人，有过目不忘之称。7岁时已能熟诵五部（这五部是概括藏传佛教经、律、论三藏主要内容的著述，即：《释量论》、《现观庄严论》、《入中论》、《俱舍论》、《戒律本论》等）大论的本颂。后得邦达家族兄弟为施主资助，于1926年到拉萨哲蚌寺学习经论，并被追认为罗色林扎仓的措康活佛。曾先后在以论辩著称，显、密、学、修精湛的德嘛和东培格西处学习因明（佛教逻辑学）学系的《释量论》、《集量论》及宗喀巴与两大弟子甲曹杰和克主杰对《集量论》的注释；进而学习般若系统的《现观庄严论》及大般若经10万颂、8000颂要义，以及宗喀巴有关般若系统的注疏；再次学习了月称论师所著的《人中论》，龙树论师著的《中观论》，及宗喀巴的《缘起赞》和对中观系统学说的有关论述；1933年，依阿闍黎德嘛、东培受比丘戒后，精学德光论师所著的《戒律本论》及《四分律》、《十诵律》等戒学。最后学习《俱舍论》，还学习了第一世达赖更顿竹巴对该论的注释。在学习上述各部论著时，还结合学习宗喀巴最重要的代表著《菩提道次第广、中、略论》。由于勤奋苦学，坚白赤列在青年时期对显教的各种经、论及注疏都能口诵心悟，得其精要，立宗论辩，明辩无碍。27岁即在全藏的格西考试中获得了格西拉让巴（头等格西）的学位。1941年，在各教派学者云集于拉萨的万人传召（祈愿）法会的21天中，立宗答辩无能胜者，于是誉冠全藏。显教论理的学业既成，复入局堆扎仓（上密院）学、修密宗。并依宗喀巴密部第二十八代康萨喇嘛为根本上师，研习《密宗道次第》，从事密、行密入手进而受学瑜伽、无上瑜伽等4部密法及各种仪轨、灌顶、坛城等密部承传。并专修、学《大威德怖畏金刚》、《集密金刚》及《大乐金刚》等本尊仪轨。并在这一时期著有《因明精要》及《疏释》等论述，刻板流行于世。31岁在上密院考取了密宗学位昂仁巴，进而于32岁时被推任为上密院的格贵

( 执法人 ) 1951 年，被推任为哲蚌寺的结巴堪布。 1952 年 2 月，在任堪布期间，被选为我国佛教徒参加印度“菩提伽耶咨询委员会”的代表，前往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 2500 周年纪念活动。在印度参观访问，面对佛教圣地的一片废墟和残缺不堪的寺庙、佛像和佛塔，深感失望和忧虑，并为印度佛教的沦落深感悲伤。同时对比国内各宗教和教派同时并存，一律平等及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保护、尊重，感到安慰。回国后，在北京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饶嘉措会晤时甚投其缘，后来成为佛学研习上的最好的同参。他接受了喜饶嘉措的建议，参加了民族参观团，到祖国各地进行了参观学习，深感祖国的伟大，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的正确英明。同时深感西藏的落后，群众的贫苦，认为其原因是制度不好，西藏必须走民主改革的道路才能根除落后与贫困的状态。为此，他后来一直拥护西藏的民主改革，拥护社会主义制度。1956 年冬，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成立时，他被选为秘书长，主持佛协的日常工作，并以其身份和影响在哲蚌寺的僧侣中宣传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宣传民主改革的意义和好处。1957 年，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1959 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时，坚白赤列坚决反对叛乱，并在哲蚌寺劝说受蒙蔽的僧侣投诚，劝说逃跑的僧侣回寺，对平叛工作起了好的影响。平叛改革时，他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积极参加了西藏的民主改革。1960 年，任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二届理事会副会长。1961 年，任西藏国庆观礼团副团长，带队前往北京观礼后又到祖国各地进行了参观学习。1962 年，积极筹办西藏佛教经典研究班，选择学员，选写教材，不辞劳苦地亲自备课，给学员们教授经论，为藏传佛教培养了一批人才。1964 年，继续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的副会长。1965 年，被选为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积极参与政治协商工作。“文革”中，坚白赤列同其他



爱国人士一样受到了极左路线的冲击，但他坚信中国共产党的信念从未动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统战、宗教政策逐渐落实，坚白赤列先后被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等职，并主持佛协西藏分会的全面工作。1983年，筹办西藏佛学院时兼任院长，在筹建校址、维修校舍、招考学员、研制教学计划，编写教材等方面，尽职尽责，做了大量艰苦、耐心、细致的工作。1983年底，他不顾病魔缠身，为了佛教事业，长途跋涉，前往北京出席全国佛教协会四届二次理事会议，对赵朴初会长提出的“人间佛教”理论非常赞同。返藏后，他传达了会议精神，并组织佛协西藏分会的同仁们进行学习。他十分关心留滞在国外的藏族同胞，希望他们早日回到祖国各民族大家庭中来，为争取国外藏胞的回归，做了大量的工作。1984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四届二次理事扩大会议前夕，他突然病重，但仍然不忘佛协的工作，再三嘱咐同仁们一定要开好这次会议，要遵照佛协章程办事；要认真协助党和人民政府正确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要爱国守法，爱国爱教。1984年12月12日中午，他安详结跏趺坐，在所供奉的主要本尊“大威德怖畏金刚”坛城前含极西逝。

对于他的西逝，西藏自治区党政领导极为重视，立即组织了以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阴法唐、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阿沛·阿旺晋美等西藏党政军负责同志为首的治丧委员会，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区党委书记杨岭多吉在追悼会上，对其生平作了高度评价，指出：“坚白赤列是一位真诚同党长期合作共事，积极为党为西藏人民工作的爱国主义者。”坚白赤列的一生，是爱国爱教的一生，是宗教界和爱国朋友学习的好榜样。

# 杨仁山居士

禹晓虹

座落在古老的南京城中心，延龄巷与淮海路的交叉路口，有一所幽静闲雅的院落。院内，花木扶疏，绿荫映掩，杨垂柳飘，景色宜人，这就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汉文刻印佛经流通场所——金陵刻经处。在宅的西北隅是深柳堂，深柳堂的后面有座墓塔，是南京城内唯一的印度式塔，与北京白塔形状相仿。塔周围系有铃铛，风一吹叮叮当当，幽雅可闻。塔碑上刻着吉祥字样的唵、诃、义、摩、罗、婆、啰、耶八个梵文，下面从右至左写着：“杨仁山居士之塔”。

杨仁山居士是名扬中外的金陵刻经处创始人，也是中国晚清爱国佛学家。

杨仁山居士（1837—1911年），安徽池州府石埭（今并入太平县）人，母亲孙太夫人妊娠他时，曾梦见一座古刹，庭中有一巨瓮，瓮上有一朵大莲花，很奇怪，1837年生下了他，名文会，字仁山。他两岁随父授职西部，举家北上，后南归。从小天资聪颖，好读奇书，凡音韵历算天文舆地以及黄老庄列之说，无不领会。他不喜欢功名举业，常与友人结社赋诗作乐，又喜练习驰射击刺之术，能文善武。

1864年，杨仁山居士父亲去世。他将父亲葬在乡间，完事后回安徽时染上时疫（痢疾），久病不起，开始学道。先是有位不知名的比丘尼送给他一卷《金刚经》，反复展读，不解其意。经一僧

人指点，窥得奥旨。病愈后，便开始潜心研读佛学。翌年，得到本《大乘起信论》连读5遍，爱不释手。以后再得《楞严经》，废寝忘食，连连背诵。从此居士废弃一切所学，一心学佛，开始了遍求佛经的艰苦历程。1865年，来金陵，得经书数种。次年，由安庆移居南京。在金陵董理江宁廨宇工程，并与同事王梅叔共探佛学，彼此相得益彰。又与邵阳魏刚己（耆）、阳湖赵惠甫（烈武）、武进刘开生（翰清）、岭南张浦斋、长沙曹镜初（跃湘）、江苏郑学川（书海）等人，深究宗教渊源。

佛教经典自东汉传入中国，迄今已1700余年。长期以来，作为传播佛教文化的经书，虽有手抄和木刻印本，但数量很少，而《嘉兴藏》、清《龙藏》等折叠本，仅能作为大寺院藏经楼上的点缀品，不便广为流传。广大信徒只能凭口传背诵一些早晚功课、经忏佛事等应经文，对反应佛教文化里的精华内容，学人无经书可读。正在佛教文化趋于大滑坡的紧要关头，杨仁山居士等同仁认为，弘扬佛法，需有经典流通。为便于广为流传，于是发心重刻书本藏经，并由杨居士亲自主持草创。先协同10几位志同道合的人，分任劝募，当时赞助最多的是江都郑学川（未几出家，法名妙空）1866年，在北极阁杨居士住宅内，正式创办刻经处（也曾称经书局）首刻《净土四经》。

不久，刻经处移到现在的淮海路35号。刻经处创办之初，全国各地寺庙里收藏的藏经佛典总数在万卷以上，内容繁杂，异译别本相并流传，使初学研究者望洋兴叹。杨居士为便利初学研读，以历代刻印大藏经、日本缩刷大藏经（8535卷）、卍字续藏经（7144卷）及古德遗书中，选辑460部，3320卷，又436纸编成《大藏辑要目录》，陆续刻印流通。刻经处创立后，迅速得到各方名人的大力支持。鲁迅先生于1914年9月，以周树人的名字施银60元刻《百喻经》上下两卷，并印功德书100本，余款拨刻《地

藏十轮经》。在各方极力支助下，先后印有《玄奘全集》、《大智度论》、《法华经》等典籍1 000余种，佛像18种。

金陵刻经处现收藏和续印的125 000余块经版，及珍藏杨仁山居士的日本朋友南条文雄等人从日本和朝鲜帮助寻回的《古德遗著》280种，使隋唐诸高僧大德所著章疏复见中国，使刻经处成了当今全国最大的汉文佛经刻印流通场所和宝地，因而驰名于海内外。1985年，日本天台宗佛教代表团团长，91岁的山田惠谛长老来宁访问刻经处时激动地说：“这不仅是你们的瑰宝，也是我们的瑰宝。”

杨仁山居士在刻印流通佛教经典、图象的同时，还创办了佛教院校和佛学研究机构，培养了大批佛学人才传扬佛教文化。

1895年，锡兰达摩波罗长老，为发展“大菩提会”，经日本来上海与杨居士晤洽，请中国学者往印度讲学弘法，复兴五印佛教，意甚恳切。杨居士非常赞成，于是提倡僧学，首订章程，亲著《佛学初学课本》。1907年秋，在刻经处内开设佛教学堂，名“祇洹精舍”。就学者兼通中西文，以为将来驰往于天竺振兴佛教，并传教于国际之间。杨居士亲授佛学课，又聘李晓曦（世由）授国文，诗僧苏曼珠授英文。当时就学的有释太虚（唯心）、释仁山（今藏）释善亮、释惠敏等20余人。从而使金陵刻经处对振兴国内佛教，复兴印度佛教、加强与东南亚以及国际间佛教文化交流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他在苦心刻经流通和提倡僧学的基础上，同时也注意开展佛学研究。

1910年，又在刻经处深柳读书堂（简称深柳堂）设立佛学研究会，成员中有欧阳竟无（渐）、狄楚青（年子）、欧阳石芝（柱）、梅擷芸（光羲）、梅斐漪（光远）、蒯若木（寿枢）、李证刚（翊灼）、余同伯、陈宜甫等人，共推杨居士为会长。佛学研究会大大地扩

大了佛教的影响，开拓了佛教研究事业。他与日开展论十念往生而必发菩提心然后净土宗之实践。会内，对各宗各派组织广泛研究，使会员中，各有所长。比如谭嗣同善华严、桂伯华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论，而唯识法相之学有章太炎、孙少侯、梅赓芸、李证刚、蒯若木、欧阳渐等。这些人，较好地继承和发展了佛教思想学说。谭嗣同在《仁学》中，称杨仁山居士的佛学为晚清思想界一伏流。

杨仁山居士弘法 40 余年，不仅流通经典百余卷，印刷佛像 10 余万张，而且著有《大宋地玄文本论略》（4 卷）《佛教初学课本》（1 卷）《十宗略说》（1 卷）《道德经发隐》（1 卷）《等不等观杂录》（8 卷）等，为中华佛教事业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在中华史册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他创办的“祇洹精舍”和“佛学研究会”，为佛教界培养了大批佛学人才，为开展佛学研究和创办佛学院打下了良好基础。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在 1956 年 10 月的四届佛教徒大会上，高度赞扬了他的功绩。他说：“近代佛学学术风气倡导者杨仁山，为培养人才和扩大佛典流通，便利佛学研究。他用了几十年的光阴致力于佛学和刻经事业。他所主办的金陵刻经处曾经刊印了由日本取回的我国已经遗失的法相宗重要著作，因而使法相之学得以复兴。金陵刻经处同时又是他讲学的场所，谭嗣同和章太炎都在那里听过讲。在他的影响下还产生了一些佛教学者。”

杨仁山居士还注意政治、制造业等学。1878 年，随曾纪泽赴英法，考察探求政治和救国救民真理。同时精研天文、测绘、显微等学。他亲自制作了“天地球图”及“舆图尺”，著有《天地图说》。在传播西方科技知识方面做出了贡献。1886 年春，又应刘瑞芬（芝田）聘邀，随经伦敦，再次考察英国政治、制造诸学，后调驻法国，探明列强郅隆原因。回国时，他已 53 岁了，看到中华不

振之态，常常感慨地对人说：“斯世竞争，无非学问。欧洲各国政教工商，莫不有学，吾国仿效西法，不以切实入手，乃徒袭其皮毛。方今上下相蒙，人各自私自利。欲兴国家其可得乎？”这充分表现了杨居士忧国忧民思想以及救国救民的心愿。

杨仁山居士还同情革命。他曾极力赞助门人孙少侯，俞同伯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活动。孙少侯被捕后，杨居士又冒风险，将他的家属隐藏在金陵刻经处内避难。又曾有一个僧人亚坤，因参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受到清政府的追捕，居士也帮助他脱险。这些，都体现杨仁山居士对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给予了支持和帮助。

他忧国忧民还表现在他对国家人口增殖的忧虑上。他料想人口的增长将影响国家的经济发展，以至牵扯到政治危机。他说：“谚云：‘一人生两人，十世一千丁’。以三十年为一世，至十世而添人千倍矣！地不加大，何能容之？彼时先坏商务，继坏工务，……。工商以外无生业者不计其数，啼饥号寒，哀声遍野，岂有不乱者乎？”超负荷的人口增殖，必然引起社会的不平衡，原本是1人吃的，现在要10人吃，接着而来的便是穷困、贫寒。人民肚子吃不饱，就会发生骚乱，社会一乱，国家哪有兴旺的道理。早在那时，杨居士就能意识到人口发展的无限性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提出控制人口增长的观点，今天看来，确是有先见之明的预感的。

杨居士还无私地奉献自己全部的家业。1897年夏，杨居士的母亲寿终。他诏长子自新，次子自超，三子福严曰：“我自28岁得闻佛法，时欲出家，因为有老母在，未能如愿。如今老母虽已寿终，但我的身体却衰迈，不能满足出家的心愿了。现在你们正壮年，应去各谋生计，分炊度日。所置金陵城内延龄巷房屋，将全部捐作刻经处为十方公产，永远作刻经藏版和流通经典之

所。”

金陵刻经处是杨仁山居士苦心集聚30余年筹建而成，每一处都凝结着他的心血和汗水，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传遗子孙，但他把这所住宅——房间71间，地基6亩余全部捐献给刻经处，永为刻经流通场所而遗给3个儿子的却是分认3810两银子的债务。他在《杨氏分家笔录》中写到：“屋宇一所，围墙东至西二十四丈，西边南至北二十丈，东边南至北十六丈与漆匠店毗连，此屋专作刻经处公业，与父亲三十余年经营所成永远作为流通经典之所，三房均不得认为己产。目前家眷暂住在内，以十年为限，十年之后，照例起租，不得自添屋宇以杜占据，俟各房自选住宅，即当移居。”

后来，他的家人都遵照居士遗志一一照办了。杨居士公而忘私，一切奉献佛教事业的精神令人钦敬，并影响着子孙。

杨仁山居士于1911年秋示寂，享年74岁。他生前常对人说：“吾在世一分时，当于佛法尽一分时之力。”曾嘱托：“经版所在，即灵柩所在。”佛教界和他的门人以及他的后人遵其遗嘱，于其示寂后7年（1918年）建塔于深柳堂后面，经版房前，名为杨居士塔院。

金陵刻经处在“文革”中受到摧残，经版散失，管理瘫痪。1973年，杨居士的孙女杨步伟和她的丈夫赵元任（世界著名语言学家）从美国回来给祖父扫塔时，向周总理提出了恢复刻经处的请求。在中国佛教协会大力支持和赵朴初会长的积极关怀下，1980年起恢复了。使曾几经湮烟息鼓，现又枯木逢春，从此日益兴旺。杨步伟逝世后，其儿女按她嘱咐，于1982年9月将她的骨灰一半洒入太平洋，一半带回祖国，撒在祖父“杨仁山居士墓塔”下。

杨仁山居士将家业奉献十方，既是为了佛教事业，又是为了

教育子孙，要他们自立，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奋斗，争取自己的人生命运。他要儿子为他还债，是希望儿子为父完成尚未尽完的事业，也好了却他毕生的弘愿。杨居士的心愿没有白费，他的子孙后来都较为出色，尤其是他的孙女杨步伟更甚。

杨步伟从小与祖父很亲，多方面得到祖父的支持和鼓励。

小时候，小步伟到了缠足之年。父亲杨自新命人为她缠足。她哭着跑去告诉祖父，说她不愿缠脚。杨居士欣然应允。他认为：缠足是自五代宋以来逐渐形成的一种摧残妇女身心健康的封建陋习。他反对封建反对缠足的进步思想，在封建意识猖獗的清朝末年，确实称得上有胆有为之士。

他还反对包办婚姻与闺门限制。杨步伟长大后，要求解除指腹为婚的旧约。杨居士不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金科玉律，大力支持破除这条残杀人情的封建观念，帮助孙女争取婚姻自由。

后来，杨步伟要去日本留学，又得到了祖父的支持。他再次打破了“男不入内，女不向外”的封建枷锁，勇敢地迈出封建礼教的“雷池”一大步，是向封建旧观念的挑战，为后人做出榜样。

杨仁山居士是晚清的一位爱国佛学家、近代中国有觉悟的爱国知识分子，不仅为中华的佛教文化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对中国初期革命起到推动作用，他的名字将流芳百世，永不被人所忘怀。



## 居士高鹤年

墨 憨

佛教里的在家学佛者，称优婆塞，又叫居士，是男居士。

第一代江苏省人大代表，佛教信徒高鹤年居士，一生以皈依正觉和普度众生为职志，多次参加全国各地救灾活动，创办刘庄贞节妇女净土安老院，撰写《名山游访记》，博得了海内外佛教信徒的尊敬和当地父老兄弟的怀念。

高鹤年居士，名恒松，号隐尘，又字隐人，别号终者，云山道人，云溪道人。祖籍安徽贵池，后世迁于江苏兴化县，复移大丰刘庄，并在刘庄定居。生于1872年9月14日，歿于1962年正月初二日，终年91岁。8岁入蒙馆，9岁因同学陈氏天殇，突然失去伴读好友，使他若有所失，伤感异常，遂至刘庄紫云山寺中停学3日，回家后到苏州穹窿山道院为徒，后因贵池刘香林携来佛经，阅后改信了佛教。佛教里规定，带发修心的居士是可以结婚的，他于18岁娶妻智氏。

高居士自信佛以后，便开始从事学佛和佛教活动。他的生活年谱，展现了这位居士的佛教生活里程。他21岁，游镇江金山寺从大霖法师受《律学戒法》及《性论教议》，自此茹素，不吃葷腥，又到金陵刻经处随杨仁山居士肄业佛学。29岁，在金山江天禅寺受戒，谒秋崖长老、大定上人，与融通上人同住金山寺藏经楼，共参佛理。30岁，听通智法师讲《楞严经》，又在九华山结茅棚两所，以为常住静修之所，后返刘庄居紫云山潜修。41岁，至

上海频伽精舍与陈樱宁同参佛理，并襄助狄楚青办佛学流通处及《佛学丛报》与寄禅法师、李正刚、欧阳渐等办佛教会，与谛闲法师、陈介石办世界宗教会。42岁，游宁波访园瑛法师。43岁，访章嘉活佛及韦印堪布大喇嘛默尔根诺门，与终南山诸师结莲社。49岁，往香港访黎工真。69岁，编《印光大师六十年苦行记》出版。82岁，赴北京出席中国佛教协会，当选为理事，归途中参观治淮工程，回来后写《深感毛主席英明领导之无限正确》一文。84岁，赴南京出席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

高鹤年居士在佛教生活中，为求正知正觉，苦于潜修。他曾在全国许多地方，结茅于深谷之中，清风作伴；经行于云霞之间，松月为邻。种芋菜，觅野果而修真心，抛弃名闻利养，舍却贪瞋痴爱，成就善根因缘。他于清光绪年间，在关中终南山嘉午后谷结茅，横竖丈二，碎石砌床，石片为桌，石块为凳，小锅一只，余无他物。山中泉水稀少，自围水塘，天旱无水。下山二里许，汲水于羊肠鸟道间，每日食用水二大碗。他在南五台结大茅蓬，也无泉，用水池蓄水，虽用32个工开深，仍无水。山无泥，遍山碎石子地，无润泽气，种芋菜也难以成功。山上野兽颇多，非揪响器不能保护。深山穷谷里，没有一家人，连修行住山洞者也很少。他就在这样的艰苦地方自讨苦吃。年过80，又来至苏州穹窿山寺楞严台度夏，在寺后山上建小茅蓬一所。工程建筑方半，茅蓬墙后四五尺许正对厨门数步，掘得甘泉，味厚而美，泉有五眼，吴济时先生题名鹤来泉。雨大时，泉流成瀑布，响声震山谷，瀑布数叠，如白龙出水，雄势奇观。这样的境遇，十分少见。也许他苦修见诚，佛来相助，导至老来得福。

“享受多折福，多贪多得祸”，这是一个普通道理。他利用这普通道理，在结茅修持中，搬柴运水，烧菜熬粥，洗扫杂务，全是自己劳动。每天二时功课，祈祷和平，时时检点，不敢多贪

受。

他的艰苦修炼，使他明心见性，心地豁达，好比万里晴空。他在修持中，以诚治妄，反妄归真，大发菩萨心，为众生办了很多好事。他上求下化，普利群生，无私无畏，诸如创办刘庄贞节院和抢险救灾等一系列的慈善活动，不能不说是他一心学佛，苦于潜修的结果。

高鹤年居士，为普度众生，做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的工作。25岁，参加山西旱灾救济工作。45岁，因平津水灾至沪劝募赈款。48岁，应熊希龄邀请赴湖南办赈。57岁，因兴化水灾与石金声至沪劝募赈款。59岁，于刘庄、白驹、安丰、永丰圩等处办粥厂14处。设救贫团、收容妇孺于贞节院，造斗龙港渡船一只。60岁，江淮和黑下河大水，与赵一褒设救命团，与周梦白办灾民收容所。在刘、白设耕牛收容所，与石金声放赈，调解大丰垦区放水纠纷，作《辛未水灾临时救命团日记》。62岁，修成刘庄进谷桥编《救命团征信录》。63岁，任上海战赈会理事。64岁，因大水为义赈会视察苏北灾情。65岁，因川、陕、豫、甘等省旱灾，为上海慈善联合救济会奔走劝募赈款。66岁，助粮20石救济江南灾民。67岁，刘庄百余家遭敌机轰炸，与石金声办理善后事宜，因兴化水灾续办粥厂20余处。68岁，开南洼河、新开河、以工代赈，办刘庄贫民借贷所。70岁，办刘庄贫民小工场。71岁，办刘庄女工纺织所。

他的慈善活动，以苏北里下河地区的救灾工作最为突出。里下河，是指江苏地域内京杭大运河附近的高邮、兴化等县的低洼地。1931年，里下河地区大水灾情特别严重。他在《辛未水灾临时救命团日记》中写道：“兴邑地势，形同釜底，屡受水灾未有若今年之惨且剧也。江北大水，三坝齐开。不数日，运堤崩决27处，湖水横溢，漫天而下，内河各县，尽成泽国。吾县首当其

冲，各圩溃决，庐舍倒塌，亿顷田禾，悉数沉没，时国历八月廿九日，即夏历七月十六日也。旦夕间，河水陡涨数尺，村庄淹没，男女老弱，哀号乞命于洪涛巨浪中矣。即所住（刘庄）净土安老院外大觉精舍，水不及檐仅尺余耳。升屋四顾，水天相连，哀此下民，抑何法以度此厄？”这段文字，足以可见水势严重和居士的惶急心情。

这是一幅惨绝人寰的灾民图，高鹤年居士对此采取了紧急的施灾措施。他日记中又写道：“八月三十日，先行组织刘、白水灾救生会……雇舟分往四乡，抢救生命，分为六组。是夜，救生船，普渡众生，送往高埠近六百人，带回刘庄收容所者五六十人，自此供给糝粥，聊以充饥。”他每天的日记，都这样记录，以至成《辛未水灾临时救命团日记》一书。

从1931年8月27日到1932年5月，他殚精竭虑，拯溺救饥，奔走呼吁，不惮烦劳，甚至以“舍我一命，救数十万人命”之感慨，拼命筹款施舍。在各地诸友、苏北国际救济会、中外慈善团、义振会大力支持下，不断建立难民收容所、贫民贷款所和施粥场，对灾民进行源源接济。由于灾害影响农业欠收和家财散失，不免出现少吃缺衣景况；由于灾害带来了死亡，又不免出现疾病或瘟疫流行现象。高居士不断关心灾区民众，及时组织施舍，春放小赈、夏施良药、冬赈棉衣，甚至以胡萝卜、野芋等物救济。

高鹤年居士的救灾活动，从25岁开始，一直延续到71岁，先后有46年之久，在刘庄、白驹一带也有12年之多。1931年的辛未救灾活动，是高鹤年居士一生中最大的贡献。因他的紧张而有效的救灾活动，及时组织各地社会力量添款救灾，同时联系中外慈善团体劝募补助，赢得了时间，抢救了成千上万的灾民。

1911年，高鹤年居士还参加了调解兴化、东台两县农民和大丰垦区棉农的水利纠纷。

大丰垦区有一大丰圩，位于卯西河口之北。圩内横阡竖陌，秩序井然……由子午大堤至大丰镇（今新丰镇）街为十字形，道路宽阔，商铺林立，商团警察，设备齐全。汽车土车，往来如织。该圩约200余里，面积百余万亩，横亘南北者，为东西子午大堤。其地未垦之前，无子午高堤之阻，凡遇西水下注于斗龙港，漫滩而过，人于黄海。故清同治五年（1866）高邮清水潭缺口，水势汹涌（俗称蟒蛇水），与今年（1931）水位相等，未及1月，水已涌退，农田便能耕种。这次洪水，不能畅流归海。非开放卯西河，不足以救兴、东两县百万亿生灵。细察该地势，东高于西，南高于北，再东约十数里又低……兴化、东台两县农民说：“大丰公司圩堤阻遏西来之水，……不得不誓死力争，不达开口下水之目的不止。”垦区内棉民说：“开圩口放水，诚恐圩堤冲破，身家性命不保，不能不死守不开。”堤内堤外，聚集着双方几千名农民和棉民，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当时虽有省、县政府的调解处在调解，但收效甚少，待高鹤年居士赶来后，很快劝阻了这场大规模械斗。

高鹤年居士在里下河地区救灾和劝阻垦区大堤械斗的功绩，永远留在人民心中。当地人民群众，直到现在，还在怀念着他。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

近几年来，国际红十字会的人来到江苏，还问起过高鹤年居士的情况。

高鹤年居士的慈善事业中，创办刘庄贞节院，也是他一生中受人称道的大事。

1921年，高鹤年居士散家财，济予贫苦亲友。

第二年，以自己的 亩地和部分房屋为基础，创办刘庄贞节院。院内建有大殿、斋堂、客堂、延寿堂、祖堂、如意寮、涅槃堂、讲堂和厢楼，殿宇计百余间，寮房共60余所。大殿内供有西方三圣，小佛像若干，左右经柜内供有书本藏经及诸方名山山志。全院规模宏大，佛像庄严，树木蓊郁，环境清幽。院的四面环水，有小桥名九莲桥通外。整个面积约 8 亩地，在串场河西有菜园 6 亩，水稻田 110 亩。到 1925 年，仅用 3 年时间，园满地建成了这块环境幽静的佛国乐土。

高居士创办的刘庄贞节院，受到了广东省中山县县长李柏农及上海等地名人简照南、简玉阶、沈惺叔、王一亭、黄涵之、聂云台、赵云韶、关纲之、魏柏荪等人的鼎力相助。他亲自手订章程，又经印光、谛闲二法师及诸大明公核定，各省来学者颇众。在院修持的妇女们，坚持朝暮功课，研经静修。她们祈祷和平，愿干戈永息，风调雨顺，上报四恩（四恩：一父母恩，二众生恩，三国王恩，四三宝恩。），下济三苦（三苦：一苦苦，即由苦事之成而生苦恼。二坏苦，由乐事之去而生苦恼。三行苦，由一切法之迁流而生苦恼。）

该院最盛时期，有修道妇女四五十人，信佛教，不改装，不改姓名，过修持生活，佛教梵语称优婆夷，即女居士。那时规定进院的年龄只能在 30 至 60 岁之间，平时除在院里做功课外，还要参加劳动，并规定居士个人不得向外化缘，靠自食其力。他们除出租水稻田所得收入外，就是依靠种菜、纺纱、织布和加工粮食等收入来补助集体开支。

刘庄贞节院还为社会办了不少好事。高鹤年居士在《山中归来略记》中写道：“1941年，春荒紧逼，青黄不接，灾民嗷嗷待哺，施放芋米两次，粥少人多，难以普济，尽心而已。王居士（光钺）来院，提倡纺织工艺种植田园等事。秋间余（指高居士

本人，笔者注）与地方诸公，扩充因利堂，建筑贫民小工厂，收容贫民，学习芦苇斗篷等轻便工艺，亏欠万余元，概由我院担任，借贷偿还。……余（他本人，笔者注）由山中归来，创办妇女安老院，已 20 余载，叠遇水旱蝗刀兵等灾，不能坐视，设法救济，故将院中各人自备养老口粮之基金用去，又将院众衣棺零用等资数千元用尽，仍欠万余元。”类似事情，20 多年中，刘庄贞节院承担了许多次救济事务。高老居士的刘庄贞节院，受到了全国各地的称赞和效仿。

1938 年，高老居士将刘庄贞节院改名为“净土安老院”。直到现在，刘庄贞节院的修女们还保持高鹤年居士制定的自食其力优良传统。每天除按时课诵外，还坚持种菜、纺纱等工作，并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与照顾。

高鹤年居士游访全国名山，并作《名山游访记》，也是他在佛教界的一大贡献。

遍游名山，历史上屈指可数。古代传说中，有个千岁宝掌和尚，中天竺（印度）人，在天竺约 500 年，于汉末来我国，历三国两晋，宋齐梁陈隋，至唐高宗显庆二年（657）活 1 072 岁。凡南北名山道场，无不亲历其地。到明末，有位紫柏尊者，亦复遍历名山，以日行 300 余里，虽无宝掌之寿，其所游历，可与宝掌相齐。方内人中的徐霞客，游踪始于明万历丁未（1607），止于崇祯庚辰（1640）经 34 年，留下了一部残缺不全的游记。近代游僧不少，但时间短，且间而行之，仅为悠悠自闲，赏心悦目，一游而过，没作为者诸多。高鹤年居士，游踪自 1890 年，到 1924 年止，前后共计 35 年，写下了一部完整的《名山游访记》。

高居士宿根深植，诚朴敏忠，目睹世上诸恶因原，在于行为不实，思想愚昧，于是发慕道之心，深怀学佛之志，别离家庭，遍参知识。开始偶游云台山，遇高僧赠予教典，展读起来，如贫

获宝，似渴得泉，明知了三界（一欲界，含淫欲与食欲；二色界，即有形有色之物；三无色界。此界无色无物，唯以心识住于深妙之禅定。）无安，犹如火宅，人命危脆，不能偷安，始有忏悔访道朝礼名山之志。于是首朝浙江普陀天台，参礼敏曦、镜融二法师，旋往清清凉山，回诣江苏宝华，参叩大霖律师，又到金山受五戒（杀、盗、淫、妄、酒），亲近大定老人与融通上人，同住藏经楼，白天阅藏，晚上参禅。以后便云游天下，遍访各地名山，深探佛理、谨守戒律，苦修禅宗、净土、真言、止观。

世人常以高居士来比明末之徐霞客，他俩有相同又有不同之处。徐霞客天性好游，殫毕生精力，搜奇探险，有洞必钻，逢巖必陟，后得足疾，行走不便。由昆明至武汉，坐轿150天，再从武汉乘船回到江阴寿终，享年56岁。34年中，全以游为目的，作用仅为一部山水游记。高居士在芒鞋竹杖中，并非以游为目的，而作重在参访，住山苦修，称为行脚，寿龄超过徐霞客20岁。二者游踪之广相柏冲，但志不同，因而相同之中又有不同之处。

高鹤年居士游历广远，凡四大名山、五岳、包括皖之黄山、白岳、天柱、九华，浙江之天目、天台、雁荡、括苍，蜀之峨嵋、青城，陕之终南、太白，晋之五台，鲁之劳山，赣之匡庐，鄂之武当，闽之武夷，粤之罗浮，滇之鸡足，一一涉足。所到之地，都记有风土人情，古迹胜境，道场寺宇，高僧名士事迹。根据语言回答，各有记载。一可供不能行脚者，没法得知圣道场地胜迹而遗憾，二可供初学寻师访友之一大方针。自1912年至1913年止，在《佛学丛报》上首尾略载，而居士行脚，积稿未刊者居大半，信众有如嚶求之切。时有王一亭、许止净、聂云台、狄楚青、简玉阶诸居士，劝居士单独编成一册，出版流通。当时名僧虚云，也劝居士集稿速印。在广大佛教徒的积极肯求下，居士将《名山游访记》汇编成册，付印出版。



高鹤年居士的《名山游访记》，概括起来说，记有以下三方面内容：一为梵宇道场，古今兴废。二为文化遗物，如五台碧山寺之墨迹华严经塔，涿州云居禅林石刻藏经，北京雍和宫之古佛，五台之转轮藏及所藏历朝宝器，云岗之唐刻石佛，应州之大塔，泰山之唐宋碑铭，龙门之北魏造象，孔庙之汉魏唐宋古碑，关中之王褚圣教序碑，长安之碑林等，这些几经沧桑，仅仅保存下来的古代美术结晶品，大有光辉于我国历史。三为诗歌偈颂，玄机问答，以及诸方谚语等，多被采择，使阅者心为旷，神为怡，矍然进惕，汤垢涤秽，返朴归真。至于弘法圣化方面，他也功德无量。

高鹤年居士《名山游访记》“第二篇 泰山 北京西山 五台山”文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着：“……又有范王二君，朝岳同行，说知恩报恩，风光和雅，有恩不报，非为人也，存诚之道，不妄语也。五十里，崔家庄。王君谈，日食三餐，每念农人之苦。身被一缕，常思织女之劳。一星之火，能烧万顷之薪。半句非言，误损平生之福。五十里，泰安府泰安县，住。城内岱岳庙伟大，有温凉玉圭等宝，羽士居。出北门，五里，红门宫，孔夫子登泰山处，今僧家居。上山二十五里，由金石玉，回马岭，五大夫松。十五里，瀑布、南天门、天街、岱岳圣母殿，铜碑。五里，观音洞、舍身岩、观日峰、泰山极顶，住东岳庙。范公曰：人生智未生，智生人亦老，心智一切生，不觉无常到。时有叔侄争吵，对神明心。王老劝云：“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土后人收，后人收得莫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次早，五六人观海日出。五里，后石坞，相传圣母修道处，有墓在焉。怪石奇松，最幽之地，内住五六人，泛论儒释道三教所谈之理。往丈人峰，大观岱岳诸胜，概在眼底。留住三日，下山。范公谈，欲识其人，先观其友。君臣不信国不安，父子不信家不睦，兄弟不信情不亲，朋

友不信交易疏。陈君言，溪壑易盈，人心难满。……”这是他在《名山游访记》中的一部分，全书都这样写着。文章里，有地名，景点、方位距离，有景有情，还有人生哲理和劝善益言，读者颇受教益。

高鹤年居士英年立志，矢志行脚，一筇一笠，掉头振臂，蓦直而去，翱翔千万里；劳顿数十年，云水飘飘，游行自在，非一般人所能办到。出家人行脚参访，则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尚非难事；若在家居士，真正行脚，磨练身心，艰苦参访，洵为稀有之事。尤遇大善知识，靡不躬参，如于终南山参拜年约数百岁之黄面老人，指向深谷洞中，习定坐禅，饥餐草果，渴饮涧泉，百余日不食烟火，修其最苦之外，又往往遇睹豺狼虎豹，异兽珍禽，以及可怖可畏之山精石怪等，皆为奇迹。唯高鹤年居士，敢于冲风冒雨，露宿风餐，受寒暑、忍饥渴，承受千辛万难。凡国内名山，无处不历，广求知识，无一不参。他的求知欲望，受人鼓舞；他的《名山游访记》，深受广大读者菁莪。自1934年起至1957年，游记已出版过3次，还供不应求。近几年来，应香港和国内外广大佛教信徒要求，此书由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题词，江苏省佛教协会主办，并在他俩位弟子王光钺和孙勤居士的热情奔波下，于1986年1月，再次出版发行。

解放后，高鹤年居士更加受到了信徒们的爱戴、党和政府的关怀、照顾。89岁时，返刘庄净土安老院养病，由国家补助生活费用，后由王心海（即王光钺）居士迎至泰州养病。91岁返刘庄逝世。南京佛教代表、苏州佛教代表，泰州政协代表共同举办追悼会，骨灰葬于苏州穹窿山西南方山中。

# 卫立民传

玉 竹

在国民党时期的宗教界上层人士中，有一位十分活跃的年轻人，他是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总干事卫立民。他今年虽已85高龄了，还满腔热情地热爱宗教事业，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

卫立民老先生，佛教居士，1904年7月29日生，安徽省合肥市东十里处的卫杨村人。清盛军总督卫汝贵的嫡孙，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的堂弟。

他有过荣华富贵的家庭。他出生在南京，并在南京长大，虽是安徽人，但不知安徽老家是个什么模样。有一次，母亲带他回老家，见一群小孩在村口玩，便问卫汝贵的家。小朋友们立即回答：“哟，是卫家大房子。”他们领我们母子俩来到卫家大院，房子真大，有房屋300来间，比一般庙宇还大，柱子很粗，两个大人也抱不住。

他祖父卫汝贵，清季盛军将领，官居甘肃宁夏镇总兵。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六月，奉命进军朝鲜平壤，以抗御日军；八月，平壤清军败绩，随大军撤回九连城布防；九月初，被清政府革职；十月，复被掣交刑部问罪；十二月于京师问斩。正是他祖父生命危急之时，家里人千方百计解救。当时政府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这样的罪犯，只要家里能拿出一大笔钱来，完全可以免于死刑。于是，卖了一大批田产，由大伯父卫少三带钱到北京。结果，他去了上海，在上海吃喝嫖赌，全花光了。他的祖父生命

没有保住。

卫老父辈有兄弟三个，老大卫少三，将级官位，家住南京浦口。老二卫本铎，团长，住南京城里。他父亲卫本鉴，排行老三，讲武堂毕业，官最小，营长。有一天，二伯父去浦口看大伯父。大伯父的警卫员连升，玩枪走火，一发子弹从柏文蔚（国民党将军，卫少三密友）头皮上擦过，头发烧焦了。这发子弹又飘到了卫本铎身上，当场死于非命。二伯母跑到南京来告状，说“哥哥害死弟弟”。大伯父和他父亲拿了不少钱给二伯母，并送钱给二哥哥卫立鑫在北京上大学，一场家庭纠纷算完了。后来，大伯父背上害骆驼疽，被鼓楼医院的马林（受美国基督教会总会派遣的传教士、该院院长）治好了。出院后，又继续嫖赌，不久病逝于南京。

大伯父是一家之主，他死后家中无主了，家里人也开始奔溃，各奔东西。当时，湖北督军段之贵，是他祖父卫汝贵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他为了报恩，打电报来叫他父亲到武汉，任湖北省督军署顾问。那时有个不好的习惯，在段之贵身边的安徽籍人组成了安福系，只要安福系人都能挂东洋刀。合肥去了几十名农民跟随他父亲，成了安徽集大官集团。这些人生活全由他父亲负担。他父亲欠了不少债，没办法，只好回来卖田产。刚还完债，段之贵调奉天任督军。他父亲跟随人太多，不能跟随他去奉天，只好流落在湖北。父亲卖了田，没脸见人了，自到湖北后，几年没与家里人联系，家里人谁也不知他的下落。他祖母无奈，到天津找叔曾祖父卫兴武，他辈大人小，从小在他家养大，后送德国留学深造，回国后任段祺瑞的卫士武官长，是段祺瑞的红人。他当然要全力以赴帮助他祖母寻找他父亲。他给湖北督军王占元去了个电报，请他查找他父亲。王占元很快给卫兴武回了信，说他父亲在湖北混成三旅任职。他祖母带着他母亲、姐姐和他，一同

来到了湖北，拿着王占元的信找到了他父亲。

这个荣华富贵的家，就这样破败下来了。

卫立民生活在一个信奉佛教的家庭，祖母、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从小受家庭影响，对佛教就有感情。他记得小时在南京，祖母领着他到朝天宫，用几个铜钱在石乌龟上磨磨，再用红线串起来挂在脖子上，还经常随祖母到南京的清凉寺、毘卢寺、灵谷寺、鸡鸣寺、古林寺和栖霞寺等庙里烧香。

他在武汉开始上小学，13岁转到宜昌姐姐家上学。那年暑假，他回到武汉看祖母。返校时，祖母托了同乡商人费致法与他结伴，请他照应他回宜昌。那时，宜昌没有泊船码头，大船只能停在江心，然后用小木划子从江心渡到岸上。他们的船还没有到停泊地点，一些木划子就靠近大船，扔上铁钩，抢着帮忙载运。当时江水很大，浪潮急涌。费致法把货卸下去后上了木划子，他要他也下船。他不肯下，可是没办法，只好跟着上了木划子。江水浪高水急，小划子刚离开轮船就翻了，人和货物全翻到了江里。浪潮一会儿把他抛入空中，一会儿又跌落下来。他随浪潮上下起伏，水直往肚里灌、嘴闭不起来，心里难过，在水里拼命挣扎，内心不断喊着：“菩萨保佑我，菩萨保佑我！”突然，从兵舰上扔过来一条绳子，他死死地拽住绳子。他说：“那时也不知那儿来的那么大力气，一直拽住绳子不放。待水兵把我救上船时，我已经昏迷了，肚子上鼓起了一个山包，满肚子全是水。水兵们帮我排水后，我慢慢复苏过来，发现背包还没有丢，而比我力壮的费致法却死了，东西也随江而去，我感觉希奇。”

同船的同学回来向他父母报信：“卫立民掉江里了，你们收尸去吧！”母亲在街上听了，当场瘫在那里。父亲也吓昏了，来到江边等着收尸。当他来到父亲身边时，连声叫了好几次“爸爸！”他开始不理他，好一会才定下神来，认定他没死。于是，父子俩抱

痛哭。回家时，在路上看见妈妈，她还跪在街心的石板上。回到家，他连续躺了好几天。他睡到床上，多少天还在感觉被水冲来冲去。醒来后问妈：“妈，我还回来了吗？”妈回答：“回来了，这是信佛的结果，是菩萨保佑了你。”

这事对他刺激太大了。他回忆说：“在这样的生死大转折关头，我的思想最纯真，当时只有活的愿望。活过来后，一切都觉得是佛菩萨保佑。从此打下了坚定的信念基础，坚信了佛教。事后，经常到宜昌最大丛林慈云寺和古佛寺烧香拜佛。19岁时，我考入了省立第三师范学校高师班就读。这所学校也设在宜昌。在上中学的日子里，我常到宜昌居士林听讲经。当西藏的贡嘎活佛来居士林讲经传法时，我也参加听传话。后来，沙市章华寺住持本一法师到居士林讲经，我去听讲经时皈依了他，取法名广种。那年我20岁，从始我成了正式的佛教徒。”

卫老师范毕业后，在宜昌的税务机关里找了份工作。“七·七”事变后，随着战争形势发展，各地机关不断内迁。他在宜昌也呆不住了，上哪儿去呢？幸好有他姑父的朋友在重庆。他姑父的朋友就是陈铭枢将军。

他姑父李少川，住上海，同盟会会员，与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当时的团长陈铭枢交往很深。他俩去上海，常住他姑父家，尤其是陈先生和他姑父有莫逆之交。不久，陈先生由团长上升为将军。上海抗战后，陈先生和李济深在福建组建人民政府，后因内部政见不一，没多久宣布解散，陈先生离境出国访问。后来，他响应毛主席团结抗日号召，回国经汉口到重庆，以民主人士身份参加抗日统一战线。他到重庆后，被推选为“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主席，中共王炳南任外交协会理事。卫老说：“我给他去信，他立即复信要我到重庆。我被陈先生委任为外交协会总务主任，之后又成了外交协会会员和理事，在那些日子里，国民党特务经

常找他麻烦，他的安全没保证，行动不自由，经济上也很困难，生活来源靠蔡廷楷、蒋光鼐寄钱来接济。外面的事，多数是我替他跑。他没钱用，银行不敢借给他。为解决他的生活困难，我想了一招，他的字写得好，我让他把写好的字交我裱好后送给了各大银行的经理、董事长，他们以酬劳的方式拿出了大笔钱给陈先生。当我了解到外协的国民党团组织分别开了会，并传出要换主席，要给吴铁城准备办公室的情况后，将消息报告了陈先生。陈先生知道情况不好，主动辞职，后由吴铁城当了国民外交协会主席。陈先生一走，我也不干了，王炳南也离开了外协。”

陈铭枢将军留学日本时接受了佛教洗礼，回国后随支那内学院院长欧阳竟无居士研究佛学，他与太虚法师来往也很密切，在重庆卫老随陈将军认识了太虚法师，后由乐观法师介绍皈依了他，取法名观明。由于重庆市区遭敌机大肆轰炸，他和太虚法师在北碚缙云寺住了一个时期。经过长时期相处，太虚法师对他非常器重，委任他为中国佛学会总干事，会址设在重庆市内罗汉寺，中国佛学会一切内外事务均交他处理，同时又被选为重庆市佛教会常务理事暨代理会长，在佛学会工作时间里，他与各教发生了联系，结识了各教会领袖人物。其中有中国天主教文化协进会理事长于斌总主教，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总干事卫理公会会督陈文渊博士，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长白崇禧等。又由陈铭枢将军介绍认识了安徽同乡基督将军冯玉祥。冯玉祥将军介绍他到中央赈济委员会任简任专员，支简任级薪俸。又在中国国民抗日救国节约献金运动总会工作，冯是会长，他是总干事。

1943年元月14日上午10时，由冯玉祥、白崇禧，于斌、陈文渊、太虚、陈铭枢、卫立民7人发起筹建宗教徒联谊会。会议推选卫立民进行具体筹备工作。同年5月22日下午3时，在重庆市基督教卫理会堂，召开“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成立大会，国民政

府主席林森颁发亲笔祝贺赞词、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参政会主席莫德惠、秘书长邵力子、重庆市市长贺跃祖等参加大会亲临指导。会议推选冯玉祥、白崇禧、太虚、于斌、陈文渊为常务理事、卫立民为总干事、葛德基、冯兆异为副总干事，黄忏华为主任秘书。从此，卫立民又成了冯玉祥将军的门生，紧随他热衷于“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的工作。

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是个团结抗日救国的各宗教联合组织。冯玉祥将军常对卫总干事说：“古人云，得人手软，吃人嘴软，慎之戒之。”为防止受人控制和被人利用，该会没有基金，不接受政府津贴及国际机构捐助，也不以任何名义募集基金，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冯派宗教团体。会中少数雇员及勤杂工的开支，均由卫总干事个人掏腰包，一切会务活动所需经费，均由主办人自费解决。尽管如此，他在重庆，围绕抗日救国、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紧跟冯玉祥将军做了大量工作。

在争取和改造社会黑势力上，他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上海的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东北镇守使张树声，武汉红帮头目杨庆山，都是十恶不赦的杀人魔王，通过冯先生等人的工作，改变了凶恶面目，为抗日济民做了很多慈善工作。卫总干事亲自找杜月笙谈话：“许多军界、政界人士都以宗教生活为归宿。你也参加社会活动多年，人非圣贤，谁人无过！人不是圣贤，不能没有过错，劝先生晚年来对宗教多加研究。如军阀时代的吴佩孚、孙传芳、汤芎铭，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晚年都皈依佛法了。”同时，联谊会有活动，也请杜月笙等人参加。后来，杜月笙文雅多了，简直成了个士绅派，一幅慈善脸孔。抗战期间，广东省发生了特大水灾，给群众生活带来很大灾难，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梁寒操给联谊会一捐簿。联谊会发动群众捐助时，杜月笙也捐了好几万元。以后办学募捐时，他也出了一笔钱。



抗战期间，敌人快要攻占独山，重庆吃紧，人心很乱，有钱人纷纷想逃往香港。有一天，冯玉祥将军电话约卫总干事，到他上清寺康庄官邸共进午餐。饭后，叫副官刘耀把摄影师请来，他穿了一身黄咔叽布中山服，脚上穿一双黑皮鞋，俩人合影了一张全身照片和一张半身照片。冯将军年老个子高大，卫总干事年小不到他肩旁高，大家称他俩一老一小。照完相后，冯对卫说：“敌人要攻占独山，我们处在国家存亡紧急关头。我们一老一小，要做一个救亡图存的工作，马上出发动员各阶层爱国人士，共同奋起承担救国的重任，并组织慰问团去前线慰劳将士。”工商界、金融界及社会各阶层人士，受冯将军爱国教育启发，各处捐献了一大笔钱。卫总干事协助冯将军将这些钱，直接交有关部门送到独山劳军去了。独山将士受到很大鼓舞。一老一小的合影，成了人们纷纷要求赠送的纪念照。

有一次，卫总干事与副总干事冯兆异博士，一同前往重庆嘉陵宾馆参加宴会，适中共周恩来副主席与各国大使亦先后到达。冯兆异博士有些神秘地问卫总干事：

“你想不想见一个人？”

卫立民有些不解，不加思索地说：

“只要你认为合适，我当然愿意。”冯兆异说：“那好，你就等着，见了面，你会终生不忘的！”

卫立民既激动又兴奋，只好按照冯兆异的吩咐，在一个房间里等着。不一会，冯兆异显得格外兴奋，领着卫立民来到另一个房间。卫先生一眼看出是个伟人，但不知说什么好。只见他穿着深灰色的西装，系着领带，显得威武庄重。经冯兆异介绍，知道这位伟人就是周恩来副主席（冯是周副主席在国外的同学）。

周副主席热情地请卫先生就坐，然后亲切地寻问了宗教徒联

谊会的情况。周副主席说：“联谊会是个创举，为抗日救国服务，卫立民先生做了许多工作。”

卫说：“现在虽把各大宗教团结起来了，但为抗战所做的事还很不够。”

周副主席说：“宗教徒联谊会好得很，是爱国行动，现在起步了，要提高，要发展。”

卫说：“我们要更多的发展联谊会成员，广泛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临别时，周副主席紧握他的手说：“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反对侵略，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伟大的苏联十月革命节到来之际，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在大使馆设宴招待各国使节与有关人士时，周副主席再一次热情地和卫总干事握手，并予以勉励。

这两次握手，卫总干事受到很大鼓舞。

宗教徒联谊会成立二周年特刊上，各领导成员和有关大使发表了赞颂的文章。其中，有卫立民写的《宗教徒联谊会两年来的工作报告》、于斌的《伟大的宗教》、太虚的《历史的创举》、《反侵略的动力》、白崇禧的《宗教徒的典范》、陈铭枢的《人类的指南》、贺国光的《与民为善、于国有功》、印度大使梅农的《印中友好的桥梁》。这些文章，都不同程度地指出了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的历史作用和抗日战争中的丰功伟绩。

宗教徒联谊会在抗日战争中的行动，领导成员内部也是比较满意的。大家对卫总干事的勤奋工作，更是十分满意。

卫总干事在两年多的宗教徒联谊会工作中，在这些伟人和恩师的指教与培养下，不断锻炼成长，既增长了才干，又成了一位敢于斗争的勇士。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成立后，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基督教徒）被推选担任该会理事。吴立即派中央党

部机要秘书来会对卫说：“请你们安排吴秘书长来会办公的时间。”卫总干事当即答复：“此事须经常务理事会决定后再行通知。”他将此情况向轮值主席冯玉祥汇报。冯先生生气的说：“吴铁城又想控制宗教徒联谊会。过去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他就是这样夺权的，我们宗教徒联谊会可不听他那一套。”吴铁城想篡权一事，完全被拒绝了。

在重庆，为了揭发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在安徽的罪行，安徽旅渝同乡会，召开了安徽旅渝各阶层人士群众大会，卫总干事被邀参加，并偕同他表弟李家友一同到会（解放初李家友任武汉市江岸区区长，后任民革武汉市主委，民革中央候补委员），正值大会上踊跃发言，揭发李品仙在安徽的罪行时，忽有一个C. C. 特务头子翟某操纵会场，谩骂“冯玉祥先生是共产党的尾巴”。妄图扰乱会场，混淆视听，煽起反冯情绪。他听了很生气，当场义正词严地批驳了他的谬论，还打了翟某几个耳光，到会的人均拍手称快。会后，在场的李家友和冯玉祥先生办事处的汤处长，把会场全部经过报告了冯先生。陈铭枢将军和冯先生对他此举评价很高。陈铭枢将军当着卫总干事的面风趣地说：“我最得意的是福建事变，卫立民最得意的是昨天大打特务头子。”后来，以莫须有的罪名，他被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传讯。陆军大学教育长，军委会法制处处长周亚卫将军得悉后，随即驱车到重庆卫戍总部向刘峙总司令详述他的为人处世，绝无违法行为，愿以人格担保，后经刘峙下令撤消传讯。

年轻的卫总干事，总是满腔热情地处理宗教徒联谊会日常事务，满腔热忱地为充分发挥该会的职能而奋斗。或组织僧侣救护队，抢救重庆被轰炸中的受伤居民；或组织友好往来，争取反法西斯大同盟；或赈济救灾，募金慰问，广泛动员抗日力量；或组织创办首都中医院，发起祈祷世界和平运动。当宗教利益受到冲

击时，他极力加以维护。

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的一天，能海法师偕同成都大喇嘛寺住持，一位 80 多岁的老喇嘛来到卫总干事处，提出成都大喇嘛寺被中央军校占用多年，无法进行宗教活动，曾由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多次向中央军校交涉无效，特来请求设法解决。他想到中央军校是由国民党考试院戴传贤院长亲手创办的，必须找他才能解决。他亲自领着他俩晋见了戴院长，在太虚法师大力帮助下，戴院长专电中央军校，令其迁出。中央军校奉电后，立即全部让出。佛化新闻报社特发专号，显目的标题上写着：“闻佛寺被占，卫立民泪下如雨，并函戴院长请求维护解决。”事后，西藏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代表全体藏胞发来感谢电。

抗日战争中，原湖南省主席何键，函介前湖南省督军赵恒惕先生，请宗教徒联谊会为他代募捐款，兴建南岳佛教居士林。他当即发动本会成员，银行界的潘昌猷、韩梓材等，为他劝募。

1946年 8 月，宗教徒联谊会接获北平佛教各寺庙联名电告，北京市政府飭令佛教各寺庙，提拨庙产百分之五十作为建设市政之用。各寺庙僧尼恐慌万分，要求宗教徒联谊会给予设法解决这一严重事件。卫总干事接电后，当即向常务理事主席冯玉祥将军汇报，冯说：“这件事我们要大力支持，也是宗教徒联谊会应尽的责任”。后经冯先生电请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北平市长熊斌请予收回成命，使北平佛教庙产幸免提拨。

南京清凉山寺，是佛教六朝圣迹地藏菩萨道场。每年农历七月初一至三十日，各地佛教徒均来此朝拜，香火极盛，还有很多佛教国家的外宾也来朝拜。该寺被当时警察学校强占，无法进行宗教活动。1946年 9 月，该寺住持具文呈请宗教徒联谊会，要求大力支持收回该寺全部庙房。据报后，卫总干事当即报请常务理事轮值主席、国防部长白崇禧，白部长当即批令首都警察厅长韩

文焕转饬警察学校从速迁让。事后，清凉山寺住持表示深切感谢。

1935年11月，显赫一时的孙传芳在天津被一位女子——施剑翘刺杀一案，曾震惊中外。

1947年春，在苏州市保国寺，卫总干事接待了她。

她衣着朴素，但仪表不俗。经与交谈，知道她也是卫总干事安徽同乡，俩人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她向他介绍了亲手枪杀孙传芳的全过程。她父亲施从滨是孙传芳部下一名军长，因违犯军纪被孙传芳枪杀了。她为父报仇，刺杀了孙传芳。

施女士讲完后，他批评她说：“孙传芳为执行军令，处决你的父亲是为公，不是为私，你应谅解。你如此枪杀孙传芳是不对的。假若孙传芳的子女再为父报仇，这样继续下去将没完没了。”她听了他的话，表示懊悔。后来，她皈依了佛教，并在苏州办了一所学校。在办学中，对教育贫苦儿童很有贡献。

她性格豪爽，待人诚直坦然，谈笑风声，落落大方，时而在报刊上发表一些诗文，是一位聪明能干的女性。自那次批评以后，他成了她的益师良友，两人来往甚密，她经常到南京毘卢寺来看他，有事找他商量。

她信佛以后，曾动员母亲信佛，母亲不依，便到毘卢寺来找卫，请他上她家去劝母亲念佛。她的家在南京汉中门外二道埂子，他到她家后与她母亲谈得很融洽。不久，她非常高兴地告诉他：“母亲开始念佛了。”

1948年冬，姐弟俩来到毘卢寺找卫总干事，一进门就跪下向他叩头说：“母亲往生了，她老人家临终的境界非常好，神志很清楚。往生前没生任何疾病，往生时口里还在念佛。”又说：“我们全家一起研究过，准备为母亲开吊，并请人为母亲点主。”卫提议：

“佛教徒为母亲开吊招待亲友应该戒杀，最好在昆卢寺办素席招待。点主人最好请年长有威望的蒙藏委员会许世英委员长进行，我帮你联系。”他的提议，得到她大哥施中诚等全家人的赞成。为她母亲开吊那天，她父亲施从滨生前好友和他的部僚全到昆卢寺来了。

国民党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在励志社纪念印度甘地先生时，他领她参加了纪念大会，并晋见了戴院长。当卫总干事宴请许世英、章嘉活佛，喜饶嘉措、莫得惠，焦易堂时，她也在座。她借主人的酒，特向国民党最高法院院长焦易堂，对她的特赦表示感谢。

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经过多年的内外活动，在国际国内都有很大影响，卫总干事的声望也响彻政坛，印度教大学校长罗达克西藏爵士，在应联谊会邀请来华访问之际，他和印度大使梅农两次邀请他赴印度访问。蒋介石曾问卫立煌：“卫立民和你什么关系？”卫立煌回答：“他是我堂弟。”后来，卫立煌对卫总干事说：“想不到你比我名声还大。你是怎么搞的？”

蒋介石对宗教徒联谊会的国际影响十分重视，曾召见卫总干事说：“宗教徒联谊会搞得有声有色。”又写“中国宗教徒联谊会”会牌，落款蒋中正，挂在南京昆卢寺。他亲自送给他一张大礼服照片，照片的上款是“立民先生”，下款是“蒋中正”。下面盖有“国民政府主席之印”的方形图章。据参军长吕超说：“他给送大礼服照片的人不多，没几张。”卫总干事仅看到章嘉活佛那儿有一张同样的照片。这张照片，在南京卧佛寺失火烧了。1947年，国民党召开了国大，蒋介石任总统后，又送了一张同样的照片，落款是“蒋中正”。盖有“蒋中正”的私人图章。

宗教徒联谊会 and 卫总干事的成绩，使国民党内部一些极右分子陈立夫等人的极大关注。1948年春天，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

C.C.头目陈立夫，派来亲信林铁庵当说客。他是安徽合肥人，与卫总干事是同乡。抗战时，卫总干事和陈铭枢将军到江津听欧阳竟无讲佛学课时，食宿都在他家。他双目失明，能说会道。他的哥哥过去参加过革命，颇有名声，因有以上关系，他在军事委员会挂了个参议头衔。他与陈立夫打得火热，朝夕不离，一日三餐，没有他陪着，陈立夫吃不下饭，他是陈立夫的心腹、智囊。林铁庵来到卫总干事办公室，作了一般的寒暄后，来了个言归正传，宣扬陈立夫对人如何真诚，对卫如何器重，称赞他有大志，他愿向陈推荐他出任重要职务。卫总干事默默无言。林铁庵一天的游说，毫无收获，有兴而来，败兴而归。陈铭枢先生听后说：“你没上林铁嘴的当，万幸，万幸！”

1947年，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创建人之一，常务理事太虚法师在上海玉佛寺病情严重，神智尚清，嘱医护委员会电召卫总干事赴沪省视。他接电后，当夜乘车到上海玉佛寺大师病榻前参拜。原有医师离去，由他在榻前守护。大师弥留期间，向他指示道：“要保持宗教徒联谊会的伟大成果继续前进。”他表示保证遵行大师指示。守护历时两天，大师在慈悲地安祥密行中示寂了，他当即向门外所有的人宣布这一消息，大师示寂。卫总干事心里十分沉痛。

1944年，冯先生收卫立民为门生。仪式是在重庆上清寺康庄冯先生官邸举行的，卫先生正式成了冯玉祥将军的门生。

冯玉祥将军自重庆返回南京后，他对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行径大为不满，两人的斗争形成了水火不相容之势，冯先生只好申请出国。蒋介石从中刁难，最后决定他赴美考察水利工程。冯将军想带卫总干事走，但他公务在身，不能离开。临行前，令副官刘致军请卫总干事来到上海路冯将军官邸。冯先生语重心长地对卫总干事说：“我出国后，你要坚定立场，不屈不挠，不畏强权，

要树立勇于斗争到底的顽强意志，做一个名符其实的不负我多年对你精心培养的忠诚门生。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发展、壮大伟大的有益于人类的宗教事业。”他听完这番令人激动、深思，永铭肺腑的临别赠言后，不由热泪盈眶，决心牢记恩师教导，为宗教事业奋斗终身。冯将军说完后，叫参谋周茂藩请来了摄影师，他拿出了从来不穿的大礼服，又把精心珍藏，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全部勋章佩挂在胸前，俩人合照了一张照片。事后，与恩师一同驱车到下关火车站，直到火车离开了南京，他还呆站在那儿，十分留念。后来，冯将军不幸牺牲于从美赴苏的油船上，卫总干事万万没想到这次下关送别，是一次与冯将军的永别。冯将军的死，卫总干事又一次万分沉痛。直到现在，还总是黯然悲怀。

国民党还都南京后，喜饶嘉措大师出任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由他向行政院提名，卫总干事被任命蒙藏委员会蒙古专区简任专员，支简级薪俸。解放前夕，喜饶嘉措大师回青海，由他代管他的事务。是时委员长许世英辞职赴港，由白云梯继任，有军统特务 4 人至蒙藏委员会找白云梯查问，说卫总干事与共产党有联系。委员长办公室秘书长姚光霁听了，特来告卫注意，免遭不测。

1948 年农历腊月的一天，国民党中央新闻社社长罗桑益西（藏族），来到大悲巷特二号之一找卫，这时恰巧他外出未归，他夫人告诉他不在家，罗即要她打开客厅。他进去四处张望很久，发现客厅的字画挂得很整齐，没有作走的准备后便说：“我们请卫先生早日离开南京，准备撤退，否则我们就要采取行动。”卫总干事回家听说后，早听喜饶嘉措大师告诉他，罗桑益西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知道这个军统特务罗桑益西说话的份量。他不愿意去台湾，白崇禧曾派人来约他同机赴汉口，他没去。这次不走，将不是被绑架就是被暗杀，当晚携夫人彭素莲乘车至沪。在上海南



善德佛慈会住持杨露卿佛堂住了一宿之后，次日晨转住到汉倬云（陈将军同学）家，在他家与陈铭枢将军见面后，去了冯将军家（冯将军赴美后，他家里人和副官刘耀等人转移到了上海）。

在上海没住几天，他又转到杭州周亚卫将军处住了一些时候。直到陈铭枢将军写信告诉他：“你快回南京吧！南京快解放了。”他按陈将军的指示回到南京，迎接解放。

卫总干事回到南京，住在家里，很少外出，当时南京的各机关人员正在紧张的撤退，没过几天，南京就解放了。南京解放前夕，由陈铭枢、吴贻芳、陈裕光等署名的南京市治安维持会的通告出现在各街道上，他见到通告后非常愉快，即到设在中山东路的治安维持会参加了工作。在国民党的飞机临空骚扰下，他奋不顾身，抱着大批军管会的布告，在各街道重要路口张贴。治安维持会结束后，参加了街道读报组，担任读报组长，先后又参加了第一区人民文化馆政治班学习，南京市反特展览会讲解员，三反五反运动中的街道工作组骨干分子。当时工作没有待遇，生活问题各自解决。他一家大小数口，生活十分困难，每天将院内各种鲜花剪枝到科巷出卖，用以维持家庭生活。后有喜饶嘉措大师、陈铭枢将军和佛学家吕激先生长期资助，直到1967年“文革”发生后为止。

陈铭枢将军在上海时，接受党的领导，进行忘我的工作。军统头子毛人凤曾下令准备迫害宋庆龄和陈铭枢，陈将军处境十困难。上海解放，卫总干事立即收到陈先生来电，说他安全脱险，来宁盼接。他随即到车站月台迎候，见到不少穿军服的解放军也在月台候客。由上海驶来的列车到站了，他立即上卧车车厢接到了陈先生。上海市军管会主任，亲自培送他来宁。柯庆施副市长上前迎接陈先生，并陪同乘车至励志社（现中山东路三七招待所）休息和用早餐。陈先生向柯庆施介绍了卫总干事的情

况，柯说：“我早就听姚光霁说了。”早餐后统战部史永部长安排陈先生住招待所，陈先生说：“不用住宾馆，我住立民家。”后来：陈先生全家人都迁居卫总干事家（大悲巷特二号之一）。

陈先生迁居北京时，临行前安排了卫总干事与他的爱人汤质彬到华北革大高等政治研究班学习深造，卫因夫人彭素莲不肯去，没一同前往。史部长向卫了解到蒙藏委员会留宁的高级人员情况后，这些人都会被转送到北京安排了工作。

喜饶嘉措大师出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时，崑函邀请卫去青海避暑，并愿陪同他朝礼塔尔寺，以偿宿愿。姚光霁得知，向柯庆施汇报了。政府即派藏族委员意希博真与姚光霁夫人一同赴青海，并负责沿途用费。后来，因家务繁重，未能成行。

民革中央主席李济琛，来函通知民革江苏省委员会帮助卫解决困难。民革江苏省委也转达了李主席的指示，但他没有请他们帮忙。民革中央组织部长朱蕴山来南京看过他，也说要给他推荐工作，他也谢绝了。

1953年，江苏省人民政府成立，谭震林任主席，柯庆施、冷遹任副主席。那一年，担任各民族代表团团长的喜饶嘉措大师，访问北京、青岛、上海、无锡后，特给卫总干事来函，告诉他们一行即将来宁消息。他和吕澂先一生同到车站迎接，大师见了卫立民，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呼喊他的随从人员前来与他见面。次日，他带着他的小儿子卫道尊来到国际联欢社与大师长谈，直到深夜始返。大师对冷遹副主席说，要约卫立民一同去青海。冷副主席说：“让他留南京工作。”于是大师特向组织推荐。他为了实现改造世界观的迫切愿望，希望到工厂体验生活。后经省政府函介南京市人民政府，市政府积极为他安排工作。当时市长惠浴宇，派人调派他的工作，他还是要求到工厂参加车间生产劳动。政府满足了他的要求，被分配到南京塑料十一厂，历时20多年。

江苏省政协副主席高一涵，为照顾他的生活，调整他的工作工序，曾函请秦淮区委协助解决。在此期间，卫立民常到冷遹副省长干河沿寓所晤谈，冷亦常留他在家吃便饭，直至他逝世。解放以来，40年内的历届政治运动中，他没有受到任何冲击，始终心情舒畅，精神振奋。1979年光荣退休。1984年起，被江苏省人民政府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1986年，撰写《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的始末》。在他的纪念册上，有中顾委委员江渭清、惠浴宇、江苏省委书记韩培信、省政协主席钱钟韩、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金陵协和神学院院长丁光训、书画家刘海粟等名人留名签字。当时（1987年）93岁的名书画家刘海粟写道：“灵犀一点 精神万古。”江渭清写道：“爱国必先爱民 爱教必先爱国。”惠浴宇写道：“爱国爱民 佛家之道。”丁光训写道：“让我国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继承抗战时期团结一致为国出力的传统，在今天更紧密地相互团结，并同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设作出宗教作出宗教信徒应有的贡献。”现任省委书记韩培信鼓励道：“发扬宗教界的爱国传统，为振兴中华再作贡献。”卫老的俩儿俩女都早已成家立业了。1988年，南京市委书记张耀华特予批示，为他俩儿俩女共解决了四套住房。政府对他的关怀和照顾，他从肺腑里表示十分满意。

卫老虽已到了耄耋之年，可是他精神仍然是很充实的。他象一棵不老松，那样苍劲，不断有益于社会。他还四处奔波，为祖国统一尽自己绵薄之力。他还在忙于撰写陈铭枢将军传，还在为成立南京市佛教居士林忙碌着。同时，也在以愉快的心情安度自己的晚年。

# 李维光神父

楚 日

李维光又名秉论（1896—1965年）江苏省无锡县人。李氏家属原籍浙江，是明末天主教早期传入中国时的三大柱石之一李之藻的后辈。李家有300多年信教史，其伯祖李竹夫是天主教无锡总铎的传教先生助手，其叔祖为耶稣会修士，三叔祖一生在本街天主堂工作，祖姑母、嫡大姑母均为传教女先生，终身守贞不嫁，为教会工作。又因长兄毓麟在徐汇公学毕业后，当进修院，而因其母不许，走上商业岗位，当时该地神父茅本荃曾诅咒说：将来决遭主罚，故其母动员他将来修道，以补长兄之缺。不及2年长兄不知去向，生死不明，其母痛子成疾，临终时嘱他必修道至终。他在母亡后2月即进修院。在这样的家庭和亲友的熏陶和鼓励下，他从小就有志于修道，愿终身为教会服务。

李维光生于公元1896年6月1日。1907年入江苏江阴天主堂办的高小，1909年入上海徐汇公学，1913年入上海教区天主教徐汇小修道院攻读拉丁文，1915年入大修道院攻读哲学、神学，1923年毕业后晋铎即被祝圣为神父。先后在高邮、兴化、江阴等地天主堂任本堂神父。1933年后，在江阴以教会名义创办崇真中学及崇真小学，自兼校长。当时江阴沦陷，由于江阴城中日寇居住，教员、学生不敢去城里教书、上学，其他中学的规模不够完备，旧江阴省立南菁中学的有名教员很多都到崇真中学教书，因此学生也纷纷而来，学校收了近千名学生，为当时办学作出一定

贡献。1943年，他任南京教区江阴总铎区后滕堂本堂神父。翌年，晋级为南京教区副主教，并调任无锡、江阴、常州、宜兴等4县天主堂的总铎。在无锡时组织了渔会（渔民教徒参加），开办了学校、医院，举办了育婴堂。

1950年，他任南京教区副主教，后曾被选为南京市天主教革新运动促进会委员、南京市人民代表、南京市政协委员。1954年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人大代表、江苏省政协常委、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1957年，被选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1958年，被南京教区自选自圣为教区正权主教。1958年1月，担任江苏省天主教爱国会主任委员。

1965年11月9日，因患动脉粥样硬化症，歿于南京，终年69岁。

解放初期，李维光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持怀疑态度。来南京后，由于南京市委统战部、宣传部单位的负责同志及市委主要领导人向他进行多次交谈教育，并组织他去各地参观（如去治淮工地、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三河闸、马鞍山铁厂、石景山钢铁厂参观），使他看到祖国伟大建设及光明前途，增加了爱国热忱及对共产党的认识。到南京后，他又亲自去市政府问党对宗教政策，当时政府的答复非常明确，认为只要各教遵守政府法令，教会不但可以存在，而且受到政府的保护，而事实证明如此，他建立的天主教渔会重新得到政府的批准，证明政府说话算数，使他对政府怀疑逐步解除。同时由于他过去长期在教会耳闻目睹外籍主教、神父作威作福，欺压中国传教士的事实，尤其在1949年2月大陆解放前夕，当时罗马教廷梵蒂冈曾向各教会发出指示：“对少数特殊危险者可避走，大修院可移至安全区。”南京教区总主教于斌逃往台湾时曾指示：教区作应变措施，并发给无锡教区总铎区各神父每人黄金2两，还预备将堂中贵重祭品暗藏到教徒家

中，将教会活动转入地下等。同年 7 月，教廷圣职部又下达命令，规定：凡报名加入共产党或对共产党加以赞助以及发表、宣传、阅读支持共产主义理论或行动的书籍、报刊的天主教徒都拒绝接受“圣典”。1950 年罗马教廷驻华公使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摩洛哥人）又规定各堂都要执行“三不”，即不看共产党报纸、不听共产党宣传、不讲教会中有帝国主义分子。这些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国政府的命令，引起爱国教徒的极大愤慨，也使李维光开始认清帝国主义的面目。后又经过伟大抗美援朝运动的反帝爱国教育，在全市人民的推动和支持下，在爱国教徒的影响下，他于 1951 年初发动句容、溧水、丹阳、陶吴等地的神职人员及南京教徒共 793 人发表关于实行自养、自治、自传的联合宣言，即“天主教南京教区爱国宣言”。该宣言主要内容为：坚决反对教廷干涉中国内政，坚决与教廷割断政治上、经济上的关系，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在酝酿此宣言过程中，受到黎培里的阻挠和破坏。他开始不同意发表宣言，对李维光进行威胁利诱，曾说：只要不发表宣言，公使馆可以撤走，各地外国神父可以不掌实权，可由中国神父掌握……等。后来看到发表宣言不可阻挡，又指使公使馆一等秘书陈哲敏等人对起草的宣言进行种种限制与篡改，如提出在宣言中不得反对于斌主教，不得反对美帝国主义，不得提及罗马教廷的“教宗圣统”等等。而当时部份教徒由于长期受严重的神教思想禁锢，加上黎培里的挑拨与阴谋，他们对梵蒂冈尚存有幻想，对黎培里等心有顾虑，所以有的教徒白天签了名；晚上又去否定，白天在会上揭发控诉，表示支持三自革新；晚上又去教堂请求赎罪，斗争形势很为复杂。但李维光不顾阻挠，冲破重重阻力，政府也动员各方面力量做教徒的思想工作，终于在 1951 年 3 月 31 日将此宣言在南京《新华日报》上发表。它表明了中国天主教徒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决心，受到了南

京市广大人民、各民主党派、各宗教团体的热烈欢迎。同时由于南京教区反帝爱国宣言的发表对推动各地如安徽、武汉、上海、北京等地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的开展，起了一定的影响。

1951年上半年，随着政务院关于《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的文教救济机关、宗教团体登记条例》的贯彻及帝国主义分子控制的圣心儿童院、慈爱育婴院残害中国儿童事件的揭发，1951年4月26日，李维光等123人发表公开信，拥护政府接办“圣心儿童院”并要求政府严惩残害我国儿童的帝国主义分子，进一步提高了反帝爱国的自觉性。

“天主教南京教区爱国宣言”发表的当天，黎培里竟发出致中国天主教各教区主教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反对中国教徒“三自”革新的爱国运动，还表示“深为悲痛”；“不能赞同”并说“这是敌人的诡计”。煽起了一股反动逆流，有些教徒在此影响下也认为此宣言是“叛教、裂教”，“侮辱神长”。在南京部份教徒思想中产生混乱，但爱国的神职人员及教徒一致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分子干涉我国内政，是利用天主教侵略我国的铁证，他们坚决支持反帝爱国的正义斗争，要求政府将黎培里驱逐出境。这使李维光进一步认识到黎培里的反动面目，而爱国教徒的热烈支持更增加了他反帝爱国的信心。1951年上半年，他与孙持芳、汪皓等爱国教徒在南京教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驱逐黎培里的签名运动。当时参加签名的神职人员和教徒共750余人（约为当时南京市教徒人数的70%以上），在1951年6月24日的南京《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以李维光为首的驱逐黎培里的签名信，当时重庆、天津、上海等地的天主教界人士也纷纷来电来函表示声援与支持。《人民日报》在1951年5月25日发表了《决不能容忍》的短评。江苏省及南京市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纷纷举行集会，抗议和声讨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的罪行，支持南京教区的反帝爱国斗争。南京市总工会、妇女

联合会、市农协等组织也相继发表声明，支持天主教的反帝爱国斗争。上海万余基督教徒举行控诉大会，支援爱国的神职人员及教徒驱逐黎培里出境。这时李维光又筹备组织驱逐黎培里的示威游行，当时黎培里曾派他的秘书向李维光进行利诱威胁他所控制的亲信在教徒中竭力散布“反对黎培里就是反对神长”，“签名就是犯罪”。而爱国教徒在政府支持下，发扬了顽强的斗争精神，反复耐心地做其他教徒的思想发动工作，揭露和批驳了帝国主义分子种种欺骗、恫吓伎俩。李维光在广大教徒支持下，坚持反帝爱国立场，于7月25日在南京举行了驱逐黎培里的示威游行大会。会后全市700余名神职人员和教徒以及各界支援队伍2000余人，在李维光带领下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的示威大游行。队伍经过南京市中心新街口广场时，南京市抗美援朝分会和南京市政协负责人看望了游行队伍，沿途各机关、团体、工商界人士设立鼓动站、茶水站，表示声援和支持。南京基督教知名人士、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亲自端茶送到游行队伍中，金大校长李方训带头高呼驱逐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出境。当游行队伍经过黎培里的公使馆时，李维光率队高呼口号，把大字标语贴在公使馆门上，同时发表了不能容忍帝国主义干涉我国内政的讲话。1951年8月4日，南京市军管会接受人民群众的严正要求，发布命令，驱逐反对中国天主教徒贯彻“三自”爱国运动的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出境。

南京市的反帝爱国运动也冲击了教会圣教法典的规定和束缚，以实际行动否定了教会规定的“不许参加共产党的活动”，“不能向政府反映情况、靠拢”等规定，对解放初期神职人员的思想解放、对教会的改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李维光还在教理上教育神职人员，他曾用拉丁语宣讲“人民的声音即天主的声音”，“爱国是我们应尽的本份，缺少这个本份就是犯罪”等。使得神



职人员在反帝爱国运动中得到了理论上的根据，从而增加了他们积极参加反帝爱国的勇气。

1951年12月15日，南京市举行天主教第一次代表会议。会议选出李维光、孙持芳、汪皓、王性天等23人为委员的革新运动促进委员会。从此，江苏各地教区的革新运动也蓬勃地开展起来。

1952年，由于李维光靠拢政府，打击了帝国主义分子黎培里，罗马教廷进一步对他施加压力。罗马教廷传信部于1952年2月1日作出决议，发布摘除李维光神权的“绝罚”命令，由龚品梅集团秘密向李维光传达。命令指出：“宣判你已受到绝罚，但是圣教诚恳地希望你及早回头，认识自己的错误”；“做相当的补赎，补赎你所犯的罪并向南京总主教区管理主教大人（指龚品梅）求赦罪，他是唯一有权赦免你这个罪人的”，“否则……你将受到永罚的惩处”。企图迫使他向教廷屈服。有些神父、教徒也认为李维光是大逆不道，早已受法典的自降罚了。上海、南京教区一些神父不承认他是主教，弥撒上台，都一哄而散。亲戚好友来信也对他进行责备。开始参加签名的王性天神父（南京天主教革新运动委员会委员）不久也屈服于龚品梅来反对他，龚品梅集团并向李维光威胁利诱。他们开始采取软的办的，劝说李维光办个手续，承认宣言不出于其本心，是别人强加于他的，另外从经济上收买他。当时李维光的思想一度陷于极度的紊乱，心境非常痛苦，但他在政府的帮助与教育下，广大爱国神职人员及教徒的支持下，并没有屈服于这些威胁，没有向龚品梅集团投降，终于挺起身来，继续坚持反帝爱国的道路。他无视梵蒂冈的“摘神权”的非法处分，抵制了罗马教廷的命令。李维光是第一个抵制“绝罚”的主教，他的反帝爱国立场对其他神职人员的反帝爱国起了良好的作用。驱逐黎培里后，全国各地站在反帝爱国运动前列的天主教徒，没有被“绝罚”、“摘神权”、“停领圣体”等宗教处分所吓

倒，是中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史上十分光荣的一页。

在这几年中，李维光去过杭州、苏州、徐州、芜湖、蚌埠各地访问。也接待来自哈尔滨、福建、杭州、徐州、芜湖、蚌埠、上海的教友，相互座谈交流，他劝告各地神父、教友反帝爱国是正义的、必要的，绝罚是无效的。打破他们的顾虑，从思想上帮助他们提高反帝爱国的自觉性。

1954年，李维光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这是当时天主教中唯一的一位神职人员当上全国人大代表的。在人大会议期间，李维光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说：“啊！你就是李维光！”使他深受鼓舞。

积极参加反对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当黎培里被驱逐出境后，梵蒂冈教廷通过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龚品梅等人来控制中国天主教。任命龚兼任南京教区和苏州教区主教，并向龚提供大量金钱，以收买南京教区反帝爱国力量，蓄意搞垮这个爱国爱教的据点。龚品梅忠实执行梵蒂冈打击李维光的指令，他见罗马教廷的“绝罚令”并没有使李维光屈服，于是他一方面将无锡总铎区（原属南京教区）划归上海教区，又派人控制丹阳、常州各堂，积极向南京教区推行“蚕食”政策。

1954年2月，又将陶吴的李少灵、丹阳的张博鲁、花家渡的崔学孟、常州的李玉符、戚墅堰的魏天爵等各地本堂神父都叫到上海去做补赎，并不许再和南京往来。当时纪元凯神父来南京时竟不敢称李维光为副主教，握手时只是呵、呵！呵的。龚品梅集团后又委派无锡总本堂神父康世诚为南京教区地下副主教，以打击、排挤李维光，逐步取而代之。另一方面，不断派遣与李维光“有交情”的神父来“规劝”李。并向李维光手下的神父王性天、呼玉琳、范伯录等威胁、收买。他们还在教堂内外散布“李维光被罗马教廷绝罚无神权了”，以此来打击李的威信，破坏正常的宗教生

活。1953年圣诞节，他们大搞圣母游行。1954年圣心节，他们在佘山有计划地搞朝圣活动，企图分化瓦解爱国反帝力量，进而迫使李维光屈服，打击革新运动。而当时政府对李维光却大力支持。1954年，李维光被选为第一届人大代表，并进一步肯定他的反帝爱国正义行动，1955年9月8日，上海市公安机关在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教徒的要求和协助下，破获了这个反革命集团。李维光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他曾安排江苏的康世诚、杨邻德二位神父常驻上海，他们利用上海的关系，争取上海教区的神职人员分辨是非，共同来反对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李维光还在安徽、浙江等地传播反帝爱国理论及写文章，为瓦解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组织力量。1960年3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个反革命集团举行了公开审讯和宣判，首犯龚品梅被判处无期徒刑。

李维光常说：“摆脱梵蒂冈的控制是我们当前重要的任务。”他一再强调：“摆脱了梵蒂冈的控制，不能没有头”，“中国天主教应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教务机构”。1956年，李维光联合各地主教，如上海的汤历道、北京的李君武，向中央建议成立全国天主教爱国组织，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总理亦曾约请李维光等37位天主教著名人士在北京商讨成立筹备天主教爱国会组织事项。李维光此时常在北京进行全国天主教爱国会的筹备工作。1957年，在全国天主教代表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

1958年3月14日，南京教区全体神长在南京石鼓路天主堂选举李维光为南京总主教区正权主教。3月19日，举行了新主教宣誓就职典礼和庆祝大会。上海市天主教友爱国会筹备会主任胡文跃，苏州、海门、蚌埠等教区主教、副主教、代主教、神父，以及芜湖、安庆、合肥、徐州、扬州、海州等地神父、修女、教徒代表100多人特来参加盛典。李维光在圣体台前当着全体神父、修女、教徒隆重宣誓：愿为天主光荣，为祖国繁荣富强，为圣教会

真理的显扬而竭诚尽忠。1957年1月15日，在南京石鼓路天主堂举行为李维光等南京、苏州、海门、徐州教区四位主教的祝圣典礼，主礼是皮漱石总主教，襄礼是赵振声主教和王文成、易宣化、李道南主教。

1958年以后，李维光带领全省天主教神职人员贯彻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推动全省各教区自选自圣工作的进行。

10余年来，李维光在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中一直站在斗争的前列，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 马相伯

晓 荣

爱国老人马相伯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爱国民主人士，也是一位有民族自尊性和正义感的天主教徒。他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不惜献出自己的全部家产，为祖国的富强，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奋斗不息，直至临死前还惦记住抗日战事。中国共产党在马相伯先生百龄大庆时的贺电称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

马相伯的原名志德，字斯臧，又名钦善，亦名建常。改名良，字相伯，别署求在我者，晚号华封老人，祖籍江苏丹阳，1840年4月7日，诞生于江苏丹徒。又名松岩，是位儒医，以教书、行医为业，还开过药铺和米布店。母亲沈氏，贤明识大义，对子女管教甚严，自家勤俭节约，对亲戚有困难，必给予救济。

马相伯的父母世奉天主教、他生后不久，便受洗礼，教名若瑟，故又号若石。他5岁入学，先读天主教的经典，然后读儒家书籍。又由于受了天主教的影响，他认为天子和泥土并没有贵贱之分而泥土比黄金更有用他说：“我后来的人生观与宇宙观皆从这时顺着这种倾向发展出来的。”他读书时对于儒家经典的繁琐考证不感兴趣，而对气象运转喜欢寻根究底。他指着月日：“我识汝，汝不识我 汝不我若也。”又问父老：“月活耶 死耶 月生何处？”12岁时背着父母到上海，经友人介绍到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徐家汇设的依纳爵公学（后改徐汇公学即徐汇中学）就读。

马相伯在依纳爵公学读书期间，由于天资聪颖，学习勤奋，对自然科学感兴趣，特别是数学。他在晚年时曾对人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我研究数学几乎发了狂，夜间睡觉，仰视帐顶，都隐隐约约地出现了许多数目字。梦中也发现四处都是数目式的公式。”<sup>14</sup>岁时在校内助教国文和经文，使他进步更快。15岁时开始学习法文与拉丁语，成绩优良，多次受到奖励。18岁时，法国领事馆请他去当翻译，他毅然回绝说：“我学法语，是为中国所用。”继续在校学习。

马相伯23岁进耶稣会在上海设立的初学院修道。2年后，他在初学院学习期满，进入大修院学习哲学和神学。30岁时得神学博士，并加入耶稣会，授职为司铎。不久，他奉命耶稣会长命去安徽宁国、江苏徐州等地传教，2年后，耶稣会调马相伯任徐汇公学校长，兼管教务。他在工作之余，继续研究数学和天文。马相伯对教学十分认真，尽管他对孔子持批判态度，对学生仍然注意讲解中国的经史子集。学生中考取秀才的很多，耶稣会怕他把学生变为异教徒，1885年调他专任研究天文的职务。但那时徐家汇天文台只有一台利玛窦用过的旧仪器，无法进行研究。马相伯被迫专攻数学，他把中西数学融会贯通，著有《度数大全》120卷，可教会不予印行，书稿逐渐散失。耶稣会对马相伯仍然不放心，2年后调他到南京任教理编撰。马相伯感到在耶稣会内不可能对国家有贡献。便毅然脱离耶稣会，但仍然信仰天主教，回到上海。

马相伯目睹传教士在天主教内之所作为，感到痛心，忧心忡忡。他给刘少坪信中指出：“中国教务，自来主教会长等等，皆西来教士。近则西官每多干涉，凡属某国修道会者，某必用某国主教与会长矣。”为改变这种状况，他提出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主教与会长等等既等断绝俗情，来华传教，何妨按国籍法，改为中国国籍，则不含该教士本国政府之臭味。”即完全脱离其殖

民主主义帮凶之地位。另一个根本办法，就是教会完全摆脱殖民统治，由中国自己来管理，“应栽培华铎，能为一方教会之主任。如同宗徒所为者。不当使中国教会，常为寄生物，殖民地之类也。……何以英之教会，现皆英人耶？疑忌华者，争教权耶？争国力耶？”<sup>29</sup>他明确地指出：宗徒时代，传教到那里，就培养那里的神职人员或教友来管理自己的教会。不让中国人管理自己的教会，传教士硬把持着中国教权不放，究其原因：或是背离宗徒传统精神，争教权，或者是为他们国家扩张殖民主义势力，绝不存在第三种原因。

马相伯对传教士在教会内实行殖民统治，把中国神职人员作为他们的仆从，讥刺我国朝政提出了十分严厉的责斥。1918年11月18日，罗马教庭巡阅使光若输发出《致天津华铎书》对爱国教友参加“五四”爱国运动横加干涉，马相伯在上面写了许多批语，认为爱国是正义行动，不应该受到干涉，他写到“光所告华文廿二条，拉丁文廿八条可见绝非原文。……，于此切要之条，尚含糊如此，葫芦中恐带着某国民之性质也，津铎似以不答是，视为西来之客教，而权在洋官也。”表示他对天主教徒参加爱国运动的关切和支持，同时以“带有某国之性质”、“权在洋官”二句，指出这是外国对我国内政的干涉。

马相伯一生还翻译了大量的教会书籍和出版了他自己编写的宗教书籍。如《救世福音》《新史合编》20卷，《灵心小史》、《五十年来之世界宗教》、《圣经与人群之关系》、《宗教之关系》等书籍。

1900年，马相伯从欧美回国后就决心创办大学以教育救国。他说：“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其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者，请归我。”他还希望“借拉丁文沟通泰西学术之

源流”，今后出现“炉锤东西两大帝国文章政治成一家言，以金碧辉煌我国土”的学者。这时马相伯已年老力衰，怕不能实现办学的愿望，就把兴学的愿望寄托在教会身上，捐献给天主教耶稣会属于自己名下的祖遗产良田3 000亩，为将来教会开办中西大学堂“专为资助英俊子弟斧资所不及”。不料，耶稣会接受了马相伯的财产并不办学。

1902年，南洋公学学生反对学校当局的专制压迫，200余人高呼“祖国万岁”，集体退学，退学学生请求中国教育会负责人蔡元培协助组织“共和学校”，蔡除了与中国教育会协助退学学生建立爱国学社外，又介绍一些学生到马相伯处求学。马相伯欣然允诺，创立震旦学院，“震旦”意为中国之曙光。震旦创办之时，一无校舍，二无师资。马相伯借天主教徐家汇天文台余屋为校舍，并聘请耶稣会教士为教师。为办好震旦马相伯不仅献出自己所有家产，还将属于长兄马建勋的土地充当基金。并将现洋40 000元和英法租界的八处房地产来建筑校舍。为实现教育救国之目的马相伯宣布了3条办学信条：一、崇尚科学；二、注意文艺；三、不讲教理。并在学校实行学生自治，每周开讲演会，宣传民族复兴，爱国主义，并借学院保护了一些反清志士，其中最著名的是于右任，马相伯让他以刘学裕的假名考入震旦学院以避清廷迫害。

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中的一些人阴谋夺取震旦的领导权，他们趁1905年马相伯病重时期。制造了一连串的事端，他们取缔了学生委员会，任命了传教士南从周管理学校。南从周在夺得学院的领导权后对校政横加干涉，“尽改旧章”妄图改变学校的性质。震旦学生见此情形，极为愤慨，决议全体退学，摘下校牌全体离校。马相伯闻之愤慨万千，扶病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毅然和学生一道退出震旦，他召集离散学生，并与严复、熊季廉、袁观澜



等筹备复校。又请两江总督周馥协助，周馥拨吴淞营地为校资。以万金为开办费，并向社会各界募捐，得到社会各方支持。正当此时，法国徐家汇天主堂抢先宣布震旦学院于七、八月开办。马相伯等被迫改校名为复旦公学。所谓“复旦”不仅有复我震旦的意思，而且和我国古诗“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意思相吻合，它表现了中国人民充满希望的浩然之气。8月中秋节复旦正式开学，马相伯亲任校长。在他们的领导下，学校本着“发展科学，学以致用”的务实精神。”全体师生不怕困难，自强不息，一间房子又做教室，又做饭厅。马相伯不顾66岁高龄，自告奋勇教授法文。他特别爱护青年，毕生希望于青年。他和同学们亲密无间，但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不足之处，决不容情。

马相伯不仅自己办学，并尽力协助其他人的办学事业，他把历年来自己积蓄的薪金10 000元捐献给了启明女中（上海市第四中学前身），英敛之先生在北京创办辅仁学社（即辅仁大学前身）、黄炎培在上海办中华职业学校，马相伯都极力赞助。

马相伯办学，完全出于爱国热情，他着重知识，乐育英才，尝言：“不读书不足以救国，不研究深邃科学，更不足以救当前之中国。时过境迁，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马相伯的高瞻远瞩，已为历史所证明，是十分正确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东三省，马相伯已90岁高龄，他深感国家危机，救国有责。于是不顾年老体弱，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发表演说，书写文章，号召全国团结一致，呼吁人民起来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他在《为日祸敬告国人书》中提出全国人民“自赎自救”、“立息内争，共御外侮”、“对内绝对不许枉费一枪一弹，对外必要不许吝惜一枪一弹”。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

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华战争实行不抵抗政策，诋称等待国际联盟调查。马相伯著文反驳指出：“国联之物本与日本同其臭味，同其实质。”依靠国联是“与虎谋皮，自取其辱”。他号召青年不必去南京请愿，而要深入到农村去，唤起民众，组织民众。

日本政府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时，马相伯奋书“还我河山”4字，并手题：“一周年间，河山变色，如此奇耻大辱，国人应奋起自救，不还我河山不止！”并到处演讲。主张人民自治，抵制日货，并为抗日义勇军募捐。对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非常不满，曾经说过“终身委员长”，就是皇帝。委员长又做了这许多年，失地也失得不少，难道委他的人民不应该有所表示么？”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几个月后，马相伯在上海响应北京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领头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为国内最早的救国运动。1936年，马相伯与宋庆龄、何香凝、沈均儒、邹韬奋等人组织了上海各界救国会，简称“上海救国会”并任理事，后又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委，常在他所居的小楼上举行常委会。真如他在《松沪御日血战大画史序言》中说：“我虽年迈，一国民也，数十年来之经历，凡关于福国利民，如拒毒，如救灾，如废止内战，如提倡国货，如研究科学，如创办学校。如倡人民自治，悉本道之精神，求为真理而努力。”他主张团结各党，一致抗日，他曾对《新世纪》记者讲：“须团结一致、为祖国奋斗之各党派，各团体一致救亡，这是洗雪国耻唯一道路”当时有人问过马相伯：“您是信仰天主教的，是有神论者，而共产党是无神论者，您为什么不主张打共产党呢？”他回答说：“信仰是各人的自由，不能互相强迫的，可是要记着国家是大家的，应该懂得‘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理。老实说共产党还很爱国呢。所以我一直大声疾呼，现在国难时期，如不立息内争，共御外侮，则国亡无矣！”他

岁时又发表了《停止党争，一致对外》一文，在各大报发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日军进攻上海，马相伯在上海沦陷前撤退到桂林。黄炎培先生曾三次去探望他。每次探望，马相伯必问战争情况并“大说日本必败”。1938年11月1日，于右任又请他迁居昆明，在迁居途中因病留越南凉山。1939年4月正值马相伯虚龄百岁。上海复旦同学会为马相伯举行招待会，马相伯从越南凉山给他们的信中写道：“国无宁土，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落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寥寥数行、反映出老人忧国忧民的沉重心情。当他临终弥留之时，握着孙女的手嘱咐说：“我死后，你快回去，上前方参加抗日，不要忘记我们的国家正在受难！”

1939年11月4日，马相伯不幸在越南凉山与世长辞。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同志于11月9日联名电唁马相伯家属，唁电如下：

河内总领事署转

马相伯先生家属礼鉴：

惊悉相伯先生于本月四日，遽归道山，老人星黯，荡海同悲，遗憾尚多，倭寇未殄，后死有责，誓复国仇，在天之灵，庶几稍慰，特电驰唁，敬乞节哀。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

重庆《新华日报》于1939年11月6日发表题为《悼马相伯先生》的短评指出：“马先生早年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晚年目睹日寇侵略加紧，民族危机严重，为救国事业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数年前马先生以稀有之高龄，在上海那种恶劣环境下，策励青年，为团结抗战而奋斗，其英勇振奋之气概，至今尤历历在人耳。马先生热心爱国家爱民族的，是永远有着青年人奋斗精神的。我们追悼马相伯先生。要学习他这种精神，为中华民族解放而奋斗到底。

# 邵镜三传记

## 杨秉诚

邵镜三先生，1902年生于江苏南京，歿于1958年，生前是中华基督会的领袖，也是中国基督教中的上层著名人士。

邵先生出身贫寒，但聪明过人。幼年在苏州苦儿院读书 5 年。毕业后考取南京基督会办的育群中学，第二年受洗入基督教。在校期间，由于成绩优良，年年获得奖学金。1919年，中学毕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金陵大学，同样，也能年年获得奖学金。

1923年，金大毕业后，先生立志要做传道人。于是，中华基督会保送他到金陵神学院读神学。课余时，先生刻苦钻研哲学和心理学，热爱宗教教育事业，并于1925年，在中华基督会的江安年议会上，以《儿童三期之特征》为题，作两次演讲。根据儿童 3 个时期 3 不同特点，提出一系列实施宗教教育的方法，受到与会代表的好评。谁知，这就打下后来他长期从事宗教教育工作的基础。

1926年，先生获神学士学位毕业于金陵神学院，到基督会南京花市教区做传道人，任该教区宗教教育干事兼育群中学校长 4 年，施展他办学才能。这期间他与该会主办的中华女中教师鲍富年女士结了婚，并在他出国深造之前，被按立为该会的教师。

1930年，基督会的传教士吉爱梅女士出资 500 美元，帮助他到美国耶鲁大学深造，专攻哲学，于193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学

成归国，时年 32 岁（出国深造期间，同样是年年获得奖学金）。

学成归国后，正值中华基督教会需要华籍领袖人才的时候，而邵先生论学识、论修养、论宗教知识的造诣，在当时的基督教会中是少有的。因此，从 1934—1937 年 3 年时间内，他逐步被推上该会的领导层。在 1934 年和 1935 年两年的年议会和评议部会议上，他先后被选为评议部委员（评议部是该会最高决策机构），干事部（该会主持日常工作的机构）干事，开始走上该会的领导岗位。

由于他在年议会和评议部会议上，先后提出对该会宗教教育事业与培养领袖人才的意见和治理改进该会所属各学校的计划，受到代表们和委员们的重视，遂被任命为该会专司宗教教育的干事，同时又被选为该会出任中华基督教宗教教育促进会的委员，参与全国性的基督教办学工作。

1936 年，他又接受金陵神院的邀请，为该院宗教教育系义务讲师约 1 年，后因工作太忙而辞去。

1937 年，基督教会的评议会又推选他为该会出席 1938 年在印度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代表，参加了国际性的基督教会议。

抗战爆发后，在“金女大”工作的邵夫人带着孩子随学校西迁，而滞留在合肥的邵先生直到南京失陷后才于 1938 年转道去成都。在“华西”六、七年中，他专任中华基督教宗教教育促进会的干事，把大部分精力，从事在非常时期宗教教育协调促进工作上，同时又兼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干事，兼顾中华基督教会和华西的委员和干事之间的联络工作。

1943 年 5 月 22 日，在重庆他又应邀参加中国宗教徒联谊会成立大会，当选为理事。

1945 年下半年，日寇被迫无条件投降以后，基督教会苏皖各教区的工作也正处于百废待兴之时，该会遂于 1946 年 3 月在南京召开第一次理事会，决议聘请邵先生为该会代总干事，负责领导

该会的全面工作。从此，实际上他成为该会的领袖。

接任以后，邵先生一面同国民党政府交涉收回被占用的房屋，一面向全国基督教教育协进会求来紧急援助，积极筹办所属各校复课事宜，一面又汇款给在华西的委员干事们促他们早日东归工作，一面又要筹划东归人员人事安排问题。此外，他主持了该会救济工作，救济该会在抗日战争中蒙受重大损失的人员，他还积极处理下属所提出的急需解决的事项，真是千头万绪，但他能处理得有条不紊。同时，他又亲自兼任鼓楼教区的教牧工作，主持筹划该会主办的青年夏令营活动，显出了他的办事能力。

同年，该会理事会又推选他出任金陵大学的校董，中华基督教全国协进会公办（几个派别合办）学校教育委员会委员，继任中华基督教宗教教育促进会委员。在基督会外，中华基督教全国协进会续聘他为干事，南京市基督教协进会又推选他为执行委员兼事工推进委员会主席。

1947年初，在中华基督会理事会上，他被推选为该会出席世界基督教宣教协进会议的代表。当年6月，他动身出国至加拿大参加会议。会后，他逗留美国数月，作募捐演讲，为该会拟议中的“奋进运动”“募集基金。回国后，被正式任命为总干事，成为该会名副其实的领袖。

那个时候，鉴于邵先生长期服务于宗教教育事业，有一定的经验，1948年6月，中华基督教全国教育协进会特致函邀请他参加在7月30日—8月5日召开的基督教高等教育会议，研究教会大学的办学事宜。邵先生应邀至上海参加了会议。

同时，由于邵先生在中国基督教有一定声望。1948年，蒋介石捐款建筑的“凯歌堂”在南京中山门外落成，特邀请先生主领献堂礼拜。先生以“圣殿三柱石——信、望、爱”为题向参加礼拜的听众（包括蒋介石本人在内）证道。

同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亦请他主领词拜；10月，中华基督教总会总议会在苏州召开第五次年议会，特函请邵先生为大会的特约讲员。后来，又被推选为南京市基督教协进会主席。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基督教的有识人士，对“西差会”通过西教士和金钱长期控制中国教会的现状极为不满，深深觉得只有摆脱西差会的控制，割断与他们的一切关系，实行“自治”、“自养”、“自传”即独立自主由中国自办教会，才是中国基督教的唯一出路，才能洗刷百余年来因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加给中国教会屈辱的历史。邵先生在中国教会服务20余年，对此更身有感受，于是毅然投身到中国基督教的“三自”行列，发起并推动了中国基督教的三自革新运动。

在1950年中，邵先生曾四度去上海分别参加“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执委（扩大）会议”、“中国基督教团体行政人员会议”和“中华基督教宗教教育促进会年会”等一系列会议，讨论如何发动中国基督教的三自革新运动，并于当年六、七月间在沪亲自参与拟定《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这一历史性的文献（即“三自宣言”）成为“三自革新运动”的全国40位发起人之一。

在南京，先生又主动联合全市基督教团体，发表了《南京市基督教反对美国侵略朝鲜台湾的宣言》，又主持成立了“南京市基督教团体保卫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还在南京市基督教控诉、揭露美帝分子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罪行的大会上，积极发言，揭露美帝国主义分子侵略罪行，义正词严地驳斥美国驻安理会代表奥斯汀于1950年11月22日在联大诬蔑、诽谤、侮辱中国人民的发言，深深地教育了群众。他的发言还全文刊载在当时的《新华日报》上。

1950年底，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处理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方针的决定》并于1951年4月在北京召开

处理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制定《对于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处理办法》，邵先生不仅代表该会参加了会议，而且参与发表《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的联合宣言》，郑重宣布：完全彻底地割断与外国差会的一切关系，实现中国基督教的自治、自养、自传。

在这两年中，先生曾两次到该会所属的南通、滁洲、三河、无为、合肥、芜湖等教区做工作。第一次传达周总理接见吴跃宗等基督人士的谈话精神和中国基督教代表团出访友好国家的经过，号召信徒拥护三自革新，积极抓在“三自宣言”上签字。第二次传达北京会议精神，推动该会各教区的财产登记工作，并提出5点实现教会自养的规划，要求各教区自1951年1月1日起，割断与差会的一切关系，拒绝接受任何外资津贴。

同时，先生又参与教会组织的联系实际的爱国主义学习，清算自己和信徒头脑中的崇美恐美思想，树立爱国爱教一致性的观点，热爱新中国。在此基础上，南京市基督教于1951年8月召开第一届三自革新会议，选举产生了南京市基督教第一届三自革新促进委员会，陈鹤琴教授当选为主席，邵先生当选为副主席。之后，邵先生又当选为南京市基督教团体抗美援朝支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南京分会监委。

随着三自革新运动的深入发展，原华东地区由西差会办的八所神学院三所圣经学校的负责人，经过充分商讨研究，决定为把十一所院校合并为一所“金陵协和神学院”，由中国教会独立自主地在南京主办，吴耀完先生当选为董事会主席，邵先生当选为副主席。

这所神学院成立伊始，全国教会舆论毁誉不一，不少人怀疑、观望。而邵先生却在《金陵神学志》的创刊号上著文热情洋溢地赞颂这所神学院。他说：“这是革新运动中的一项重要成就”，



“对帝国主义是一个有力的回击”。又说：“过去帝国主义控制我们，分割我们，革新后，我们焕然一新，发扬了基督的‘彼此相爱’、‘合而为一’的精神”等等，有力地支持了新生事物。

1952年10月，邵先生两次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愤怒谴责、声讨美国侵略军在朝鲜和我国东北使用灭绝人性的细菌武器的滔天罪行，并热烈庆祝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保卫和平大会在北京胜利闭幕，表示坚决为实现和平会议通过的决议而努力奋斗。

1954年7月，中国基督教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正式宣告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选举全国第一届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先生为选为常委。

由于解放后，他一直要求进步，在南京及全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中起积极作用，作出一定的贡献，先后被选为江苏省第一届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及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7年，党在反右运动中，出现“左”的偏差，造成严重扩大化的错误，而邵先生也因此不幸身亡。

邵先生生前是中华基督会的领袖，基督教中的著名人士，但为人谦和，没有一点架子，而且对人宽厚，关心所属教会每一个同工乃至教友，谁有困难找到他，他都能真挚地尽力帮助，被誉为教会的好牧长，所以人们深深地怀念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基督教“三自”组织刚刚恢复活动。1980年7月，南京市党政有关部门郑重宣布给邵先生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基督教“两会”组织及南京市广大教徒在莫愁路堂举行隆重的追思礼拜，以寄托对他的哀思和深切的悼念。

# 李青辉长老

郭润宇

李青辉，字旭东，1883年生于陕西蒲城东乡翔鸾村，清末受廪祿。其祖辈务农兼商。因其家道小康有余资而染鸦片恶习，沉沦消极。1913年某日，在县城见基督教教士扛“今日礼拜”的旗子，摇铜铃劝人去参加礼拜。出于好奇，随扛旗教士去南观音庙巷的礼拜堂去听讲。不久，成了一名基督徒，戒了大烟。

后来李青辉去基督教会办的崇正小学去教书，发现外国传教士趾高气扬，看不起中国人，甚至不许学校挂中国国旗；出于爱国义愤，与教友原振之（1905年加入同盟会）交谈。原与李认识相同，并说：“我正因为如此，现在不但不去参加礼拜，甚至连教会的人也怕见面！”原还把他订的上海基督教自立总会办的《圣报》让李看。该报有时改报道，如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等。原、李二人为了摆脱洋人控制，决定在本县也办一个基督教自立会，逐步夺回教权。他们去信与上海总会会长俞国祯联系，俞寄来《基督教自立会宪章》。该《宪章》规定基督教自立会的宗旨为“弥中外之交涉，增国家之体面，夺回教权，发扬教义，挽救中华民族之危运。”据此，原、李二人联络教友原逢春等共同发起，于1916年成立了“蒲城县基督教自立会”，推李青辉为自立会长老，原振之、屈载臣为执事，原逢春为管理。诸发起人捐地100多亩，以地租收入作会费，会址设于蒲城县城大人巷王家祠堂。教友很快发展到100多人，还办了一所明德小学。与此同时，西安、三原等地也成立

基督教自立会。后来全国基督教自立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李青辉被选为该会陕西省的代表，前往参加，并于会上作了充满爱国激情的发言。他说：“我从陕西来什么也没有带，只带了一身陕西的土布。希望全国在很短时期内，拿土布代替洋布，更希望不久能以中国本色教会代替洋教，挽回教权……。”其发言，引起与会诸多代表的共鸣。

这次会后，全国基督教自立会总会任命李青辉为陕西区基督教自立会董事，并发了委任状。后来李青辉参加了支持孙中山革命的组织——太平洋后援会和自立会的“拒毒会”（戒烟组织）。“五·四”运动后，李青辉订阅了革命通俗刊物《新生活》。该刊常发表李大钊等革命先驱的文章，使李青辉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李青辉为了使群众不忘国耻，奋发自强，编了一本《外交惨史记略》，记述了从葡萄牙租借澳门到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 21 条卖国条约的国耻史，写出了中国多年被侵略遭掠夺的苦难经历。该书封皮上写着：“有中华民国公民资格者不可不读，有祖先父母坟墓者不可不读，有妻子儿女者不可不读，有教育之责者不可不读，有宰国治民之责者不可不读。”用木板刻印，分发给各省、县政府，各地缙绅（按当时的缙绅名录）及海外华侨。上海《圣报》也全文发表。李青辉又采取通俗浅显的说唱式，编了一本《外交惨史俚言》，一开头就写道：“急忙把众同胞一声呼唤，再莫做黄粱梦把国耽延。且莫说国有伤为民办，岂不知国与民一体相连。我也是效摩西<sup>①</sup>拯众志愿，我也是效保罗<sup>②</sup>救犹太一国人焉。”李青辉还常带自立会的学生，去文庙前宣传国事。

圣经《出埃及记》载，摩西率在埃及为奴的犹太人迁回迦南、并在西奈山上接受上帝写在石板上的“十戒”。

② 据《新约全书》记载，保罗把基督教传到小亚细亚和希腊，罗马等地，最后被罗马皇帝杀害。

基督教自立会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信徒与日俱增，而瑞典传教士胡林德主持的福音堂参加礼拜的人却越来越少。一些人讽刺胡：“说你教养的不好，领洗入教的人也不少；说你收养的好，一个一个都自立了！”胡林德看到基督教自立会的势力压倒了自己，便采用卑劣手段对付基督教自立会。他向县政府控告李青辉是“排外党”、“暗杀党”、“洪秀全之余波”。腐败卖国的军阀当局，终于依照洋教士的意愿，于1920年初将李青辉逮捕入狱，并没收其书版。反动知县审问他是不是“排外党”、“暗杀党”等，李青辉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地说：“我是排外党 我就是为了挽回教权，誓雪国耻，把教权和政权都掌握在中国人手里。说我是暗杀党，我没杀过一个人，但希望把卖国贼和羊皮下的狼都杀完！说我是洪秀全余波，洪秀全把树栽了没有浇活，我继续来浇这个树！”反动知县生怕得罪了洋大人，对其俯首贴耳，以暗杀党罪名，将李青辉判处死刑。基督教自立会的其他领导人原振之等，将此案反映给上海基督教自立总会。总会一面向北洋政府外交部交涉，一面将此案在《圣报》公布，题目是《李青辉为国被囚，破产绝食，大有中国保罗气概！》新加坡华侨彭照君看到后，写信在《圣报》上质问瑞典传教士胡林德：“你既本基督教救黎民之旨 即就是李青辉得罪了你，应该以教义来处理，你为何把他送上法庭 判为死刑 俗曰‘羊皮狼穿’ 谁欤？”黑龙江、河南等地教友，汇款支援李青辉。其中河南确山县射桥邹兴让，给陕西蒲城县慈善救济所兑了20元钱，信中说：“请转交李青辉长老，如李被杀，救济家属，家中无人，随意救济。”

由于各方面的营救，李青辉坐牢 8 个月后，当局被迫将其释故。李虽出狱，但其所创蒲城县基督教自立会被解散，自立会办的学校也被迫停办。李青辉并不灰心丧气，他又应河南教友之请去信阳一带办基督教自立会。到1937年，李青辉在故乡蒲城县城

东街又置了一院房子，到 1954 年盖了厅房，又挂出了蒲城县基督教自立会的牌子。不久，教友即发展到 500 余人。胡林德见搞不垮李青辉，又妄图拉拢他，打发人劝解，要和李青辉交谈。李断然回绝，连面也不愿见，并说：“我和胡林德谁是谁非，现在不谈，等来世在天父面前再评定是非！”1955 年，李青辉归天。

# 伊斯兰教学者刘智

## 郑勉之

刘智（1664—1739年），南京人，清初回族穆斯林中的“筛海（贤人）”。他的著作在中国伊斯兰教内被尊为“汉乞他布”（汉文经典），一些经句至今仍烱炙穆斯林之口。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近年来标点和重新出版了刘智部分著作，引起了巨大反响，西北穆斯林奔走相告，他们又一次体会到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温暖。

刘智出生于南京一个伊斯兰教经师的家族，父名三杰，号汉英。

在刘三杰生活的时代，伊斯兰教传入我国已有近千年的历史，生活在内地的回族穆斯林早已以汉语为本民族语言，而宗教生活中所使用的经典却依然是阿拉伯文或波斯文的原著，这就发生了普遍对经典只能诵而不解其义的不正常现象。

1679年曾发生这样的事：清康熙皇帝巡行到蠡城，这里有座清真阁藏伊斯兰教的经典，他感到兴趣，于是诏“能讲者来”，然而无一应者。

事隔3年，新疆吐鲁番使者向朝廷献经典，康熙确实想了解在国内有重大影响的伊斯兰教，于是又谕京师“能讲者来”，这次有应者，然而面君时，却只能诵而不能解。

对经典的不解，意味着教义不彰，关系到宗教的兴衰。中国伊斯兰教感受到经典汉译的需要和迫切。南京是江南历史文化名城，这里的回族经商者居多，而且几乎垄断了一本万利的珠宝玉

器行业，经济状况优裕于其他各地的同胞，因而产生了自己的知识阶层。他们往往既通儒学，又明伊斯兰教义；既精于汉文，又懂阿拉伯文与波斯文，于是被称为回儒，汉文译著伊斯兰教经典的历史责任就落在他们的肩上。于是，一时南京回儒纷纷开展学术研讨活动，气氛颇为热烈，出现了一些汉文译著。这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称“以儒诠经”活动，刘智父亲刘三杰是积极参加者，著有《清真教说》。

在刘三杰时代，“以儒诠经”活动还处于初级阶段，尚未进入宗教哲学领域。他有一定的儒学根基，通性理之学，常慨叹：伊斯兰教之性理亦甚精，恨未能汉译之，俾广昭于斯土也。

这叹息对幼年刘智影响很大，决定了他人生的道路。

刘智幼年是在父亲身边度过的，接受了良好的启蒙教育，并受到宗教的熏陶。大约在12岁时，被送到位于今太平南路附近的武学园清真寺（现已不存）学阿拉伯文经籍。经师袁汝琦亦一代回儒，在众弟子中见刘智不贪嬉戏，专心致志于读经，乃精心培育。刘智在短短的3年习经过程中，打好了阿拉伯文与波斯文的基础，为以后的译著创造了条件。

3年后，刘智年方15，就拜别经师，回到家中，开始读书生涯。凡儒家的经、史、子、集，佛家的《释藏》，道家的《道藏》，以及当时颇为时髦的“泰西之学”，无所不读；对于流入我国的伊斯兰教经籍，无论哪种文本，只要能搜集到皆潜心钻研。他在寒窗下，一读就是14年，终于成为兼通三教——儒、释、道的伊斯兰教学者。他对儒教与伊斯兰教有比他父亲更深刻的见解：孔孟为东方圣人，穆罕默德为西方圣人，“圣<sup>①</sup>之教，东西同，古同一”，因此，伊斯兰教经典也“大同于孔孟之旨”。于是，他握笔，为沟通东、西方圣人之道而著书立说了。

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也影响着回族群众。刘智学成后已近“而

立”之年，这时父亲已经去世，自己也有了家室。过去，他一心读圣贤书，家境每况愈下，有时为了购书，甚至典当衣物，亲人虽有怨言，尚有期望。如今，他已学成，亲人见其无意于功名，又不事生计，乃视之为怪物，终日与之吵闹不休。刘智为实现父亲的遗愿，毅然离家，来到清凉山，独自建庐而居。

刘智在山中一住就是20载，扫叶楼常有他的身影。在这里，他眼观日月星移，花开花落，心悟其间蕴藏的奥秘，每有所得即回庐奋笔疾书。

这20年的著述生活，可谓艰苦备尝，即以住所为例，也在山中十易其处，生活很不安定。然而他以苦为乐，著述方面硕果累累，达数十种之多，其中以《天方性》与《天方典礼》为传世之名著。刘智对这两部著作的态度十分严谨，初稿完成后，一度离开山中，携稿出游，以征询意见。他在北京访问了一些“理学名臣”，如赐进士出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徐元正，赐进士出身、光禄大夫礼部尚书王泽弘等，他们读稿后大加赞赏，认为它“虽以阐发天方，实光大吾儒”，乃纷纷作序；在山东，得到教内黑鸣凤的共鸣，认为它阐发了“吾教公理”，于是亲自在《天方性理》每章后作了注释。这些来自客观的评价，使刘智感到安慰，父亲所期望的东、西方圣人之道已得到沟通而可能传于“斯土”了。

刘智此行还征得三位乐意为付梓而捐资者，其中有那位共鸣者黑鸣凤，因此《天方性理》在1710年刊刻时称“三成堂梓”。两年后，《天方典礼》亦问世，刘智时年48岁。

圣人之道沟通了，而西方圣人穆罕默德与东方圣人孔子相比又如何呢？刘智认为，他们各是一“方”的“至圣”，然而西方至圣事迹尚未传于“斯土”，于是握笔为穆罕默德立传。

这项著述从1721年发笔，至1724年三易其稿，始有“小成”。刘智称这初稿为“小成”，是因为资料不足，内容不够充实。于是



他又携“小成”之初稿，第二次出游，此行是寻访藏于回族中的有关资料。他一行千里，终于在河南朱仙镇发现了赛氏珍藏的阿拉伯文原著《穆罕默德传》。

刘智又回到朝夕相处的清凉山怀抱。山色虽秀，而陋庐已被风雨侵袭成为断垣残壁了。他再也无法易其居处，而文思却如泉涌，在友人帮助下，躲入了三山街一喧闹的书肆小楼，熬过几个炎夏与寒冬，完成了又一部巨著——《天方至圣实录》。此时他已年逾花甲。

刘智的一生是在读书与著述中度过的，可谓平凡。然而一个谢绝人事，置妻儿于不顾，自己的一切又仰求于人，而且是终身仰求于人者，生活该是如何的辛酸和艰难啊！他没有给后人诉说什么具体遭遇，却有饱和眼泪的叹息：“人心之反复，世道之崎岖，尘纷之抢攘，毁誉之凌凌，日无宁晷，心无宁刻！”

《天方至圣实录》完成后，他抚着满是创伤的心灵，又回到清凉山中，重建陋庐。此时，他毅然绝笔，摆脱人间的纷扰，在扫叶楼的清风明月中度过10余年宁静时光，始与世长辞。

刘智以一生的辛勤耕耘，将清初发生于南京的“以儒诠经”活动推向顶峰，为伊斯兰教中国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著作满卷儒家气息，寓伊斯兰教哲理于孔孟性理之说中，也寓孔孟伦理道德观于伊斯兰教义中，为生活于儒家文化环境又保持伊斯兰教纯洁信仰的回族穆斯林群众的欢迎。刘智著作流传甚广，经久不衰，直至现代，实为出版史中罕见。历史上还有因流传他的著作而发生的一件公案。

刘智经师袁汝琦孙袁国祚，刊刻了刘智的著作，流传到在汉口开帽店的南京回族袁二的手中，袁二又赠了几本给广东崖州三亚村回民海富润。海富润携带刘智著作到了桂林，被桂林知府贵中孚查获。此时，西北回民正在起义，于是贵中孚就将刘智著作

视为“匪徒”的证据，逐级上报到乾隆御前。乾隆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清醒的，认为将仅仅携带几本宗教书籍的回民视为“匪徒”的官吏“可鄙可笑”，于是亲自作了批谕了此公案。

乾隆的批谕给刘智著作的传播开了绿灯，在全国出现三大刊刻中心，江苏的镇江为其一。回族中一些殷实富户也以刊刻赠阅刘智著作作为善举，因此版本甚多，发行量也大，现在全国一些大图书馆都能找到各种不同的版本。

由于刘智著作影响，清末民初在西北出现一个新教派——汉学派。汉学派一经形成，即发展经济，兴办教育，提倡青少年学习文化科学知识，成绩斐然，成为中国伊斯兰教内三大教派之一。

刘智墓在南京中华门外，全国穆斯林前往瞻仰者世代不绝于途，西北穆斯林尤众；瞻仰后往往去刘智著书立说处——清凉山凭吊。

近代西北著名回族军政要员，曾被中华民国政府授予陆军上将衔，特任祥武将军的马福祥，于1922年去清凉山凭吊时，曾有感于山色秀丽和刘智之伟迹，而为扫叶楼撰对联一付：

“屡开万里眸，绿树浓荫美，秀比前人图画；

山耸一枝笔，展青天作纸，书成大块文章。”

可惜这付对联，在日寇沦陷南京时被毁，遂使后人只知清凉山在清初曾有画家龚贤隐居，而不知稍晚还有一代回族鸿儒于此著书立说。

## 念经习武的阿訇

侯 铁

哈只·马延增（1910—1988），阿訇，回族，曾任吉林省人大代表、吉林省政协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委，吉林省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长春市伊斯兰教协会名誉主任。

他能文会武，是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生前，他曾给作者讲述过自己不平凡的经历。

马延增是河北省大名县马时庄人，生于1901年农历10月29日。他的父亲叫马元生，是一般庄稼人，务农为主，闲时候做糖糕（一种用烫面做的回族食品）。岁数大了以后，他在家卖粥。有一身过人的武艺。

受父亲的影响，马延增光着屁股就开始跟着拳师沙四巴学武艺。沙四巴的父亲是沙瑞，父子二人都曾在北京镖局里当过保镖，沙瑞还曾做过镖头。他们回到大名府南街教拳，分文不收，是远近闻名的大拳师。沙瑞教6路花枪，四巴教拳术。

马延增念经做阿訇是沾了他母亲一家的光。他的母亲没有官名，一家人都是念经的人。耳濡目染，马延增起小就能念上一点经。

10岁那年，马延增到马时庄清真寺当海里凡，跟着郑方瑞阿訇念经。郑阿訇先教他学习阿拉伯文，又教他念“亥听”（《古兰经》选集名）凯俩目（《教心经》）筹经文还念过“连五本”，就是五本连在一起的经。过了两年，郑阿訇又教他们念“糟”（

本经的名字)。念过经的人都知道，“念完糟，不用教；念不会糟，一辈子糟糕。”郑阿訇一共收了十来个海里凡，年龄就数马延增小，有的乡老看到他年龄小，就对郑阿訇说：“你带的海里凡这么小，还得吃奶吧！”郑阿訇总是说：“别看马海里凡年龄小，经念得多，将来不错。”

不久，马延增随郑方瑞阿訇上河南凯州（现河南省濮阳县）凯州在黄河北岸，是战国时的老城，城内有几处名胜：“一出凯州门，路过子路坟，四十五里大桑树，进到南门，还有八孔桥……。”清真寺在城的东南角。在寺里，郑阿訇白天带他们念经，晚上领他们练武。郑阿訇练的是“滑拳”。马延增在那里学会了使花枪、双戟。1年后，马时庄又请郑阿訇回去，马延增也跟着阿訇回到了自己家。

1930年那一年，马延增29岁，他在家结婚。听说他要娶媳妇，凯州的乡老给他送了贺喜的帐子、提灯、帽子，还给他做了件大夹袄。妻子叫杨二凤，结婚以后改叫马杨氏。

婚后，马延增先到山东省张鲁投学杨兆乾阿訇，又到朝城清真寺投学杨兆太阿訇，后去叶儿里清真寺投学郭繁祥阿訇。郭阿訇是马延增的表兄，曾在北京牛街清真寺挂帐，脾气不好。马延增的脾气也挺倔，给他当海里凡不到一年，他们就分手了。

马延增离开郭阿訇以后，又去七里店跟王静一阿訇当海里凡了。七里店统共有100多户回族。王静一阿訇一共收了10个海里凡，5个人轮流吃百家饭，大概是20多户人家管一个海里凡。他们吃饭念经，没有其他收入。

一次，马延增同几位海里凡上街买东西。有个行人拿出个信皮找他们问路，他们谁都不认识上面用汉字写的地址。马延增一看，不学汉字不行，连信皮上的地址都不认识。回来以后就自学汉语。念了半本《三字经》、半本《中庸》初步掌握了一些常用的汉

字。

王静一阿訇除了经学上的功夫以外，还有些医道。在七里店马延增还跟着他学了点医术。当时，人们常说：“金眼科，银外科，想找啰嗦学内科。”马延增跟王静一阿訇学的是外科，用中草药治疗痔疮，还挺管用。

马延增的启蒙恩师郑方瑞阿訇，为了使他的海里凡能在经学上能有所成就，找到马延增对他说：“我做阿訇念了一辈子经，学‘莱玛尔台’（《昭元密诀》经）这个经下的功夫最大，但学的不咋的。你去河南找李忠信阿訇学这个经吧，这个经他念得好。等你把‘莱玛尔台’学好了再回来教我。”

于是，马延增打起行李带了13本经去河南投师李忠信阿訇。李阿訇是甘肃人，经讲得好。等他赶到河南，李阿訇出去了。碰到北京天桥清真寺的冶亮普阿訇，便去北京投冶阿訇了。可是冶阿訇不讲“莱玛尔台”，也不理想。他又带着自己的13本经，从北京坐上拉煤的火车，二下河南洛阳，再找李忠信阿訇。见到李阿訇的时候，正赶上洛阳古城发大水，人们四处逃荒。李阿訇说：“你看水都没到房檐了，我还能招海里凡吗？”几经折腾，马延增身上的那点盘缠早花光了。没法子，他只好把身上穿的大褂卖了几个钱，坐上马鸿逵部队去北京拉饷的火车，到邯郸他姐姐家住了两天。随后，去陈村找郑方瑞阿訇。郑阿訇见他又黑又瘦，就掉泪了，“怎么折腾成这样了，哪儿也别去了，就在我这儿当海里凡吧！他在陈村待了不到1年，又回大名府东寺投学，最后，跟杨兆太阿訇到了朝城清真寺。

在朝城，马延增念了两年经，把杨阿訇教的经都念完了。杨阿訇对马延增说：“你能从头至尾把‘米鲁索尔台’念下来，我就给你挂帐。”“米鲁索尔台”是本经的名字，意思是“关口”讲的是“世间是大，人生是小”的道理。马延增每天念7张，抄7

张，再把附文“大哈尔滨”对照着看7张，一天2张，不到7天念完了。杨阿訇看了很高兴，他说，“你用这么一股劲念下来一本经，以后一辈子也不能有时间再念这么一遍经了。”

1936年，马延增35岁。杨兆太阿訇为他挂幛。“挂幛”是阿訇为海里凡办的毕业典礼，很隆重。挂幛时用1丈3尺的缎子做幛子，上面写着马延增阿訇，底下写着送幛子的乡老的名字，挂在大殿的门口。两边是两个对子，中间是“学成名立”4个大字。各处的乡老听说了，也都送幛子，一送送了不少。挂幛时他穿着当时时兴的马褂。

从朝城他回到了马时庄。

数月以后，马延增阿訇又经天津，到北京天桥投冶亮普阿訇，冶阿訇很痛快地收下了他。

旧社会的天桥很热闹，三教九流都在那里表演。有几个玩杂耍的叫“八大怪”很有点名气：摔跤的“神翻”，跟头翻的又高又飘；张宝忠举大刀，能举起200多斤重的大刀；“大兵黄”卖糖，穿一身国民党的旧军装，一边卖糖，一边骂大街；“大金牙”拉大洋片；“狗熊陈”拉大弓；“云里飞”胡编乱唱，逗乐……真是鱼龙混杂。

天桥清真寺的冶亮普阿訇管海里凡管得很严。清真寺里人才济济，马延增阿訇结识了几位很一般的朋友。一位叫丁克祥，会画石涛派的山水画，是洛阳人。一位叫孙宝宗，师范学校毕业，自小跟他的母亲学画，画一手好的水墨丹青。马阿訇跟着他们学画。“北京清真书画社”还约马阿訇写过字画。经人介绍，马延增还结识了张学良的前任武术教官赵瑞林，京剧名角李万春，跟他们一起练功。

在天桥，马延增念了不少经，在外边也小有名气，冶阿訇让他当了教小海里凡的小学阿訇，陆续收了几位小海里凡。马阿訇

每天下午花 3 个小时的时间给他们讲经，很受这些小海里凡的欢迎，他们中有的人干脆就说马阿訇是他们的老师。

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者的铁蹄打碎了马延增阿訇念经习武的平静生活，一些小海里凡相继离开了天桥清真寺。几经曲折，马阿訇随于少斋阿訇来到了东北长春。

长春长通路清真寺的建筑气势挺大，讲堂是清乾隆年间盖的。住的屋子和水房子底下都有暖道，脚踩上去热呼呼的。马阿訇刚到长春有两个月，于少斋就去了日本，让马阿訇给他看门，寺里的 10 多个海里凡，都由马阿訇代管。半年后，马阿訇又去北京前门清真寺代理阿訇，帮助于少斋阿訇带那里的海里凡。在寺里，他给海里凡讲《穆罕默德传》，每天一小节。后来，于少斋又让马阿訇又到长春，给他挂幛。挂幛以后，马延增又到农安做了三四年阿訇，在长春市二道河子清真寺做了一段时间的阿訇。长春临近解放时，他和于少斋留在长通路清真寺看管寺院。

解放以后，马延增阿訇任长春市二道河子清真寺阿訇。他关心国家颁布的重大政策法规，积极地讨论国家宪法草案，和街道的基层干部一起，接触群众，积极地工作，关心群众的疾苦。他被选为区人大代表，不仅受到回族乡老的拥护，当地汉族群众也都热忱地称他为“马代表”。以后，他又被群众推选为吉林省、长春市人大代表。

打倒“四人帮”，恢复了党的宗教政策以后，马延增阿訇继续担任二道河子清真寺阿訇。而且，马延增阿訇成为吉林省第一位朝拜沙特阿拉伯麦加禁寺内“天房”（克尔白）阿訇，圆满地完成了神圣的“五功”。1988年8月28日，马延增阿訇在长春无常。

# 中国道教协会会长黎遇航

袁志鸿 黄常伦

江苏省句容县境内的茅山道教宫观，是全国有名的重点宫观之一，被世人誉称为“第一福地、第八洞天”，又有“秦汉神仙府，梁唐宰相家”之说。他以独特的茅山道派驰名于海内外。

在辽阔的江南平原上，茅山之顶峰拔海高达370米左右，象一颗翡翠从平地凸起。老远望去，宫观耸入云霄，周围山峦叠翠，环境幽雅，景色秀丽。自西汉景帝时，茅氏三兄弟（茅盈、茅固、茅衷）来此隐居修炼后，茅山名声远扬。山上曾有三宫五观（九霄万福宫，元符万宁宫、崇禧万寿宫；德佑观、仁佑观、玉晨观、白云观、乾元观），计有房屋5 000余间，规模宏伟。虽经几次历史灾难毁坏，但名声不减当年。

这是一个引人想往的胜地。历史上曾有不少名人志士在茅山修炼，不少墨客诗人在宫观留名，更有不少帝王以能受茅山符箓为荣，不少群众赞扬茅山草药治病解难的功能。他们曾为茅山留下过不少诗章、经典、墨宝、古迹以及许多美丽的传说和动人的佳话。今日的茅山，既是香客中敬奉的道场，又是游客心目中游览的佳地。远至浙江、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和南京，近到茅山脚下的句容、金坛两县，上山的香客和游客，每天络绎不绝。殿内香烟缭绕，道乐声清脆悠扬。每逢春季香期，仅大茅峰顶上的“九霄万福宫”，那块蛋丸之地，一天上山人数达三四万人之多，更是热闹非凡。



茅山名人辈出，除茅氏三兄弟外，还出现过《抱朴子》一书作者葛洪、山中宰相陶弘景，以及杨羲、陆修静等历史上有名道士。当今的茅山，也出了一位受人敬仰的长者，他能书善画，对道教教理、教义和教仪、经忏、道乐等都有研究。他高身材而精瘦，皮肤黝黑，耿直开朗。一双有神的眼里，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那和蔼的脸上，显露出他对事业的忠诚和坚定。几十年来，他在维护道教事业、民族尊严和社会主义建设上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今年73岁，在北京白云观处理协会的各项工作，他就是目前中国道教协会会长，全国政协常委黎遇航。

黎遇航，道名黎顺吉，1916年旧历9月21日出生于金坛县西岗乡西城村。其母黎纪氏因外出未归，久无音信，当时只好将他送至姑母杨黎氏处抚养。其父黎洪春是瓦工，不幸因石灰爆炸使眼睛受到损坏，不能上高处做瓦工活。加之世道黑暗，于是对俗世心灰意冷，遂入江苏茅山元符宫西斋道院拜耿云清道长膝下为皈依弟子。他白天为道观劳作，夜晚即向耿道长学道。由于妻子遗下骨血，心中牵挂，遂使他常回俗家探视。其子在姑母的热心抚养下，长得健壮，人很聪明。待到四、五岁时，姑母知此子是兄长唯一的精神寄托，每逢父子相见，临别时都流露出念念不舍之情，于是劝兄长还俗归家。黎洪春因入道之心坚定，除儿子外，家中毫无牵挂，最终还是没有还俗回家。然而，他对儿子黎遇航确实难舍难分，经过再三思考，向妹妹提出说：“孩子已四五岁了，兄长我已能照料，想就此携往道观相依生活。”姑母听了，心里难受。但又想到，虽然姑侄情重，毕竟父子同心，后来也就让侄儿随父共赴玄门。

耿云清道长，道法高妙，人品高尚。他收的徒弟中最为得意者，当数徐龙田法师。徐法师人品、学问、道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凡道教音乐、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尤长于击鼓。他初时

起鼓，轻如蝉鸣，晴空万里，继之以千军过境，万马奔腾，又继之雷轰电闪，暴风骤雨，瞬间间，又云散莺鸣，青山万里。因此，耿云清道长最偏爱于他。元符宫由他所在的西斋也最发达。

黎洪春携子入道，耿道长见小遇航聪明伶俐，举止有礼，讨人喜欢，于是与众徒设宴接纳庆贺。酒至半酣，爱徒徐龙田又亲自下厨烹调两道拿手好菜：炒豆芽、蜜煎生梨片端了上来。耿道长兴致勃勃的说道：“今在座诸门下，法派为‘定、顺’二字辈。”一指坐在父亲身旁的小孩黎遇航说：“今‘顺’字辈可喜也有传人。洪春这孩子俗家时俗名为何？”黎洪春起而答道：“一直想请师尊赐名，故尚未有名字。”耿道长点头笑道：“取名‘顺吉’吧，其意是顺太上无为之法，兆我教继往开来，兴旺发达之吉。”众门下听了，纷纷起身举杯共祝。耿道长接着又说：“龙田可收其为徒。此子生有异相，举止不凡，好好调教，今后必有大成。”

顺吉四五岁就成了茅山道院的幼苗，在道院的仙风雨露中茁壮成长。

他生活在道观中，耳濡目染的全是虔城奉道，积善做人，修养长寿的一套说教，在日积月累中把自己培养成一个道性高尚的人。道法上，除有师傅徐龙田亲传专授外，还广泛接受其他师傅的专门指点。他虚心好学，颇受大家喜爱，道门中个人特长绝艺，象园艺工纷纷往这位道童身上浇灌，因而学道一事，成了他的轻车熟路。功夫不负苦心人，师傅们的辛勤培育，自己的勤苦修炼，很快使顺吉成了道院中的能人，凡诗词文章、琴棋书画、吹拉弹唱、念打斋醮，等等，各种道门绝技，无不知晓。

道院为培养道教后学，还专门聘请茅山当地知名的学子吴济之先生，到茅山道观元符宫设馆授学（吴后参加革命，抗战时先在茅山，后随军北撤过江，建国后一直勤勤恳恳为党工作，晚年逝于任上）。顺吉本来聪明好学，一得名师指点，如鱼得水。人品、

学问、道法，皆成上上之材。他很小就成了道场主力。每次做法事，都有师傅抱上醮瓊，请他在道场中担任高功（主管法事中的最高职位），代天说法，为善男信女们做超度、祭炼、祈福，消灾等法事。

当年龄逐渐成长，阅历也随之增长，知识也不断地有了提高，他的视野更开阔，想的问题也就更多了。十八九岁时，师傅徐龙田就让他承担了带徒任务。

第一个进门的徒弟是比自己小不了几岁的大小伙子，起名周念孝。后来，相继又进门 3 个徒弟：欧阳念平、陶念忠、汤念义。在学问上，他自可为人之师，但在年龄上，他毕竟还是一个小青年啊。他与 4 个徒弟互相体贴，亲如家人一样。然而，既然带了徒弟，这行为举止，就更要循规蹈矩。于是，他亦逐渐变得少年老成了。

这太平平的茅山本来真是世外桃源神仙福地。但自从“芦沟桥事变”的枪声一响，举国震动，国民党对日寇的入侵，采取不抵抗政策，大片河山沦入日寇铁蹄。“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茅山四野更是人心浮动。一片静池似猛地投入一块大石，全国都日益乱糟糟起来。过不完的广东兵，跑不尽的老百姓，国民党在逃跑，老百姓在逃难。庙里也住满了逃难者，大家还要往北跑。一天晚上，父亲对儿子说：“顺吉，你带上念孝往安徽去吧！听人说，日本兵过来可凶得狠，鸡犬不留。你是我的命根子，你不走，我的心不安啊！据说安徽那边的部队打鬼子。”

1937年冬，21岁的顺吉师傅带上比自己仅小几岁的徒弟，第一次走出茅山出门远行。没想到刚走到安徽含山地方时，竟各自走散。举目无亲，一片凄凉，连吃顿热饭也不可能。他从小在亲人和师长的抚慰中、溺爱下长大，哪曾吃过如此之辛苦。这人生的坎坷、艰辛，既使他增添了阅历，也使他对陷我山河的日寇增

加了切齿之恨。同时，还使他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徬徨。今后的路怎么走？这在他当时来说，完全是一个未知数。在安徽含山，他曾咏诗一首，以记当时之心情：

只身脱险到含山，受尽饥兮忍尽寒；  
自笑不如空际雁，家山万里任回还。

从安徽六安到固始，经人引导到了大别山。在这谷深林密的山区，真使人心中发怵，不由得引起人万千感慨。在此情景之中，他又咏诗以志情怀：

山路崎岖远，林深不见庄；  
迎风难跋涉，何处是家乡？

大别山有洪杨革命时李长寿的家。当时，那里的城墙、吊桥都存在，并还有武装维护，庄里管事的，据说是二寨主李修远。在这里，他遇见了原国民党国大代表巫兰溪（巫与吴济之是同学，后被蒋介石开除国大代表职衔）。后来，他由固始再到中州黄川，经河南兴阳，湖北孝感到武汉。

因怕飞机轰炸，只能晚上过江。1938年3月底，碾转到了湖南长沙，在长沙住了一个月，四月底又从株州到达江西樟墅，再到江西吉安时，遇到了与茅山紧相毗连的磨盘人周长青。周带新四军先遣队东进后，他不久也转回茅山，投入到茅山抗日的洪流之中。

1938年旧历8月14日，中秋的月儿就要圆了。没想到日寇乘这美好的节日，打破了茅山人中秋月圆团聚的美梦。日寇在这一天对茅山进行了残酷的清剿、扫荡。仅仅茅山三宫五观的道士，在这次劫难中就被日寇屠杀了30余名。元符宫勉斋道院有五名道士被逼着脱光衣服，然后一刀又一刀地被活活捅死。

国已不国，斯道安存？黎的两名爱徒汤念义、陶念忠是躲入地沟水道中，才幸免于难的。他们亲眼目睹了日寇对我们中国人

的残酷，连遁入空门中的道士都不放过。亲眼看到日寇用火枪点火烧宫观殿堂。日寇的暴行，可谓人神共愤！因此他们请求师傅，让他们参加新四军，去直接与日寇战斗。黎老毅然答允了他们的请求，支援他们参加革命。

汤念义，俗家常州金坛县（原丹徒县）登科乡朱村人。他找到新四军参加了樊玉林率领的四县总会（丹阳、丹徒、金坛、句容 4 县）他在新四军队伍中进步很快，被提升为后勤处事务长。有一次，新四军在茅山乾元观与日寇战斗，打得很激烈，他从后方唐家边（茅山地方村名）赶到前线参战，也就在这次战斗中，他光荣地献身于抗日救国的事业中。

陶念忠，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多次负伤，为民族独立、解放作出了血的贡献。建国后，他被安置在茅山下泊宫修养。

黎的父亲黎洪春，在 1938 年 8 月 14 日，日寇扫荡茅山时被抓住。日寇逼他带路上九霄宫，被拒绝所命，日寇恼羞成怒地将他刺杀于华阳洞顶的石头山上。抗战年代，茅山道士积极参加抗日救亡，他们为新四军带路，送情报，黎当时就是新四军一个情报站的站长。还有的看护伤员，参加锄奸，或直接参加新四军队伍。九霄宫有两个道士名叫陈宪荣、徐钦神。日寇占领九霄宫后，他们不屈于敌人的淫威，经常暗地里协助新四军锄奸。一次他们带新四军抓获一名汉奸潘翻译，后由于看管不慎，让其逃掉。潘翻译跑回据点即带鬼子上茅山顶宫，将两位道士抓获，带到句容县城，严刑拷问，死不招供。陈宪荣被日寇枪杀，徐钦神则被伤心病狂的日寇放出狼狗活活咬死（潘认识茅山道士。潘建国后被枪毙）。这些国仇家恨，使黎对日寇恨之入骨，这种民族仇恨，他至今不能释然。

日寇盘据在九霄宫制高点，控制着茅山地区抗日军民的活动。新四军曾组织强攻，试图拔掉这颗钉子，但敌人居高临下，强攻

损失太大，没有效果。1945年农历 7 月，抗日组织召集道教界人士和其他社会各界人士，在金坛境支河高南庄开会商量这件事，提出待日寇换防间隙，出其不意上山将庙烧掉。黎老表态说：“顶宫住鬼子，对革命有害，烧了吧！”于是动员九霄宫七老太滕瑞芝等，将道观贵重东西搬下山。因当时茅山社会情况复杂，土匪活动猖狂。为保护道士搬移安全，新四军负责人说：“你们搬东西下山，有我们新四军负责，无人敢抢。现在将庙烧了，革命成功了，再造。”

总算熬过来了，抗日战争胜利了，解放战争胜利了。江南行政公署立即派一位名叫张燕的同志来茅山组织道士学习，帮助道观土改。黎与道观的七老太滕瑞芝，吴老太吴鸣皋等茅山老一辈的道教界人士，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学习革命道理，坚决表示茅山道士要跟共产党走。黎并帮助组织道士学习，最后顺利地组成了互助组。根据他当时的年龄，文化才干，工作能力等条件，组织上希望他能顾大局，为茅山的教育方面做些工作。于是，他服从组织的安排，下山到下泊宫担任学校教师。1951年至1957年7月，他一直坚持在那里工作，历任教师、校长。在此期间，1953年，他被选为句容县人民代表，1954年被江苏省政协聘为政协委员。

1957年，道教界名宿于北京发起组织“中国道教协会”。因工作需要，同年9月，他奉调到“中国道教协会”工作，担任副秘书长职务。1961年12月，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职务。

文革期间，他于1969年被疏散，带薪回江苏茅山。但他并不消沉，他积极参加地方的血防、节制生育等项工作。并认真撰写《茅山抗日革命史》，利用各种机会向社会各界宣传，介绍茅山抗日战争中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和英雄事迹。

1980年，中国道教协会恢复工作，他又重新被调回北京，担

任中国道教协会会长职务。同年他被聘为“全国政协委员”。

1987年，他被聘为“全国政协常委”，他还是“全国老龄书画协会会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理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等等。

现在黎老虽然鬓发染霜，但仍然在精神饱满地为道教继往开来的事业积极地工作。他常说：“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 也就没有我们道教今天的兴旺发达，更没有我个人的一切成绩。因此，我们道教界人士，更要爱国爱教，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

## Zhongjiao Mingren Zhuanji

宗教名人传记

佟杰 主编

责任编辑：尚尔元

封面设计 孙梦白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32开本 7.625印张 2插页 178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3号)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印数：1—4 440册 定价：4.60元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 7-80528-435-0/K·193



# 前 言

宗教，作为一种超自然的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以至于今天仍然继续存在，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对此，社会学家可以从各种角度进行探索和研究。本书作为宗教名人传记，只是把宗教人士的各种人生记叙出来，既是一部人物传记，也是一本史料专集。

在许多人心目中，宗教是一个神秘的世界，对于宗教人士，头上更是笼罩着神秘的光环。他们是一些怎样的人？他们是怎样走上宗教道路的？又是怎样生活的？他们所经历的是一条什么样的人生轨迹？这些对于社会学家最有价值、对于普通人最感兴趣的题目，恰恰是宗教人士很少谈论的问题，这正是宗教问题独特的方面，正因为知此，编写这样一本传记更具有独特的价值。社会各界需要了解宗教人士，宗教人士也需要了解社会各界。许多宗教名人作为宗教界的各级领袖，是联系政府与信教群众之间的纽带，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需要经过他们向信教群众进行宣传贯彻，并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信教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也常常通过他们向党和政府反映。因此，了解宗教人士，正确处理各种宗教问题，对于社会的安定和民族的团结，对于抵制国际反动势力的渗透和颠覆活动，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我们本着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